

# 中国商事调解年度报告

## ( 2023-2024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  
2025 年 1 月

## 编辑委员会



### 编委会：

主    编：蔡晨风、武长海

编    委：沈四宝、范愉、李虎、温先涛、刘敬东、郭恒亮、陈福勇、  
姚俊逸、王芳、薛源、赵云、沈健、周建华、黄静怡

执行编委：姚俊逸

### 编写组：

王泓鑫、韦洁、成晨、刘莘睿、李林益、李怡薇、李新磊、连俊雅、  
何依宁、杨雯婷、吴铠安、张薛、郝洁若、姚扬、袁杜娟、袁睿、  
徐睿宁、钱云济、殷智航、郭思锐、黄雯欣、黄静怡、傅泽豪、  
程华儿、潘雅葵、潘墨泽

# 前言

2024年7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化律师制度、公证体制、仲裁制度、调解制度、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其中，对调解制度改革作出部署，强调要健全国际商事调解制度。2024年5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国办发〔2024〕23号），把《商事调解条例》作为预备项目列入其中，以加强对商事调解工作特别是涉外商事调解工作的指导，持续推动完善商事调解制度规范。商事调解制度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自《中国商事调解年度报告（2022—2023）》发布以来，商事调解领域在多个维度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和完善，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和全新的格局。为了准确把握商事调解领域的最新动态，全面梳理其发展轨迹，并深入剖析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效与面临的挑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委托中国政法大学武长海教授组建课题组，专项开展《中国商事调解年度报告（2023—2024）》的课题研究工作。本报告将结合调解实践中的最新数据和案例，深入探讨商事调解在实践中的应用、制度改革的推进，以及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推动商事调解制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本报告存在以下五大亮点：

第一，全面梳理了中国商事调解法律规范、组织发展、人才培养、案件处理及学术研究实现的显著突破。首先，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律文件，尤其是《商事调解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为商事调解工作提供了法律指导。其次，商事调解组织的数量大幅增加，新设立的商事调解组织达到306家。再次，商事调解案件数量大幅增长，比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在2024年上半年受理案件6366件，标的额达到397.8亿元。最后，商事调解的学术研究成果数量增多，国际性研讨活动频繁举办，提升了我国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的影响力。

第二，从调解主体和功能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六大商事调解模式的新发展。“调解+仲裁+诉讼”模式充分发挥调解的灵活性、仲裁的保密性以及诉讼的权威性各自的优势，形成了以调解前置、仲裁和诉讼托底的模式；“诉前调解+N”调解模式以商事调解机构为主导，以法院、仲裁机构等为辅助，更高效地化解了中小企业间的商事纠纷；“法律+科

技 + 调解”调解模式结合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极大地释放了时间和经济成本；“法院 + 商会”调解模式依托法院的司法权威，结合商会的行业专业性，构建起多元、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助力民营企业化解经营纠纷；“专业调解 + 便捷机制 + 多元供给”调解模式实现各部门资源共享，推动调解常态化、服务精准化；“公益性调解 + 市场化解纷”调解模式结合了公益性调解的社会责任与市场化调解的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当事人需求，实现纠纷的高效解决。

第三，聚焦知识产权和金融调解领域展开深入研究。在知识产权调解领域，全面梳理整体态势，明确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由五大部门及典型国际组织 WIPO 共同推进。提出“持续拓展深化‘云平台’模式，完善功能，整合资源并强化数据分析；夯实‘诉调对接’机制，拓宽适用场景；强化专业人员培训，提升调解员业务能力”等建议。在金融调解领域，不仅全面呈现金融调解政策概况及各机构职责运作，构建完整组织架构体系，还展示了多地创新路径，并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得出关键启示。例如，加强调解队伍建设，健全调解机制，加大宣传力度，加强与各方合作，为金融调解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第四，从域外视角对标探索国际上商事调解规则的发展变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第一，基于比较法的视角与方法，选取了商事调解领域的重要国家、国际组织，对其调解规则的变化进行了深入讨论。第二，立足国情，整体围绕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规则新发展展开，从背景、规则内容、规则突破，最后到规则亮点，层层递进，各部分紧密相连，清晰把握商事调解规则发展脉络与核心要点，理解各环节因果关系。第三，在讨论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调解规则时，报告从条文规范出发，既有全景式扫描，又有重点规则的集中分析，以期对域外调解制度的内容和特点进行体系化论述。

第五，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发展历程及国际适用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从既有商事调解研究来看，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全面观察尚属首次。一方面，以详实数据和典型案例剖析《新加坡调解公约》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情况，考察不同法域的立法衔接、司法适用及执行障碍。另一方面，结合“一带一路”倡议背景，探讨如何借助《新加坡调解公约》优化我国商事调解制度，提升国际话语权。同时，全面考察《新加坡调解公约》全球推广情况及适用挑战，使理论分析与实践考察相互映照。

最后，承蒙最高人民法院、商务部、司法部等部门和机构的鼎力支持与悉心指导，在此致以诚挚感谢。我们衷心希望，本报告不仅能为 2023—2024 年度商事调解事业的发展提供深刻的理论和实践参考，也能作为推动中国商事调解制度持续完善与发展的重要一环，为我国商事调解事业的蓬勃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助力其迈向更加稳健与卓越的未来。

#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中国商事调解年度发展情况·····	1
一、中国商事调解制度建设年度进展·····	1
(一) 中国商事调解法律规范的年度进展·····	1
(二) 中国商事调解机构规则的年度进展·····	5
二、中国商事调解组织建设年度进展·····	7
(一) 市场需求催生下的商事调解界定·····	7
(二) 商事调解组织机构建设情况·····	9
(三) 调解人员队伍建设情况·····	14
(四) 在线调解平台建设情况·····	16
三、中国商事调解案件情况年度进展·····	17
(一) 年度案件数量总体统计情况·····	17
(二) 不同案源渠道案件类型分析情况·····	19
四、中国商事调解学术研究年度进展·····	20
(一) 中国商事调解文献研究情况·····	20
(二) 中国商事调解学术会议情况·····	25
(三) 中国商事调解学术比赛情况·····	27
(四) 中国商事调解学术研究年度进展评价·····	28
第二章 中国商事调解模式新发展·····	30
一、“调解 + 仲裁 + 诉讼”模式 ·····	30
(一) “调解 + 仲裁 + 诉讼”模式的内涵和应用 ·····	30
(二) “调解 + 仲裁 + 诉讼”模式的特点 ·····	36
(三) “调解 + 仲裁 + 诉讼”模式的效果评价 ·····	37
二、“诉前调解 + N”的调解模式 ·····	38





(一) “诉前调解+N” 调解模式的内涵和应用 .....	39
(二) “诉前调解+N” 调解模式的特点 .....	41
(三) “诉前调解+N” 调解模式的效果评价 .....	44
三、“法律+科技+调解” 的调解模式 .....	47
(一) “法律+科技+调解” 调解模式的内涵与应用 .....	47
(二) “法律+科技+调解” 调解模式的特点 .....	51
(三) “法律+科技+调解” 调解模式的效果评价 .....	52
四、“法院+商会” 的调解模式 .....	55
(一) “法院+商会” 调解模式的内涵与应用 .....	55
(二) “法院+商会” 调解模式的特点 .....	60
(三) “法院+商会” 调解模式的效果评价 .....	62
五、“专业+便捷+多元供给” 的调解模式 .....	63
(一) “专业+便捷+多元供给” 调解模式的内涵与应用 .....	64
(二) “专业+便捷+多元供给” 调解模式的特点 .....	67
(三) “专业+便捷+多元供给” 调解模式的效果评价 .....	69
六、“公益性调解+市场化解纷” 调解模式 .....	71
(一) “公益性调解+市场化解纷” 调解模式的内涵与应用 .....	71
(二) “公益性调解+市场化解纷” 调解模式的特点 .....	75
(三) “公益性调解+市场化解纷” 调解模式的效果评价 .....	77
第三章 重要商事领域争议调解发展观察 .....	81
一、知识产权争议调解观察 .....	81
(一) 知识产权争议调解概况 .....	81
(二) 知识产权争议调解的创新措施 .....	87
(三) 知识产权争议调解的典型案例及分析 .....	96
二、金融争议调解观察 .....	102
(一) 金融争议调解概况 .....	102
(二) 金融争议调解的新动向 .....	108
(三) 金融争议调解的典型案例及分析 .....	123
第四章 国际商事调解规则新发展 .....	128

一、域外典型国家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的新发展·····	128
（一）美国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的修订·····	128
（二）日本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的修订·····	134
（三）澳大利亚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的修订·····	138
（四）新加坡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的修订·····	142
二、主要国际组织商事调解规则的新发展·····	146
（一）国际商会的商事调解规则·····	146
（二）知识产权国际组织的商事调解规则·····	151
（三）国际金融组织的商事调解规则·····	155
（四）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国际投资争端调解规则·····	158
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规则的新发展·····	164
（一）商事调解规则新修订的背景·····	164
（二）新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及其内容·····	167
（三）新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的亮点·····	171
（四）借鉴国际经验与接轨实践·····	174
（五）首创性贡献·····	176
第五章 新加坡调解公约五年观察（2019–2024）·····	177
一、《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静态观察·····	177
（一）《新加坡调解公约》概述·····	177
（二）《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影响力·····	190
二、《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全球实践·····	197
（一）《新加坡调解公约》加入情况概述·····	197
（二）《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实施情况·····	210
三、中国视角下的《新加坡调解公约》·····	226
（一）中国与《公约》的关系·····	226
（二）《公约》对中国的影响·····	228
结语·····	237
附录 1：2023–2024 年中国商事调解发展大事记汇总·····	240
附录 2：2023–2024 年度地方商事调解规范性文件·····	258



附录 3：2023—2024 年度全国登记的商事调解组织 .....	270
附录 4：2023—2024 年度商事调解学术活动汇总表 .....	288
附录 5：国际商事调解相关文件和规则名称对照表 .....	293



## 第一章 中国商事调解年度发展情况

本章通过筛选、汇总和整理相关数据，对 2023 年 12 月初至 2024 年 11 月底中国商事调解在制度建设、组织发展、案件处理及学术研究等方面的进展进行梳理和分析，旨在全面把握我国商事调解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为推进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以助力构建更优质的营商环境。

### 一、中国商事调解制度建设年度进展

#### （一）中国商事调解法律规范的年度进展

2023-2024 年度中国商事调解在政策法律规范层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的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与商事调解相关的政策法律规范，正逐步推进完善我国商事调解制度规范。

##### 1. 中央政策法规层面商事调解年度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置于前面，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2024 年 7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机制”“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化律师制度、公证体制、仲裁制度、调解制度、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其中，对调解制度改革作出部署，强调要健全国际商事调解制度。2024 年 5 月 6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 2024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国办发〔2024〕23 号），把《商事调解条例》作为预备项目列入其中，以加强对商事调解工作特别是涉外商事调解工作的指导，持续推动完善商事调解制度规范。目前，已形成了《商事调解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根据北大法宝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本年度关于商事调解的中央政策法律规范包

括中央部委政策文件 2 部、司法解释及司法文件 2 部。<sup>①</sup>（详见表 1-1）。

表 1-1 2023-2024 年度中央商事调解的规范性文件

类型	名称	发布时间	相关内容
中央部委政策文件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	2023.12	鼓励经营主体选择商事调解和仲裁机构解决商事争议纠纷。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 - 2027 年）》	2024.01.22	鼓励商事调解组织开展涉外商事纠纷调解，探索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商事调解制度规则。
司法解释及司法文件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2023 修正）》（法释〔2023〕14 号）	2023.12.18	完善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方便当事人运用信息化平台解决国际商事纠纷。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法〔2023〕247 号）	2023.12.22	

## 2. 地方法律规范层面的商事调解年度进展

根据北大法宝数据库的检索结果，2023-2024 年度使用商事调解的地方法律规范包括地方性法规 23 部（省级地方性法规 10 部、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 12 部、经济特区法规 1 部）、地方政府规章 2 部、地方规范性文件 18 部、地方工作文件 109 部，共计 152 部。笔者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省级地方性法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地方规范性文件、地方司法文件、地方工作文件进行分析。（详见附录 2）<sup>②</sup>

<sup>①</sup>笔者以“商事调解”为关键词，以“中央法规”为检索范围，公布年份设定为 2023 年和 2024 年，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30 日。

<sup>②</sup>笔者以“商事调解”为关键词，以“地方法规”为检索范围，公布年份设定为 2023 年和 2024 年，在“北大法宝”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30 日。

表 1-2 2023-2024 年度地方商事调解的规范性文件

规范类型	规范数量
地方性法规	23
地方政府规章	2
地方规范性文件	18
地方工作文件	109
总计	152

3. 中国商事调解法律规范年度进展评价

2023-2024 年度中国商事调解法律规范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进展，不仅完善了我国商事调解法律体系，还积极融入国际化发展趋势，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并充分体现地方特色和实践需求。这些进展为提升我国商事调解的规范性、国际影响力和适用广度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利于构建更高效、更包容的商事争端解决体系。

第一，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与商事调解相关的法律规范，这些规范的出台使得商事调解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为商事调解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2024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中提到“预备制定商事调解条例”。在具体立法方面，中国各地积极探索，出台了多项促进商事调解发展的条例。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第 43 条规定：“鼓励商会、行业协会等依法设立商事调解组织，加强投资、金融、证券期货、保险、房地产、工程承包、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等领域民商事纠纷调解。”《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第 60 条第 2 款规定：“支持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等按照市场化方式为民营经济组织提供调解服务。”《杭州市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条例》第 47 条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商事调解相关制度，指导和监督商事调解活动，推动建立商事调解行业诚信体系，并定期向社会公开监督管理情况。”《东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 56 条第 2 款规定：“加强对商事纠纷的监测、预警，防止和减少商事纠纷的发生。鼓励和引导纠纷各方优先选择商事调解、商事仲裁等非诉讼途径化解纠纷。加强信息化技术在商事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应用，推进商事纠纷在线咨询、在线评估、在线调解和在线确认工作，实现纠纷网



上化解。”这些条例为商事调解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法律指导，有助于发挥好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第二，注重国际化发展。多个法律规范强调了商事调解的国际化发展，如鼓励在合作区依法开展国际商事调解等。这些法律规范的实施有助于提升我国商事调解的国际化水平，增强我国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机构积极推动商事调解组织的国际化发展，致力于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商事调解组织，打造国际商事调解的“中国品牌”。目前，国内依法登记设立的商事调解组织数量不断增加，其中不乏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的组织。这些组织不仅在国内商事调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在国际商事调解中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商事调解规则的制定和修订工作，为推动国际商事调解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中国还积极支持国内商事调解组织参与国际商事调解活动，建立国际商事纠纷联合调解机制，为国际商事争端多元化解机制的构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例如，《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服务工作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决定》中规定：“支持境外商事调解组织在符合境内监管要求条件下，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设立业务机构，提供国际商事调解服务。”《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第75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商务、知识产权等有关部门应当依法通过行政奖励、行政确认、行政协议等方式，支持律师事务所、涉外商事仲裁机构、涉外商事调解机构等法律服务机构和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为各类创新主体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海外知识产权维权等提供服务。”《北京市外商投资条例》第27条第1款规定：“本市支持商事调解组织开展涉外商事调解，鼓励国际商事调解组织设立办事机构。”《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持续打造“三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中提到：“健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进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和律师参与商事纠纷调解。加快国际化、专业化商事仲裁机构和商事调解中心建设。”

第三，注重地方特色，强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2023-2024年度，中国在注重地方特色和强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各地在出台商事调解法律规范时，充分考虑了本地的实际情况，同时鼓励多种调解方式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制定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法律规范。例如，《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支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高地若干政策的通知》中提到“支持郑州经开区设立郑州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分支机构”。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关于支持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高端法律服务业集聚的实施办法（修订）》的通知（2024）中规定：“经业务主管部门批准在前海合作区新设立或新迁入的仲裁、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查明、商事调解、合规等机构，可以给予一次性50万元的落户支持。”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十条措施”》中的第4条措施为：“合力深化商会商事调解培育培优行动。提炼推广全省商会商事调解培育培优行动经验做法，将商会商事调解工作情况纳入全省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发布商会商事调解通报及典型案例，宣传引导市场主体更多选择商会商事调解化解纠纷。”《杭州市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条例》第21条规定：“本市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律师调解、商事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有机衔接、协调联动，各有关国家机关和组织、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调解工作格局。”《海东市平安建设条例》第12条第1款规定：“市、县（区）平安建设组织协调机构应当推动建立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商事调解、诉讼、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作用，促进社会矛盾纠纷及时有效化解。”《阳江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33条第1款规定：“本市推动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纠纷源头预防和前端化解，鼓励市场主体选择商事调解机构和商事仲裁机构解决商事争议。”

总之，中国商事调解法律规范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通过完善法律体系、注重国际化发展、注重地方特色以及强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中国商事调解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未来，中国将继续加强商事调解的规范化管理和发展创新工作，为推动商事纠纷的高效、便捷解决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支持。

## （二）中国商事调解机构规则的年度进展

### 1. 中国商事调解机构规则年度进展概况

2023-2024 年度成立的商事调解组织中，制定的调解组织规则有《上海市虹口



北外滩多元商事调解中心调解规则》《滨州黄河民商事调解中心调解规则》《深圳市证信民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工作规则制度》《上海奉贤区东方美谷调解中心调解规则》《上海市松江区枫华商事调解事务所调解规则》《上海市松江区智城商事调解事务所调解规则》《上海浦东新区中泰金融商事调解中心调解规则》《上海市宝山泛亚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调解规则》等，这些规则的基本内容包括调解宗旨和原则、调解范围、调解程序、调解效力、附则。亦有调解组织在已制定规则的基础上，根据商事调解的实践对规则进行了修订，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新修订了《调解规则》，该规则于2024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上海市松江区智城商事调解事务所于2024年7月30日修订了《调解规则》；上海市松江区枫华商事调解事务所目前适用的《上海市松江区枫华商事调解事务所调解规则》是2024年7月29日新修订版。

## 2. 中国商事调解机构规则年度进展评价

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和效率对于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具有重要意义。高效的争议解决机制不仅是经济秩序稳定发展的保障，更是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之一。通过对2023-2024年度中国商事调解机构规则的梳理和评价，商事调解在提升争议解决效率、保障当事人权益、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引入创新机制，以丰富调解手段、提升调解效率。在商事调解领域，创新机制的引入无疑为争议解决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可能性。各地商事调解组织积极尝试并推广了一系列创新机制，这些机制不仅丰富了调解手段，也提升了调解效率和当事人的满意度。例如，联合调解机制通过组织多方参与调解，为复杂商事争议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调解与仲裁相结合的模式则打通了调解结果与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实现了调解结果的高效执行。此外，多元化争端解决辅助服务，如在线调解、法律咨询支持和专家意见等显著降低了争议解决成本，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加灵活、高效和便捷的选择。这些创新手段不仅拓展了商事调解的应用场景，还增强了调解结果的法律效力和可执行性。

这些成果表明我国商事调解正逐步走向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和国际化。然而，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规则制定日趋规范化，但依旧存在适用“人民调解”的情况。中国商事



调解机构在规则制定方面呈现出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趋势。一些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商事调解组织都制定了详细的调解规则，明确了调解程序、调解员的职责和职业道德、调解结果的法律效力等关键要素。但仍有未制定详细调解规则的商事调解组织，它们大多仅仅明确工作原则、业务范围、调解程序、收费标准等事项，没有形成系统性的规则，在商事调解过程中更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进行调解。

第二，地域分布仍存在不平衡性，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虽然全国范围的商事调解组织发展迅速，但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种不平衡性不仅体现在商事调解组织的数量和规模上，也体现在调解规则的完善程度、调解员的专业素养以及调解结果的法律效力等方面。这可能与当地的经济水平、法治环境、调解资源等因素有关。商事调解机构应继续加强规则制定的规范化和专业化，进一步完善调解程序、调解员的职责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规定。同时，应积极探索创新机制，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为当事人提供更加高效、便捷、公正的争议解决服务。此外，还应加强地域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商事调解组织的均衡发展。

## 二、中国商事调解组织建设年度进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之一的调解愈发受到重视，各层级配套立法迅速推进，民商事调解实践范围也愈加扩大、理论体系愈加成熟，商事调解组织与调解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商事调解组织机构也在这一过程中迅速发展。

### （一）市场需求催生下的商事调解界定

商事调解与人民调解、法院调解等调解方式存在显著区别。传统的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等方式虽然能够应对大多数民事、民间纠纷，并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法律保障，但在应对商业领域的复杂纠纷时，往往显得专业性不足，难以完全满足商事纠纷当事人的需求，为填补这一空白，商事调解和商事调解组织机构应运而生。通过专业化、市场化的调解服务，商事调解组织能够为商事纠纷各方主体提供更为精准、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案。商事调解和人民调解分别对应着市场和社会的两



股力量，因此，通过二者的比较以清晰界定商事调解的概念。“商事调解”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因商事争议，自愿在商事调解组织和商事调解员主持下友好协商解决纠纷的活动。而“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sup>①</sup>人民调解更多地关注家庭、邻里、劳动争议等涉及民生的纠纷，强调社会和谐和社区稳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性。商事调解与人民调解虽然同属于调解这一纠纷解决形式，同为民商事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渠道，但二者在适用范围、调解主体、调解员以及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差异：

第一，商事调解与人民调解在适用范围上有显著差异。商事调解主要适用于商事领域发生的纠纷或争议，包括贸易投资、金融、运输、房地产、工程建设、知识产权、技术转移、数据流通等领域因商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其中婚姻家庭、继承、监护等争议；劳动人事争议；消费者权益保护争议；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权属争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争议等不适用于商事调解。而人民调解的适用对象则是民事纠纷，更具体而言是熟人之间发生的日常生活性纠纷，是关于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sup>②</sup>

第二，商事调解与人民调解调解的主体有所不同。商事调解由商事调解组织机构主持进行，主要是专门成立的具有专业性和一定资质要求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或由商会行业协会设立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而在人民调解中，根据我国《人民调解法》的规定，人民调解实施主体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通常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sup>③</sup>

第三，商事调解员与人民调解员在专业背景上有显著差异。商事调解员通常具有法律、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背景，并具备丰富的商业经验或法律实务经验。同时，商事调解员还要完成不少于一定学时的培训课程并经过考核，且需要每年参加

---

① 《人民调解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

② 参见梁德阔：《论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基于民间纠纷的考察》，载《民间法》2023年第1期。

③ 《人民调解法》第8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至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必要时，可以设副主任若干人。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有妇女成员，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应当有人数较少民族的成员。

培训。《人民调解法》规定，人民调解员应当由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成年公民担任，<sup>①</sup>通常是社区或村里的居民、热心人士、退休干部或法律工作者，他们依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调解工作。总的来说，商事调解员和人民调解员在职责范围、专业背景和调解对象上存在显著差异，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满足不同类型纠纷当事人的需求。

第四，商事调解与民事调解的理念与价值追求存在不同。商事调解的理念和价值追求体现在其对商业纠纷解决的高效性，追求使当事人尽早恢复正常的商业运作。商事调解还追求维护商业秩序和市场稳定，通过非对抗性、合作性的方式，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从而减少因诉讼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的市场风险。商事调解不仅关注争议的解决，更注重从长远的商业和社会利益出发，优化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商业活动的可持续发展。而民事调解依靠民间力量解决民间纠纷，更多体现了社会自治、群防善治以及多元联动的理念，追求和谐这一价值。<sup>②</sup>

## （二）商事调解组织机构建设情况

商事调解组织机构是指依法成立的、由专业商事调解员组成、专门从事商事纠纷调解服务的组织机构。根据司法部《关于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作用推进诉源治理的意见》，商事调解与人民调解、律师调解、行业调解与行政调解等共同构成了化解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的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种类繁多，主要是由社会力量举办并运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和商会协会等设立的事业单位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此外也有自然和法人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性质以及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

市场化、专业化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为商事纠纷各方当事人提供了多样化的调解渠道选择空间。就商事调解组织具体数量构成而言，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是商事调解组织机构的主体、占商事调解组织数量的绝大多数，并且

---

① 《人民调解法》第14条规定：人民调解员应当由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成年公民担任。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

② 参见刘坤轮：《人民调解制度的理念与价值》，载《财经法学》2015年第6期。

该类型商事调解组织机构地域分布广泛。而由行业协会、商会等设立的事业单位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无论是受案数量，还是案件金额及社会影响力，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并且由行业协会、商会举办的事业单位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在化解具有行业特点、专业性的商事纠纷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

### 1. 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建设情况

#### （1）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概况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力量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自愿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sup>①</sup>。因此民办非企业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则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社会力量自愿设立并运营的专门调解机构，其核心功能是通过非诉讼的居间调解机制有效解决商业争议。市场化商事调解组织机构旨在提供灵活、高效的商事纠纷解决方案，以非诉化的纠纷解决方式替代时间长、成本高的诉讼途径，降低各方纠纷解决时间、金钱成本，维护良好的商业关系，促进市场秩序。

商事纠纷数量激增以及商事调解的迅速发展导致市场对商事调解组织的需求不断增加，近年来国家层面不断强调纠纷矛盾的非诉讼解决途径以及依靠社会力量共治共享，作为商事调解市场化力量代表和主要构成的民办非企业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也处在快速发展阶段。本报告以“商事调解”为关键词，通过民政部“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进行检索，2023-2024年度以民办非企业和社会团体性质新设立的商事调解组织共306家。（详见附录3）

#### （2）民办非企业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的地域分布状况

本报告基于检索结果，根据地域范围将该类型的商事调解组织划分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商事调解组织、直辖市内的商事调解组织、设区的市内的商事调解组织。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商事调解组织位于国家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其享有更高的政策灵活性和制度创新空间，更加注重与国际商事调解规则的接轨。直辖市

---

<sup>①</sup>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内的商事调解组织位于中国的直辖市内，其更加注重调解的规范性和权威性，以满足直辖市内复杂多变的商事争议解决需求。设区的市内的商事调解组织更加注重调解的实用性和便捷性，以满足设区的市内中小企业和个人商事争议的解决为需求。

## 2. 事业单位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建设情况

由行业协会、商会设立的商事调解机构主要是指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及其各分会的调解中心、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设立的调解组织以及其他行业协会、商会下属的调解组织。协会商会类型的商事调解组织是商事调解组织机构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是事业单位性质，虽然该类型的调解组织数量远低于由社会化力量举办并运行的商事调解组织，但由于行业协会、商会在各自领域内影响力巨大、并且具有专业性，因此在解决行业内案情复杂、金额较大且社会影响广泛的商事纠纷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1）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及其各分会调解中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及其各分会的调解中心，是以调解的方式，独立、公正地帮助中外当事人解决商事、海事等争议的常设调解机构。该中心成立于1987年，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下设的专业调解机构，旨在通过调解途径解决国内外企业在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等领域的商事纠纷，并以此促进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为商事纠纷各方当事人提供公正、独立、高效的纠纷解决服务。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多为具有丰富国际贸易法律经验的专家和学者，能够提供专业的调解服务；同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的调解过程相对灵活，可以根据争议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注重维护双方的商业关系，调解程序也相对简便，通常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有助于快速解决纠纷；此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与多国商会和调解机构合作，具备处理跨国商事纠纷的能力。因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所进行的商事调解具有专业性、灵活性、高效性与国际化等特点。目前已在主要省市和行业设立了76个调解中心。

### （2）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下属的各调解组织

中华全国工商联简称全国工商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为主体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成立于 1953 年，致力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国工商联下属的各调解组织既包括全国工商联调解中心，也包括各地方工商联调解组织。全国工商联调解中心是全国工商联设立的专门调解机构，主要负责解决涉及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商事纠纷。全国工商联在各省、市、自治区设有地方分会，各地方工商联也设有相应的调解组织。这些调解组织根据当地的经济特点和实际需求，提供针对性的调解服务。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及其下属的调解组织通过提供专业、灵活和高效的调解服务，帮助非公有制企业解决商事纠纷，维护商事主体合法权益，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各地方工商联调解组织根据地域特点和实际需求，提供多层次、多领域的调解服务，为当地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 （3）证券业协会下属的商事调解组织

中国证券业协会以及各地证券业协会下设的证券纠纷调解中心，在维护投资者权益、促进金融市场和谐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纠纷调解工作管理办法》，中国证券业协会设立证券纠纷调解中心负责证券纠纷调解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sup>①</sup>并成立证券调解专业委员会研究、指导、处理与证券纠纷调解工作相关的专业问题。中国证券业协会设立专门的调解中心，在证券业内，对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证券业务纠纷进行调解，是《证券法》赋予证券业协会的法定职责，<sup>②</sup>主要目的是为了妥善处理证券纠纷，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除中国证券业协会外，北京、上海及深圳等地的地方证券业协会为解决证券期货等资本市场纠纷，也通过成立证券期货纠纷调解中心，对投资者与投资机构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以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为例，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是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和深圳国际仲裁院共同推动，由深圳

---

① 《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纠纷调解工作管理办法》第 2 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纠纷调解是指经纠纷各方当事人同意，调解组织通过说服、疏导、调和等方式，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和解，解决证券业务纠纷的活动。调解组织是指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纠纷调解中心以及接受调解中心委托转办证券纠纷调解案件的地方证券业协会。

② 参见施明浩：《金融创新下证券纠纷解决模式比较——从纠纷调解机制的视角》，载《证券市场导报》2013 年第 9 期。



国际仲裁院和深圳市证券业协会、深圳市期货业协会和深圳市投资基金同业公会共同设立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法人，对证券、期货、基金、风险投资等资本市场业务产生的纠纷进行调解。

#### （4）其他行业协会设立的商事调解组织

其他行业协会下属的事业单位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是指贸促会、工商联以外的行业协会所设立的商事调解组织，这些组织在其所属行业内提供专业的商事调解服务，以解决行业内的商事纠纷，维护行业秩序。以中国建筑业协会调解中心为例，其主要负责解决建筑工程、房地产开发等领域的商事纠纷。由行业协会设立的商事调解机构与其他商事调解组织机构相比专业性强，其调解人员大多为具有相应业内知识的专业技能人才和相关行业法律知识的法律专家，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除专门设立的调解中心等调解组织，各行业还以不同形式提供商事纠纷调解服务，以中国证券业协会为例，该协会在处理投资者与证券公司之间的纠纷时，设立了投资者投诉调解机制，当投资者未能通过证券公司解决问题时，可以向协会提出投诉，协会会协调双方进行调解，努力达成和解。

总言之，行业协会、商会类型的商事调解组织在中国商事纠纷的解决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发挥着其他类型商事调解组织机构无法替代的作用。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营商环境的改善、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对调解认识的提升，未来的商事调解将会更加专业、高效和便捷，行业协会类型的商事调解组织将为维护良好的商业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 3. 其他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情况

目前，我国的商事调解组织以非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为主，这是由于商事调解的专业性、行业性特点以及商事调解属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这一本质所共同决定的。但在实践中，越来越多其他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机构也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并为解决商事纠纷、优化营商环境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他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类型。

通过在企查查平台以“商事调解”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出目前存续的个人独资企业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共 9 家，分布在山东、山西、湖北、海南以及青海五个省级行政区。有限责任公司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共 35 家，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商

事调解组织仅一家，是注册地位于香港的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有限公司。<sup>①</sup>虽然目前企业公司性质的商事调解组织，无论是数量、规模或是受案数量及社会影响力，均远低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和事业单位性质的商事调解机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领域的不断扩展，这些产生于市场、服务于市场的商事纠纷解决力量一定会不断壮大，并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商事调解力量构成中的重要一极。

### （三）调解人员队伍建设情况

商事调解员是具体主持商事纠纷调解工作的人员，通常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行业专业背景，也是商事调解组织机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商事调解人员队伍建设状况，有助于从微观视角更好地了解商事调解组织机构建设的年度进展。

#### 1. 商事调解人员队伍资格要求状况

商事调解人员亦即商事调解员并非具有完全独立体系的职业，商事调解员属于“调解员”的其中一类，是专门从事商事领域纠纷的调解员，既具有调解员的一般性特征，又因商事领域的特殊性与专业性而具有自身的特点。由此，针对商事调解员应当设定一些任职的门槛性要求。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15条第2款规定：“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sup>②</sup>。地方法规无权对商事调解员的任职资格、许可做出任何规定或者限制。<sup>②</sup>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于2024年新修订

---

① 笔者以“商事调解”为关键词，在企查查平台上，分别将组织结构类型限定为“个人独资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股份有限公司”得到上述结果，最后检索日期为2024年12月15日。

② 《行政许可法》第15条规定：本法第十二条所列事项，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

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规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守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授予调解员资格规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行为考察规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培训规定》五项重要制度性规范提高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最低工作年限要求，规定一般情况下申请人需具备“十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才能被授予调解员资格，同时也将职称要求提高到了“高级职称”，以传递商事调解员应为高水平专业人士的价值导向。

特别是其中新增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培训规定》明确提出要推进调解员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高素质的调解员队伍。<sup>①</sup>此外该规定还强调，调解员培训应当遵循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能力、应训尽训的原则，除资格培训外，还应进行能力培训。这一规定体现了在新的商事纠纷状况和要求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要求调解员不断提升调解能力，以适应各种类型商事纠纷调解需要。同时，《商事调解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也提到了对调解员要每年参加培训的要求。

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发布的有关商事调解人员的任职资格和能力要求外，各地也发布了相关的要求、标准等，意图提升商事调解人员队伍的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商事纠纷解决。以广西为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西壮族区分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广西商事调解协会共同起草并颁布了《广西商事调解员职业能力要求》这一团体标准，具体规定了商事调解员所应当具备的专业能力与素质。

由此可见，虽然立法上仍然缺少对商事调解员硬性的任职资格要求，但调解组织可以通过内部的规章制度对商事调解员的任职资格做出一些限制性规定，从而提高商事调解员的任职门槛，提升商事调解人员队伍的整体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商事

---

<sup>①</sup>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培训规定》第1条规定：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章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规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守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授予调解员资格规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行为考察规定》，为推进调解员培训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高素质的调解员队伍，制定本规定。



调解，更高质量、更高效率地化解商事纠纷。

## 2. 商事调解人员结构状况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共有调解员 1000 余名，就调解员的工作领域来看，绝大多数调解员从事法学教育研究、法律实务、国际经贸往来等领域的工作。另外，根据各商事调解机构公布的调解人员名单、数据及问卷调查结果，各商事调解组织人员构成高度似同，调解人员队伍主要由律师、法学家、离退休法官、仲裁员、经贸实务工作者构成。例如，海南国际仲裁院调解中心关于调解员的数据显示：首批 346 名调解员均从本院仲裁员中遴选聘任，其中境内 265 人，港澳台及境外 81 人，分布于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 28 个国家和地区；法律实务类 244 人，教学研究类 51 人，经济贸易类 51 人；博士研究生学历 98 人、硕士研究生学历 147 人、本科学历 101 人；专业类型覆盖法律、经济贸易、金融、知识产权、海事海商等多个领域。<sup>①</sup>

### （四）在线调解平台建设情况

商事调解作为解决商业纠纷的重要手段，其在线平台的建设与发展对于提升调解效率、降低调解成本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商事调解在线平台的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商事调解在线平台通过整合多方调解资源，实现了服务的在线化、智能化和高效化，为各方当事人提供了便捷的线上调解渠道。这一模式特别适用于跨地域或复杂商事争议，突破了传统调解的地域限制，显著提升了效率。此外，在线平台支持实时信息更新，当事人可以随时跟踪调解进展，确保过程透明。同时，与传统线下模式相比，在线调解平台有效节约了时间和经济成本，进一步优化了争议解决的体验和效率。

商事纠纷在线调解平台包括传统线下调解组织新开设的线上调解服务，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平台，该平台通过“贸促调解”在线服务，支持跨国商事纠纷的调解。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平台外，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院在线调解平台、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

---

<sup>①</sup> 参见海南国际仲裁院官网，<https://www.hnac.org.cn/list/32.html>。

心)调解平台、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在线调解平台以及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在线调解平台等也提供在线商事调解服务。商事调解的在线调解平台也包括新兴的直接起源于互联网的在线调解平台,如中国(杭州)知识产权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

表 1-3 2023-2024 年度在线调解平台建设情况

名称	网址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在线调解平台	<a href="https://adr.ccpit.org/">https://adr.ccpit.org/</a>
北京仲裁委员会 / 北京国际仲裁院在线调解平台	<a href="http://www.bjac.org.cn/">http://www.bjac.org.cn/</a>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调解平台	<a href="http://www.shiac.org/">http://www.shiac.org/</a>
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在线调解平台	<a href="http://www.scia.com.cn/">http://www.scia.com.cn/</a>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在线调解平台	<a href="https://www.hkiac.org/">https://www.hkiac.org/</a>

目前,商事调解在线平台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应用,为适应互联网时代商事纠纷解决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在线解决渠道,尤其在跨地域商事纠纷中具有显著优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许多商事调解当事人通过平台成功解决了商业纠纷,降低了调解成本,维护了良好的商业关系。然而,商事调解在线平台适用范围仍较窄,有效性也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在线平台虽然提供了便捷、高效的调解服务,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着调解员素质参差不齐、调解协议缺乏强制执行力的问题。这将导致一些复杂的商业纠纷难以得到妥善解决,甚至可能引发更大的法律纠纷。因此,商事调解在线平台应在技术层面不断完善平台功能以提升用户体验,为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商业环境做出更大的贡献。

### 三、中国商事调解案件情况年度进展

#### (一) 年度案件数量总体统计情况

2020年至2023年底,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案件数量以约48%的增长速度逐年增加,分别为3809件、4989件、9531件和12509件。从案件来源来看,由法院转介的案件数量分别为2948件、3675件、7844件和10844件,





占比分别为 77%、75%、82.3% 和 87%。尽管调解中心案件数量逐年稳定增加，但案件来源较为单一，绝大部分为法院转介、且占比不断提高，少数来源于使馆、商会协会以及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委托。2024 年截至上半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共受理商事调解案件 6366 件，标的额为人民币 397.8 亿元，受案数量显著增加。

据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数据显示，该调解中心于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及 2023 年案件受理数量分别为 388 件、403 件、294 件及 293 件，调解成功案件数量则分别为 217 件、280 件、186 件及 201 件，案件涉及的标的额分别为 164.48 亿、115.68 亿、106.75 亿及 114.4 亿元。由此可见，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的受案数量并不稳定，且在 2021 年后连续两年下滑，标的额也始终未超过 2020 年案涉标的额。浙江省贸促系统（13 家调解机构）上半年共受理商事纠纷案件 807 件，案件标的额 10.59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62%、70%。而根据《滨州日报》报道，滨州市 2024 年以来全市商事调解组织成功化解各类纠纷案件 3253 件，涉案金额达 5.5 亿元。<sup>①</sup>据央广网报道，2023 年江苏全省各级商事商会调解组织累计化解纠纷 13960 件，标的总额 11.3 亿元。<sup>②</sup>同样，2024 年以来，西安市司法局按照全省试点部署，积极指导两家商事调解中心在商事领域开展纠纷调解，截至目前，商事调解试点机构共受理商事纠纷案件 2488 件，调解成功 433 件，司法确认 121 件，调解协议涉及标的金额约 8.3 亿元。<sup>③</sup>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2024 年 1-9 月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sup>④</sup>，诉前调解成功案件 1020.4 万件，同比增长 24.04%。15 家“总对总”合作单位共有 3.6 万家调解组织、8.4 万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参与调解，同比分别增长 15.89%、

① 参见隆卫：《商事调解组织化解各类纠纷案件 3253 件》，载《滨州日报》2024 年 9 月 29 日，第 3 版。

② 参见央广网、王锡斐：《2023 年江苏各级商事商会调解组织累计化解纠纷 13960 件》，载央广网 2023 年，[https://news.cnr.cn/local/dfj/20231225/t20231225\\_526533849.shtml](https://news.cnr.cn/local/dfj/20231225/t20231225_526533849.shtml)。

③ 参见陈少华：《西安市融合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法律有尺度 调解有温度》，载《西部法制报》2024 年 12 月 12 日，第 6 版。

④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2024 年 1-9 月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2024 年 10 月 16 日，<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45321.html>。



24.45%，接受法院委派诉前调解成功 116.3 万件，同比增长 11.37%。

综上所述，尽管各地商事调解案件数量存在一定波动，总体上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法院转介案件是案件的首要来源且占比仍在不断提高。各类市场主体对商事调解的需求仍在不断攀升，显示出商事调解在解决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和广泛前景。

## （二）不同案源渠道案件类型分析情况

目前，我国商事调解组织案源主要依赖于法院的委派或者委托，同时也有少量案件来源于使馆、商会协会以及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委托。

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为例：2020 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共受理商事调解案件 3809 件，标的额为人民币 32 亿元，其中来自法院案件 2948 件；独立承接或由相关商协会、驻华使领馆等转送案件 861 件，全年受理涉外商事调解案件 743 件。2021 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共受理商事调解案件 4989 余件，标的额为人民币 55.1 亿元，其中来自法院案件 3675 件，独立承接或由相关商协会、驻华使领馆等转送案件 1314 件，全年受理涉外商事调解案件 815 件。2022 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共受理商事调解案件 9531 件，标的额为人民币 179 亿元，其中来自法院案件 7844 件，独立承接或由相关商协会、驻华使领馆等转送案件 1687 件，全年受理涉外商事调解案件 963 件。2023 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系统共受理商事调解案件 12509 件，标的额为人民币 105.3 亿元，其中来自法院案件 10884 件，独立承接案件 1625 件，全年受理涉外商事调解案件 1273 件，占案件总数 10.18%。

### 1. 法院自调或委托案源渠道分析

从数量上看，近年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受理案件中，来自法院渠道的商事调解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从 2020 年的 3809 件增长至 2023 年的 10844 件。从比例上看，近年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受理的商事调解案件中，来自法院的案件比例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20 年，法院案件占比约为 77.4%；2021 年法院案件占比约为 75%；2022 年，法院案件占比约为 82.3%；2023 年，法院案件占比约为 87%。法院案源数量占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受案数量比例变化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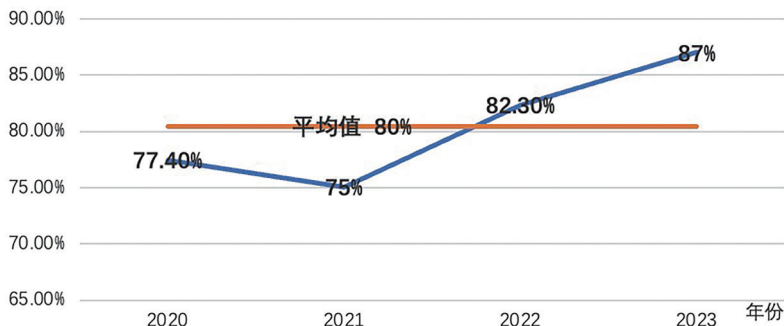


图 1-1 2020-2023 年法院案源数量占贸促会调解中心受案总数比例变化图

可见，2020 至 2024 年，来源于法院渠道的案件数量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受理的商事调解案件总量中占比均超过 75%，且平均超 80%，由此可见，法院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最重要的受案渠道。

## 2. 调解机构自主受理案源渠道分析

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深圳调解中心数据，其 2022 年自主受理的来自于当事人自行申请调解的案件数量仅有 18 件、2023 年仅有 10 件；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调解中心 2022 年受理的社会咨询的调解案件仅 21 件、2023 年仅为 8 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重庆调解中心由当事人自行申请调解案件 2022 年仅有 1 件、2023 年仅为 2 件。由此可见，商事调解机构自主受理案件数量不仅在年度受案比例中占比小、绝对数量也极少，自主受理案件渠道极为受限。而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数据，2020 年至 2024 年，独立承接或由相关商协会、驻华使领馆等转送案件合计分别为 861 件、815 件、963 件及 1625 件，不仅数量上远低于法院渠道案件，并且占案件总量比例也远低于法院渠道。

## 四、中国商事调解学术研究年度进展

### （一）中国商事调解文献研究情况

#### 1. 研究概况

在研究成果数量方面，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检索结果，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期间，共发表期刊论文 39 篇<sup>①</sup>，在近 20 年“中国知网”收

录的商事调解期刊论文发文量（见图 1-2）中排名前列；在期刊层次方面，发表在 CSSCI（2023-2024 版）收录的期刊共有 4 篇；在研究的主题方面，学者们特别注重《新加坡调解公约》相关的研究，涉及“《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论文共有 7 篇，占近一年发文总数的 17.95%<sup>②</sup>。学位论文方面，“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 2023 年“商事调解”主题硕士学位论文 16 篇，博士学位论文 2 篇；2024 年的硕士学位论文 4 篇，博士论文尚未收录。会议论文方面，“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会议论文 6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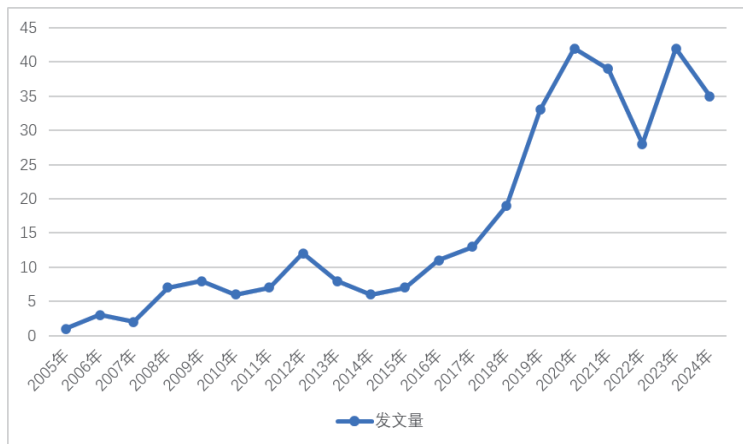


图 1-2 2005-2024 年“中国知网”收录的商事调解期刊论文数量

## 2. 商事调解立法问题研究

商事调解立法问题研究主要涉及商事调解立法的基础理论、《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商事调解的制度构建影响以及关于商事调解的比较法研究。

第一，商事调解立法的基础理论。赵毅宇从商事调解的立法理由体系化论证角度出发，认为商事调解具有特殊性，需要立法调整，完成了正当性论证。商事调解实践为立法提供稳定对象，其国际发展带来外压，国家规划产生内动力，立法解决合法性问题。立法可行性体现在法律规制逻辑、文本基础和实施推进机理，未来立

①笔者以“商事调解”为主题，以“学术期刊”为检索范围，时间范围设定为 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日期为 2024 年 12 月 5 日。

②笔者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主题，在前述“商事调解”的搜索结果中进行二次检索，时间范围设定为 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检索日期为 2024 年 12 月 5 日。

法应包含总则、组织规范、程序规范等。<sup>①</sup>周建华认为，商事调解法的立法应从整体调解法的角度考虑。未来在完善调解法律体系时，应采取宏观整合策略，即在已有的《人民调解法》基础上进行整合和修改，以社会调解为中心形成一部包含多种调解类型的综合“调解法”。<sup>②</sup>邹国勇认为，应当关注商事调解的保密原则。将来我国在制定商事调解法时，总则需引入调解保密的基本原则，而分则要明确保密的特殊情况。应具体界定调解信息可披露的对象和主体、披露的流程，以及对于不当披露行为所涉及的法律责任和可采取的补救措施。<sup>③</sup>

第二，《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商事调解的制度构建的影响。刘敬东认为，我国需制定《商事调解法》并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以解决《人民调解法》无法覆盖的商事调解专业性问题。立法应参考《国际商业调解和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示范法》，结合我国特点和立法惯例，将《商事调解法》分为国内和涉外调解两大部分，并设立“涉外调解篇”。<sup>④</sup>张生认为，中国应建立一套规则以支持《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执行，借鉴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经验，并积极运用司法解释。立法中应纳入个人主导的调解机制，利用律师等专业人才。同时，立法应构建国际和解协议的有效性确认机制，并将投资者与国家间的争端纳入可调解范畴。<sup>⑤</sup>祁壮认为，应加快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以适应国际商事调解趋势。在自贸区试点开放调解市场，引入国际知名调解机构，建立区分国际与国内商事和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双轨制。<sup>⑥</sup>许志华认为，应当准确评估《公约》对我国的影响和风险，通过双轨制处理《新加坡调解公约》关键条款；适用范围的界定方面，要将以“营业地”作为是否具有“国际性”的依据，以减轻不利影响。明确“经调解”条款的效力，设置“岔路口”条款，明确机制转换和程序变更的效力。应当做好批准前的试行工

① 参见赵毅宇：《中国商事调解立法理由的体系化展开》，载《中国海商法研究》2023年2期。

② 参见周建华：《中国调解立法整合的范畴与体系》，载《商事仲裁与调解》2024年第1期。

③ 参见邹国勇：《论商事调解保密例外的价值、规则及边界》，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

④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中国商事调解立法”研究课题组、刘敬东：《论我国商事调解立法的必要性、立法路径及立法框架》，载《人民调解》2023年第1期。

⑤ Zhang Sheng,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And China' S Commercial Mediation: Toward A Full-Fledged Regime, 11 China Legal Science82 (2023).

⑥ 参见祁壮：《国际商事调解发展的新趋势与我国的应对》，载《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作，在自贸区、自贸港试点建立直接执行机制，专属管辖区际和香港调解院的执行案件。<sup>①</sup>而在《新加坡调解公约》以外，学者也重点关注其他法域的调解立法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赵希、伍俐斌认为，可以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的“示范法”模式，适时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示范法”。<sup>②</sup>

第三，商事调解的比较法研究。刊物《人民调解》的“国外调解”专题共收录论文15篇，该专题以域外法为研究对象，从比较法视野重点介绍了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国的商事调解制度，给予我国商事调解制度以更多的域外经验与完善角度。

### 3. 商事调解应用情况研究

商事调解应用情况研究主要是从商事调解的实际运用情况出发，总结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对策建议。

第一，在组织和队伍建设方面，学者们主张应加强调解员的培养。姚俊逸认为，长期以来，商事调解被认为观念陈旧、方法过时，常被视作“和稀泥”。调解员需依靠个人威信、专业技能和精湛技艺，确保调解流程的顺畅；应持续提升调解能力，寻找双方共同点，帮助当事人达成共识。此外还应当强化调解培训，提升调解技巧。<sup>③</sup>蒋惠岭认为，商事调解商事调解资源配置不足，虽有社会资源支持，市场资源未充分发挥。需加强调解队伍建设，提升职业化水平。此外，调解国际化有待提高，需建立适合的管理体制，解决收费问题，培养高层次、专业化、国际化调解员，构建高标准调解制度。<sup>④</sup>

第二，在地区先行实践方面，学者们主张应利用地方立法权，充分探索商事调解制度构建。陈瑞云从海南自贸港的商事调解实践情况出发，认为海南自贸港商事调解机制面临挑战：概念适配冲突、个人调解制度缺失、调解机构和队伍不完善以及调解协议执行路径不畅通。海南应利用其自主立法权进行先行先试。具体措施包

① 参见许志华：《我国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问题与对策》，载《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2期。

② 参见赵希、伍俐斌：《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规则衔接问题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24年9期。

③ 参见姚俊逸：《关于我国商事调解的几点思考——从加强企业自主优先的角度分析》，载《中国法治》2024年第3期。

④ 参见蒋惠岭：《论商事调解新理念与相应的改革对策》，载《中国法治》2024年第3期。

括明确“国际性”认定标准和商事争议范围，确立个人调解制度并赋予其与机构调解同等的法律地位，加强调解机构管理，培养调解员人才，并确保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sup>①</sup>陈旭东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面临三大挑战：首先，商事调解在调解机构中占比低；其次，内地商事调解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程序、案源和收费等方面存在问题；最后，内地调解组织与港澳相比市场化和专业化程度低，粤港澳间调解员资格、机构资质和协议互认存在难题。应发展“枫桥经验”，完善调解工作格局。<sup>②</sup>郭子平则关注深圳经济特区的立法实践。目前深圳市规范调解的专门立法缺位，商事调解主体资质不明确会削弱机制透明度和可预测性，这将阻碍市场化、公平化发展。非官方认证的第三方调解协议难以司法确认，仅具合同约束力，易引发违约和执行难问题。新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有效解决了商事调解的“效率”“效能”“效果”“效益”问题，为我国落地《新加坡调解公约》提供了制度参考。<sup>③</sup>

#### 4. 商事调解协议执行研究

商事调解执行的研究多聚焦于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效力与执行模式等问题。冯冬冬指出中国商事调解协议缺乏执行力和专门法律、调解员规范不完善等问题，难以与国际公约对接。建议建立直接执行机制，完善法律体系和调解规则，制定调解员守则，以强化执行制度。<sup>④</sup>江保国认为，《新加坡调解公约》主要围绕商事调解协议的既判力和执行力构建，与多国法律存在冲突，也挑战传统商事纠纷解决理论。执行中调解协议的强制效力难以合理解释，应理解为合同效力基于双方意愿，而既判力和执行力则源自公约和国内法。<sup>⑤</sup>庄诗岳认为，国际商事调解协议跨

---

①参见陈瑞云：《〈新加坡调解公约〉视域下海南自贸港商事调解机制创新研究》，载《新东方》2024年第1期。

②参见陈旭东：《推进商事调解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载《中国法治》2023年第11期。

③参见郭子平：《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特区立法：问题争议、解决机制及制度贡献》，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④参见冯冬冬：《〈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中国国际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的完善》，载《国际法研究》2023年第2期。

⑤参见江保国：《〈新加坡调解公约〉下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载《国际法研究》2024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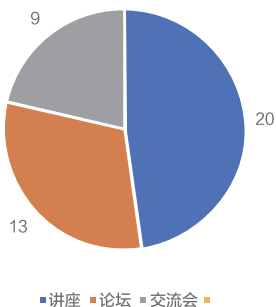


境执行有五种模式，各有优势和局限。我国立法是否应明确建立无需起源国复审的直接执行模式，需深入研究。在立法决策前，可在自贸区和粤港澳大湾区试点，根据试点效果确定最适合我国的执行模式。<sup>①</sup>王涵认为，我国应确保直接执行的和解协议包括国际与国内和解协议，包括机构调解和临时调解产生的协议，同时排除具有作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执行可能性的和解协议。<sup>②</sup>

## （二）中国商事调解学术会议情况

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期间，各单位主办或赴境外参加学术研讨活动42场，笔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活动10场列于表1-4，其余完整表格详见附录4。<sup>③</sup>从活动类型来看，包括讲座、论坛、交流会等多种类型，讲座20场，占比47.62%；论坛13场，占比30.95%；交流会9场，占比21.43%。从活动规模、影响力、参会人员来看，涵盖国际性活动、全国性活动、地方性活动，其中国际性活动13场，占比30.956%；全国性活动15场，占比35.71%；地方性活动14场，占比33.33%。

2023-2024年商事调解学术活动类型分布图



2023-2024年商事调解学术活动规模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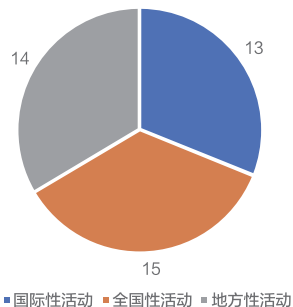


图 1-3 2023-2024 年度商事调解学术活动统计图

①参见庄诗岳：《论国际商事调解协议跨境执行的模式》，载《商事仲裁与调解》2024第3期。

②参见王涵：《〈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范围探析》，载《国际商务研究》2023第4期。

③笔者以“商事调解”“学术会议”“讲座”为关键词，在“微信搜狗”“百度”“必应搜索”等搜索引擎进行检索，筛选出日期为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的搜索结果，检索日期为2024年12月5日。



表 1-4 2023-2024 年度商事调解学术活动汇总表

举办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主题	主办方
2023 年 12 月 8 日	第十六届“WTO 法与中国论坛”分论坛暨第三届三亚国际商事调解论坛	海南特色涉外法治人才体系建设	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海南法学会
2024 年 3 月 8 日	商事调解理论与实务研讨会	商事调解的创新与发展、商事调解的立法模式等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调解学院）
2024 年 4 月 27 日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事调解专业交流会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调解风控暨培训质效论略、商事调解在中国的司法确认等	广东省律师协会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委员会与跨境争议解决法律专业委员会
2024 年 8 月 2 日	第十二届全国调解理论与实务研讨会	调解法治化、信息化与多元共治	上海政法学院
2024 年 8 月 10 日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调解中心商事调解系列讲座	中国商事调解的新理念与新思维、商事调解产业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等	湖南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调解中心
2024 年 10 月 14 日	第二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仲裁调解周“商事调解制度的创新发展圆桌沙龙”	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商事调解的改革创新和持续发展	珠海国际仲裁院（横琴国际仲裁中心）、横琴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2024 年 10 月 22 日	2024 华语律师大会（专题活动）——跨境商事调解合作发展路径探索	跨境商事调解合作发展路径探索	深圳市前海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深圳市商事调解协会
2024 年 11 月 6 日	中国人民大学第十一届“明法学术月”开幕讲座：一带一路商事多元化解决机制新进展讲座	一带一路商事多元化解决机制新进展	中国人民大学
2024 年 11 月 8 日	第三届新时代调解论坛	新时代新征程调解制度的创新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湘潭大学、宁波市人民调解协会
2024 年 12 月 18 日	第三届国际调解论坛（2024）	调仲诉机制结合、跨文化国际调解等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仲裁研究院

(三) 中国商事调解学术比赛情况

商事调解类学术比赛在中国高校中尚属“新兴”，但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较成熟的一系列国际商事调解赛事，例如每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全球商事调解竞赛、在中国香港举办的 ICC-Hong Kong 全球商事调解竞赛以及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调解竞赛等。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我国代表团参加的商事调解学术比赛共计 3 场<sup>①</sup>（见表 1-5）。

表 1-5 2023-2024 年度商事调解学术比赛汇总表

举行时间	比赛名称	比赛地点
2024 年 2 月 5 日至 10 日	第 19 届 ICC 国际商事调解大赛	巴黎
2024 年 8 月 24 日至 25 日	第 8 届 ADC-ICC 亚太商事调解大赛（APCMC）	线上
2024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日	第 3 届 ICC-HK 国际商事调解比赛	香港

2024 年 8 月 24 日至 26 日，第 8 届 ADC-ICC 亚太商事调解大赛（APCMC）在线举办。澳大利亚争端中心（Australian Disputes Centre）携手国际商会（ICC）共同主办了本次竞赛。此次竞赛专注于提升学生在商业调解领域的专业技能，为未来的法律和商业专业人士提供实践平台。APCMC 面向全球法学院、商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的学生开放，旨在通过模拟国际商业纠纷的调解过程，培养学生的谈判技巧和问题解决能力。竞赛吸引了来自澳大利亚、中国、印度等地的顶尖大学学生团队参与。

2024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日，第 3 届 ICC-HK 国际商事调解比赛于香港举行。国际商会国际商事调解比赛－香港（ICC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Competition－Hong Kong）是由国际商会（ICC）香港分会与香港律政司主办的年度调解比赛，是香港地区唯一专门致力于国际商事调解的比赛。大赛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商学院、法学院的参赛队伍，以及国际知名调解员和专业人士。在比赛期间，

<sup>①</sup> 笔者以“商事调解”“学术竞赛”为关键词，在“微信搜狗”“百度”“必应搜索”等搜索引擎进行检索，筛选出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的搜索结果，检索日期为 2024 年 12 月 5 日。



参赛者将运用 ICC 的友好争议解决规则，解决由国际调解专家特别模拟的商业争议情境。大赛赛题将会于正式比赛前发放到各赛队，每支赛队需要准备一份对赛题的简要书面分析。比赛期间，组委会还将组织特别培训活动，邀请专业人士举行讲座分享其经验以及实践经历。

2024 年 2 月 5 日至 10 日，第 19 届 ICC 国际商事调解大赛（19th ICC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Competition）在法国巴黎举行。这项比赛由国际商会（ICC）主办，旨在通过模拟调解会话，让学生们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同时与世界顶级调解专家互动，提升调解技能和问题解决能力。本次活动包括了 100 多场模拟调解会话，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48 支学生队伍参与竞赛。在比赛期间，参赛队员在专业调解员的指导下，运用国际商会调解原则解决国际商业纠纷。在赛事之外的交流活动中，160 多名专业调解员和培训师向选手分享自己在解决跨境争议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最终，来自爱尔兰的代表队赢得了冠军。

#### （四）中国商事调解学术研究年度进展评价

2023–2024 年度商事调解学术研究成果、学术研讨活动领域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取得显著进展，但是本土学术竞赛仍然有发展空间。

第一，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双双提升。商事调解领域的研究成果数量较往年呈现出显著增长，表明学术界对商事调解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发表在 CSSCI 收录的期刊论文数量也有所增加，这也体现了研究成果质量的提升。特别是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相关的研究发文数量增多，这为我国商事调解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此外，我国学者在关注国际商事调解发展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事调解制度，例如在商事调解的本土化实践方面，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商事调解实践被学者们积极讨论，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商事调解的理论体系，也为我国商事调解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二，学术研讨活动频繁，国际交流加强。学术研讨活动涵盖了讲座、论坛、交流会等多种类型，这些活动的举办为商事调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平台，促进了国内外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一些国际性活动的举办，如“国际商事调解发展研讨会”和“沪港商事调解论坛”，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了我国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我国商事调解的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国际学术竞赛发展成熟，本土学术竞赛有待培育。在全球范围内，商事调解学术竞赛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例如国际商会（ICC）全球商事调解竞赛等，这些赛事在促进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实践平台。相比之下，中国境内的商事调解类学术比赛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的培育和发展。虽然国内已有高校参与国际商事调解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但本土举办的商事调解学术比赛相对较少，且影响力和参与度有待提升。因此，未来应加强本土学术竞赛的组织和推广，通过竞赛激发学生对商事调解的兴趣，为专业人才培养添砖加瓦，同时也提升中国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第二章 中国商事调解模式新发展

随着商事调解的不断发展以及其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地位不断突显，全国各地商事调解模式持续创新发展，各有特色，成效显著，在推动商事纠纷多元高效解决、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章将从模式内涵、实际应用、特点及效果评价等方面详细介绍 2023—2024 年度中具有突出发展的六大商事调解模式。在实践基础上总结而来的六大商事调解模式主要从商事调解主体的不同以及功能等方面进行划分。总而言之，我国的商事调解模式正朝着更加专业化、高效率的阶段迈进。

### 一、“调解 + 仲裁 + 诉讼”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对其不断进行改革完善，适应新时代要求，而“调解 + 仲裁 + 诉讼”模式的发展正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响应，通过整合调解的灵活性、仲裁的保密性和诉讼的权威性等多种解纷方式，提升治理效能。在 2023—2024 年间，各地对这一模式的实践应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 （一）“调解 + 仲裁 + 诉讼”模式的内涵和应用

“调解 + 仲裁 + 诉讼”这一模式是纠纷解决中组合拳的创新运用，这一模式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而来，是一种调解在前、仲裁及诉讼托底的“一站式”商事纠纷分级化解模式，在法院和仲裁机构双方或其中一方主导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可在商事调解机构中就纠纷达成和解、签署和解协议，并进行司法确认或仲裁裁决的模式。该模式是集多元化专业调解、仲裁理念、线上线下灵活调解方式及司法确认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性商事纠纷解决模式，旨在通过高效、专业的调解服务，为商事纠纷提供公正、便捷的解决方案。“调解 + 仲裁 + 诉讼”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

##### 1. 涉外商事纠纷：江门华侨华人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三地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日益频繁，贸易、投资、



金融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涉侨商事纠纷类案件数量显著增长。这些案件呈现出涉侨商事法律事务办理难、域外法律查明难、涉外诉讼流程复杂等难点，为满足华侨华人的多元法律服务需求，广东省江门市采取了多项创新性举措。<sup>①</sup>

第一，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深圳国际仲裁院江门中心、江门仲裁委员会共同签署《华侨华人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合作协议》，三方合作共建华侨华人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引进国际仲裁员、法律专业人士等作为商事调解员。深圳国际仲裁院的调解中心在一起涉外商事纠纷案件中创新运用了“调解 + 仲裁 + 诉讼”的模式，成功调解了一起涉澳商事纠纷。该案件涉及作为买受人的澳门某建筑公司与作为出卖人的境内某木合板厂的买卖合同的货款给付纠纷。为了降低双方当事人的时间成本，法院在深圳国际仲裁院的调解中心主持线上调解，最终双方在线签署了解决协议。该案的解决途径充分展现了“调解 + 仲裁”是民商事纠纷的“润滑剂”，通过该模式，双方快速、高效地解决了纠纷，实现了双赢的局面。

第二，三方将共同推进委托调解机制和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定期合作举办多元化解纠纷争议解决论坛、推动开展调解员业务培训交流等措施，提升华侨华人国际商事调解中心高效、专业、和谐解决纠纷的能力，为广大华侨华人提供高效便捷的商事纠纷法律服务，更高水平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涉侨商事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

第三，探索新的调解模式。江门中院和深圳国际仲裁院江门仲裁委员会共同以华侨华人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的成立为契机，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法律资源优势，创新探索“调仲诉”对接调解模式，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广大华侨华人以更和谐、更快速、更有效、更节省的方式解决各种国内外商事争议。

## 2. 上海开展商事纠纷解决一体化建设

2024年4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与上海仲裁委员会签署《关于发挥仲裁优势、共建一体化商事纠纷解决新平台合力推进商事纠纷多元化解的战略合作协

---

<sup>①</sup> 参见李霭莹：《华侨华人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在江门揭牌 推进涉侨商事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载《南方日报》2023年11月29日，第6版。

议》，打造一体化商事纠纷解决新平台。此次平台的构建对商事调解而言有如下创新点。<sup>①</sup>

第一，形成调解在前、仲裁及诉讼托底的分级化解模式。即若先行调解成功的，当事人既可以选择仲裁程序确认，又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出具民事调解书。若先行调解不成功的，则尊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权利。

第二，建立仲裁员与调解员的双向交流机制。即闵行区人民法院内设调解室，由上海仲裁委选派仲裁员进行调解，闵行区人民法院亦可推荐调解员，经确认后纳入调解员名册，为中外当事人提供便捷、多元、高效的纠纷解决途径。

第三，确立“有偿+低成本”的调解工作模式。即针对该区域商事纠纷案件整体量大、涉及中小微企业多、个案标的额相对低等特点，上海仲裁委“有偿”支撑专业调解队伍建设，以“低成本”吸引更多商事纠纷导入调解赛道，探索市场化运作机制。

第四，建立特定类型案件“优先推送”机制。充分发挥仲裁、调解在涉外、金融、知产类案件以及新类型、新业态商事纠纷解决中的优势作用，优先引导这些类型的纠纷进入仲裁、调解程序，推动商事纠纷化解机制降费、减时与增效。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与上海仲裁委的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仲裁机构、商事调解中心的专业解决纠纷的优势，构建仲裁联动调解机制，进一步释放了商事调解的服务潜能，并同时构建与诉讼相衔接的商事争议多元解决模式。

### 3. 金融纠纷调解：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成立“仲裁调解中心”

2024年5月，为了更好实现诉前调解、机构仲裁以及司法裁判三者的良性互动，湖北省荆州市采取多项举措。<sup>②</sup>

一是湖北省“荆州仲裁委员会驻沙市区人民法院调解中心”在沙市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挂牌成立，这标志着“调解+仲裁+诉讼”模式的全面启动。此次合作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调解+仲裁+诉讼”模式在大调解格局层面充

<sup>①</sup> 参见魏其濛：《上海闵行法院探索一体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载法治网，[https://m.cyol.com/gb/articles/2024-04/11/content\\_GqYQGqtzxw.html](https://m.cyol.com/gb/articles/2024-04/11/content_GqYQGqtzxw.html)。

<sup>②</sup> 参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新闻处、民四庭：《“调解+仲裁+诉讼”荆州法院构建商事纠纷多元化化解新模式》，载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网 2024 年 5 月 8 日，<https://jzszy.hbfy.gov.cn/DocManage/ViewDoc?docId=180c7206-4ff8-4005-8f2e-4c0bedfa4eba>。

分发挥各主体的优势。“荆州仲裁委员会驻沙市区人民法院调解中心”作为荆州市首个“仲裁调解中心”，是调解中心、仲裁委、法院三家机构的连接机制的探索成果，完善了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构建了以诉前调解为基础，司法审判、仲裁裁决为保障的多元纠纷解决协作机制。其次，这一模式体现了各自纠纷解决途径的特点。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充分发挥了“调解”快捷高效，“仲裁”高保密性、低成本性和“诉讼”强制执行的优势，让政府力量与司法力量共同作用，成就新时代基层网格治理实现良法善治的新实践。最后，这一模式展现了个性与共性并存的特点。沙市区人民法院作为荆州市首家合作法院，将先行先试、深耕细作，努力探索出一条既有地方特色，又有普遍适用性的多元纠纷解决道路，让仲裁调解工作室成为多元纠纷解决工作的“金名片”。

二是荆州仲裁委员会与沙市区法院签署了《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合作备忘录》，“调解+仲裁+诉讼”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新机制将在金融纠纷领域实体运行。2024年8月，荆州沙市区市人民法院“仲裁调解中心”与荆州仲裁委员会成功实现首例金融纠纷诉讼转仲裁案件的调解。某银行荆州分行涉及的两起金融贷款纠纷案件，在仲裁员的指导下，双方当事人通过线上调解平台在线签署了和解协议，案件得到成功化解。这进一步突显了在金融纠纷案件中诉调对接机制的程序便利，彰显了“调解+仲裁+诉讼”模式在深化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持续优化金融领域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起着重要作用。<sup>①</sup>

#### 4. 其他省区市县陆续建立商事纠纷调仲诉对接工作机制

为深入贯彻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衔接，推动诉源治理工作，全国各地开花，纷纷建立了“调解+仲裁+诉讼”多元商事纠纷调仲诉对接工作机制。

##### （1）广东省肇庆市四会法院的“调解+仲裁+诉讼”模式

广东省肇庆市四会法院与肇庆仲裁委员会、肇庆市正兴商事调解中心联合签署

---

<sup>①</sup> 参见姜涵：《全市首例！金融纠纷诉讼转仲裁案件成功调解》，载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网2024年8月9日，<https://www.jzszy.hbfy.gov.cn/DocManage/ViewDoc?docId=e7682f02-20f3-4add-984a-1a71320b2879>。



《关于共同建立四会市商事纠纷调仲诉对接工作机制合作备忘录》，构建商事纠纷“调解+仲裁+诉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共同促进商事纠纷高效解决。三者建立仲裁引流机制和诉中委托调解机制、协助调解机制。经审查符合法院立案条件的一审商事纠纷，且适合由肇庆仲裁委仲裁或者正兴调解中心先行调解的，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四会法院可引导当事人进行诉前仲裁或调解。此外，《关于共同建立四会市商事纠纷调仲诉对接工作机制合作备忘录》还明确规定了律师调解员回避机制，即律师调解员主持调解后，当事人仍坚持诉讼的，该律师以及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均不得担任同一案件的代理人。<sup>①</sup>

### （2）湖北省武汉市经开区法院的“调解+仲裁+诉讼”模式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与武汉仲裁委员会共同签署《“诉讼+调解+仲裁”多元解纷合作备忘录》，双方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民商事、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利用武汉仲裁委员会广泛联系社会专业纠纷解决力量的人才和制度优势，构建诉讼与仲裁共同参与、共同协作、共同治理的联动解决工作体系，并就建立联席会议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宣传引导机制、案件分流机制、协作调解机制、联合培训机制、工作联系机制和法律保护工作站等八个方面达成合意。法院将诉前调解的案件分配给调解中心，调解成功后根据当事人的意愿，一是可以由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确认作出裁决书或调解书，无需再返还给法院进行司法确认，可使争议得到及时解决，化解社会矛盾。二是可以由法院进行司法确认，进行司法权威保障。同时，武汉市经济开发区作为国际级汽车产业集群的核心承载区，科技创新能力旺盛，由此产生的知识产权维权纠纷和相关案件层出不穷。因此，此次合作模式的构建将进一步扩宽知识产权纠纷非诉解决渠道，对于深化知识产权纠纷协同治理机制具有重大意义。<sup>②</sup>

### （3）海南省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的诉调对接合作机制

2024年4月，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与海南国际仲裁院建立诉调对接

<sup>①</sup> 参见刘畅：《四会法院与肇庆仲裁委、正兴商事调解中心建立商事纠纷调仲诉对接工作机制》，载微信公众号“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6月7日。

<sup>②</sup> 参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民庭：《“法院+仲裁”|“诉仲联调”聚合力 多元解纷开新局》，载微信公众号“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4年10月17日。

合作机制，共同签署《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合作备忘录》，建立长效沟通与合作机制，更好凝聚调解合力、强化诉调对接。自从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建院以来，持续依法开展知识产权纠纷的诉讼与调解对接工作，以服务保障自贸港建设为着力点，不断加强与调解机构的对接和共商共建工作。此次《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合作备忘录》的签署进一步丰富了知识产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进一步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保护条例》《海南省多元化解纠纷条例》，更好地实现司法资源与社会资源交融共享，共同持续把深化调解作为服务民生、化解矛盾、防范风险的源头性、基础性、根本性工作，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大合力。<sup>①</sup>

#### （4）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人民法院的“调解 + 仲裁 + 诉讼”模式

2024年8月，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人民法院与大连仲裁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推进诉讼与仲裁相衔接的民商事纠纷调解机制建设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创新“法院 + 仲裁”解决民商事纠纷的新模式，以依法、自愿、依程序为原则，经当事人同意后，由当事人签订《调解程序协议》及《补充仲裁协议》，调解员将案件优先委派至仲裁委员会进行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后向当事人送达调解书。此种运作模式的优势在于案件由仲裁委员会进行调解可以让当事人在最短时间1—2日内收到裁判文书，并节省案件受理费的支出。除此之外还具有调解员可供选择、审理方式灵活等优势。<sup>②</sup>

#### （5）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法院的“调解 + 诉讼 + 仲裁”模式

2024年8月，湖北省黄冈仲裁委员会在黄州区法院堵城法庭挂牌成立民商事调解中心驻黄州区法院工作室，联动开展调解工作。“法院 + 仲裁”化解矛盾的方式结合了“诉前调解”的快捷高效、专业便民以及“确认仲裁”的高保密、低成本的优势，为当事人提供了多元维权途径，及时有效地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法院 + 仲裁 + 调解”模式亦是构建非诉走在前面、诉调衔接的矛盾多元化解体

<sup>①</sup> 参见陈蔚林：《海南国际仲裁院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建立诉调对接机制 推动诉讼与非诉化解纠纷方式衔接》，载《海南日报》2024年4月28日，第2版。

<sup>②</sup> 参见孙玢：《诉仲衔接，让民商事纠纷调解更高效》，载微信公众号“庄河市人民法院”2024年8月6日。



系的一项重要举措，打通民商事“预防、调解、仲裁、诉讼”周期流程，实现了从“裁审止争”到“源头化解”的转变。<sup>①</sup>

## （二）“调解 + 仲裁 + 诉讼”模式的特点

### 1. 专业团队主导

在“调解 + 仲裁 + 诉讼”的合作模式下，调解员通常是具备丰富调解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员：一是可以由仲裁委选派的调解员进行调解；二是可以由法院推荐调解员，经确认后纳入调解名册；三是由知名高校教授或者专业的执业律师来担任调解员。调解员的多元渠道来源旨在打造一批具有代表性、专业性、高质量的商事调解员队伍。此外，调解员通常会接受系统培训，通过“传帮带”模式学习调解经验、调解技巧、沟通交流方式以及学习调解平台全流程操作等，全面提高和强化诉前特邀调解员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以确保调解过程的公平性和规范性。

### 2. 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

对于双方当事人而言，“调解 + 仲裁 + 诉讼”的合作模式为其提供了个性化解决方案。具体体现在：一是提供多元化纠纷解决途径。即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法院可以引导当事人进行诉前仲裁或者调解。法院、仲裁委、调解组织三方主体共同建立中立第三方评估机制，聘请调解专家担任评估员。当事人根据评估员出具的评估报告，对案件诉讼风险进行预测，以此选择调解、仲裁、诉讼等多元解纷路径。二是能够高效化解矛盾。即通过“调解 + 仲裁 + 诉讼”合作模式，可实现法院、调解组织、仲裁委员会的无缝对接，高效化解矛盾。三是程序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在该模式下，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调解员、调解场所和调解时间等。此外，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意愿进行灵活调整程序，以满足当事人个性化需求。

### 3. 司法确认保障

在“调解 + 仲裁 + 诉讼”的合作模式中，经过法院委托仲裁调解中心调解或

---

<sup>①</sup> 参见陈星：《黄州好“枫”光：“法院 + 仲裁”诉裁联动 走出解纷优途径》，载微信公众号“黄冈市黄州区人民法院”2024年8月23日。



者法院与仲裁委进行合作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在法院引导下当事人可借助此调仲诉的衔接机制申请司法确认，通过司法权威更进一步保障了调解的累累硕果。具体而言，司法确认在该模式中起到了如下作用：一是增强了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即通过法院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从而将原本只具有合同效力的和解协议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二是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司法确认不仅为和解协议提供了法律保障，还增强了调解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切实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提高了当事人选择调解作为纠纷解决方式的热情。三是进一步保障了多元化解机制的运行。即司法确认制度为建立多元纠纷化解机制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使得当事人有更多的可供选择的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调解+仲裁+诉讼”的多元解纷合作模式在提供多元化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法院在该机制中的主导作用，保障了司法诉讼的权威性，能够很好地满足当事人的个性化司法需求。此外，通过司法确认，可以有效地稳定法律关系，维护社会稳定。

### （三）“调解+仲裁+诉讼”模式的效果评价

#### 1. “央地协同”联动化解机制

“调解+仲裁+诉讼”合作模式在实现“央地协同”联动化解机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其通过中央和地方各层级之间的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化解商事争议和纠纷，实现央地协调、联动解纷。一是中央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指导意见，为地方提供指导和支持，提出要实现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多元化解纠纷机制的有效衔接和相互协调。二是建立系统性联动机制，地方法院与仲裁委员会共同建立高效、系统、顺畅的对接机制，形成覆盖不同地域层级、涵盖各纠纷多发领域的联动工作体系。

#### 2. 矛盾纠纷前端化解，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调解+仲裁+诉讼”这一合作模式高度重视纠纷源头化解工作，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起到了“抓前端、治未病”的重要作用，是企业妥善化解商事纠纷、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优化营商环境的保障。一方面，这种合作模式以商事调解在前、仲裁和诉讼托底衔接，降低了纠纷解

决成本，还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亦促进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优化，一是其为市场主体提供了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途径，降低了企业的法律成本和时间成本，使得企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社会生产中。二是调解作为第一道防线，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高效、灵活地解决商事争议，且仲裁作为中间环节，充分发挥其保密性的特征，为市场主体提供更高水平的解纷服务。三是诉讼作为保障手段，确保了纠纷解决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减少了诉讼总量，维护社会稳定。

### 3. “三位一体、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

“调解 + 仲裁 + 诉讼”这一合作模式将法院、仲裁机构、调解组织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完善了调解、仲裁、诉讼有机结合的大调解工作格局，通过各方资源的整合和信息的共享，构建一个以诉前调解为基础，以司法审判、仲裁裁决为保障的多元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平台，共同参与纠纷的预防和化解，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诉前调解、机构仲裁以及司法裁判三者的良性互动，从而更有效地化解商事纠纷。部分地区根据数据显示，自实施该合作模式以来，呈现出结案率显著提升、案件数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等现象，直观展现了“调解 + 仲裁 + 诉讼”工作机制的实效。

综上所述，“调解 + 仲裁 + 诉讼”模式整合了多元纠纷解决方式的特点，充分发挥调解的灵活性、仲裁的保密性以及诉讼的权威性各自的优势，形成了以调解前置、仲裁和诉讼托底的模式。这一模式更高效地化解了纠纷，为当事人提供了多种选择，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纠纷形势。

## 二、“诉前调解+N”的调解模式

“诉前调解+N”的调解模式不同于传统的诉前调解，其中“N”代表着多元化、多渠道的调解力量与资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共同印发的《关于发挥商会调解优势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2023年8月，西夏区法院联合西夏区工商联共同建立了“西夏区民营企业商事调解服务中心”，并制定了配套文件，以保证商事调解活动的专业性。根据“N”所涵盖的多元维度以及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公布的商事调解信息，在此选取了“诉前调解 + 法官指导”、“诉前调解 + 商会指导”以及“诉前调解 + 司法确认”三个典型模式进行深入分析。

### （一）“诉前调解+N”调解模式的内涵和应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调解工作发表重要指示，他强调要继承并创新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致力于构建一套全面而高效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预防化解机制<sup>①</sup>。在这一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商事调解作为调解体系的关键一环，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乃至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发显著。

“诉前调解+N”调解模式是指在案件正式立案之前，或是当事人申请诉前保全的阶段，通过人民调解、商事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调解途径来处理 and 解决纠纷的一种模式<sup>②</sup>。这一机制的产生，是对当前社会追求高效、和谐解决纠纷需求的积极响应。从“诉前调解+N”调解模式设立的初衷来看，诉前调解不仅有助于当事人快速解决争议，还能有效减轻法院的案件负担，同时对社会和谐具有积极作用。在商事争议日益复杂多变的当下，仅仅依靠诉讼和仲裁等传统争议解决方式，已难以全面满足企业和个人对于低成本、高效率解决商事争议的需求。当事人对于争端解决的需求，不仅限于时间和成本，更在于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能够维护和促进商事主体间长期友好的商业关系，这也符合道德层面的正当要求。“诉前调解+N”这一模式主要来源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民营企业商事调解中心实践的科学总结。

#### 1. 诉前调解 + 法官指导

在西夏区民营企业商事调解服务中心处理的案件中，采用“法官一对一跟踪指导解纷”作为一种创新的调解策略，展现出了“诉前调解+法官指导”模式在处理复杂商事纠纷中的独特优势。该模式通过整合法官的专业指导与调解员的调解技巧，旨在提升诉前调解的精准性和效率。

以某建材公司与某运输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为例，双方因长期合作产生的运输费用清算问题产生争议，涉案金额高达210万余元。由于运输公司未能及时支付款项，建材公司采取了诉前保全措施，冻结了运输公司的基本账户，进而影响了其正常的招投标及生产经营活动。案件被转至西夏区民营企业商事调解服务中心后，调

<sup>①</sup> 参见廖永安：《深刻认识发展商事调解的时代意义》，载《中国法治》2024年第3期。

<sup>②</sup> 参见王丽：《止纠纷于初期，定争议于萌芽——论新时期法治思想下的诉前调解》，载中法网，<http://www.cnlawweb.com/lite/word/2021102537934.html>。



解员在初步审查中发现，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账目往来频繁且难以理清，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分歧较大。鉴于案件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调解员决定请求跟案法官提供必要的法律指导。法官的介入不仅帮助调解员迅速厘清了案件的法律关系，还确保了账目往来的准确核对，为后续的调解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法官与调解员的协同努力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诉前和解协议，建材公司同意解除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双方争议得以圆满解决。从诉前保全到调解成功，整个过程仅耗时13天，充分体现了“诉前调解+法官指导”模式的高效性。

该案例不仅展示了“诉前调解+法官指导”合作模式在解决复杂商事纠纷中的有效性，还揭示了该模式在缩短纠纷解决周期、减轻法院案件压力以及促进商事主体和谐关系构建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一模式的成功实践，为商事纠纷的多元化解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sup>①</sup>。

## 2. 诉前调解+商会辅助

西夏区民营企业商事调解服务中心借助西夏区总商会及其下辖的两镇七街商会等资源，实施“借梯上楼”策略，提升服务效能，解决一起涉及王某与宁夏某公司的土地承包费用纠纷案例。此案中，王某长期承包宁夏某公司的土地用于农业种植，但已拖欠承包费两年。宁夏某公司因此向西夏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某返还土地并支付欠款。案件被分配至调解服务中心后，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发现，王某已在涉案土地上种植葡萄多年，土壤状况良好，且王某表达了继续种植的意愿，但因经营不善导致拖欠费用。为平衡双方利益，调解员多次组织调解，并寻求街道商会的协助。街道商会也积极响应，派员参与调解，共同商讨解决方案。经过多方共同努力，调解服务中心成功促使王某现场结清拖欠的承包费，而宁夏某公司则同意王某继续承包土地，并为其提供技术指导。

此案例揭示了“诉前调解+商会辅助”模式在解决商事主体间纠纷中的有效性。通过引入商会作为第三方力量，调解过程得以更加深入和专业，不仅有效保障了农户的经营权益，还解决了企业的收费难题。该模式不仅提高了调解效率，还

---

<sup>①</sup> 参见张欣钰：《六项工程 | 民营企业商事调解服务中心“诉前调解+N”模式让民营企业商事调解服务更有质效》，载微信公众号“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2024年5月21日。

促进了商事主体间的和谐关系构建，进一步拓宽了商事纠纷多元化解的思路和路径<sup>①</sup>。

### 3. 诉前调解 + 司法确认

在宁夏某工贸公司与宁夏某工程公司之间的货物采购合同纠纷中，双方签订了货物采购合同，宁夏某工贸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为宁夏某工程公司提供了价值 100 余万元的原材料。然而工程完工后，宁夏某工程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材料款，导致宁夏某工贸公司向西夏区法院提起诉讼。案件被分配至调解服务中心后，调解员王喜梅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宁夏某工程公司虽然当前缺乏支付能力，但存在资金周转的希望，且后续工程仍有继续用料的需求，因此案件具备较大的调解空间。基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帮助企业摆脱暂时困境的考量，王喜梅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宁夏某工贸公司表达了其作为西夏区总商会会员，对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的支持态度。经过多次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共识，签署了诉前和解协议，约定宁夏某工贸公司分两期支付拖欠的材料款。为确保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双方及时进行了司法确认程序，使得诉前和解协议获得了与法院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这一做法不仅避免了诉讼费用的支出，还为双方后续的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此案例展示了“诉前调解 + 司法确认”模式在解决企业间纠纷中的有效性。通过诉前调解，双方能够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和解，而司法确认则确保了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为双方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途径<sup>②</sup>。

## （二）“诉前调解 + N”调解模式的特点

### 1. 引入法律资源，高效协作解纷

在具体实践中，商事调解中心和相关合作部门通过对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审判力量的有效整合，建立了一个既灵活又高效的工作模式，即“复杂案件深入细致

<sup>①</sup> 参见张欣钰：《六项工程 | 民营企业商事调解服务中心“诉前调解 + N”模式让民营企业商事调解服务更有质效》，载微信公众号“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2024 年 5 月 21 日。

<sup>②</sup> 参见张欣钰：《六项工程 | 民营企业商事调解服务中心“诉前调解 + N”模式让民营企业商事调解服务更有质效》，载微信公众号“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2024 年 5 月 21 日。



审理，简单案件快速高效解决”。这样的模式极大地缩短了诉讼周期，提升了审判效率，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既便利又高效的纠纷解决途径<sup>①</sup>。与此同时，商事调解中心也不断加强与各方的协同合作，特别是与法院、仲裁机构等的联动，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将商事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首选方式，从而使得商事调解工作更加规范、有序且富有成效。

第一，商事调解中心通过与法院展开合作，双方共同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调解与诉讼衔接机制，明确法院委托调解的具体流程、纠纷信息的共享机制以及司法确认的相关事项。这一机制为纠纷当事人提供了一站式的调解、诉讼及司法确认服务，能极大地促进商事纠纷的高效解决。

第二，商事调解中心通过与仲裁机构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明确商事调解与仲裁调解之间的衔接流程。根据调解结果的不同，双方可以制定多样化的纠纷解决路径。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例，调解员可以引导双方签订补充仲裁协议，并向仲裁机构申请出具裁决书；对于调解未果且属于仲裁受理范围的案件，可以通过调解员引导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并进入仲裁程序，同时提供仲裁立案的协助服务。

第三，商事调解中心积极与律师事务所进行合作，积极拓展前端服务平台，共同建立企业法律服务工作站。商事调解中心采用了“每周三，律师会进驻工作站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和调解引导服务”的模式，为企业经济主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支持。

最后，商事调解中心通过定期组织与各相关部门的业务交流会，及时分享商事纠纷调解的动态信息，实现资源的共享与协作的深化。在定期组织的交流会上，各方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商事调解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了商事调解工作的多元化与全面发展<sup>②</sup>。

## 2. 诉前调解前置

商事调解以“和气生财”为基本理念，不主张将争议双方的直接利益和关联利

---

<sup>①</sup> 参见王丽：《止纠纷于初期，定争议于萌芽——论新时期法治思想下的诉前调解》，载中法网，<http://www.cnlawweb.com/lite/word/2021102537934.html>。

<sup>②</sup> 参见傅永新、冯泳、李雯婕：《搭建商事调解新平台，护航经济发展高质量》，载《人民调解》2024年第4期。



益对立起来，而是提倡在努力实现实质利益冲突解决的同时，维护好争议双方的关系利益。商事调解注重引导争议双方当事人从“利益对抗体”转向“利益共同体”的思维打造。调解员在商事调解过程中既努力融合争议双方的不同利益，同时充分挖掘争议背后的共同利益，从实现共同利益增长的角度促成和解协议。也就是说，商事调解不仅注重“切分蛋糕”，更加追求“做大蛋糕”。

诉前调解前置体现了商事调解实现了从“单一静态利益观”向“多元动态利益观”的理念转变。商事调解中心主动与金融机构、企业、行业协会等联系，以“调解优先”合作备忘录的方式推动建立商事纠纷化解联盟，拓展商事调解工作领域。签订“调解优先”合作备忘录，是合作各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认可并推行商事纠纷优先以调解方式解决。商调中心根据联盟成员所在领域的特点及商事解纷需求，定期组织商事纠纷专题研讨会、法律咨询、业务培训等，优先提供个性化的商事纠纷预防及调解方案。同时，商调中心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强化与各银行的联动合作，共同探索建立涉银行纠纷调解优先的纠纷化解机制<sup>①</sup>。

### 3. 市场化自主发展推升调解“效益”

我国最为常见的调解机制类型之一是人民调解制度，其深刻影响着公众对调解制度的认知。大众往往将调解与人民法院等公共权力机构的联合调解形式相联系，这种观念带有强烈的政府公共服务和无偿援助的印记。

尽管这种认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增强了公众对商事调解的信任基石，但它也无形中为商事调解的市场化进程设置了障碍。一旦商事调解引入费用机制，就可能遭遇来自公众的关于成本和费用的非议。然而，市场化是推动商事调解制度不断进步、确保其与国际接轨的关键。以仲裁领域为例，自其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仲裁行业蓬勃发展，仲裁委员会、仲裁人员及仲裁案件数量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显著提升了仲裁的规范性和效率<sup>②</sup>。

商事调解秉持着多元化动态利益的平衡原则，其关注点不仅限于直接的物质利益，还扩展到非物质层面，即不仅聚焦当前诉争的直接利益，也重视诉争之外、间

<sup>①</sup> 参见廖永安：《深刻认识发展商事调解的时代意义》，载《中国法治》2024年第3期。

<sup>②</sup> 参见郭子平：《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特区立法：问题争议、解决机制及制度贡献》，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接及长远的利益。通过灵活多变的调解策略，商事调解在解决直接利益冲突的同时，也致力于保护那些超越诉争本身的、更广泛的利益，确保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尽管人民调解的政府公共服务和无偿援助体系对商事调解的市场化有一定影响，但商事调解通过其独特的多元化动态利益平衡原则，以及灵活多变的调解策略，不仅能够有效解决当前的利益冲突，还能够兼顾更广泛的利益，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因此，商事调解的市场化能更好地适应国际趋势，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 （三）“诉前调解+N”调解模式的效果评价

#### 1. 提高民营企业商事调解服务质量

调解与诉讼、仲裁并称为争议解决的“三驾马车”。其以低成本、高效率、多合意、少强制的特点，为商事主体提供了更为综合、高效的跨境纠纷解决机制，亦凸显东方“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有助于当事主体平和化解分歧、维持稳定合作关系<sup>①</sup>。

商事调解相较于诉讼、仲裁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更加尊重和依赖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及纠纷双方在调解过程中对于程序推进的持续接受与认可，否则，调解随时有可能被任意一方当事人停止。这也导致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时效、利益无法得到完全保障。如果当事人未能通过调解程序达成和解，个别当事人有可能利用调解进程的时间窗口转移资产，导致另一方的合法权益难以最终实现。

因此，为提高民营企业商事调解服务质量，法院等公权力机关的参与必不可少。例如在和解协议司法确认这一过程中，法院的审查是司法确认和解协议效力，并赋予其执行力的必要条件。法院对商事和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不是“橡皮图章”，司法确认程序不仅可以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预防纠纷的再次发生，还可以通过审查诉讼外所达成和解协议是否违法以达到监督之目的。<sup>②</sup>

<sup>①</sup> 参见司艳丽：《粤港澳大湾区法律规则衔接疑难问题研究——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切入点》，载《中国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

<sup>②</sup> 参见祁壮：《国际商事调解发展的新趋势与我国的应对》，载《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 2. 做好诉前远端防控，构建长效工作机制

商事争议中的利益冲突往往涉及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直接利益与关联利益、眼前利益与未来利益、共同利益与差异利益。如何有效地平衡商事交易各方的各种利益类型，是构建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关键所在。通过诉讼或仲裁解决商事争议往往难以圆融周全地兼顾各种利益类型。

以商事诉讼为例，其通过“请求—抗辩”“举证—质证”等具有对抗色彩及竞技因素的程序设计，形成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对抗体，并利用这一对抗体去充分挖掘过去发生的案件事实，在案件真实“浮出水面”之后进行“黑白分明”的判断。这种利益对抗常常会使当事人陷入“零和游戏”的困境，徒增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破坏商业关系<sup>①</sup>。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在全国调解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张军院长指出，要有效发挥调解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做深做实新时代能动司法，打造构建诉前、诉中、诉后的全流程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紧密链条，深入推进诉源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发生。

做好诉前远端防控和构建长效工作机制，需要向网格化方向延伸，化纠纷于基层。任何矛盾纠纷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第一时间发现并解决矛盾纠纷，成本最低、效果最好。这就要求人民法院需要积极主动地融入党委主导的社会治理与诉源治理大局之中，力求在基层层面化解矛盾。

除了向网格化方向发展，为落实诉前调解源头治理，商事调解需要向立体化方向拓展，遏纠纷于源头。司法解决个案只是治标，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才是治本之策。变“化解矛盾”为“提前预防”，以“我管”促“都管”，促进强化诉源治理、综合治理，法院和调解中心要用好在线诉服平台，在线完成诉前调解、在线庭审、联系法官、信访投诉等覆盖立审执全过程的诉讼服务，通过嵌入平台搭建在线司法服务网络，实现法官“点单式”普法宣传和法律业务指导，网格员“全流程”在线协助查人、找物、调解、送达，有力促进矛盾纠纷诉源治理。

<sup>①</sup> 参见廖永安：《深刻认识发展商事调解的时代意义》，载《中国法治》2024年第3期。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相关部门需要拓宽沟通协作的渠道，强化党建的引领作用，全面融入党委、政府的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加强与乡镇综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等机构的紧密合作，构建信息共享、隐患共治、重点共管、矛盾共调的协同机制。法院以及调解中心通过适时开展工作研讨，提供法律咨询支持，努力实现“未诉先解”，有效降低“每万人中的民事案件起诉率”。

同时，人民法院还需要深化网格融合的深度，持续推进“审判服务下沉基层、法官入驻网格”的举措。通过定期协助网格化管理中的排查工作，强化分析讨论与前期介入，可以有效防止矛盾升级转化为诉讼案件。此外，利用司法大数据资源，人民法院可以深度剖析社会矛盾的特点、成因及发展趋势，为党委、政府的决策制定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此外，加大司法宣传的广度与深度也至关重要。人民法院、调解中心以及相关部门要积极践行习近平法治文化思想，提升其宣传的法治文化内涵、思想深度及导向作用。通过精选涉及房屋交易、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等贴近民众生活的典型案例，采用新闻发布会、法律知识讲座、示范庭审等多种宣传手段，我们可以强化以案说法，力求“审理一案，教育一片”，引导民众树立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法治观念，营造自觉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sup>①</sup>。

### 3. 汇聚化解合力，优化营商环境

发展商事调解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营商环境是全球经济竞争的“软实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商业交易中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商事纠纷。如果商事纠纷得不到妥善解决，有可能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比如，商业交易的减少、创业活动的减少、投资的减少，这些均会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因此，行之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对于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指标体系，商事调解是评价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其中，涉及商事调解的指标有：商事调解的自愿性、独立性、公正性、便利性，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是否简便快捷，公共组织能否提供广泛的商事调解服务，商事调

---

<sup>①</sup> 参见李红建：《打造全流程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紧密链条》，载中国法院网 2024 年 1 月 28 日，<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4/01/id/7786248.shtml>。

解的在线化水平，商事调解员名册及调解数据的公开程度，调解中披露的信息是否会运用在其他程序中而对当事人不利，法律上、经济上有没有政策措施激励商事调解发展等等<sup>①</sup>。

### 三、“法律 + 科技 + 调解”的调解模式

商事调解“案多人少”的矛盾愈加突出，传统商事调解机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发挥集成效用。在创新发展商事调解模式的浪潮下，随着现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地在 2023—2024 年间积极设立以科技赋能的商事调解机构，进一步创新商事矛盾化解方式，发挥科技协调优势，使用智能化手段、数智化平台等，实现人力与科技相统一，建立“法律 + 科技 + 调解”模式是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应有之义。<sup>②</sup>

#### （一）“法律 + 科技 + 调解”调解模式的内涵与应用

“法律 + 科技 + 调解”调解模式是一种创新性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其深度融合了法律的专业性、科技的先进性和调解的灵活性。该模式通过搭建智能应用平台，将法律专业知识与先进科技手段相结合，为商事纠纷的调解提供全方位、立体化、开放化、模块化、一体化的解决方案。该模式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调解案件进行深度分析，挖掘案件背后的规律和趋势，为调解员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通过智能推荐系统，为当事人提供个性化的调解方案，增加调解成功的可能性。同时优化调解流程，提高调解效率，降低调解成本，确保调解结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纠纷解决途径。

##### 1. “互联网 + 商事调解”：在线调解与远程协作

互联网赋能下的商事调解，从线下的面对面形式转变为在线模式，打破了传统调解模式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高了商事调解的效率，降低了各方的时间、经济等成本。2024 年 3 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杭州市委员会与舟山市贸促会签署了中国（杭州）知识产权·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以下简称“商事调解云平台”）

<sup>①</sup> 参见廖永安：《深刻认识发展商事调解的时代意义》，载《中国法治》2024 年第 3 期。

<sup>②</sup> 参见数智枫桥研究院：《法律 + 科技 + “枫桥经验”赋能综治中心 编织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数智网”》，载微信公众号“数智枫桥研究院”2024 年 4 月 3 日。





入驻协议，意味着舟山市贸促会正式入驻商事调解云平台，助力推广在线商事调解模式。该商事调解云平台是技术赋能下市场化解纷试点的一个生动实践，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打破调解的时空限制，真正实现了跨时空的“知识产权和国际商事纠纷调解一次不用跑”，为技术化手段、非诉讼方式解决知识产权和国际商事纠纷提供新模式。该平台主动融入技术化改革，推动线上调解可持续发展。通过该商事调解云平台，实现了调解申请一键直达、调解信息一秒送达、调解沟通一屏联通、调解结果一站履行、调解全程一体监管，大幅提升了调解效率。同时，该平台还开发了平台手机移动端，切实保障调解员使用移动端调解案件，为当事人和调解员大大降低调解成本。<sup>①</sup>

此外，杭州市贸促会联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共同制定了《在线商事调解服务规范》团体标准，对在线商事调解有关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服务流程、异常情况处理和服务质量控制与提升等内容进行了规范，填补了我国在线调解的空白。

为深入推动诉源治理，助力基层“末梢”向“治理”前哨转变，推动矛盾纠纷前端化解，山东省沂源法院全面推广“E+智慧法庭应用”，实现县域“E+智慧法庭”全覆盖。该应用设立了集合在线调解、巡回审判、法治宣传等功能于一体的法庭，一网多点，实现调解员就地调解。此外，为解决多主体、跨地域、多跑腿引发的诉讼不便等问题，沂源法院联合淄博中级人民法院研发“一案一群司法链调解系统”，为群众提供跨时空界限、网上面对面、全流程留痕、24小时普法的全方面解纷服务。<sup>②</sup>

## 2. “数字化+商事调解”：数字应用平台搭建

数字化技术赋能下的商事调解，将数据收集进行分析等能力运用到线上调解中，可以极大提高调解的准确性，并为调解员提供最优调解参考方案。2024年4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面临着商事案件数量大与工作人员人数欠缺之间的张力问题

---

① 参见蔡杨洋、李佳萌：《杭州舟山合力推广“数智化”在线商事调解模式》，载《杭州日报》2024年3月12日，第10版。

② 参见王均生、刘丽萍：《以智慧化手段精准服务社会治理》，载《山东法制报》2024年4月9日，第4版。



以及传统调解平台的单一性无法有效应对这一情况的局面，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联合企业成立科技赋能的调解机构，即上海市宝山泛亚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商事诉源治理工作站正式揭牌运行。泛亚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是上海首家由大型法律科技企业发起、司法行政机关指导、法律专家团队支持的商事调解的社会服务机制，首创“法律+科技+调解”调解模式，通过搭建以智能应用为基础的全方位、开放化、一体化的纠纷解决平台，实现调解资源跨区域、跨领域共建共享，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注入崭新力量，为涉外法治工作创新发展打造全新平台。

该调解中心具有诸多创新点。一是泛亚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创设了“智慧云调解平台”，该平台可利用大数据优势，根据类案指引，及时分析和调整案件的调解策略，提高调解成功率。二是该平台还依托大数据，打造“虚拟调解员”，使其成为调解员的“得力助手”，大幅提升调解的规范性和准确性。三是泛亚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还创设了全息“智慧调解”路径，实现“网络分流+特邀调解+文书签订+跟进履约”全流程网上办理，其中的案件查阅、数据反馈、程序节点等均实现留痕可视，确保调解规范透明。<sup>①</sup>

2024年8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创新研发的“龙法和”云法庭解纷系统正式上线运行，探索建立数字化调解的模式，推动全省法院解纷工作数据化、可视化、场景化。“龙法和”云法庭解纷系统在有效整合法院调解平台、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相关功能基础上，增设了法律咨询、指导调解版块。据统计，该系统自2024年运行以来，通过该系统申请的调解案件达到30余万件，法院指导调解2万余次，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sup>②</sup>

### 3. “智能化+商事调解”：人工智能商事调解助手

人工智能赋能下的商事调解，通过智能调解、智能问答、智能咨询等服务，一方面推动构建人工智能与调解工作的互补体系，另一方面亦提高了调解的效率，促进调解工作的可持续发展。2024年2月，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个学生团队研发出了

<sup>①</sup> 参见余东明、张海燕：《上海宝山打造“非传统”解纷新平台 推动商事调解成为企业解纷的首选优选》，载《法治日报》2024年4月30日，第2版。

<sup>②</sup> 参见赵丽丽、付茂丽：《黑龙江：“龙法和”云法庭解纷系统上线运行》，载中国法院网2024年8月10日，<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4/08/id/8060393.shtml>。



仲裁全流程智能辅助系统，并利用该系统联合广州仲裁委员会成功调解一起合同纠纷案件，成为我国首例由人工智能主导的纠纷解决成功案例。在调解过程中，智能辅助系统根据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意见进行实时互动协调，促进双方达成共识。该智能系统通过归纳案件事实，生成多个调解方案，再对双方选择的方案作出分析从而给出新方案，最终使双方达成调解一致。该案成为由全流程智能辅助系统主导的庭前调解首案，为我国探索打造智能调解服务贡献了广州智慧。该系统的智能调解功能可以为当事人提供“立案后，组庭前”的智能调解服务，为当事人提供多种调解方案。如果各自方案不能完全满足当事人需求，系统则会结合已有方案进行优化分析，最终得出个性化的最优调解方案，实现从争议源头高效化解纠纷。<sup>①</sup>

2024年5月，在福建省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有福之州·对话未来”系列活动中，福州金山街道社区推出生成式智能AI调解助理。这一创新平台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的高质量的法律文本资料和公开的司法案例进行预训练。当输入纠纷案件后，AI助理能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取关键信息，并总结出矛盾焦点、适用的法律法规、调解方法和相关案件等反馈信息。借助AI助理这一技术，极大简化了基层工作人员面对矛盾调解时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了调解的成功率，提升了工作效率。<sup>②</sup>

2024年5月，在深圳市南山区司法局的指导下，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与智法宝（深圳）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深圳市南山区法言商事调解中心正式设立。该商事调解中心面向各类商事主体提供市场化商事纠纷调解服务，重点解决金融、知识产权、工程建设等领域发生的纠纷以及中小微企业在创新创业过程中发生的各类商事纠纷。该商事调解中心的一大特点在于其开展网络化与智能化调解，充分利用现有的互联网技术，提供线上申请、线上提交、线上调解、线上签署和解协议等调解服务，打破时空限制，为用户提供便利。<sup>③</sup>

---

① 参见章宁旦、刘远强：《广仲纵深推进仲裁国际化智能化发展 为大湾区仲裁“走出去”贡献力量》，载《法治日报》2024年5月22日，第2版。

② 参见钟自炜、刘晓宇、王云杉、何娟、张鲁阳：《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福州举办——数字创新激发发展动力》，载《人民日报》2024年5月26日，第2版。

③ 参见君言律师事务所：《君言快报 |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与智法宝（深圳）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共建商事调解中心》，载微信公众号“君言律师事务所”2024年5月14日。

## （二）“法律 + 科技 + 调解”调解模式的特点

### 1. 专业调解团队与科技结合

“法律 + 科技 + 调解”模式的亮点之一便是将专业调解团队与科技相结合，以科技赋能调解。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科技便利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亦与法律进行深度融合，大幅提高当事人多元解纷的效率。尤其是在注重效率与成本的商事调解中，线上调解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调解数据分析提高了调解的准确性，人工智能协助调解减轻了调解员的负担等，这些都是科技赋能下的变革性进步。除上述实践应用外，上海亦采取多举措促进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商事争议解决新高地，为此，上海市司法局会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商务委员会、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工商业联合会印发《关于促进本市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该《若干措施》创造性提出了加强商事调解信息化专业保障，助力提升商事调解服务质效，其中第8条规定：“支持商事调解组织与法律科技企业开展合作，结合商事调解应用场景需求，开展生成式、智能化的‘AI+ 商事调解’法律科技产品研发和应用推广；鼓励和支持商事调解组织使用在线视频调解、电子签名等应用，实现线上调解。”<sup>①</sup>

### 2. 风险评估与预警系统

“法律 + 科技 + 调解”模式的一大特点在于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来对调解过程中的风险评估和预警进行全面分析。一是提供智能评估与建议。即人工智能根据固定的法律关系和使用场景进行自动纠纷分析，将证据、需求等进行精确的整合梳理，同时提供辅助工具以清楚地展现预判结果或提出调解方案，使得企业获取更多信息并寻求更多纠纷化解的可能性。二是在风险识别方面，通过分析案例库中的历史数据，预先分析商事合同的风险点所在，并结合案件纠纷分析不同解纷流程的风险，以实现风险的快速判断，并为当事人提供更为准确的建议。

---

<sup>①</sup> 参见余东明、张海燕：《上海多举措促进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 努力打造商事争议解决新高地》，载《法治日报》2024年5月29日，第2版。



### 3. 多元化解纷机制的整合

聚焦于多元化路径，促进诉讼前的纠纷解决，“法律+科技+调解”应深度融入基层管理体系，强化外部协同合作，集结基层的纠纷解决资源，力促矛盾在诉讼前得以多样化、实质性化解。为提升多元化纠纷解决效能，人民法院依托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各部委构建的“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体系，发挥各部门对行业规则的熟悉优势，实现“行业纠纷行业治理”。同时，借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贤等深受群众信赖的“地方智者”角色，通过群众陈述、专家阐述、法官讲解的方式，既解决案件的“法律难题”，也化解群众的“心理疙瘩”<sup>①</sup>。

此外，完善多元化调解架构和搭建全面覆盖的调解平台，是推进高效、和谐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浙江省温岭市在全省率先成立“1+6”知识产权纠纷化解平台，即1个市级诉调对接中心和6个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基层巡回调解室，把人民调解、专业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快速调解机制，扎实开展知识产权案件“诉转调”“诉转裁”工作，着力推进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体现了多元化解纷机制在知识产权纠纷领域的应用。强化人民调解的指导力度，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桥梁，选派具备良好业务素养和群众工作能力的干警担任联络员，利用在线网格化管理，确保法官与网格员、调解员之间的即时通讯，迅速响应需求、阐释法律、处理难题。并构建精细化的业务指导体系，邀请资深法官传授法律适用策略和调解策略技巧，组织人民调解员通过观摩庭审、案例研讨、实际调解实践等，提升其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sup>②</sup>。

### （三）“法律+科技+调解”调解模式的效果评价

#### 1. 汇聚多元力量、合力解决纠纷

诉前调解制度这种具有广阔前景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减轻司法系统的负担，增加人们解决纠纷的途径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它又很年轻，是一种仍

<sup>①</sup> 参见梁爽：《商事调解 打造止争解纷新途径—陕西商事调解工作综述》，载《西部法制报》2024年8月31日，第1版。

<sup>②</sup> 参见魏悦：《人民法院“总对总”在线多元调解案例》，载中国法院网2022年2月24日，<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2/02/id/6543868.shtml>。

处于初创及完善阶段的司法创新制度，相关法律规范亟待健全。深入推进诉前调解工作，逐渐形成了非诉与诉讼有机衔接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格局，让兼具“不收费、抗反诉、可执行、提效率”特征的司法确认逐渐成为群众解决纠纷的第一选择，有效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成为定纷止争地解决问题手段之一，坚持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法治建设，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法律效力的“速度与激情”<sup>①</sup>。

在运用新兴科技方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发布的新规则中增加了电子化办案相关内容，允许当事人通过能获得传送记录的网络电子方式提交电子化材料并利用适当的音视频通信等技术手段进行在线调解。将在线技术应用于商事调解之中，便利跨地区当事人利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降低调解成本，提高调解效率。

商事调解的推进离不开调解员这个关键要素，专业化的调解员队伍是落实此次新发布的调解规则的必要条件。一方面需要保持中立和公正，另一方面需要凭借高超的调解技巧推动当事人积极沟通、达成和解。因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同时修改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聘任管理办法》，将该办法修改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授予调解员资格规定》，提高了调解员的授予资格条件，比如将申请人的最低工作年限由五年修改为十年；覆盖了更多的从业领域，除接受传统经济贸易实务工作者的申请外，还特别增加了接受“科技、金融、建设工程、房地产”等行业实务工作者以及“从事知识产权代理工作”人员的申请，以满足当事人对行业专家的要求。<sup>②</sup>

## 2. 借助科技力量减少诉讼成本，为企业减负

深化科技赋能开拓创新，提高诉调对接效率，需要因地制宜找准切入点。在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大胆创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及目前互联网发展新形势，寻找到更为准确的切入点，更有实效地推进相关工作。此外提供更为高效便捷的金融消费纠纷线上调解服务。发挥互联网数字技术更为便捷、高效的线上调解

<sup>①</sup> 参见王丽：《止纠纷于初期，定争议于萌芽——论新时期法治思想下的诉前调解》，载中法网，<http://www.cnlawweb.com/lite/word/2021102537934.html>。

<sup>②</sup> 参见张维：《让商事调解更具吸引力》，载《法治日报》2024年7月5日，第7版。



优势，持续发掘“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中国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网”的在线调解功能，通过系统调试、模拟调解、流程检测等环节，实践“双平台”数据交换、互联互通的在线诉调对接机制，实现案件委派、委托调解、送达、材料交换等环节的全流程信息化、科技化建设，大幅提升了金融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的效率<sup>①</sup>。在对企业的商事调解纠纷中，通过调解解决相关商事纠纷，不仅维护了企业形象，而且争取了企业渡过难关的缓冲期，维护了双方的合作关系，也有利于保障企业回归正轨。

### 3. 远程在线调解服务打破地域壁垒

在传统商事调解中，当双方发生争议，由中立的第三方调解员介入，通过沟通、协商等方式，帮助双方达成和解协议<sup>②</sup>，从而解决纠纷。这一过程强调自愿性、灵活性和保密性，是商事领域非诉讼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sup>③</sup>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商事调解模式有了新的展开方式，通过借助远程诉调平台对案件进行调解，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移动终端进行线上交流，即使远在异国他乡也能及时表达意见，不受时空限制，实现便捷远程调解，既节省了双方当事人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又缩短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调解周期，提高了办案效率，实现共赢。

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不断发展，企业在贸易、投资、保险、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矛盾纠纷增多，需要通过商事调解组织独立、公正、高效、依法予以解决。推进信息化、大数据及智慧法院建设是落实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提高诉讼服务智能化水平，不仅便利群众调解，更是为人民群众减负、为纠纷化解增效<sup>④</sup>。

---

① 参见魏悦：《人民法院“总对总”在线多元调解案例》，载中国法院网 2022 年 2 月 24 日，<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2/02/id/6543868.shtml>。

② 注：“和解协议”与“调解协议”存在国际与国内用语使用习惯的区别，为避免引起混淆，本报告沿用了国际语境下的惯用表述。和解协议指当事人调解达成一致后签订的协议，即调解的结果；调解协议指当事人约定的纠纷解决方式，即调解的依据。本报告出现的“和解协议”和“调解协议”概念沿用上述解释。

③ 参见刘杰：《商事调解化纠纷，以和为贵解企忧 | 商事调解你 get 了吗？》，载微信公众号“深圳普法”2023 年 4 月 28 日。

④ 参见法治江苏：《南京海事法院建成多元解纷新格局》，载微信公众号“法治江苏”2021 年 1 月 14 日。



#### 四、“法院+商会”的调解模式

调解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灵活、便捷的特点，但在某些复杂商事纠纷中，由于调解人员专业性不足或者权威性不够等原因，调解结果往往难以令人信服。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法院+商会”的新型调解模式应运而生。这一模式不仅将法院的司法权威带入调解过程，还借助商会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及其专业知识，使得调解过程既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又具备行业专业性和实用性。这种合作机制不仅有助于减少法院的诉讼压力，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还能够缩短纠纷解决的时间，降低企业的诉讼成本，避免因诉讼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 （一）“法院+商会”调解模式的内涵与应用

“法院+商会”调解模式的核心是通过法院的司法监督与商会的行业专业知识的有机结合，促使商事纠纷得到更有效地解决。在“法院+商会”调解模式中，法院主导整个调解过程，通过对和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赋予调解结果合法性和司法保障，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与后续协议履行的稳定性；商会则凭借其在行业内的专业知识和威望，协助法院处理具体调解事务，为纠纷双方提供不同业务角度的专业见解和建议，帮助当事人达成更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此外，法院在诉讼进程中可根据案情发展的需要随时引入商会调解机构开展调解工作，使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与正式司法程序相结合。这一程序上的有机衔接不仅可以避免无效冗长的诉讼过程，提高纠纷解决效率，还能在必要时通过司法确认来保证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进一步增强当事人对调解结果的信心。总之，“法院+商会”这一调解模式充分结合了司法权威与行业专业性，为商事领域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更加灵活与高效的新途径，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发展前景。目前，已经有许多地区的法院和商会在探索这一模式的实践应用，建立起了法院与商会的合作调解机构，并在实务纠纷解决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备受当事人的赞许与信赖，这也为其他地区调解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借鉴的典范。

##### 1.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坪地街道商会调解指导中心

2024年8月，深圳市司法局印发《关于矛盾纠纷调解工作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的表扬通报》，表彰一批“优秀人民调解组织”，其中，龙岗区坪地街道商会



人民调解委员会获得“优秀人民调解组织”荣誉。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成立于2022年4月，其与龙岗区人民法院开展合作，积极探索商会调解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并在化解商事纠纷、优化营商环境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合作，同年10月，两方在全市挂牌成立了“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坪地街道商会调解指导中心”（以下简称“调解中心”），该平台通过建立“法院指导、商会调解”的模式，初步形成了“法院+商会”“精细化调解+专业化审判”的创新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深挖深圳市龙岗区调解中心的组织构成和调解案例不难发现，该模式的成功既源于其特殊的运作模式，又有赖于有效的制度保障和政府支持。

第一，调解中心作为指导商会调解的工作平台，通过法院的全程指导，构建了一套完善的调解机制。首先，调解中心会确定调解指导法官，明确联络对接人等关键角色，确保调解过程的规范性与专业性；其次，调解中心会充分发挥商会的行业专业知识，使调解建议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尤其在涉及复杂的商事纠纷时，商会成员能够凭借其深厚的行业背景和经验，为纠纷双方提供更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再次，调解中心会对达成的调解结果进行司法确认，既确保协议的法律效力，又有效增强当事人对调解结果的信任感；最后，调解中心会负责对调解员开展业务培训、进行诉调对接等多项工作，为快速、有效地解决商事纠纷提供专业有力的保障。调解中心这种“法院+商会”的运作模式，将专业化与多元化有机结合，不仅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还通过法律与行业的结合，为企业创新创业提供了更加优质的法治环境和法治保障。

第二，为了确保该调解模式在解决民营经济纠纷中的有效性，龙岗区政府采取了多项有力举措，促进调解中心的发展与完善。一是制定了《商会调解培育培优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和《“法院+商会”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商会调解手册》（以下简称《调解手册》），《行动方案》构建了“1+11+12”的多层次调解网络，为调解中心的实际操作提供指导方针，《调解手册》要求通过财政支持确保调解组织足够的资金运转；二是建立了案件分拨对接机制，由法院通过在线联调系统，将适合的案件分派给各商会调解中心，在确保调解效率的同时提升调解成功率，同时法院还为调解结果提供司法确认服务，以确保和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避免纠纷再起；三是重点强调调解员的扩充和培训，调解中心吸纳了百余

名兼职调解员，其中不乏人大代表、商会顾问、专家学者等，形成了覆盖面广、专业度高、人数充足的调解员队伍，还成立了专业调解团队和线上智库，为调解工作提供专业支持。通过上述措施，龙岗区在“法院+商会”的调解模式下，实现了纠纷快速、高效、多元化的解决，这一模式运行以来，各商协会调委会已处理上千宗案件，成功调解了数百宗案件，涉及金额上亿元，显著提升了地区民商事纠纷的解决效率。<sup>①</sup>

深圳市龙岗区调解中心这一“法院+商会”的调解模式，不仅为企业的商事纠纷提供了灵活的解决方案，避免长时间诉讼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与经营风险，有效减少了传统诉讼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还帮助企业避免了因纠纷公开而损害声誉的风险。尤其是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调解中心为企业化解潜在经营风险、维持业务稳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有利于优化当地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后盾。此类调解模式的成功实施，标志着商事纠纷解决模式的重大进步，并为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商会调解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and 优秀的范例。

## 2.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法官工作站+总商会调解服务中心”平台

2024年5月28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工商联与区人民法院共同挂牌成立了“法官工作站”和“商会调解中心”，通过这两个平台的相互协作，桥东区人民法院有效建立起了院企之间的常态化沟通，深化了司法与企业的联系，两个平台分工协作，力求化纠纷于事前，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营商环境。

第一，“法官工作站”在司法与企业之间架起了桥梁，通过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实现其化纠纷于事前的预防性功能。法官工作站会定期举办法律讲座、法律研讨会以及实务操作培训，使企业了解到最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相关的民商事经典案例。如此常态化的法律知识和讯息普及，不仅有助于帮助企业掌握经营活动中基本的法律规范和要求，还能帮助企业在实际经营中识别潜在的法律风险，从而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规避。此外，法官工作站还鼓励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进行自我审查和合规管理，帮助企业更科学地制定风险控制措施，提高法治化经营水平，增强法治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从而降低法律纠纷的发生率，为企

---

<sup>①</sup> 参见深圳市工商联：《龙岗区坪地街道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获“优秀人民调解组织”称号》，载微信公众号“深圳市工商联（总商会）”2024年8月22日。



业的稳健运营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商会调解中心”为企业间的纠纷提供了高效化解的渠道。商会调解中心具有丰富的资源和经验，可以灵活、高效地处理企业之间的争议，避免纠纷的升级。这种调解方式不仅减轻了法院的诉讼压力，也为整个司法体系的高效运转注入了新的活力。调解中心的运作模式非常灵活，商会调解员会倾听各方的诉求，了解争议的根源，运用专业知识和经验帮助企业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不仅要关注法律层面的争议解决，还要考虑到企业间的商业关系，力求通过非对抗的方式促进和解。这种人性化的处理方式，不仅有助于维护企业之间的良好关系，还能为双方节省时间和成本，避免漫长的诉讼程序。<sup>①</sup>

桥东区对该模式的探索已经初步显现出明显的效果，通过法官工作站和商会调解中心的共同努力，企业的法律意识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企业管理层和员工对法律风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决策过程中变得更加谨慎；企业在日常经营中也更加重视经营的合规性，并主动寻求法律服务，大大增强了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企业在与供应商、客户及其他合作方的合作中也更加注重合同的合法性和合规性，确保各项合作活动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这种良好的法律意识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信誉，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由上述可见，“法官工作站+商会调解中心”这一创新调解模式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法律支持，也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治基础。这一模式的成功实施体现了在事前防范法律纠纷的重要性，为其他地区提供宝贵的借鉴经验，有利于推动全国范围内法治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 3. 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法院委派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商事纠纷

为了应对商事纠纷的频繁发生给企业经营带来的诸多挑战，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与市工商联紧密合作，积极探索了一种新的商事调解模式，即人民法院委派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商事纠纷。这一模式不仅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还为企业提供了灵活的解纷渠道，对于地区调解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sup>②</sup>

---

① 参见区工商联：《桥东区工商联“总商会调解服务中心”和桥东区人民法院“法官工作站”挂牌成立》，载微信公众号“桥东发布”2024年5月29日。

② 参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法院+商会”模式 助力商事纠纷商会解》，载微信公众号“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4年6月28日。

该调解模式的核心在于建立法院和商会的常态化联动机制。法院在接收商事纠纷后会对案件进行初步评估，如果案件较为简单且适合调解，法院可以决定委派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商会调解委员会在收到委派后，将迅速组织调解员与当事人进行接洽，引导当事人进行深入沟通，探讨解决方案。调解成功后，双方可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使调解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商会调解委员会也会对协议履行情况进行跟踪，确保双方按照约定履行义务。这一调解模式强调非诉讼优先，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放在首位，尽可能地通过调解减少诉讼数量，提高纠纷解决效率。此外，该调解模式的灵活性也非常突出，调解过程不受传统诉讼程序的约束，可以根据双方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调解方案。例如，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线上方式进行调解工作，如此，企业可在不出门的情况下解决纠纷，大幅节省时间和成本。通过这种模式，法院可以将“判”的刚性与“调”的柔性有效结合，是对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有益探索，为商事纠纷的高效化解提供了新的思路。

#### 4.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派驻法院调解工作室

2023年7月，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法院与工商联、司法局联合成立了平川区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并设立了派驻法院调解工作室，通过“法院+工商联+商会”的协同机制，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推动纠纷前置化解，优化区域法治化营商环境。

该调解模式具有显著的特征与优势。一是建立在“专业+行业”的双轮驱动机制之上，充分整合了法院的法律资源、工商联的组织优势和商会的行业专长。法院在接到案件后，首先判断纠纷是否适合调解，将适宜调解的案件委派至商会调解委员会进行处理，调解员根据行业经验和调解技巧，引导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同时，法院会安排法官为调解员提供法律指导，确保调解工作合法合规进行。二是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诉讼成本，调解过程更加灵活简便，有利于快速促成双方达成和解，避免漫长的诉讼过程以及高额的诉讼费用。在这一调解模式下，企业不再需要经历复杂的法律程序，可以通过调解快速化解纠纷，节省了时间和经济成本。此外，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通过对话与沟通帮助双方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从而保留双方的合作基础，甚至进一步促进合作的深化，有效地避免了因为诉讼导致的双方对立情绪，有助于维护企业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三是注重普法宣传，通过面对面讲法、以案释法、法律咨询等形式，引导企业提升法律意识。这种教育





与调解相结合的模式，有助于企业了解法律风险，并在日常经营中预防法律纠纷的发生。企业通过调解过程中的法律辅导，不仅能更好地处理眼前的纠纷，还能提高法律风险防范的能力，增强依法经营意识。<sup>①</sup>

综上所述，平川区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派驻法院调解工作室不仅提升了企业间纠纷的解决效率，还对优化区域营商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法院+工商联+商会”的三方联动，调解工作室实现了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使得各类涉企纠纷得以快速化解，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经营环境，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

## （二）“法院+商会”调解模式的特点

### 1. 常态化对接机制的建立

在“法院+商会”调解模式中，常态化的对接机制是确保调解过程顺畅运行的核心环节。法院和商会作为两个独立的机构，在合作中需要建立定期沟通和协作的渠道，确保双方能够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类商事纠纷。

常态化对接机制的首要任务是构建一个高效的联动平台。通过此平台，法院能够及时将适合调解的案件推送给商会，而商会也能主动向法院反馈调解进展和结果。这一平台既可以是一个专门的线上系统，也可以是常规性的会议机制，无论形式如何，关键在于建立一条畅通的信息通道，避免信息滞后和沟通不畅带来的问题。法院通过这一联动平台，可以提前识别那些适合通过调解解决的案件，避免所有纠纷一开始就进入诉讼程序；商会则通过平台获取案件信息，及时组织调解员介入，利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这种信息流的顺畅是调解模式有效运行的基础。

为了使常态化对接机制能够高效运行，商会需要建立一支专业的调解员团队，调解员应当具备丰富的商事知识，并且熟悉调解流程和法律框架。法院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为调解员的选拔和培训提供必要的支持，确保调解员在处理纠纷时既懂得法律规定，又懂得行业规则。同时商会需要定期更新调解员库，并根据案件类型和纠纷性质，选择适合的调解员进行调解，这种动态管理机制可以确保调解过程的专

---

<sup>①</sup> 参见平川区人民法院：《【三抓三促·铸忠诚警魂】白银平川：“法院+工商联+商会”助企高效解纷》，载微信公众号“白银政法”2024年6月24日。



业性和针对性。

常态化对接机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案件的筛选和流程的规范化。在实际操作中，并不是所有商事纠纷都适合通过调解解决，法院与商会在对接过程中需要有明确的案件筛选标准。一般而言，涉及金额较大、法律关系复杂或纠纷双方有明显敌对情绪的案件，适合通过诉讼解决；而对于金额较小、纠纷双方愿意和解的案件，则可以优先引导进入调解程序。

## 2. 共同探索商事调解新模式

随着商业环境的变化，商事纠纷的类型和复杂性也在不断变化，单一的调解模式无法完全适应复杂多变的商业纠纷，因此，法院和商会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例和行业特点，不断创新调解方法，探索多元化的调解模式。

商会作为行业协会，拥有广泛的行业资源和专家队伍，因此，法院和商会可以共同探索“行业调解”的新模式。例如，针对特定行业，如建筑、科技、医疗等领域的纠纷，可以引入该行业的专家，确保调解方案更加符合行业惯例和实际需求。此外，在一些涉及多方利益的商事纠纷中，可以邀请相关方共同参与调解，例如行业协会、利益相关方等，这种多方参与的模式不仅增加了调解方案的可操作性，也能够更好地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线上调解成为了一种新的趋势，尤其在全球化的商业环境下，许多商事纠纷涉及跨地区甚至跨国的当事方，传统的面对面调解模式显得不够灵活。因此，法院和商会可以共同探索线上调解的新模式，利用视频会议、电子签名等技术，帮助当事人远程参与调解过程。

由于商事纠纷的复杂性，其往往无法通过单一的调解程序就彻底解决，因此调解、仲裁、诉讼三者之间的有机衔接是确保纠纷得到彻底解决的关键。而这种衔接机制建立与运行的关键在于确保调解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和证据在后续的仲裁和诉讼程序中可以得到有效利用，因此，法院和商会可以共同制定规则，明确在调解过程中如何记录、保存和转移相关材料，避免重复劳动和程序上的障碍。

## 3. 专业性和权威性并重

在商事纠纷中，法院通过与商会合作，将具有丰富行业背景的专家引入调解队伍，这些专家调解员熟悉各类行业惯例和市场动态，能够为当事人提供切实可行的

调解方案，大大提高调解成功的概率。例如，在建筑行业的调解中，商会调解员对合同履行和工程款结算流程的熟悉，能够帮助双方快速达成和解；而在金融行业，调解员对金融产品的运作机制和风险防控的了解，也有助于更快地解决金融纠纷。

同时，法院作为司法机构，具有不可替代的公信力，法院的参与增强了解调的权威性。法院通过法律监督可以确保调解过程的合法合规，当和解协议达成后，法院可以通过司法确认程序使其具有法律效力，保证当事人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法院与商会共同合作的模式，将商事调解提升至一个更高层次，增强了解调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 （三）“法院 + 商会”调解模式的效果评价

#### 1. 增强司法公信力和调解工作认可度

“法院 + 商会”的调解模式通过将一些非诉讼性纠纷引导至商会进行调解，极大地减少了法院的案件积压，优化了司法系统的资源配置。在这一模式的运作过程中，商会调解机构作为诉前的中立方，通过多方的协调与沟通来帮助当事人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尽可能避免案件进入诉讼阶段。通过这种模式，法院不仅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那些需要严格法律裁定的案件中，还能大幅缩短普通商事纠纷的处理时间，从而显著提高司法系统的效率。

此外，法院与商会的合作使得商会在纠纷调解中发挥了桥梁作用，商会作为企业家和商界人士的自治组织，具有很高的行业权威性与公信力，与法院合作后，商会的调解工作被赋予了更高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得到了企业与社会的普遍认可。同时，法院的参与也为商会调解背书，使得调解结果在执行层面上更加具备法律保障，进一步提升了商事调解的社会认可度。

#### 2. 商会专业化调解，显著缩短纠纷解决时间

商事纠纷往往涉及复杂的法律、商业及行业背景，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才能高效化解。“法院 + 商会”模式通过商会这一平台，整合行业专家资源，为商事调解工作注入了专业化力量，显著缩短了纠纷解决的时间。在纠纷调解中，这些行业专业人士运用其掌握的专业知识使调解更加切中实际问题，有效防止因双方对行业规则理解不同而导致的调解失败。这一行业优势，使得“法院 + 商会”

调解模式在处理复杂的商事纠纷时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同时，商会调解的快捷性在于其更加注重纠纷解决的实际效果，而不是拘泥于复杂的法律程序。通过这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当事人不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满意的解决方案，还能避免进一步的经济损失，保持商业关系的稳定性。尤其对于一些资金周转紧张、时间成本高昂的小型企业，快速解决纠纷对于他们的业务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法院+商会”调解模式的专业性和高效性在此类案件中会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通过商会调解，当事人在诉前阶段就可以尝试通过非正式的渠道解决争议，这使得当事人避免了高昂的诉讼费用和漫长的等待时间。特别是在复杂的商事纠纷中，商会调解为当事人提供了灵活而经济的选择，双方通过调解达成协议后，无需继续投入时间和资源进行诉讼。这对于企业而言，不仅节省了大量的诉讼成本，还能更好地维护商业信誉与合作关系，减少因纠纷产生的负面影响。

### 3. 促进和谐商事环境的形成

“法院+商会”调解模式不仅在个案层面上解决了纠纷，还通过其调解机制的推广，促进了整个商事环境的和谐与稳定。通过调解解决争议，双方当事人往往能在沟通过程中增进了解，化解误解，从而建立更为稳固的商业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不仅对个别商事活动产生积极影响，也有助于推动行业内部的合作与发展。此外，调解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作为行业规范，帮助企业在日常经营中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通过调解机制的有效运作，不仅有助于解决商业纠纷，还能为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力量。企业在处理纠纷时，选择调解而非对抗性的诉讼方式，体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决策，这种积极的商事行为，将有助于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社会各界的和谐发展。总体而言，“法院+商会”调解模式体现了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进步，为现代市场经济下多元化纠纷解决途径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方向。

## 五、“专业+便捷+多元供给”的调解模式

“专业调解资源+便捷纠纷解决机制+多元服务供给”的调解模式（以下简称“专业+便捷+多元供给”调解模式）是2024年以来为应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所产生的对专业、高效、灵活的商事调解的现实需求而在实践中产生的一种新型商



业调解模式。

### （一）“专业 + 便捷 + 多元供给”调解模式的内涵与应用

所谓“专业”是指集商事调解相关的各种专业性要素提高商事调解的专业性。具体而言，就是要由具有为商事主体提供行业服务或法律服务的专业优势的专业组织发起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商事调解组织，积极吸纳法律专业人士加入商事调解员队伍并对其进行专业指导；“便捷”是指通过各种便捷调解程序的设计，确保商事调解的高效性；“多元供给”，则是指商事调解不仅仅局限于产生纠纷之后对纠纷本身的化解，更注重纠纷产生的避免和预防以及对产生纠纷根源的梳理。这一调解模式主要来源于对山东省滨州市商事调解组织培育实践以及河南省鹤壁市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实践的科学总结。

#### 1. 山东省滨州市：商事调解组织培育

为推进商事调解的专业化、高效化、综合化，滨州市司法局以市场化解纷为突破口，以商事调解组织培育为切入点，探索出了一条“专业 + 便捷 + 多元供给”的全新的商事调解模式。截至 2024 年 6 月，滨州市已培育了配备有超 250 名民商事调解员的 10 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事调解组织。23 年以来，这些商事调解组织共计成功调解纠纷超 1500 件，涉案金额逾 4.5 亿元，<sup>①</sup>在本市商事纠纷化解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维持良好的营商环境，维护社会安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具体商事调解模式设计层面，滨州市对专业调解资源、便捷纠纷解决机制、多元服务供给三个层面均进行了积极尝试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第一，通过对专业调解资源的聚集，提高商事调解的专业性：一是鼓励律师事务所等专业组织发起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事调解组织，充分发挥设立单位自身的专业性优势，同时由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市县两级司法行政部门设置严格的准入条件，确认商事调解组织的专业性门槛，截至目前滨州市各专业组织已依法设立了 2 个商事调解中心以及 8 个民商事调解中心；二是吸收律师等法律专业人士作为商事调解员加入商事调解组织。目前，滨州市人民调解员中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

---

<sup>①</sup> 参见山东省滨州市司法局：《突出“三大特色”打造商事调解“滨州样板”》，载《人民调解》2024 年第 4 期。

员占比达到 86%，这些调解员在司法行政部门联合人民法院开展的针对商事调解员的业务培训训练之下，其专业化水平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为滨州市建立高素质商事调解人才队伍、建立专业化商事调解模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组织保障和人才保障；三是建立法官与商事调解员之间“一对一”的带教制度，由法官在商事调解进程中实时针对法律关系认定等法律专业领域具体问题提出指导并对最终调解结果进行司法确认，为商事调解提供法治化保障。

第二，通过对调解机制的创新，增强商事调解的高效性：一是建立完善的调解、诉讼对接机制，各调解组织按照“案件登记、约调、调解、申请司法确认”流程推进商事调解工作，在保证调解效果的前提下以最短的时间周期推进商事调解的开展以及调解结果的落实；二是采取“线上+线下”双轨并行的商事调解模式，对法律关系清楚等简单案件或当事人因行动不便等原因不适宜采取线下调解模式的案件采取线上调解的模式，最大程度减少商事调解对当事人时间、资金成本的损耗，让当事人“一趟不用跑”即可化解纠纷，确保商事调解的便民性、亲民性；三是由司法行政部门与金融机构协调合作，建立小额金融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对同质化、金额小、争点少的商事纠纷实行简案快调，以滨州市融曜商事调解中心为例，该中心通过小额金融纠纷快速解决机制，仅在 3 天之间就在保证调解质量的前提下成功完成了 6 起同类型的信用卡纠纷调解工作。

第三，通过商事调解组织服务的多元化设计，增强商事调解的实效性：一是积极组织商事调解组织了解企业运行状况，为企业提供专项法律咨询服务，增强企业风险防范意识，减少企业因忽视风险控制而诱发的商事纠纷；二是由司法行政部门编制企业合规管理和风险防控指引，并经由商事调解组织向各市场主体传达落实，确保市场主体商事经营和企业治理规范化、体系化、制度化，实现商事主体依法经营、依规经营，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商事纠纷的产生；三是由商事调解组织牵头，多方联合针对企业需求，为企业 provide 风险评估、资产重组等延伸服务，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 2. 河南省鹤壁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密织多元共治

为应对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具有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等特征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鹤壁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探索多元纠纷化解模式，通过一系





列创新创造，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专业性指导、建设了相对完善的纠纷调解体制机制、有效提高了调解效能，为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维持社会安定起到了制度保障作用。归纳概括而言，鹤壁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所进行的调解模式创新具体设计，亦可以分为“专业”“便捷”“多元供给”三个模块。

第一，通过加强调解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专业性：一是组建专业化调解员队伍，并不断加强对调解员队伍的规范和引导，推进人民调解员工作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同时征集知识产权领域专家、产业技术领域专家、经济管理领域专家等多领域专家，构建知识产权专家库，为纠纷调解提供专业化意见引导；二是通过线下集中授课、线上授课、组织实践学习等形式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人民调解员培训和教育work，切实提高调解员队伍思想政治素质、法律职业素养、调解业务能力。

第二，通过对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机制布局的调整，增强纠纷调解的高效性：一是构建三级联动的畅通纠纷调解渠道，在全市范围内成立各级知识产权维权服务工作站超 50 个<sup>①</sup>，实现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市、县（区）、乡（镇）三级行政区划全覆盖，推动纠纷调解力量向基层下沉，有效提高纠纷调解的便利性；二是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设立知识产权纠纷线上调解工作室并选派调解经验丰富、专业素质过硬的人民调解员入驻平台，通过提供线上调解服务，降低当事人纠纷解决时间、资金成本，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三是构建“互联网+纠纷化解”新模式，滨州市“质汇通”和“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两个互联网平台有效实现了调解主体的协同配合，线上云调解的新模式有效提高了纠纷化解效率，打通了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第三，通过扩充调解组织服务职能，提高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覆盖面：一是组织调解组织对企业深入走访调研并召开相关专题座谈会，深入研究透析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困境和需求，提高服务精确度、准确度，从而实现对维权时间成本、资金成本的有效降低；二是积极开展针对企业的企业核心技术专利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知识等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知识产权利用和保护的意识。

---

<sup>①</sup> 参见市知识产权维权保护中心：《多元化保护，多方位协同——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密织多元共治“解纷网”》，载微信公众号“鹤壁市场监管”2024 年 1 月 12 日。



识和能力，从根源上遏制和减少知识产权纠纷的产生，避免因陷入知识产权纠纷而给企业增添不必要的经营负担；三是推进海外知识产权纠纷维权援助机制建设，在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维权保护中心挂牌成立的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河南分中心鹤壁受理处，在新出台的《关于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社会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涉外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政府文件的规范指引之下，为全市从事海外商事活动的企业针对海外知识产权维权以及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提供指导。

## （二）“专业 + 便捷 + 多元供给”调解模式的特点

山东省滨州市以及河南省鹤壁市对“专业 + 便捷 + 多元供给”调解模式的创新及实践应用，展现出了强化多元服务供给、调解效果与后续跟进并重、强化跨部门协作等多个方面的商事调解技巧，这些技巧不仅是“专业 + 便捷 + 多元供给”这一全新商事调解模式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所在，同时也为其他地区对这一成功范式进行仿行借鉴提供了提纲挈领性的指导和参考。

### 1. 多元服务供给的应用

多元服务供给是这一全新商事调解模式中的一大核心要素，此要素强调商事调解工作不能仅仅局限于商事纠纷本身的解决，更应当注重对商事纠纷发生的预防和控制。在前述滨州市和鹤壁市的商事调解实践中，二者均成功通过调解组织多元化的服务实现了这一目标。

在滨州市，商事调解组织通过深入企业进行调研，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识别企业内部潜在的法律风险，针对性地向企业提供包括法律咨询、风险评估和合规管理等在内的多元化服务。这种内涵多元广泛的服务供给模式不仅增强了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也有效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纠纷。

鹤壁市的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样注重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多元服务供给。委员会组织专家对企业进行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培训，帮助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此外，委员会还建立了知识产权专家库，及时为企业提供专业意见，确保企业在技术和法律层面上都能获得有效支持。这种多元服务供给的方式，在有效增强商事调解实效性的同时，也增强了企业对调解组织的信任感，使得商事调解能够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 2. 注重调解效果与后续跟进

滨州市以及鹤壁市对这一新商业调解模式的丰富实践表明，商事调解流程的顺利推进和解协议的达成本身并不是商事调解的终点，确保商事调解的效果以及其成果的后续落实跟进才是商事调解的重中之重。

在滨州市，调解组织建立了完善的后续跟进机制以确保调解结果的落实。例如，人民调解员在调解结束后，并不会将调解案件抛之脑后，而是通过定期与当事人联系，密切关注和解协议的执行情况并主动解决后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切实维护商事纠纷的解决与商事调解成果的落实。

鹤壁市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相关体制机制同样注重后续跟进制度的设计安排。具体而言，调解委员会建立了针对调解成果落实的信息反馈机制，定期收集调解后续执行情况的相关数据反馈，通过对调解结果落实情况的评估，委员会能够清晰迅速地识别出调解工作中的存在不足之处并及时进行针对性的改进与完善。这种数据驱动的反馈机制对有效提升调解工作的整体水平以及切实落实调解成果大有裨益。对两地的新调解模式构建的宝贵经验进行总结，不难发现，对调解效果和后续跟进的注重不仅能及时预防和发现和解协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增强调解的有效性，更能有效增强当事人对商事纠纷调解组织的信任感，提高人民群众对商事调解的接受度，从而推动和促进全新商事调解模式的落地实行。

## 3. 强化跨部门协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实践当中，商事纠纷往往涉及金额巨大、纠纷疑点难点众多，因此商事纠纷调解仅仅依靠某一个组织或者机构难免捉襟见肘，这就使得跨部门的协作与资源共享显得更为重要。而滨州市和鹤壁市商事调解实践也表明，调解组织只有通过强化跨部门协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才能有效提升商事调解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在滨州市，商事调解组织与法院通过建立法官对调解员“一对一”指导、法官及时进行司法确认的协同机制，既发挥了调解组织的灵活性又发挥了法官的专业性。此外，市、县司法部门与金融机构联合建立的小额金融纠纷快速解决机制，实现了政府司法部门与金融市场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大幅提升了小额简单金融纠纷的解决效率。

鹤壁市同样注重不同部门、机构之间的协调联动，除完善“诉调对接”，加强

调解组织与法院、仲裁机构之间的协调联动之外，还通过设立知识产权纠纷线上调解工作室、建立市场监管所下属的知识产权维权服务站等措施密织知识产权纠纷化解网络，实现了各部门对知识产权纠纷的协同共治，有效增强了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便利性，确保调解服务能够触及最广泛的人民群众。

综上，“专业+便捷+多元供给”的调解模式在滨州市和鹤壁市的成功实践，充分展示了强调多元服务供给、调解后果与后续跟进并重及强化跨部门协作等技巧对成功的商业调解模式构建的重要意义。这些技巧不仅提升了调解的专业性和有效性，更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此外，也为其他地区进一步完善调解机制，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实现更高水平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借鉴范式。

### （三）“专业+便捷+多元供给”调解模式的效果评价

滨州市与鹤壁市两地“专业+便捷+多元供给”的调解模式在实践中均取得了优良效果与显著成效。具体体现在实现了调解工作的常态化、长效化运行；深入企业调研、企业服务精细化；减轻司法压力等多个方面。

#### 1. 调解工作常态化、长效化运行

调解模式能否常态化运行是评价其效果的重要指标。滨州市和鹤壁市通过建立稳定的调解机构和流程，确保调解工作不仅是应急措施，更是日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滨州市，市司法局与多家专业组织合作，形成了以市场化解纷为突破口的常态化调解机制。通过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商事调解组织，滨州市不仅增强了调解工作的权威性，还促进了调解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滨州市的商事调解组织共成功调解超1500件纠纷，涉及金额逾4.5亿元，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滨州市调解组织调解工作的高效运转，也表明其在日常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鹤壁市的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同样注重调解工作的常态化运行，通过建立三级联动的调解渠道，实现了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站在市、县（区）、乡（镇）的全覆盖。这样的布局确保了调解服务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使企业和个人在面临纠纷时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滨州市和鹤壁市的新调解模式实践表明，二者的调解机制建设均实际有效地确保了调解工作的常态化、长效化运行，这种常态化运行



不仅增强了调解工作的可预见性，还提升了公众对调解机制的认同感，进一步促进了调解工作的深入开展。

## 2. 深入企业调研、企业服务精准化

商事调解工作的成功与否还体现在能否实现对商事主体服务的精准化方面。而欲达到这一目标，提供更加个性化和专业化的服务，就必须由商事调解组织通过深入企业调研，切实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把握商事纠纷的痛点、难点所在。

在滨州市，调解组织积极开展企业走访活动，深入了解和把握企业的实际运营情况和潜在的法律风险。通过风险评估和合规管理等服务，滨州市人民调解员为企业提供了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法律建议，为企业预防和化解纠纷提供了巨大助力。这样的精准服务不仅增强了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也为后续的调解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鹤壁市的实践同样表明了该市调解组织对服务精准化的极端重视。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组织专家对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宣传和培训，提高了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应对知识产权纠纷的专业素养。这种积极主动的服务模式，使得企业在日常运营中能够更加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从而有效降低了因侵犯知识产权而引发的纠纷。滨州市和鹤壁市通过一系列新型调解机制的构建，成功实现了对企业服务的精准化，这不仅有效提升了调解的实效性，也增进了企业与调解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使得企业在面对纠纷时更加愿意选择调解作为解决方案。

## 3. 减轻司法压力，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

有效的调解模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司法系统的压力，这也是在对商业调解模式效果进行评价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环。通过将纠纷解决在诉讼前，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司法效率，也可以为社会治理的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范式。

在滨州市，调解组织的设立有效减少了法院的案件负担。通过商事调解，许多简单的商业纠纷得以迅速解决，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其中成效最突出的便是司法行政部门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的小额金融纠纷快速解决机制，这一机制通过简案快调的方式，将一部分原本需要通过诉讼解决的纠纷转化为调解解决，从而大大减轻了人民法院的案件压力。

鹤壁市在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方面所做的建设也体现了这一积极效能。通过建立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的知识产权纠纷线上调解工作室，调解委员会有效降低了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时间和资金成本。而这种“互联网+纠纷化解”的新模式，在通过线上“一站式”解决群众问题、有效提升了知识产权纠纷的调解效率的同时，也大大减少了诉至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此外更是为社会各界提供了更便捷的维权渠道，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治理的创新。

综合来看，滨州市和鹤壁市在“专业+便捷+多元供给”调解模式下所取得的成效，均表明两地新调解模式的构建成功实现了调解工作的常态化、企业服务的精准化，也成功减轻了当地人民法院的司法压力，可以称为是取得相当成功的商业调解新范式。这些地区的成功经验，不仅为其他地区的调解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也为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与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 六、“公益性调解+市场化解纷”调解模式

### （一）“公益性调解+市场化解纷”调解模式的内涵与应用

公益性调解是一种通常由政府、非营利组织或社区机构主导开展的纠纷调解模式。这一模式的理念是基于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而设立调解机构，旨在为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或低成本的调解服务，其主要目标在于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同时尽可能减少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在当前社会中，纠纷的频繁发生不可避免，如何妥善处理这些纠纷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公益性调解的推广，能够有效缓解司法压力，使法律服务惠及更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那些经济条件较为困难的弱势群体。

公益性调解的优势在于其广泛的社会服务覆盖面。通过社区、乡镇等基层组织，调解服务能够深入到每一个角落，确保更多人能获得公正的解决方案。这种模式强调的是服务的普及性，力求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法律支持。此外，公益性调解通常采用非正式的调解流程，能够更灵活地应对各种纠纷，增强了调解的实效性和适应性。调解员往往是具有一定专业背景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员，他们能够在轻松的环境中进行沟通，帮助当事人达成共识，从而避免了冗长的诉讼程序。

而市场化解纷则是指以市场为导向，由专业的律师或调解机构提供调解服务的纠纷解决模式，由于市场竞争的存在，这种模式更加注重调解的效率与结果。市场



化解纷通过专业律师的参与，不仅提升了调解服务的质量，还增强了客户的满意度。调解过程中，律师能够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与建议，使当事人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有效的协商。此外，市场化解纷通常涉及收费服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参与，为调解过程注入更多的专业性资源。

将这两种模式结合形成的“公益性调解+市场化解纷”模式，能够更好、更充分地发挥两者的优势。这一结合不仅能够确保更广泛的社会服务覆盖面，还能提供更加专业和高效的服务。这种模式的实施，不仅注重社会责任的承担，同时也能充分发挥市场导向的作用，形成一个良好的调解生态系统，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当事人的差异化需求。

这种调解模式在多个地方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例如，在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商业纠纷调解中心，有效整合了司法、仲裁等资源，实现了公益性调解和市场化解纷的有机结合；黑龙江省双鸭江市集贤县则创新性地引入了公益律师作为调解员，增强了调解的公平性和专业性；而浙江省杭州市则通过建立专职律师调解工作室，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化解纷的高效运作。随着这一模式的不断推广与完善，未来将会为更多的社会群体带来便利，促进法治文化的深入人心。

### 1. 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设立商业纠纷调解中心及分站，建立“网格法庭”

宝应县基层人民法院具有服务乡镇较多，司法服务半径相对较大的特征。而近年来商业纠纷的日益增多，更是让宝应县人民法院不堪重负。宝应县人民法院意识到，仅仅依靠传统的诉讼方式远不足以满足快速、高效解决争端的需求。因此，为延伸司法服务触角、缩小司法服务半径，宝应县人民法院积极牵头整合司法、仲裁、行政等解纷资源，率先开启了对“公益性调解+市场化解纷”商业纠纷调解模式建设的探索。

第一，宝应县人民法院牵头打造了宝应县商业纠纷调解中心。此机构作为宝应县第一家具备人民调解委员会资格的商业纠纷专业调解组织，致力于打造优质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为民营企业提供法律法规政策的普法宣传、商事纠纷的调解化解等服务，并推行“公益化和市场化”双轨并行解纷机制。其中，公益化调解致力于解决弱势群体维权难、维权成本高等问题，市场化解纷则致力于为企业提供高效、高质量的专业化商业调解，同时合理设置调



解服务费用，切实助力企业降低纠纷解决成本，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第二，宝应县工商联、司法、行政等部门实现多部门联合，聚焦本县发展较为成熟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等行业，在相关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内设立调解工作分站<sup>①</sup>，专注本县优势行业纠纷调解，为本县优势行业持续发展保驾护航，确保其“长板效应”充分发挥，带动本县经济发展实现持续稳中向好。

第三，宝应县积极探索“网格法庭”的建设。这种“网格法庭”并不是依法具有审判职权的司法机关，而是一种新型公益调解组织，主要提供包括开展普法宣传、提供志愿服务、开展征集线索、协助找人查物、参与诉前调解、指导诉讼服务等在内的一系列公益性调解服务。这一新型调解组织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它是一种由法院党支部领办的调解组织，这一特征具体表现为：“网格法庭”庭长为法院领办党支部书记、联系法官为法院专员，其他庭务主任、代办专员等成员大多从各乡镇干部、村委会干部等人群中选任<sup>②</sup>。这种党建、业务齐头并进的模式能够在充分发挥法院专业优势的同时，激活党组织末梢，使得法院工作能够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工作布局。此外，在“网格法庭”体制建设方面，扬州市在宝应县“网格法庭”建设启发之下，指导全市各级人民法院在全市范围内形成市县乡三级联动的“网格法庭系统”，形成覆盖全市的“网格法庭”覆盖网，打通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宝应县人民法院相关数据显示，自该县“公益性调解+商业化解纷”调解模式运行以来，法院新收商业案件同比下降超15%<sup>③</sup>，真正实现了商业纠纷源头治理，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的重要指示精神。

---

① 参见奚志伟、贾玲、杨晔：《营商环境|扬州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之九：宝应县在全省率先构建“公益性调解+市场化解纷”商业纠纷化解模式》，载微信公众号“扬州发展改革”2024年7月22日。

② 参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精准解纷到网格 绘就扬州好“枫”景》，载微信公众号“扬州政法”2023年11月23日。

③ 参见韩菲菲：《宝应一案例入选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载微信公众号“宝应最新闻”2024年8月8日。



## 2. 黑龙江省双鸭江市集贤县：引入公益律师作为调解员

黑龙江省双鸭江市集贤县人民法院为及时、高效、准确地解决随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而伴生的各类市场纠纷，同样积极探索了市场化解纷新机制与传统公益性解纷相结合的商业纠纷解决新模式，其中最具鲜明特点的实践创新便是引入公益律师作为调解员<sup>①</sup>。首先，公益律师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具备快速识别争议焦点、提出专业法律建议的专业基础，从而能够大大提高调解效率，减少诉讼案件数量，减轻法院负担，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其次，这一实践创新在推行市场化解纷、根据不同的纠纷类型和当事人不同需求提供专业性、针对性的解纷服务的同时，关注无法负担市场化解纷所带来的高额调解费用的弱势群体的实际需求，确保这些群体在纠纷解决中不被边缘化。为不同群体提供了多层次的法律服务，展现了法律服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同时也有效解决了市场化解纷调解模式的公平性问题，为经济困难的群体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支持。此外，这种创新模式中公益律师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承担调解员责任，更发挥着普法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促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通过引入公益律师作为调解员的创新尝试不断完善“公益性调解+市场化解纷”的商业调解模式，集贤县不仅创造性地实现了公益律师制度与市场化解纷之间的有机结合，从而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当事人的需求，同时也推动了法治文化的传播，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调解机制创新性发展。

## 3. 浙江省杭州市：专职律师市场化调解工作模式

早在2009年，杭州市就已经开始了关于律师调解工作的探索与实践，从“律师参与调解”到律师调解工作试点再到先后成立多批律师调解工作室<sup>②</sup>。杭州市经过多年实践与摸索，成功探索出了一套专职律师市场化调解的新型商业调解模式。这种模式的运行机制也较为简单直接：由具有法院、司法局等官方机构授牌资格的

<sup>①</sup> 参见周宏：《集贤县人民法院：市场化解纷创新与实践》，载微信公众号“集贤县人民法院”2024年5月16日。

<sup>②</sup> 参见李军、刘晓辉、麻伟静：《律师调解市场化的“杭州样本”实践探析》，载《中国法治》2024年第3期。

律师调解工作室接受法院委派或当事人直接委托开展调解工作，并引导涉案各方签署和解协议，最终由调解员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这种调解模式归根结底而言，就是由市场化解纷模式对公益性调解模式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延伸以弥补公益性调解本身专业程度不够、资金支持不足以及主体积极性不高等问题，进而为商事主体提供更高质量的调解服务。

此外，在不断推进专职律师市场化调解工作模式构建的过程中，杭州律协及其调解中心（杭州市律协调解中心）相继制定了《共同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合作框架协议》《杭州市律师调解工作管理办法》《杭州律协调解中心收费办法》等一系列内部管理文件作为专职律师开展市场化调解工作的具体规范<sup>①</sup>。这一系列规定作为协会内部文件对各律所律师具有普遍约束效力，在杭州市以律师作为市场化解纷模式中的调解主体的背景之下，对律师调解工作室的调解行为具有良好的约束和指导作用，实现了对上位法规定空白的灵活补足。

最后，杭州市专职律师市场化调解工作模式建设中关注的重点之一便是加强对律师调解工作室调解费用收取的规范和指引。市场化收费的方式能够充分激发专业法治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提高商业调解服务的质量和客户满意度。然而若不制定相应标准对律师调解服务费用收取加以约束的话，难免发生调解费用高昂、社会弱势群体因难以负担高额调解费用而被调解制度“拒之门外”的问题。因此，杭州市调解中心通过出台“律师调解引导类案件收费标准”，确立了调解不成功不收取服务费用，调解成功依诉讼费 50% 收取服务费用的收费标准。在保证调解模式市场化运行的前提下，降低律师市场化调解费用，在确保调解主体积极性的同时，大大降低了一般社会公众进行商业调解的资金成本，为企业找到了一条专业有效、低成本、低耗时的解纷路径。

## （二）“公益性调解 + 市场化解纷”调解模式的特点

### 1. 双轨并行的调解机制

“公益性调解 + 市场化解纷”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双轨并行的机制，满足不

---

<sup>①</sup> 参见周晖、王芳芳：《智仁原创 | 律师调解中的利益冲突规则优化——从“杭州模式”“市场化解纷”视角出发》，载微信公众号“智仁律师”2024年9月25日。



同类型纠纷的解决需求。公益性调解侧重于为经济能力有限的当事人提供低成本或免费的调解服务，确保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市场化解纷则通过收费机制提供高效、专业化的服务，适用于资金充足、追求调解效率与质量的企业或个人。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一个兼具公平性和专业性的调解体系。

双轨并行的调解机制可以精准匹配调解路径，根据纠纷的性质和当事人的经济情况，合理分配案件至公益性或市场化调解。例如，对于小微企业或普通消费者，优先引导他们选择公益性调解，以降低维权成本；而对于涉及大额商业合同或复杂业务关系的纠纷，则推荐使用市场化调解服务，确保高效、专业的解决。同时，通过区分调解服务对象，可以将公益性调解的资源集中用于解决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从而缓解司法系统的压力，而市场化解纷则承担起更多专业化、复杂性较高的纠纷，确保资源利用最大化，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

## 2. 结合多方调解组织的力量

“公益性调解 + 市场化解纷”模式强调多方协作，整合司法、行政、行业协会和律师等多种资源，形成一个多元参与的调解平台。一是要加强跨部门协作，在调解过程中充分利用政府、行业协会和司法部门的资源，实现纠纷调解的协同作战，使得调解既具有权威性，又能根据纠纷类型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二是要引入行业专家参与调解过程，对于涉及特定行业的商业纠纷，可以邀请行业协会或相关领域的专家加入调解团队，提升调解过程的专业性和针对性，提高调解的效率和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这种多方协作的方式不仅提高了调解的公信力和专业性，还为不同类型的商业纠纷提供了更加灵活、多样的解决途径，通过多方力量的联合，使得调解流程更加全面，能够有效应对复杂多样的商业纠纷。

## 3. 调解程序的设计与执行

在“公益性调解 + 市场化解纷”模式中，调解程序的设计需要兼顾效率和公正性。一是要灵活安排调解流程，在保证调解质量的同时，加快纠纷的解决速度。不同的纠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调解程序的设计应当灵活可调，例如，对于简单的商业合同纠纷，调解程序可以更加直接、简短；而对于涉及复杂利益关系的纠纷，调解程序可以设置更为详细的讨论环节，确保问题得到充分讨论。二是要进行阶段性评估与反馈，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可以设置不同阶段的评估节点，通过定期的

反馈和沟通，确保调解的进展顺利并能及时调整策略。通过这种动态调解机制，可以及时处理调解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避免调解陷入僵局，从而提高调解成功的几率。这种调解程序的设计有利于适应各类商业纠纷的复杂性，同时保持调解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 4. 市场化收费标准的设置与引导

在“公益性调解 + 市场化解纷”模式下，市场化调解服务通常涉及收费，因此制定合理且灵活的收费标准是调解成功的重要保障。合理的费用设计，既可以吸引优质调解员参与调解工作，又能降低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尤其是保护经济困难的群体免受高昂调解费用的压力。

建立合理的市场化收费标准，一是要建立分级收费标准，根据案件复杂度和调解成功率设置不同的收费标准。例如，杭州的做法是调解成功后按诉讼费用的50%收取调解费用，调解不成功则不收取费用，这种按结果收费的机制既激励了调解员的积极性，又减轻了当事人的经济压力，避免因费用问题影响调解的参与度。二是要注重保护弱势群体权益，为了确保调解的公平性，可以对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实施费用减免或全免的政策，尤其是在公益性调解服务中，可以通过减免收费或免费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确保调解服务对所有社会群体开放，不因费用问题排除任何一方的合法权益。这不仅增加了调解的普惠性，也提升了整体社会的和谐稳定。

### （三）“公益性调解 + 市场化解纷”调解模式的效果评价

#### 1. 打造特色“市场化解纷”品牌

“公益性调解 + 市场化解纷”模式并非简单地将两者结合，而是基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行业特征，因地制宜地打造特色调解品牌。例如，浙江省杭州市通过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依托专职律师开展市场化调解工作。杭州市的这一模式不仅提高了调解的专业性和效率，还为当地企业提供了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市场化解纷”品牌。通过调解机构与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密切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调解的专业性与公信力；通过引入专业的律师和调解员，有效增强了企业对调解的信任度，逐步形成了调解品牌的社会知名度。这一调解模式的推





进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有效化解纠纷，还提高了市场主体选择调解方式的积极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

此外，调解模式的成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参与，通过“公益性调解+市场化解纷”模式，许多地区的调解网络得到了有效扩展。例如，扬州市宝应县在法院的牵头下整合了司法、行政和行业协会的力量，构建了以调解中心为核心、行业协会为依托的调解站点网络。尤其是在处理行业内的纠纷时，行业协会的参与能够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这种多层次的调解网络不仅提升了调解的灵活性，也扩大了调解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市场主体能够快速、高效地解决纠纷。这一机制的成功推广，有效增强了调解制度的社会影响力，也推动了调解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

## 2. 精准对接需求，提高调解效率

为了适应商业主体对高效纠纷解决的需求，“公益性调解+市场化解纷”模式通过多种机制实现了对主体需求的精准对接，显著提升了调解效率。

该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它通过公益性调解和市场化调解的双轨并行机制，根据当事人的不同需求提供差异化的调解服务。对于经济实力较弱、无力支付高额调解费用的群体，公益性调解提供了低成本甚至免费的调解服务，确保社会公平正义；而对于经济实力较强或纠纷复杂的企业，市场化调解通过收费机制为其提供更加专业、快速的纠纷解决服务。这一机制的灵活性使得调解资源能够更加合理地进行分配，减少了纠纷积压，提升了调解的整体效率。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调解途径，从而降低纠纷解决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提高对调解结果的满意度。

提高调解效率的另一关键因素在于调解员的专业化水平。市场化调解引入了经验丰富的律师和行业专家作为调解员，确保了调解过程的法律严谨性和和解协议的执行力。例如，杭州市的专职律师调解机制中，律师作为调解员为企业提供了高度专业化的调解服务，这种模式提升了复杂商业纠纷的调解质量，缩短了纠纷解决的周期。同时，各地调解机构还通过定期培训和考核对调解员进行系统性培养，确保他们能够及时掌握最新法律法规和行业动向，大幅提升了调解的标准化和调解质量，确保了调解服务的一致性与公正性。

在具体的调解流程设计上，“公益性调解+市场化解纷”模式更加注重程序



的灵活性，以适应不同类型纠纷的需求。简单纠纷通过快速调解程序迅速解决，复杂案件则采用更加细致的程序设计，确保调解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这种灵活设计使得调解周期大幅缩短，提升了调解的整体效率，同时，透明高效的调解程序也增强了当事人对调解结果的信任感，提高了调解结果的执行力。

### 3.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

“公益性调解 + 市场化解纷”模式结合了公益性质的调解服务与市场化运作的纠纷解决机制，不仅在商业纠纷解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还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实现了良好的平衡。同时，该模式既强调了调解的公益性质，又利用了市场的激励机制，促进了纠纷解决方式的创新性发展。

该调解模式的实施，一是有利于缓解司法压力，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提前介入调解，许多商业纠纷在诉讼前得到了解决，减少了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使法院可以集中精力处理更加复杂的案件。这一效果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商业案件数量较多的地区，法院通过调解机制将一部分简单纠纷从诉讼系统中分流出去，极大提升了司法工作的效率和社会满意度。二是有利于增强企业信心，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公益性调解 + 市场化解纷”的调解模式，企业能够快速、高效地解决纠纷，避免了因漫长的诉讼程序影响正常经营活动。这不仅降低了企业的法律风险，也为其提供了一个更加灵活、经济的纠纷解决途径，增强了企业对法律环境的信任感，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三是有利于促进法律服务市场化。市场化调解机制的引入不仅为商业纠纷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也促进了法律服务行业的市场化发展。在市场竞争的推动下，法律服务机构能够不断提高自身专业能力，以适应商业主体的需求。同时，调解服务的市场化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了法律服务行业的良性发展。随着市场对高效法律服务需求的增加，法律从业人员和调解员的职业发展空间也得到了扩展，进一步提升了整个行业的活力。

综上所述，“公益性调解 + 市场化解纷”的调解模式通过结合公益性调解和市场化调解的优势，既保障了社会公平正义，又提升了纠纷解决的效率。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该模式为商业纠纷的高效解决提供了有效替代路径，并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找到了平衡。随着该模式的逐步推广和完善，它在未来有望为更多地区的商事调解领域带来积极影响，并在商业纠纷解决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各地在 2023—2024 年度结合本地商事纠纷情况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六大商事调解模式具有不同的特点。（表 2-1）

表 2-1 2023—2024 年度中国商事调解六大模式

调解模式	调解主体	调解案件类型	调解员来源	突出特点
“调解 + 仲裁 + 诉讼”新模式	法院、仲裁机构主导，商事调解机构辅助	涉外、金融、知识产权纠纷等	国际仲裁员、律师调解员、法院推荐调解员等	商事调解在前，仲裁和诉讼托底的分级化解模式。
“诉前调解 + N”调解模式	商事调解机构主导，法院、仲裁机构、律所辅助	中小企业间商事合同纠纷等	商会成员、法院推荐调解员等	商事调解机构主导、法院等其他机构部门辅助调解的模式。
“法律 + 科技 + 调解”调解模式	法院、司法局、律所、商事调解机构、法律科技企业、高校研发团队等	工程建设、金融、知识产权、国际商事纠纷等	“虚拟调解员”、生成式人工智能调解助理等	深度融合法律的专业性、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先进性、调解的灵活性。
“法院 + 商会”调解模式	法院主导，商会调解机构协助	民营企业间商事纠纷等	商会成员、商会法律顾问、特定商事领域的专家学者、法院推荐调解员等	法院主导、商会协助调解的模式使得调解过程既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又具备行业专业性和实用性。
“专业调解 + 便捷机制 + 多元供给”调解模式	司法行政部门、商事调解组织主导，人民法院作为司法确认的辅助	金融、知识产权纠纷等	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仲裁员、退休法官等法律专业人士	依托互联网开展便捷调解；注重纠纷前端规避和调解成果后端落实；强化跨部门协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公益性调解 + 市场化解纷”调解模式	人民法院作为公益性调解的主导、商业调解组织作为市场化解纷的主导	民营企业间商事纠纷等	公益律师、人民法院法官、专职律师等	形成公益性调解和市场化解纷相结合的调解模式，最大化调解解决纠纷的覆盖范围。

## 第三章 重要商事领域争议调解发展观察

商事调解涵盖诸多关键商事领域，诸如金融、知识产权、贸易、公司治理、建筑工程、服务、运输物流以及电子商务等领域。伴随商事调解的持续演进，各领域的商事调解实践均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本报告经审慎筛选，择取了在社会层面具有广泛影响力、专业属性突出，且于本年度呈现显著发展态势的金融领域与知识产权领域，予以重点剖析与观察。当前，知识产权与金融领域的争议调解至关重要且复杂程度不断提升。在经济全球化持续加速、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知识产权争议和金融争议的数量持续增长，争议形式愈发多元化。例如，知识产权领域可能出现专利侵权、商标纠纷等多种争议形式，金融领域则可能涉及金融产品创新引发的争议、金融合同纠纷等。这些争议对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若不妥善处理，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深入考察知识产权与金融这两个关键领域的争议调解现状至关重要。从政策导向方面看，政府部门可能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争议，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在机构布局上，专业的争议调解机构不断涌现，为解决争议提供了多元化的渠道。发展趋向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可能会出现更多线上调解平台，提高调解效率。创新实践方面，例如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采用多元化的调解方式等，为解决复杂争议提供了新的思路。

### 一、知识产权争议调解观察

#### （一）知识产权争议调解概况

知识产权领域商事调解是指在知识产权纠纷中，由专业的调解机构或调解员协助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争议的一种方式。这种调解通常遵循自愿、平等、保密的原则，旨在以一种更为灵活、高效、低成本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商事调解在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1. 知识产权争议调解的政策概况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国家知识产权局与司法部等部门积



极作为，先后颁布一系列政策文件。涵盖范围从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宏观指导至针对专利开放许可实施纠纷的调解办法，乃至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全面涉及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的诸多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着重强调了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以及调解在化解知识产权领域矛盾纠纷中的关键作用，明确了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协调联动、自愿平等、突出专业特点等基本原则以及具体实施规则，并设定了至 2025 年基本覆盖重点区域和行业领域的目标。

2024 年 7 月 2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专利开放许可实施纠纷调解工作办法（试行）》，该办法旨在促进专利技术的实施与运用，及时化解专利开放许可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纠纷，强调了自愿、合法、公平和保密原则，明确了案件受理、调解、结案等具体流程规定，并规定了调解申请的受理条件、调解员的指定程序、调解过程中的行为要求以及和解协议的签订等具体操作步骤。

2024 年 7 月 29 日，司法部发布《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给予更多关注，促进我国公民、组织依法处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维护我国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明确了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在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中的职责和协调机制，以确保我国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 2. 知识产权调解的机构概况

### （1）中国知识产权争议调解机构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调解机构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协同化的蓬勃发展态势。从人民调解组织的不断拓展，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积极履行行政调解职能，再到律师调解工作室、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的兴起，以及“一站式”调解平台和仲裁调解机构的日益完善，共同构建起了日益强大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网络，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具体开展知识产权调解工作的相关机构情况如下：

第一，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作为依法设立的专门用于调解知识产权领域矛盾纠纷的群众性组织，接受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的

指导、基层人民法院的业务指导以及人民调解员协会的行业指导。其涵盖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依托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设立的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关于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指出，应依据知识产权纠纷化解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地推进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设立该组织需由相关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提出申请，经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符合法律及规范要求后，及时纳入辖区内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名册，以获得工作指导。同时，应推动在产业集聚区、电商平台、专业市场等区域设立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引导企业采用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必须严格遵守《人民调解法》的各项规定，坚守人民调解的基本属性，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特点和优势。

第二，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相关文件明确指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要积极履行行政调解职能，按照《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办案指南》等规定，严格依法依规开展行政调解。在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任务较重的地区，可以根据需要成立行政调解委员会，设立行政调解室、接待室等。各地的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组织设立情况和行政调解工作开展情况需定期向司法行政机关报送。截至目前，全国已布局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73 家，快速维权中心 42 家。全国知识产权系统指导管理的调解组织达 2000 家，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化解知识产权领域纠纷的重要力量。<sup>①</sup>这些机构共同构成了中国知识产权争议调解的网络，旨在通过多元化解机制，有效解决知识产权领域的矛盾和纠纷。

第三，律师调解工作室。律师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具有优势，且律师服务可以更好地根据当事人需求定制纠纷调解方案，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可以更有效地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因此应推动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为当事人提供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服务，并可适当收取费用。

第四，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这些组织包括商会、行业协会或其他专业机构，根据当事人需求，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探索开展知识产权纠纷商事调解，且这些组织在各个领域内更为专业，充分发挥了各类知识产权专业机构作用，创新了知

---

<sup>①</sup> 参见宋晨：《全国在建和已建成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达 73 家》，载新华网，<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40808/10c1899f7447407aa13f4f4dfb3d245f/c.html>。





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形式和工作模式。例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积极致力于推动知识产权调解工作的发展，于2021年专门成立了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制定了我国首个知识产权调解中英文规则，聘任了80多名国内外知识产权领军人才担任调解员，包括来自全球的前法官、国内外知名院校高级学者、律师、行业专家等，致力于协助中外企业妥善化解知识产权纠纷。

第五，知识产权纠纷“一站式”调解平台。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速维权中心、维权援助中心等建立知识产权纠纷“一站式”调解平台，引导调解组织、远程司法确认室、知识产权仲裁院（中心）、公证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等各类资源入驻调解平台，为当事人提供司法确认、仲裁、公证等保护渠道。加强知识产权纠纷“一站式”调解平台与当地综合性非诉讼纠纷化解中心、调解中心等平台的工作对接，及时协调解决重大疑难复杂知识产权纠纷。

## （2）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是全球唯一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知识产权仲裁机构，成立于1994年，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旨在解决私人之间的知识产权商事纠纷，尤其是解决技术和娱乐方面的纠纷，于2010年在新加坡设立分中心，并在2019年10月在中国上海设立了上海中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是中国司法部批准的首家在中国境内开展涉外知识产权争议案件仲裁与调解业务的国际仲裁机构。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已与上海、福建、海南、广东、重庆等地法院建立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委托调解合作机制，受理120余件调解案件，调解成功率约为35%。案件涵盖各种类型的知识产权争议，其中商标争议占比62%，专利22%，版权和数字内容10%，信息通信技术2%，其他4%。当事人来自法国、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十多个国家。<sup>①</sup>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对其受理的首例涉外知识产权争议案件已作出仲裁裁决。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提供中立、国际化、非营利性的

---

<sup>①</sup> 参见上海知识产权局：《助力上海建设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和中心城市 国内首家境外仲裁机构首例知识产权案件在上海仲裁》，载上海知识产权局官网，<https://sipa.sh.gov.cn/gzdt/20241014/12f93e47ec14419fa2e9425ad25f19df.html>。

调解、仲裁和专家裁决及替代性争议解决服务，并且有专门的调解规则和程序，以帮助当事人解决国内或跨境知识产权、技术和商业争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与知识产权局、法院以及其他知识产权和替代性争议解决利益相关者合作，以推广使用 ADR 解决知识产权和技术争议。

### 3. 涉外知识产权争议调解的发展概况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全球贸易中参与度越来越高，部分企业存在专业性欠缺、应对能力不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涉外知识产权争议的发展趋势呈现易发、高发的状态。

2024 年 6 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发布了《2024 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调查》。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企业在美知识产权诉讼新立案共 1173 起，相较于 2022 年增长 19.0%，呈持续上涨的趋势。其中，专利诉讼新立案 447 起，增长 56.1%；商标诉讼新立案 757 起，增长 5.4%；商业秘密诉讼新立案 23 起，增长 27.8%。中国企业在美专利诉讼主要涉及制造行业及批发和零售业，商标诉讼主要涉及批发和零售业。从诉讼结果来看，65.7% 的专利诉讼以和解撤案结案；66.1% 的商标诉讼被告因缺席应诉而被判败诉。专利诉讼平均判赔额为 2371.72 万美元，商标诉讼平均判赔额为 117.98 万美元。<sup>①</sup>可见，涉外知识产权争议数量呈上升的态势。

2024 年 9 月 4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副司长宋蓓蓓介绍，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采取一系列举措帮助企业加强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取得了积极成效。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内 29 个省（区、市）设立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分中心 71 家，在 5 个国家设立海外分中心，针对重点领域设立 4 个产业分中心，对接当地企业，提供专业性、公益性的海外维权指导，帮助企业加强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专题培训累计近千次，培训人数 37 万人次，同时，通过遴选指导专家持续扩充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专家库，其中，国家层面遴选海外纠纷应对指导专家 119 人，各地遴选海外纠纷应对指导专家总数超 1800 人。根据数据显示，2024 年上半年，

---

<sup>①</sup> 参见钱颜：《〈2024 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调查〉发布》，载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http://ipr.mofcom.gov.cn/article/gnxw/xsjg/202408/1987472.html>。



累计指导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166 件。<sup>①</sup>可见，我国重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帮助企业应对涉外知识产权纠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数量持续攀升。传统诉讼方式在应对此类纠纷时逐渐显现出局限性，难以充分满足当前的实际需求。为切实有效地解决涉外知识产权争议，调解作为一种具备更高灵活性与高效性的纠纷解决方式，正日益受到广泛重视，并在实践中实现了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调解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建立了多元化的调解机制，并不断提升调解的专业性和国际化水平。我国在涉外知识产权争议调解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例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成立的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作为国内首个专注于解决涉外知识产权争议的商事调解机构，汇聚了国内外知识产权领域与调解领域的顶尖人才，为当事人提供专业的调解服务，有力推动纠纷实现高效、友好、一揽子化解。此外，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内外设立了多个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分中心，提供专业性、公益性的海外维权指导。这些举措切实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在涉外知识产权争议调解方面的能力和影响力。同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仲裁与调解上海中心作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批准的首家在中国境内开展涉外知识产权争议案件仲裁与调解业务的国际机构，与上海法院合作，成功调解了多起涉外知识产权争议案件。

未来，涉外知识产权争议调解的发展趋势聚焦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将会紧密结合当事人的各类不同需求，推出更为具体且灵活的调解方式。在人才方面，调解员需具备更高水准的专业知识以及卓越的语言能力，如此方能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与文化差异。同时，涉外知识产权争议调解将加大对信息技术的运用，构建在线调解平台与数据库，从而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调解服务。这不仅有助于降低调解成本，还能大幅提高调解效率。为确保有充足的专业人才参与涉外知识产权争议调解工作，人才培养必将成为重点。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组织大量专题培训，并建立了专家库。在法律层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等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修订，涉外知识产权争议调解将获得更完善的法

---

<sup>①</sup> 参见曹音：《国家知识产权局：2024 年上半年，累计指导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166 件》，载中国日报网，<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409/04/WS66d7cb7da310a792b3aba3de.html>。

律支持。可见，涉外知识产权争议调解未来呈现多元化、国际化和专业化的发展趋势。

## （二）知识产权争议调解的创新措施

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司法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该文件指出，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完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需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充分发挥调解在化解知识产权领域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调解作为完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重要内容，对促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知识产权争议调解的创新措施主要包括打造知识产权调解云平台、知识产权调解专项机构及工作机制和推动凝聚国际知识产权调解共识三项。

### 1. 知识产权调解云平台

中国知识产权争议调解云平台，全称为中国（杭州）知识产权·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是一个专业的常设调解云平台。中国（杭州）知识产权·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以下简称“云平台”）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杭州市委员会牵头建设，接受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业务指导，旨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和促进国际商事调解，为群众和企业提供了多途径、多层次、多种类的纠纷解决方式，推动形成“社会调解在前、法院诉讼断后”的解纷流程，加强了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衔接。

云平台自上线以来，秉承智能化、信息化的理念，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一步完善了电子送达、统一在线话务中心、失联修复、电子签章签名、文书自动生成、在线司法确认等跨时空、跨地域的一体化调解服务。截至 2024 年 10 月 21 日，调解云平台已累计接收案件 34532 件，调解完结 29099 件，调解成功 10420 件，成功率 35.81%<sup>①</sup>，涉案金额超 50 亿元人民币，涉及美国、德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等 37 个国家及地区。平台履行率接近 100%，进一步减轻了法院的审判压力。

<sup>①</sup> 参见中国（杭州）知识产权·国际商事调解云平台网站，<https://hzzcss.tiaojiecloud.com/#/>。



下面将从云平台组成、调解程序及实施方式等几个方面详细介绍云平台并阐述云平台的创新之处。

### （1）云平台组成

云平台集聚专业调解力量，引进国内外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的调解力量入驻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服务共推。目前，共有香港国际调解中心、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专职调解机构以及全国贸促系统部分调解中心等共计 92 家调解机构和近 1400 位中外调解员入驻平台提供商事调解服务。调解机构和调解员共同组成了云平台的“最强调解大脑”。

云平台的调解机构齐聚国内国际专职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力量，主要包括：香港国际调解中心、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和马来西亚国际调解中心等境外国际性知名调解机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 中国国际商会杭州调解中心、南京调解中心等 13 家贸促系统调解中心，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北京版权调解中心等 16 家国内专业商事调解机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调解工作室、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调解工作室等 49 家律师调解工作室。近年来，云平台的能级持续提升，这一发展态势促使调解机构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云平台广泛吸纳了来自浙江省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专职调解员等司法系统的强大力量。云平台会对入驻的调解机构进行严格的资质认证，以此确保这些机构具备为当事人提供专业调解服务的能力。入驻云平台的调解机构的基本情况，如机构的规模、人员构成等；纠纷受理范围，包括涉及的知识产权类型及具体的纠纷领域；擅长领域，例如在专利纠纷、商标纠纷或是版权纠纷等方面的专业优势，都会在上平台详细公布。这样的举措为当事人在选择调解机构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他们能够根据自身纠纷的特点和需求，精准地挑选出最适合的调解机构，从而更高效地解决知识产权纠纷。

云平台集聚了 1400 余位中外调解员，包括专职调解员、行业调解员、律师调解员、外籍特邀调解员和国内特邀调解员。云平台选任的调解员通常是具有专业背景和经验的人，这是为了确保他们能够在调解过程中提供专业的服务，涉及的专业细分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外观专利、发明专利、商标权、专利权权属、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实用新型专利、不正当竞争、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专利代理合同和涉外商



事纠纷等。此外，云平台会对调解员进行定期的培训和指导以提升知识产权和涉外商事案件的专业调解水平。云平台还会定期统计调解数据，分析调解失败原因以此改进工作，宣传优秀调解员和调解案例，营造解纷和谐氛围。

当事人可以共同选择调解机构或者调解员，这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如果调解员与案件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调解的关系，当事人有权要求调解员回避。若存在前述的情况，调解员也应当主动披露并回避。这一机制确保了调解员兼具专业性和中立性。

### （2）云平台调解程序及实施方式

云平台的调解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调解程序的启动、调解员的选任和指定、调解准备、在线调解的实施、结果确认、调解程序终结（见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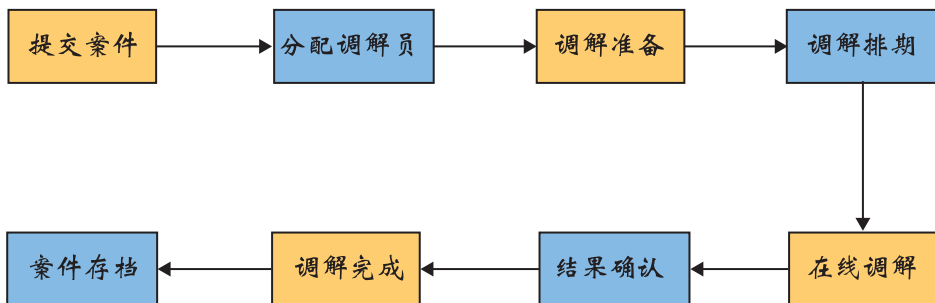


图 3-1 云平台调解流程图

第一，调解程序的启动。调解程序通常由当事人发起，当事人可以在线提交调解申请，明确争议的事项和调解的意愿。云平台接收到申请后，会对案件进行初步的审查，以确定是否适合在线调解。

第二，调解员的选任和指定。案件申请提交后，审核人员会进行审核，通过后会将案件分配给合适的调解机构，由调解组长分配给具体调解员进行调解。云平台设置“智能分案”功能，按照知产“类案匹配”标准，自动分配给专业调解员。

第三，调解准备。调解员会与双方当事人沟通，了解案件的详细情况，准备必要的调解材料。云平台所需调解时间相比于原先等待立案和至少 6—9 个月的排期开庭等待期间更短，大大提高纠纷进入实质性化解的效率，有力回应当事人的关切，个案最短调解用时仅 1 天。

第四，在线调解的实施。若当事人同意调解，会收到三条短信，即调解码短信



通知、调解信息告知和调解开庭通知。根据调解码短信的提示，当事人登录中国（杭州）知识产权·国际商事调解服务云平台，输入调解码，核对姓名与身份证号码无误后，点击“开始认证”可进入案件详情页面。调解员通过电话、视频与当事人双方沟通协商，会根据双方的意愿和案件的实际情况，提出调解方案供双方参考。

第五，结果确认。如果双方就在线调解的调解方案达成一致，调解员会协助双方制定和解协议，并在云平台上进行确认。和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此外，调解成功后，双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和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这一步骤是确保和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环节。

第六，调解程序终结。如若当事人一方反馈拒绝调解，调解员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解终止操作。此外，如果调解未能成功，调解程序将被终结。当事人可以选择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争议，如诉讼或仲裁。

### （3）云平台其他特点

第一，拥有技术支持。云平台集成了电子送达、在线话务中心和视频调解、失联信息修复、电子在线签章签名、文书自动生成、在线司法确认等智慧手段，还提供了案件预判、信息共享、资源融合和数据分析等一体化功能。调解过程中通过视频“屏对屏”调解，利用人脸扫描技术对当事人实现实人认证，采取二维码扫描方式进行当事人笔录确认。通过“调解员工作台”则可查询调解员名下的案件和工作情况。

第二，覆盖范围广。截至目前，浙江省全省贸促系统调解机构均入驻云平台，实现省域“全覆盖”。此外，云平台不仅服务于浙江省，云平台已接收的调解案件来自浙江、广东、河北等29个省市，案件还涉及来自美国、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数字化手段，云平台实现了跨时空、跨地域的调解服务，确保了调解的便捷性和高效性。

第三，云平台的数智调解大大提高了“诉前调解+司法确认”模式的运用效率，提高了解决纠纷的效率。调解成功后，双方当事人可以在和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法院会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确保其自愿性和合法性，并在确认后出具裁定书，该裁定书具有强制执行力。此外，云平台提供了在线司法确认的功能，当事人可以通过平台进行线上司法确认，提高了

调解的便捷性和效率。

云平台为处理知识产权和国际商事纠纷调解打破了时空限制，为努力建成中国特色专业化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平台提供可行路径和实践依据。企业和群众借此实现了“一次不用跑”，经济、便捷、快速地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平和化解矛盾，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 2. 知识产权调解专项机构及工作机制

### （1）知识产权争议仲裁调解机构

截至目前全国在建和已运行的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数量达到 73 家（部分见表 3-1），保护中心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和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几十个产业开展专利快速预审、专利快速维权、知识产权保护协作及专利导航运营等工作。

表 3-1 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涉及领域及网址表（部分）

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名称	领域	网址
中国（北京）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a href="http://www.bjippc.cn/">http://www.bjippc.cn/</a>
中国（中关村）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材料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	<a href="http://www.bjhd.gov.cn/ippc/">http://www.bjhd.gov.cn/ippc/</a>
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围绕新能源和互联网产业	<a href="http://www.szipsr.org.cn/">http://www.szipsr.org.cn/</a>
中国（滨海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	<a href="http://zseq.scjgj.tjbh.gov.cn/">http://zseq.scjgj.tjbh.gov.cn/</a>
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生物医药产业	<a href="https://ippc.pudong.gov.cn/site/">https://ippc.pudong.gov.cn/site/</a>
中国（苏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材料、生物制品制造等知识产权创造和保护需求旺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a href="http://www.szippc.cn/ippc/">http://www.szippc.cn/ippc/</a>
中国（浙江）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产业	<a href="http://zjippc.zjamr.zj.gov.cn/">http://zjippc.zjamr.zj.gov.cn/</a>
中国（泉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智能制造和半导体	<a href="https://www.qzipr.cn/">https://www.qzipr.cn/</a>
中国（山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海洋科技	<a href="http://www.sdipo.net/">http://www.sdipo.net/</a>
中国（新乡）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起重设备和电池产业	<a href="http://www.xxipa.org.cn/">http://www.xxipa.org.cn/</a>



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10月15日，海南国际仲裁院、省知识产权协会仲裁调解中心揭牌运作，协会依托海南国际仲裁院专业平台优势，推行“调解+仲裁”多元解纷机制有机衔接，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服务。海南国际仲裁院、省知识产权协会仲裁调解中心的建成标志着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突破与完善。

## （2）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组织

截至2024年10月，我国在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方面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全国知识产权系统指导管理的调解组织达到了2000家。这些调解组织覆盖了知识产权纠纷易发多发的重点区域和行业领域，为当事人提供了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渠道。

### 第一，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近年来，为了响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的号召，各省、市、县纷纷成立了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省级调委会包括浙江省调委会、安徽省调委会、河北省调委会、湖南省调委会和山西省调委会等。省级调委会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接受行政、司法行政部门委托，承担知识产权领域纠纷调解相关工作、承担知识产权领域的诉前、诉中调解工作；受理辖区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申请。此外，多个地级市也成立了调委会。长沙市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长沙市知调委”）是全国省会城市建设的首个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长沙市知调委创新了“三精”调解模式（精准研判、精准指派、精准调解）和“三步”联调举措（人民调解员初调、法官助理跟进调、法官或行政执法人员指导调），并推进了“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的联动机制。这些创新措施大大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效率，提升了知产纠纷解决的质量。

### 第二，其他行业性专业性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组织。

为推动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向纵深发展，北京市知识产权局指导建立了14家行业性、专业性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见表3-2），涵盖软件、电子信息、医疗器械等知识产权纠纷高发频发领域，培养了一支300余人的专、兼职人民调解员队伍，为当事人提供了便捷、高效、专业、低成本快速解纷途径。

表 3-2 行业性专业性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组织表

行业性专业性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组织	设立单位	设立时间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	2015 年 8 月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2019 年 11 月
全联农业产业商会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全联农业产业商会	2019 年 11 月
中国专利保护协会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中国专利保护协会	2017 年 4 月
中华商标协会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中华商标协会	2019 年 11 月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	2015 年 8 月
北京电源行业协会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北京电源行业协会	2015 年 8 月
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北京城建科技促进会	2016 年 11 月
北京家居行业协会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北京家居行业协会	2015 年 8 月
北京茶业企业商会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北京茶业企业商会	2015 年 8 月
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2019 年 11 月
北京市朝阳区（设计服务业）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北京纺织工程学会	2018 年 7 月
北京市朝阳区（设计服务业） 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 海互企业法律服务中心	2016 年 1 月
知乎知识产权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	知乎网 （北京智者天下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 （3）人民法院调解平台

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领域深化了“抓前端、治未病”的工作，优先推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促进知识产权纠纷的源头治理和社会治理。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建立了“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





机制，实现了 30 个省（区、市）知识产权调解组织的全面覆盖。各地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开展在线诉调对接工作。知识产权多元化解机制不断完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数量持续增加，人民法院委派诉前调解的纠纷超 9 万件，调解成功率超 80%，调解在化解知识产权领域矛盾纠纷中的关键作用进一步显现。

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了首批知识产权纠纷多元调解的典型经验和案例，包括河北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五步工作法”调解专利纠纷、江苏盐城中院委派调解的系列商标侵权纠纷、上海打造“三位一体”（简化程序——调解先行——衔接司法）的行政裁决工作机制等。这些发布的内容展示了人民法院和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在知识产权纠纷预防、在线调解、多元化解和一站式解纷等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

#### （4）知识产权调解工作机制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的重要指示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开展知识产权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

“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是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一项重要创新，由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协调推进。该机制旨在通过在线平台实现调解与诉讼的无缝对接，提高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效率和便捷性。

“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协调机制。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导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人民法院建立协调机制，确保调解与诉讼有效衔接。第二，调解平台的入驻。全国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行在线调解和诉调对接工作，实现全程在线处理。第三，调解与司法确认衔接。成功调解的案件，当事人可在线申请司法确认或调解书。人民法院在线确认和解协议或立案后出具调解书。这是对“诉前调解 + 司法确认”的一般调解模式的强化升级。第四，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动知识产权纠纷化解平台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对接，共享数据和资源，提高调解质量和效率。第五，明确职责分工。界定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人民法院在诉调对接中的职责，包括调解组织的推荐、确认、管理和执行调解流程。第六，实行联席会议制度。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民事审判第三庭、知识产权法庭、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共同参与，

定期讨论工作进展，分析并制定工作措施。

### 3. 推动凝聚国际知识产权调解共识

如前所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于2021年成立了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知产专委会”），以满足当事人对知识产权纠纷，尤其是跨境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化解的需求。三年多来，调解中心积极发挥国内外资源优势，广泛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交流，在引领知识产权调解议题设置、宣传商事调解理念、凝聚全球知识产权调解共识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第一，主动参加国际知识产权会议，宣传商事调解理念。2024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派员赴美国亚特兰大参加了国际商标协会（INTA）2024年年会并作为参展商首次参展，现场发放英文版《中国商事调解年度报告（2022-2023）》《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知识产权调解规则》，与美国、哥伦比亚、德国、乌克兰、新加坡、日本、南非、尼日利亚等30多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专业人士探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路径，相互了解调解在各自国家的发展现状，还与同样参展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AIPPI）、日本知识产权局（JPO）等机构进行了互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代表还参与会见了INTA首席执行官艾蒂安·桑斯·德·阿塞多（Etienne Sanz de Acedo）及董事会成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作为该国际知识产权会议中唯一一个调解机构，在提高国际品牌人士对调解的认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24年10月，世界知识产权大会（AIPPI）在杭州盛大开幕，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作为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机构之一，在大会期间参与了中国贸促会展台搭建，向前来参会的全球代表宣传商事调解理念，进一步扩大了商事调解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影响力。AIPPI组委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欧盟知识产权局等机构代表到展台交流。大会结束后，在由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与杭州萧山区联合主办的“企业出海国际知识产权服务对接会”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协助组织并主持了“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在国际知识产权运用促进中的最新发展趋势”研讨环节，邀请了来自巴西、南非、印度、德国的顶尖知识产权律师以及来自华为公司的代表，共同围绕调解在各国发展的新动态进行了交流分享，为现场参会的中外代表提供了宝贵参考。

第二，主动设置知识产权调解议题，争取国际话语权。中国贸促会已经连续主办八届国际调解高峰论坛品牌活动，近年来，每年的高峰论坛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都设置了关于知识产权调解的有关议题讨论，例如，2023 年第七届论坛中的议题四“加强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仲裁，提升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水平”，2024 年第八届论坛中的议题三“国内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最新发展”，每年都有来自全球 10 余个国家的争议解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研讨交流。2024 年 9 月，在由中国许可贸易者工作者协会（LES China）举办的年会上，同样设置了主题为“调解之道——解决争议，达成许可的新趋势”的研讨环节，该环节由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副主席、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席马浩先生主持，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副秘书长姚俊逸先生作为该环节发言嘉宾之一，与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国际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前会长、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一同讨论。此外，2024 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还创设了“IP 大咖谈”系列讲座，从围绕热点问题邀请专家从调解角度解读，例如举办了标准必要专利实务分享、中国和法国知识产权调解异同在线英文研讨会等高质量活动，商事调解宣传不断取得突破。

第三，探索涉外知识产权调解实践。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已经在专利许可案件中发挥作用，通过调解的方式帮助中外头部企业在促进谈判等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2024 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在国际许可贸易者工作者协会代表团来华期间，与飞利浦、诺基亚、高通等跨国企业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推动全球企业对商事调解认同和接受，发出中国调解声音，引领国际知识产权调解实践。

### （三）知识产权争议调解的典型案例分析

#### 1. 知识产权争议调解的典型案例分析

##### （1）专利侵权纠纷和解、商法中心巧解难题——杭州市国际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案情：**2024 年 4 月 26 日，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发现某个人卖家在经营的淘宝网店内，未经其许可实施侵权行为，具体行为为其销售、许诺销售的一款玩具侵犯了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一种名称为“回旋飞球”的实用新型专利。故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某个人立即停止侵害其权利，停止销售、许诺销售并销毁库存涉案侵权产品，删除、屏蔽、断开侵权产品链接，终止侵权产品的交易和服务，并赔偿其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共计3万元。法院通过调解云平台将本案移交杭州市国际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杭州商法中心”）进行诉前调解。

2024年4月27日，杭州商法中心收到此案后，立即安排调解员展开调解工作。调解员查看材料后，了解到本案的事实为：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专利权人于2020年4月17日申请名为“一种回旋飞球”的实用新型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0年12月1日出具《实用新型专利权评价报告》，结论为全部权利要求未发现存在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的缺陷，该实用新型专利至今有效且权利稳定，原告主体资格没有问题。

调解员收到上述起诉材料后，将起诉材料送达被告。被告联系调解员，表示其购入货品来源合法，并非主观恶意侵权，同时有调解意愿，根据原告诉请，被告愿意立即采取措施，包括删除案涉侵权产品链接、终止交易等。被告提出，因为其主观上没有侵权故意，且案涉产品月销较低，希望调解员与原告沟通降低赔偿金额。

与被告进行初步沟通后，调解员认为本案具备调解基础，为促成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调解员与原告多次沟通。原告表示，因其侵权行为已导致原告产生损失并支出了维权费用，可以与被告调解，但在调解金额上双方存在较大差距。

**调解结果：**经调解员与原被告双方多次沟通，分析证据情况及法律后果，双方最终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意见，本案以和解结案。双方达成和解后，被告将赔偿义务履行完毕，原告即申请撤诉。

**争议焦点分析：**

1. 被告侵害了原告的专利权。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原告专利涉及玩具领域技术，且至今仍合法有效。即使涉案产品销量较低，被告主观恶意低，被告仍需承担专利侵权责任。

2. 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相对过高，应当适度降低赔偿金额。一方面涉案产品单价、销量均较低对原告造成的损害后果有限，另一方面被告并非侵权产品的生产者，其承担的法律責任应与实际生产侵权产品的厂家有所区别。

**分析：**电商卖家作为销售方，在被诉知识产权侵权时，通常会使用“合法来源

抗辩”<sup>①</sup>的“护身符”以免除赔偿责任。在涉及网络销售的专利侵权案件中，电商卖家大多不直接制造产品，且能够提供一定的产品来源证据。需要注意的是“合法来源抗辩”条款规定免除的仅仅是赔偿责任而非侵权责任，权利人仍然可以要求销售方停止销售。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即使“合法来源抗辩”成功，销售方也需要承担权利人的维权合理开支，而非“一分钱都不出”。即使权利人没有提交关于合理开支的证据，法院也可能考虑与案件复杂程度相匹配的代理费用、公证费用以及正常差旅市场价格水平，酌定一个合理开支，要求销售方承担。这就要求广大电商经营者尊重原创，尊重知识产权，努力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路径。

## （2）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调解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

**案情：**原告林某在某电商平台发现被告方某开设的网店销售涉嫌侵犯其外观设计专利的产品，在进行公证购买实物且现场拆分进行证据保存和固定后，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方某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知识产权专员根据研判，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将案件委派给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长沙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通过平台受理了该起案件，按照建议要求指派调解员进行专业调解。

调解员收到案件信息后召开案件研讨会，根据案件材料和证据材料，查阅案件涉及的相关专利，对侵权产品进行比对、逐一分析，为案件量身打造了一份“专属的调解方案”。

调解伊始，被告并不认为侵犯原告外观设计专利权，屡次强调自己销售量少且已做下架处理。随即，调解员将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发送给被告，并向被告分析原告提交的证据链，详尽阐明法理，最终被告承认侵权事实，并就侵权行为如何赔偿征求调解员的建议。然后，调解员向原告告知被告的调解诚意，原告同意在被告能停止销售侵权产品后，以低于赔偿诉求金额进行调解。最后，调解员邀请原被告双方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行线上调解，在“面对面”过程中，被告提出和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顾虑，担忧原告在获得赔偿后会再次找“麻

---

<sup>①</sup>《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77条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烦”。调解员告知原被告双方可以线上共同申请和解协议司法确认。最终达成协议如下：第一被告同意停止销售侵权产品、删除有关销售侵权产品链接；第二被告一次性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 1.6 万元。原、被告双方就和解协议共同向法院提出了线上司法确认申请。

**分析：**本案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线处理了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包括立案、质证和申请和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选任和指派了具备相关技术背景和专利法知识的调解员，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制定了个性化的调解方案。通过比对、法律解释和劝说，实现了精准的研判、委派和调解。这一流程强化了行政与司法的联动，有效衔接了调解和诉讼，降低了知识产权维权的成本，缩短了维权的周期，缓解了举证困难的问题。

### （3）山东省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商标侵权纠纷案

**案情：**北京某母婴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拥有某商标专用权。原告认为济南市某母婴用品店（以下简称被告）未经授权擅自将其商标标识用于店铺招牌、店内装饰等，经营行为侵犯了其商标专用权，造成声誉损害和经济损失，将被告起诉至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通过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向山东省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推送该案件。

调委会快速受理案件，在整理分析案件材料后，及时联系双方当事人，梳理出引发纠纷的根源矛盾：原告与被告曾有合作协议，原告许可被告店铺使用其商标标识，原告负责提供经营指导和货源商品，被告在当地市场销售其母婴用品，合约到期半年后，被告只将店铺更名，店铺尚有很多货源商品未售出，经营店铺的招牌、店内货架、店铺装饰等多处保留了商标标识，且继续销售母婴用品。被告在商标权许可使用期满后，继续使用商标标识销售尾货，构成商标权及特许经营权的侵权行为。但其有处理尾货的意图，主观恶意较小，双方接受调解的可能性比较大。

双方当事人虽然对侵权赔偿数额争议较大，但却均表达了强烈的调解意愿。对此，调解员立足于既尊重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益，又照顾到经营者主观恶意轻微且存在客观困难。对于被告，调解员详细讲解了其客观上已经构成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建议其在能力限度内接受调解方案，免除诉讼程序，避免耽误营业，防止更大赔偿数额。对于原告，调解员提醒其存在“未充分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经营指导



的义务”的问题。又明确指出：被告店铺起初积压的商品系从原告批量进货的，自协议终止至今仅半年期限，要求被告按照1年许可使用费标准承担赔偿责任的不合理性。

最终，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接受了调解方案，仅用11天，纠纷得到圆满化解，原告被告利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线上签署和解协议。

分析：本案通过诉调对接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线上处理，特别是在线签署和解协议，在提升调解效率、缩短诉讼时间和减少当事人的维权成本的同时有效保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此外，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积极阐明法律，耐心解释，努力寻找双方的利益平衡点，实现了以理服人，促成了纠纷的实质性解决。

#### （4）上海市知识产权民事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调解外观设计专利侵权纠纷案

**案情：**王某（以下简称原告）发现上海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未经其许可，擅自在某电商平台上销售、许诺销售涉嫌侵犯其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产品，遂在该店铺公证购买了涉案产品。王某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停止侵权并赔偿。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经当事人双方同意后，通过上海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委派上海市知识产权民事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对该案开展诉前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被告提交某品牌旗舰店内销售的某款产品链接作为证据，认为该链接中的产品上市时间早于涉案专利申请日，且被诉侵权设计与现有设计相同，希望仅承担几千元的合理开支，对此原告不予认可。

#### 争议焦点分析：

第一准确适用现有设计抗辩，厘清案件事实。调解员遵循“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外观设计比对原则，将被诉侵权产品分别与现有设计、专利设计的产品颜色、纹路、形状等要素进行比对。让原告被告双方确认相同点和区别点对产品外观美感效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大小程度，判断被诉侵权产品在外观上到底是更接近现有设计还是更接近外观设计专利。最终在原告被告双方的认可下，在现有设计抗辩的法律适用上达成共识。

第二合理确定赔偿金额，促成纠纷化解。调解员了解到，被告与供应商约定，知识产权侵权责任由供应商承担。调解员向该供应商分析了涉案专利无效程序所需时间和费用、现有设计抗辩的成功率、本案诉讼成本以及其与被告的合作关系等综合因素，供应商同意王某提出的和解方案。供应商、原告、被告就和解协议事项达

成了一致。

**分析：**本案中，调解员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和对案件关键点的精准把握，有效推动了知识产权纠纷的高效解决。调解员深入理解外观设计抗辩的实质，找到了调解的突破口，展现了调解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专业性和高效性。这不仅提升了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能力，也增强了公众的保护意识，还凸显了调解在快速协同保护知识产权中的关键作用。

## 2. 知识产权争议调解典型案例的启示

通过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打造好一站式云平台，让知识产权争议调解更有“速度”；落实“总对总”诉调对接机制，让知识产权争议调解更具“信赖力”；建设专业调解机构、培养专业调解人员，让知识产权调解更具“力度”。

### （1）打造一站式云平台

聚焦于构建集约化、智能化、专业化的调解平台，强调集成优势，将解纷资源前移，实现一站式在线服务。利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知识产权调解云平台，提供在线咨询、维权申请、调解委派和信息推送等服务，以提高效率。通过强化数据分析，实现数据共享、资源共用和纠纷共解。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在线音视频调解、司法确认和文书送达。

### （2）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全流程诉调对接工作机制

构建调解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精准研判、精准委派、精准调解”机制。针对疑难案件，形成“专职人民调解员初调、法官助理跟进调、法官或行政执法人员指导调”的三级联动工作模式。在达成和解后，制作并确认和解协议，实行“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的模式，落实诉调衔接工作。

### （3）建设专业调解机构、培养专业调解人员

为提升调解案件的效能，应当建设行业性专业性调解机构。人民调解组织应当仔细选任来自高校、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仲裁机构、公证机构的知识产权领域专家担任调解员。此外，各地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调解中心应当定期举办涉及专利、商标、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内容的维权援助与纠纷调解业务培训会，提升选任调解员的整体办案能力。



## 二、金融争议调解观察

### （一）金融争议调解概况

金融领域商事调解是一种专门针对金融行业内部纠纷的解决机制，它通过专业的调解机构或调解员，帮助金融机构和消费者以非诉讼的方式解决金融争议。这种调解机制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我国金融领域商事调解正在日益发展，调解规则在逐步完善并且趋于国际化；调解组织迅速增长且专业化程度逐步增强；调解案件数量的大幅增加，其中，金融领域的商事调解案件占比较大。我国也在政策方面持支持态度，积极促进金融领域商事调解的发展，并且信息化与数字化的应用增强了调解的可及性。同时，金融领域商事调解也呈现国际化趋势，随着《新加坡调解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生效，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这些公约，调解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有加强的趋势。

#### 1. 金融调解的政策概况

近年来，我国多部门及各地积极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最高人民法院、各金融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出台了各类规范性文件，对金融调解制度进行了规范和完善。

2019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旨在建立、健全专业高效、有机衔接、便捷利民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合理配置纠纷解决资源，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强调依法公正、调解自愿、高效便民的原则。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职能，扎实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会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等，制定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发展总体规划及地方规划，推动金融纠纷非诉第三方解决机制建设，并且与各级人民法院加强沟通协作。<sup>①</sup>该意见强调了建立健全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的重要性。

2024年9月1日，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周亮在2024年金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上表示，近期，金融监管总局将联合人民银行、证监会出台《推进金融纠纷调解

---

<sup>①</sup>参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主持编写的《商事纠纷调解实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版，第144页。

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强化调解组织规范治理，完善诉调对接机制，更好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sup>①</sup>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强化救济性的保护，健全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各地金融监管局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完善金融纠纷调解制度机制。2024年8月14日，北京金融监管局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北京地区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通知》提出了六方面举措，包括：加大对多元解纷机制的支持力度、建立失联修复机制、强化纠纷源头治理、加强内外联动协同、持续完善有关机制、夯实相关工作基础。该通知强调了切实树立“能调尽调”意识，辖内银行保险机构应当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配套机制，指定具体部门推动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建立适当授权制度，提升对和解协议的认可度，积极引导消费者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主动将疑难复杂纠纷提交行业调解组织化解，构建行业纠纷治理的良好格局。<sup>②</sup>2024年5月22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共同发布了《关于促进本市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该措施旨在促进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打造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的一流商事调解机构，措施包括强化商事调解发展制度保障、支持商事调解组织发展壮大、支持商事调解组织开展涉外商事调解、实施商事调解“和”计划、优化“诉调对接”机制、试点“调解+公证”赋强计划以及加强“法律+科技”支撑。<sup>③</sup>通过实施这些措施，调解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得以提高。2024年9月25日，由深圳市司法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主办的2024年深圳调解周

---

①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启动2024年“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2024年9月1日，<https://www.cbirc.gov.cn/cn/view/pages/ItemDetail.html?docId=1177453&itemId=915&generalType=0>。

②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北京金融监管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北京地区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通知》，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2024年8月14日，<https://www.cbirc.gov.cn/branch/beijing/view/pages/common/ItemDetail.html?docId=1174539&itemId=4180&generalType=11>。

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关于促进本市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载上海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2024年5月28日，<https://www.shanghai.gov.cn/gwk/search/content/f0df890b86814ca7afc4fb5285dbb809>。



第3场活动上正式发布了由深圳市司法局、光明区司法局、深圳市商事调解协会、光明区商事调解协会、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等单位联合起草的《商事调解工作规范》，这一团体标准将持续推动商事调解规范化发展。自2021年以来，在深圳市司法局的指导下，深圳市商事调解协会先后与88家商会、协会、企业签署了“调解优先”承诺书。在此次活动中，又有12家协会和地方金融组织签署了“调解优先”承诺书。<sup>①</sup>

## 2. 金融调解的机构概况

### （1）金融监管机构

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领域商事调解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是主要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督和指导金融市场的运作，确保金融稳定和安全。该机构的职责包括制定和执行金融监管政策、监督金融市场的合规性、预防和解决金融纠纷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范围广泛，涵盖银行、保险、信托等多个金融领域，确保这些领域的商事活动合规合法。随着监管科技的发展，监管机构提高了监管效能，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增强了对金融市场的实时监控和风险预警能力。

### （2）金融纠纷调解机构

第一，地方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为了高效解决金融纠纷，各地方成立了专门的调解中心，旨在通过专业、中立的调解服务，为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提供纠纷解决的途径。例如，厦门市地方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截至目前，厦门市地方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受理纠纷数量32281件，化解纠纷数量6039件，受理纠纷标的总额433200万元<sup>②</sup>。此外，2023年10月，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司法局指导下，成渝金融法院联合重庆市17家机构和部门，揭牌成立成渝金融司法协同中心，负责调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内的金融民商事纠纷、行政纠纷。2023年12月

---

① 深圳市司法局：《护航金融调解工作高质量发展，2024年深圳调解周第三场活动圆满举办》，载深圳市司法局官方网站2024年9月26日，[https://sf.sz.gov.cn/xxgk/xxgkml/gzdt/content/post\\_11573067.html](https://sf.sz.gov.cn/xxgk/xxgkml/gzdt/content/post_11573067.html)。

② 厦门市地方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网站，<https://www.xfdmc.org.cn>。

15 日，成渝金融纠纷一体化协同治理平台上线运行。成渝金融法院于 2024 年 10 月 17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成渝金融司法协同中心成立一周年运行情况。该中心运行一年以来，共受理金融借款、信用卡等金融案件 172646 件，涉及金融机构 122 家，调解成功案件 104201 件。<sup>①</sup>金融纠纷调解的成功率较高，调解成功后，当事人可以根据需要申请司法确认，以增强和解协议的执行力。

第二，仲裁调解机构。仲裁调解机构提供金融纠纷调解服务，是旨在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金融纠纷，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这些机构通过提供中立、专业的金融调解服务，帮助当事人以较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解决金融争议。近年来，中国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机构数量迅速增长，各个仲裁委员会也有设立调解中心，如深圳国际仲裁院调解中心、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中心、南平仲裁委员会金融纠纷仲裁调解中心。这些组织、机构通过专业的调解员队伍，为金融纠纷提供专业的调解服务。实践中，大多数仲裁机构都提供金融纠纷调解服务，并且都是在仲裁的过程中进行调解。

第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在处理金融纠纷案件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能力。该中心拥有一支由资深法律专家、行业专家和资深调解员组成的专业团队，能够为金融纠纷提供专业的调解服务，致力于提供高效、便捷的调解流程，通过在线调解平台等方式，提高了调解的效率和可及性。作为国际商事调解的“中国品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在处理涉外金融纠纷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国际合作网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通过其专业、高效的调解服务，在金融纠纷调解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 （3）涉外金融纠纷调解机构

涉外金融商事调解机构专注于处理涉及跨国因素的金融纠纷，这些机构通常具有国际化的调解员队伍和丰富的国际调解经验。

涉外金融商事调解机构与多个国际调解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如“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通过国际合作网络，增强了跨境纠纷解决的能力。截至目前，

---

<sup>①</sup> 中国新闻网：《成渝金融司法协同中心成立一周年 共受理金融案件逾 17 万件》，载百度新闻网 2024 年 10 月 17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3150859519161848&wfr=spider&for=pc>。



该中心拥有专业调解员 760 名, 调解室 118 家, 调解案件 37000 余件, 其职责是协助涉及争议的相关方, 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国内外民商事纠纷, 遵守公益性、中立性和专业性的原则。通过在国内和国外设立的线下调解室以及与各国商事与法律等机构签署的合作协议, 依靠当地机构及其在相关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分支机构, 在全球实现线上线下调解的结合与联动, 受理国内外民商事案件逾六千宗, 调解结案成功率达 60%。<sup>①</sup>此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 确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以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为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仲裁和调解机构。

涉外金融纠纷调解机构在处理涉外金融纠纷时, 注重专业化和国际化, 调解员通常具备国际法律背景和丰富的商事经验, 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复杂的国际金融案件。同时, 涉外金融商事调解机构在提高调解效率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大多数机构通过在线调解平台和远程调解服务, 在降低了当事人的时间和经济成本的同时, 提高了调解的便捷性和高效性。

### 3. 涉外金融调解的发展概况

我国的涉外金融纠纷调解机制在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 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对金融纠纷调解的重视, 以及国际合作的加强。政府高度重视金融纠纷调解, 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 强调了调解在金融纠纷解决中的重要性。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标志着金融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建设全面推进, 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我国已经建立了国际商事法庭, 并公布了纳入国际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仲裁机构和调解组织, 初步形成了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涉外商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

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多个涉外金融纠纷调解组织、机构, 如提供专业的调

---

<sup>①</sup> 参见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网站, <http://www.bnrmediation.com/CN/About>。

解服务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等。这些调解中心、调解机构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当事人提供了便捷、高效的调解服务。同时，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商事调解合作，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调解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共同处理涉外金融纠纷。例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与境外 22 个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大幅度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的国际影响力。金融科技的发展为涉外金融纠纷调解工作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平台，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国涉外金融纠纷调解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可以提高调解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降低成本、增强公信力。通过互联网技术，跨国别、跨地区的金融纠纷调解变得更加方便。例如，通过在线调解平台，实现了金融纠纷调解的远程在线解决，提高了调解效率和便捷性，降低了当事人的调解成本。我国加强了涉外金融纠纷调解人才的培养，通过建立调解员培训体系，提升调解员的专业素质和服务质量，为涉外金融纠纷调解提供了人才保障。

我国涉外金融纠纷调解的未来发展趋势是多元化、专业化和国际化。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金融纠纷的类型和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中国正在积极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建设。这包括加强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律师调解以及市场化、社会化调解等多种方式的有机结合，以满足不同类型金融纠纷的解决需求。金融纠纷往往涉及复杂的金融知识和法律问题，因此专业化的调解组织在这一领域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正在推动建立覆盖面广、适应性强、高效便民的金融纠纷调解组织体系，这些组织将由专业的调解员组成，他们具备金融、法律等相关专业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涉外金融纠纷的数量和复杂性也在增加。这要求调解工作不仅要遵循国内法律，还要充分考虑国际规则和惯例。因此，提升调解工作的国际化和专业化水平成为发展趋势之一。加强对国际金融规则的研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的调解人才，以及推动国内外调解规则和实践的交流与合作。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涉外金融纠纷的调解工作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并与其他国家的调解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享调解资源和经验，以及参与国际调解规则的制定和推广。

我国的涉外金融纠纷调解机制在政策支持、调解机构建设、国际合作、在线调解平台、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尽管我国在涉外金融纠纷调解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却仍面临一些挑战，比如金融纠纷调解的法律体系尚不健



全、调解员队伍的能力和水平需要加强等。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将继续加强金融纠纷调解的法律体系，提升金融纠纷调解的公信力和提高金融纠纷调解的国际化水平，我国的涉外金融纠纷调解工作将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

## （二）金融争议调解的新动向

当今时代，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金融消费活力涌动，然而金融纠纷也随之凸显。金融调解作为化解金融领域矛盾、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关键举措备受瞩目。上海市律师协会、浙江以及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纷纷出台相关规范与规则，为金融调解工作提供专业指引与制度保障。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湖北、厦门、宁波、枣庄、义乌等地积极探索、勇于实践，打造出各具特色的金融纠纷调解模式。从完善体系建设到构建多元协同机制，从创新“调解+司法确认”模式到开创特色治理模式，金融调解在各地绽放光彩，为推动我国金融纠纷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金融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 1. 金融调解规则的新动向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与金融消费的活跃，金融纠纷日益增多。为有效解决金融纠纷，各地积极探索创新。上海市律师协会制定《律师协会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业务操作指引》，明确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及调解程序等，发挥律师专业优势。浙江出台《DB3308/T141—2023 金融纠纷调解工作规范》，强调公正合法、自愿保密原则，规范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建设与调解流程。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颁布《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调解规则》，作为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公益调解机构，为资本市场纠纷解决提供全面规范和多样程序。这些举措为金融纠纷调解提供了明确指导，有助于提高专业化水平，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权益，为金融纠纷的妥善解决奠定坚实基础。

#### （1）《律师从事金融（消费）纠纷案件调解业务操作指引》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消费的日益活跃，金融消费纠纷也逐渐增多。为了更好地发挥律师在预防和化解金融消费纠纷中的专业优势、职业优势和实



践优势，上海市律师协会业务研究指导委员会于2024年3月27日通讯表决通过了《律师协会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业务操作指引》。

该指引的制定具有重要的背景和依据。为贯彻落实中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等文件精神，上海市律师协会调解业务研究委员会依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结合律师办理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业务的操作流程和经验，制订了本指引。其适用范围明确为律师以调解员身份办理的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业务，并对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进行了定义。同时，也规定了不适用的八种情形，如所涉法律关系非金融（消费）类、涉及刑事犯罪等。

在调解业务基本原则方面，该指引强调律师调解员应具有高水平的专业素养和知识。首先，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确保调解过程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其次，律师调解员必须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当事人，以公正的态度对待纠纷双方。再者，调解应依法进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确保调解结果的合法性。此外，保密原则也至关重要，律师调解员要对调解过程中涉及的当事人信息和纠纷内容严格保密。同时注重效率，以高效的方式推动调解进程，及时解决纠纷。最后，律师调解员要综合审查纠纷情况，并引导当事人理性解决纠纷。

调解程序方面，涵盖了多个重要环节。调解的申请与受理环节，明确了申请的方式和受理的条件。调解员的选（指）定环节，确保了调解员的专业性和公正性。在调解程序的组织和开展环节，强调了程序的规范性和有序性，包括调解的方式、时间安排等。此外，还提到了类似判例检索，为调解提供参考依据。

在调解文书制作与司法确认方面，规定了调解协议的制作标准与内容。调解协议应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履行方式和期限等关键内容，确保协议的具体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对于司法确认的方法也进行了详细说明，使调解结果能够获得更强的法律效力。另外，还明确了调解终结的情况，包括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无法达成调解协议等情况。

《律师协会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业务操作指引》的出台，为上海市律师办理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业务提供了明确的规范和指导。它有助于提高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的专业化水平，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在实际应用中，律师应严格按照指引的要求，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履行调解员的职责，为当事人提供高质量的调解



服务。同时，相关部门也应加强对指引执行情况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其得到有效落实。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金融消费纠纷能够得到更加公正、高效地解决，为金融市场的繁荣和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 （2）《DB3308/T141—2023 金融纠纷调解工作规范》

2024年1月5日，《DB3308/T141—2023 金融纠纷调解工作规范》（以下简称“规范”）正式实施，为金融纠纷调解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标准，确保调解工作的公正、合法、自愿和保密。

该规范强调金融纠纷调解应以公正合法为根本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制定合法合理的调解方案。这不仅要求调解员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和专业素养，更要确保每一个调解结果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同时，规范明确了调解自愿的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强迫、不诱导当事人接受调解方案。这一原则保障了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确保他们能够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调解，从而提高调解的成功率和当事人的满意度。此外，保密原则也是金融纠纷调解工作的重要要求。除法律规定或者经当事人同意外，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及当事人双方均不得对第三方泄露调解案件情况，这有助于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和商业秘密，增强当事人对调解工作的信任。

在组织建设方面，规范明确了金融纠纷调解组织的工作职责。调解金融纠纷是其核心任务，同时还需宣传法律法规、反馈工作情况及建议、开展培训以及做好案件登记等工作。通过这些职责的履行，金融纠纷调解组织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在金融纠纷解决中的作用，提高金融市场的法治水平。

人员机制是组织建设的关键环节。规范要求建立和完善调解员的认证、考核、奖惩、退出机制，确保调解员队伍的素质和稳定性。同时，建立专职、兼职相结合的调解员队伍和调解专家库，并向司法行政机关备案，为金融纠纷调解工作提供了专业的人才支持。调解员应具备过硬的素质、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品行，同时具备法律和金融知识背景，严格遵守保密要求。这些要求确保了调解员能够胜任复杂的金融纠纷调解工作，为当事人提供高质量的调解服务。

金融纠纷调解组织应入驻当地县级社会治理中心，这为调解工作提供了便利的办公条件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工作场所应划分不同功能区，如受理区、调解区、办公区等，以便更好地开展调解工作。同时，配备办公设备，如电脑、打印机、复印

机等，提高工作效率。此外，营造相应的环境氛围也是场所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悬挂宣传标语、摆放法律书籍等方式，营造出严肃、专业的调解氛围，增强当事人对调解工作的信任和尊重。

规范详细规定了金融纠纷调解的流程，从受理、指派到实施调解和结果运用，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要求和标准。当事人可以通过县级社会治理中心无差别受理综合窗口、金融管理部门等方式申请调解，人民法院也可对具备调解基础的案件进行委派、委托。在受理环节，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确保调解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指派环节要求了解纠纷内容、调查核实情况、选定调解人员、拟定调解方案。这一环节需要调解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调解经验，能够准确把握纠纷的核心问题，制定出合理的调解方案。实施调解环节是金融纠纷调解工作的核心环节。调解员应告知当事人调解的性质、原则和效力等，听取当事人陈述，做好调解笔录，提出纠纷解决意见。对于复杂纠纷，可邀请公证机关参与，确保调解过程的公正、公平。调解期限为30日之内，如有特殊情况可延长。结果运用环节，调解成功的应出具调解协议书。对于人民法院委派、委托调解的案件，及时将调解结果及相关材料反馈法院。这一环节确保了调解结果的法律效力，为当事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DB3308/T141—2023 金融纠纷调解工作规范》为金融纠纷调解工作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指导和标准，对于提高金融纠纷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 （3）《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调解规则》

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法律服务中心）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我国唯一跨区域跨市场的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公益调解机构，成立于2020年1月17日，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全额出资，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中证法律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能包括构建投资者服务平台；受投资者委托，提供调解等纠纷解决服务；开展调解业务统计、研究和宣传交流；为投资者自主维权提供法律服务；其他依法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可开展的经营活动。

在金融调解业务方面，中证法律服务中心表现出色，曾经调解过许多标的额较大、法律关系复杂的商事案件。例如，成功调解一起近六亿跨区域涉众型纠纷，该纠纷源于资管产品“暴雷”导致的逾期兑付，涉及近600名投资者与某基金销售公

司、某资产管理机构。中证法律服务中心克服时间紧、任务重、人手少等诸多困难，抽调专业力量成立调解团队，召开案情研判会并制定工作计划。通过释法明理、充分斡旋，各方最终达成权益转让的调解方案，转让款近6亿元。之后，引导六百余名纠纷当事人通过线上平台完成相关调解流程。

2023年底，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正式颁布了《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调解规则》。这一规则的发布，标志着资本市场纠纷解决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提供了新的法律保障。该规则详尽地包括了总则、受理范围、当事人权利与义务、普通调解程序、其他调解程序及方式、效力保障以及附则等多个方面。它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坚持公益服务的定位，遵循依法、中立、专业、便捷的原则。

在总则部分，规则明确了其制定的法律依据和宗旨，强调了调解工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在受理范围方面，规则详细列举了资本市场主体之间可能发生的各类与证券等相关民事纠纷，为当事人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关于当事人权利与义务部分，规则不仅明确了当事人的权利，如提出变更请求、选择调解员等，同时也规定了当事人的义务，如如实陈述等，确保了调解过程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普通调解程序包括申请、受理、确定调解员、开展调解及终结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明确的步骤和要求，确保了调解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此外，规则还包括简易调解、小额速调、特邀调解等其他程序及方式，为不同类型的纠纷提供了灵活多样的解决途径。

当事人可以就和解协议申请司法确认以保障效力，这一规定为调解结果的执行力提供了法律保障。规则还对日期、代理人等事项做了具体规定，确保了调解过程的严谨性和专业性。最后，规则明确由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负责修订和解释，保证了规则的及时更新和正确实施。

这一系列详尽的规定和措施，不仅体现了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对资本市场纠纷解决工作的重视，也为资本市场主体提供了一个更加公正、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平台。<sup>①</sup>

---

① 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调解规则 -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http://www.isc.com.cn/html/djgz/>。

## 2. 金融调解路径的新动向

金融纠纷的妥善解决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保护消费者权益至关重要。粤港澳大湾区、湖北、厦门、宁波、枣庄、义乌等地积极探索金融纠纷调解的创新路径。粤港澳大湾区重视金融纠纷调解机构作用，完善金融纠纷解决方式体系化建设；湖北打造“调解+司法确认”模式，为金融消费者提供高效维权路径；厦门构建多元协同调解机制和“调诉一体”模式，提升金融纠纷调解质效；宁波通过创新事前监督机制、推进分类调解、多方联动等走出特色“宁波路径”；枣庄打造“非诉挺前、多调联动、多元化解”的金融调解模式；义乌构建“融易解”金融纠纷治理模式，发挥行业调解和赋强公证作用。各地实践为金融纠纷治理提供了丰富经验和有益借鉴。

### （1）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调解路径

2024年1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东监管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联合发布新修订的《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sup>①</sup>“跨境理财通”是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投资者在港澳销售银行开立个人投资账户，通过闭环式资金管道汇出资金购买港澳销售银行的投资产品（南向通）；以及港澳投资者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代销银行开立个人账户，通过闭环式资金管道汇入资金购买内地代销银行的投资产品（北向通）的业务机制。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的发展过程中，金融调解成为其中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当前，“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的《实施细则》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与金融调解相关部分内容的不足较为突出。一方面，金融纠纷调解机构的重要性未得到充分重视。《实施细则》更侧重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和内地代销机构的主体责任，为消费者提供投诉和协商解决纠纷的渠道却忽视了金融调解机构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现有的五种金融纠纷解决方式缺乏系统性和协调

---

<sup>①</sup>《〈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实施细则〉修订并发布》，载中国人民银行官网2024年1月24日，<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75/5217263/index.html>。



性。和解协商、调解、投诉、仲裁和诉讼这五种方式相对独立且规定零散，没有形成有效的体系，调解未能在其中发挥应有的承上启下的作用，粤港澳三地之间关于调解的沟通机制也不够完善，缺乏高位阶的法律规范支撑。

金融调解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随着金融纠纷呈现“小额、多发、复杂”的特点，以调解为核心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成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金融调解能够联系诉讼、仲裁、协商与投诉等多种方式，为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提供准确指引，实现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目的。粤港澳各地在金融监管机构的指导下已逐步建立金融纠纷调解机构。

为了完善金融调解机制，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重视金融纠纷调解机构的作用。以金融行业协会为主导，联合金融企业、交易所、中介机构等共同参与组建金融调解机构，如澳门的“金融消费纠纷调解计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时，应在相关法规中明确金融纠纷调解机构的地位和职责，为消费者提供维权指引，加强金融调解机构的体系性建设，提高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透明度、便利性和专业化水平。

其次，完善金融纠纷解决方式的体系化建设，强调调解的核心作用。在横向方面，要促进粤港澳三地同一纠纷解决方式间的互联互通，加强粤澳之间金融纠纷调解的联络与合作，建立信息沟通交流与公示的平台，提高透明度。在纵向方面，以金融纠纷调解为连接点，连接诉讼与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例如香港和澳门的金融纠纷调解机构规定，先由金融机构处理纠纷，处理不到位再进入调解程序，且调解机构的调解书在进入诉讼时能得到承认。通过这种横向和纵向的联系，构建起完善的金融纠纷解决方式体系，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更有力的维权保障，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便利性，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完善和发展。<sup>①</sup>

## （2）金融纠纷调解的湖北模式

湖北地区在金融调解领域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探索，其“调解+司法确认”模式为解决金融纠纷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范例。湖北监管局高度重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积极推动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构建。自2020年起，持续

---

<sup>①</sup> 参见江保国、赵蕾、孙梦：《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合作机制的构建》，载《理论月刊》2020年第2期。

发力打造金融纠纷多元化解的“湖北模式”。这一模式以“调解优先、司法断后”为原则，充分利用多元解纷平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优势，为金融消费者开辟了合法、便利且低成本的维权路径。

从具体实践来看，“调解+司法确认”模式在多个案例中展现出强大的效力。例如，在人保财险湖北省洪山支公司的纠纷调解专场活动中，一位消费者因车辆保险理赔金额与保险公司存在较大争议而提出调解申请。湖北银行业保险业调解中心与人保财险紧密协作，详细了解事故情况和保险条款。经过调解人员的耐心解释和协商，最终双方就理赔金额达成一致，消费者满意地拿到了应得的赔偿。活动当天，像这样的消费咨询和纠纷调解案例还有很多，调解中心不仅提供了大量咨询，还现场受理调解申请，高效解决了部分保险消费者的问题。

而在整个宣传月活动期间，另一起典型案例涉及一家银行与企业客户之间的贷款纠纷。企业因市场环境变化，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按时偿还贷款，银行方面则担心贷款无法收回。调解中心借助“多元解纷综合平台”，联合法院法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深入了解双方的困境和诉求。调解人员为企业制定了合理的还款计划，同时银行也同意给予一定的宽限期和利率优惠。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并通过司法确认确保了协议的法律效力，为双方解了燃眉之急，同时也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在此期间，综合调解平台为众多银行和保险机构调解纠纷并协助申请司法确认近百件。这一系列活动充分体现了该模式多元化、一站式、全覆盖的特点。同时，相关部门还深入社区和企业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扩大了金融调解工作的影响力。

再如，湖北某银行面临个人住房按揭客户提前还款纠纷时，一些客户因对提前还款的手续和费用存在异议而向银行投诉，并要求监管机构介入。调解中心迅速介入，通过精心组织调解小组，分别与银行所在地法院协商司法确认流程，以及到银行现场指导调解流程。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详细解释了相关政策和合同条款，消除了客户的疑虑。最终实现了多名客户批量完成调解和司法确认，客户按照合理的手续和费用标准完成了提前还款。这一案例彰显了“调解+司法确认”模式在处理复杂金融纠纷时的高效性和可行性。

为了更好地落实纠纷调解“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湖北进一步优化金融调解服务。在“免费办”方面，调解中心为金融消费者提供免费调解服务，实行专职律

师轮值制度，无论案件性质如何，均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维权建议，并且针对特殊消费群体提供上门调解服务。“限时办”明确了不同复杂程度纠纷的处理时间界限，从当天完成到最长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确保纠纷能够及时得到解决。“一站办”则通过与法院、仲裁委等机构合作，设立金融案件巡回法庭、仲裁庭以及“法院+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站，将纠纷化解在基层一线，对于调解不成或不愿调解的案件，可直接进入司法程序，大大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

从数据统计结果来看，2023 年 1-8 月，调解中心受理各类金融纠纷 9182 件，其中调解成功 4827 件、协助司法确认 4179 件和仲裁确认 12 件。这些数据表明，湖北的金融调解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为金融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可靠的途径。同时，多元解纷“湖北模式”已在全省范围内形成广泛覆盖，涵盖了银行保险机构、各类业务类型以及不同纠纷阶段。

湖北的金融调解模式，尤其是“调解+司法确认”的实践经验，为全国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它不仅体现了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高度重视，也展示了在金融监管和纠纷解决方面的创新思维 and 有效实践。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这种模式有望在更广泛的领域得到应用和推广，进一步推动金融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 （3）地方金融调解的厦门路径

厦门市地方金融纠纷调解中心（以下简称厦金调）是由厦门市人民政府批准，于 2021 年 6 月在厦门市民政局依法注册登记的专业金融纠纷调解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为厦门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业务指导单位为厦门金融司法协同中心，发起单位为厦门市地方金融协会，是全国首家“府院协同”金融调解组织。

该调解中心组建了由法律、金融等相关领域资深专家组成的调解队伍，遵循“独立、自愿、公平、有效”的原则，通过高效、专业、中立的调解方式解决金融消费者与金融组织（机构）之间的金融纠纷，维护双方权益。截至 2024 年 10 月 15 日，调解中心实现了全流程标准化、专业化、科技化线上调解与司法确认，打造地方高水平的金融诚信和法治环境，助力厦门市金融强市、法治强市建设和海峡两岸金融融合发展，推进金融纠纷解决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自 2021 年 9 月成立以来，截至 2023 年底，厦金调在两年间受理各类金融纠纷案件 8067 件，标的额 29.79 亿元，调解成功 843 件，标的额 4.52 亿元，为金融消

费者节省诉讼费用 2408.9 万元，减少律师费支出 1091.6 万元。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其独特的运作模式和积极的工作举措。<sup>①</sup>

在加强金融案件诉前调解方面，厦门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级人民法院等六单位达成合作意向，构建了以厦金调为平台的多元协同调解机制和“调诉一体”模式。厦金调发挥“府院协同”优势，打造“二平台一机制”，辅助金融司法协同中心开展区域金融纠纷案件的诉前、诉中调解以及消保投诉纠纷化解等工作。同时，完善诉调对接机制，优化调解流程，建立健全业务规范性制度，确保诉非联动工作质量，并获得司法保障。在调解员队伍建设上，采用专职与兼职结合的方式，整合各方资源，保证调解员专业水平。此外，还自主研发了“金调云”在线调解平台，实现线上调解的标准化、专业化和科技化，提高调解质效。仅 2023 年上半年，就处理纠纷案件 4068 件，标的金额 6.05 亿元，调解成功 378 件，较之前有显著增长。

银行保险投诉纠纷快速调解机制也成效显著。自 2022 年 12 月原厦门银保监局联合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搭建“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合作平台”后，2023 年 4 月原厦门银保监局消保投诉转接入厦金调。厦金调与 15 家银行、14 家保险机构达成深入调解合作，联合开展纠纷调解宣讲活动 20 余场。针对银行委托律所拟诉讼信用卡纠纷案件，探索律所派驻人员协助调解。同时建立消保投诉快速调解机制及相关平台，今年 4 月至 8 月共化解疏导消保投诉纠纷 190 件。针对银行类纠纷，建立一站式快处机制，与浦发银行厦门卡中心、民生银行厦门卡中心等采取该机制共化解纠纷 1941 件。

在发挥金融纠纷风险警示作用上，随着各方努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知晓度不断提升。通过定期总结调解经验，加强内外交流，形成调解标准和规范，提升调解能力。同时注重对典型案件的剖析，预警和减少金融矛盾纠纷发生。

未来，厦金调将立足区域金融司法协同优势，探索小额快速赔付机制和中立评估机制，创新小额信贷、投诉纠纷调解模式。厦门市也将充分利用调、诉、裁“三中心”体系，增强金融法治工作与“三中心”的联动，推动金融司法创新力、服务力、影响力更加优越，为营造高水平国际化金融法律环境提供“厦门样本”。总之，

---

<sup>①</sup> 冯娜娜：《把金融纠纷化解在源头：厦门市地方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成立两年侧记》，载《中国银行保险报》2023 年 9 月 21 日，第 8 版。



厦金调在金融纠纷调解领域已取得一定成绩，并有着积极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 （4）金融调解的“宁波路径”

近年来在宁波，金融纠纷调解走出了具有特色的“宁波路径”。

第一，注重源头预防，创新事前监督机制。聚焦银行信用卡和房贷业务、保险承保和理赔等民生重点关注领域，推出银行保险服务监督系统，将评价监督及预警整改移至服务前端。服务监督系统自动向金融消费者发送短信邀请评价，如有不满意回复则督促银行保险机构第一时间处理问题，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重心由事后处理向事前预防转变，自运行以来，累计向金融消费者发送短信 1865.60 万条，运用系统在前端妥善化解问题 3.8 万件，服务满意率达 98.86%。同时，针对部分重点民生消费投诉事项，监管部门、银保调委会、银行保险机构合力共建消保绿色通道，促使投诉转调解，提升投诉处理质效。

第二，推进分类调解方式。针对信用卡、金融借款合同及资产管理业务、保险合同领域纠纷频发的情况，银保调委会整合调解资源，规范调解操作流程。

第三，多方联动构建多元化解机制。在宁波银保监局指导下，宁波市银行业协会积极实践多元化解金融纠纷调解模式，2019 年成立“宁波市银行保险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起集投诉受理、服务监督、诉调对接三大平台在内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

第四，宁波市司法局四“调”联动推动金融纠纷人民调解机制见实效。2022 年第一季度，宁波市金调委通过诉前调、县域调、线上调、简易调，四“调”联动化解疑难金融纠纷 638 起，涉及金额 1.3 亿元，完成司法确认 163 起。

第五，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托共享法庭构建“市场调、行业调、电子督、法院诉”的金融纠纷四级解纷体系，创新金融纠纷非诉化解模式。2022 年以来，该院共化解金融纠纷 3699 件，第中以非诉方式化解 2899 件，占比达 78%，同期金融收案下降 30.7%。

第六，宁波中院在全省率先构建“司法 + 大金融”调解格局，经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当事人可以向宁波中院申请司法确认。同时，“司法 + 大金融”线上深度融合，依托多个在线平台，实现数据交换、互联互通，建立协调联动、高效便民的金融消费、证券期货纠纷线上诉调对接机制。

第七，宁波市中心支行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取得新成效，探索“全



链式”诉调对接机制，推动宁波市金调委等调解组织与 11 家基层法院签订合作协议，诉调对接实现 100% 全覆盖，并因地制宜探索地方模式。它还搭建“全网式”的纠纷调解机制，在 6 个区县（市）建立调解工作室，把调解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sup>①</sup>

#### （5）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枣庄模式”

山东省枣庄市司法局积极探索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新机制，打造了“非诉挺前、多调联动、多元化解”的金融调解“枣庄模式”，为金融领域纠纷调解提供了有效范例，对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以及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在平台建设方面，枣庄市司法局建立了完善的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组织网络。通过与人民银行枣庄市中心支行、市中级人民法院、枣庄仲裁委等部门的紧密联系与协调，成立了枣庄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该中心设立了人民调解、诉调对接、仲裁调解等服务窗口，为群众提供了便捷、高效的调解服务。同时，印发《枣庄市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实施办法》，明确了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及职责，并组建了由多单位人员构成的专家库。此外，推动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与 6 家基层人民法院签订合作协议，实现了辖区所有基层法院诉调对接合作机制的全覆盖，为金融消费纠纷调解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为确保调解工作的专业性和高效性，枣庄市注重规范金融消费纠纷专业调解队伍。在全市范围内公开选聘 156 名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员，广泛吸纳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专业人士。这些调解员全部入驻网上人民调解平台、诉前调解平台、金融纠纷调解网等，能够及时回应和受理群众提交的调解诉求。并且建立了“以案定补”机制，将金融消费纠纷调解纳入市矛盾纠纷化解个案奖补范围，及时发放调解补助，极大地激发了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为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提供了有力的人才保障。

在调解机制方面，枣庄市形成了金融消费纠纷调解联动格局。联合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银行枣庄市中心支行出台相关意见，建立了以人民调解为平台，相关法律服务为支撑，司法行政、人民法院、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等部门协作配合，社会

---

<sup>①</sup> 参见胡杨：《积极探索金融纠纷调解的“宁波路径”》，载《中国银行保险报》2024 年 9 月 3 日，第 6 版。



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探索形成了便捷、公正、高效的金融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由相关部门参加的金融消费纠纷调解联席会议，以及专家库成员纠纷情况通报研讨会，研究解决调解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创新金融消费纠纷联动调解模式，推动金融纠纷诉调对接、公证介入、速裁速执等工作机制，实现了“调解+司法确认”“调解+公证”“调解+速裁”等快速解纷方式，提高了调解工作效率，节省了诉讼费用。

“枣庄模式”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工作实效。有效提升了金融消费纠纷化解率，保护了银行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助力优化了营商环境。截至目前，通过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机制，已帮助银行收回不良债权 4.5 亿元，减免市场主体部分本金以及利息、罚息、违约金等 7300 余万元，和解协议履约率达 97%。枣庄市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被司法部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其工作经验也在全省得到推广。

金融调解“枣庄模式”是枣庄市司法局在金融消费纠纷调解领域的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为解决金融消费纠纷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值得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和借鉴。<sup>①</sup>

#### （6）义乌金融纠纷治理新模式

在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当下，金融纠纷的有效治理成为保障金融市场健康稳定运行的关键。义乌作为浙江省首个存贷款迈入万亿元大关的县级市，以其独特的经济地位和金融环境，在金融纠纷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效的探索。

义乌的金融市场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态势。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市金融机构数量超 140 家，存贷款余额高达 10103.1 亿元，同比增长 15.1%。这种快速发展的金融格局，在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大动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金融纠纷的增加。为了更好地保障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义乌市人民法院秉持金融纠纷协同治理的理念，在政法委的领导下联合社会治理中心、司法局、金融办、银保监、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共同开展了“金融纠纷诉源治理助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创新性地构建了“融易解”金融纠纷治理模式。该模式涵盖了“内外协同、部门联动、诉非衔接、繁简分流”等多元解纷机制，通过各方的协同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

---

<sup>①</sup> 参见山东省枣庄市司法局：《探索金融消费纠纷调解新机制》，载《人民调解》2024 年第 8 期。

在 2023 年 1-10 月期间，全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收案数同比下降了 30.26%。

行业调解在金融纠纷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义乌某进出口外贸公司为例，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龚先生在 2022 年 12 月底为承接进口业务向平安银行义乌分行短期借款 6 万美元，但因货款回流不畅导致资金链断裂，仅归还 1 万美元后与银行产生纠纷被诉至法院。承办法官鉴于案件事实清楚且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信用指数较高，只是暂时无力还贷，便在征得双方同意后将案件流转至调解工作室。具有银行从业经历的调解员甘泉在详细了解公司和龚先生的财务状况后，量身定制了还款方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目前，调解工作室已成功调解金融纠纷 110 余件，涉案标的额达 3476 万余元，累计为当事人节约诉讼费 40 万余元。为进一步提升调解专业化水平，义乌法院还联合金华市银行业协会，吸纳了包括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专业律师、会计师等在内的 14 人担任兼职调解员，共同参与金融纠纷诉前调解工作。

赋强公证则为金融纠纷治理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保障。赋强公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解协议确认阶段，由公证机关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确认，且此阶段不收取任何费用；第二阶段为执行确认阶段，如果债务人不按和解协议履行，公证机关将开展限时催收调解，若仍不履行，则出具执行文书，债权人可凭此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从而形成了“前置审查－赋强公证－催收调解－执行证书－执行辅助”的全链条闭环管理公证模式。在 2023 年，义乌市公证处已在义乌法院的指导下与 8 家银行签订协议，采用赋强公证方式处理案件 50 余件。

此外，义乌法院针对当事人确无还款能力、不适宜调解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不断深化繁简分流。对于占法庭案件总量 60% 的同质化简易案件，通过类案同审、多案联审的方式，将简易金融案件平均庭审时长缩短至 5 分钟，审理天数缩短至 30.5 天。同时，义乌法院广泛引导事实清楚、没有争议的案件进入督促程序，在审查通过后 1-3 个工作日内即发出支付令。2023 年，针对金融类纠纷共发送支付令 1017 份，涉案金额达 2.34 亿元。

义乌法院的这些探索与实践，为金融纠纷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通过“行业调解＋赋强公证”的模式以及其他相关举措，有效地降低了金融纠纷案件数量，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未来，义乌法院将继续沿着这条多元化解路径深入探索，不断完善金融纠纷治理机制，为义乌金融市场的健康稳



定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司法保障。这不仅对于义乌自身的金融生态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其他地区的金融纠纷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sup>①</sup>

#### （7）北京“互联网+”金融解纷路径

在北京的金融领域，针对金融纠纷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逐步构建起一套全面、创新且协同的金融解纷路径，对维护金融秩序稳定、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平台建设方面，积极搭建“互联网+”解纷平台。此平台深度整合了诉前调解、司法确认、文书自动生成以及批量诉讼等一系列功能，打造出一个综合性的线上解纷枢纽。客户能够借助小程序方便快捷地参与调解签约、申请司法确认等流程，而金融机构则可以批量处理调解及立案材料，并实时跟踪调解动态。同时，积极探索与通信运营商合作的失联修复机制，在完善银行销售协议文本、明确告知消费者失联修复相关事项的基础上，有效解决信用卡类纠纷中常见的失联问题。通过专线对接技术，严格保障数据在金融机构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安全流转，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的数据隐私。此外，指导在京金融机构共同建设全国首个行业联盟链（京融链），联合专业机构搭建安全隔离数据鉴证体系，确保多元解纷全流程记录具备高度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不可篡改性，为纠纷解决提供坚实的技术与证据支撑。

在协作机制方面，着力推动各方协作优化非诉化解模式。全面梳理调解及司法确认的业务流程，精心理顺司法确认渠道及模式，大力精简所需材料，显著提升解纷效率，减少当事人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建立调解组织与金融机构的日常联络协作机制，双方安排专门团队或人员入驻法院协同开展工作，金融机构详细报备三级司法联系人，确保在日常工作中能够及时、高效地进行沟通与协调。试点机构积极升级“司法催收平台”及“分期系统”，减少人工干预，大幅提高业务处理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完善考核制度，将多元化解工作纳入分支机构的考核体系，特别加强对业务一线人员的考核力度，充分激发机构和员工参与解纷工作的积极性。优化调解和用印审批制度，简化审批流程，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创新建立中立评

---

<sup>①</sup> 参见余建华、刘丹妮、楼丹：《打造“行业调解+赋强公证”的金融纠纷治理新模式》，载《人民法院报》2023年11月23日，第1版。

估机制，精心组建行业纠纷中立评估专家队伍，当金融机构面临难以化解的纠纷时，可申请专家对化解方案进行专业评估并提供针对性的意见建议。通过选编典型案例供金融机构参考适用，有效借助行业专业力量提升金融机构自主解决纠纷的能力，实现评估一件化解一批的良好效果。

在组织发展方面，全力推动行业调解组织转型升级。行业调解组织与试点机构积极协商，调整收费标准，采用按量收费模式替代传统的固定服务费模式，有效激发调解组织的发展动力。指导行业协会、行业调解组织在辖内金融机构推荐的基础上，广泛组建各类专业人才库，对兼职调解员实施分级管理，显著增强调处力量，通过持续的专业培训和严格的管理措施，大力提升调解队伍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素养，进而提高调解质量和成功率。针对标的金额 6 万元以下的小额纠纷，创新建立小额纠纷裁决机制，在无法达成调解的情况下，赋予调解组织直接作出裁决的权力，只要消费者认可裁决方案，金融机构就必须严格执行。通过行业自律的方式，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参与机制建设，与调解组织签订授权协议，充分保障金融消费者在小额纠纷中的合法权益，有效提高小额纠纷解决的效率和公正性。

通过实施以上一系列全面、创新且协同的金融解纷路径，北京在金融解纷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金融机构通过平台开展区块链存证的数量达到 24 万余笔，开展调解 6 万多件，调解成功率高达 68.9%，平均调解时长仅约 32 小时。这一系列成果有效遏制了投诉量的增长趋势，试点机构逾期、催收投诉占比呈现下降态势；显著改善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实现信用卡分期履约率超 80%，较协商方式提升 20 个以上百分点；同时，为司法系统节约了大量成本，经试点机构核算，通过行业调解组织共完成司法确认 6800 余件，实现回款超 1.58 亿元，节省成本 3300 余万元。北京的金融解纷路径为全国金融解纷工作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例，对推动金融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 （三）金融争议调解的典型案例分析

#### 1. 金融争议调解的典型案例分析

在金融领域，纠纷治理至关重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纠纷日益复杂多样，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挑战。在此背景下，各地积极探索创新金融纠纷解决模式。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陆家嘴金融城“金融纠纷治理工作室”推出“诉前调解+赋



强公证”模式，有效整合司法资源与社会调解力量，为金融纠纷的高效解决提供了新路径，既保障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又体现了司法的智慧与担当。同时，成渝金融法院在处理金融纠纷时，通过委托行业组织调解并邀请人大代表襄助，打破沟通僵局，展现了司法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合作，为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为金融纠纷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

### （1）“诉前调解+赋强公证”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灵活性强等优势，但是缺乏强制执行力一直是调解制度的主要弊端之一。2023年11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陆家嘴管理局经过协商，决定共同成立“浦东法院陆家嘴金融城金融纠纷治理法官工作室”。以法官工作室为中心，与调解机构深度合作，持续优化对接协作机制，通过赋予强制执行力的方式，为调解结果加上法律保障。<sup>①</sup>

**案例：**融资租赁公司因被拖欠租金，在案件尚未进入诉讼阶段时，“专精特新”企业主动找上门。这家被告企业是原告的老顾客，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导致拖欠租金，其虽愿意分期还款，但坚决不想有涉诉信息，担心影响后续经营发展。而对于原告融资租赁公司来说，一方面希望节省诉讼费，并且能较快拿回首期款，另一方面又不想放弃强制执行力的保障。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陆家嘴金融城“金融纠纷治理工作室”针对这一情况，采用了“诉前调解+赋强公证”的新模式来解决纠纷。首先，法官委派人民调解员进行诉前调解。调解员详细了解被告企业的财务状况，包括营业额、应收款项和应付债务等情况后，引导双方制定了一套合理的还款方案，约定分6个月归还本息。在法官见证下，双方顺利达成和解协议。接着，公证员对该协议进行“赋强公证”，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此后，如果企业不按协议履行还款义务，公证机关将出具执行文书，债权人无需经过诉讼程序，可直接凭借该文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终，这一模式既满足了原告对法律保障的需求，又避免了被告因诉讼产生的负面信用评

---

<sup>①</sup> 上海高院：《走进陆家嘴金融城，纠纷治理工作室+1，白皮书+1，典型案例+22》，载微信公众号“上海高院”2024年11月22日。

价，成功化解了纠纷，实现了双方的“双赢”。<sup>①</sup>

金融纠纷中，核心焦点在于企业通过多种融资渠道所引发的违约问题。这些违约现象往往源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从而导致现金流短缺。在此类复杂的金融纠纷中，若采取诉讼等公开性强的解决途径，无疑会加剧企业的融资困境，使原本就紧张的现金流状况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传统的调解制度虽有其优势，但因缺乏强制执行效力，使得债权人在面对债务人可能的再次违约时，缺乏有效保障。这不仅可能导致调解过程中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成为无法挽回的沉没成本，还可能进一步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针对这一难题，本案中的金融纠纷调解工作室创新性地采用了“诉前调解+赋强公证”的解决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融资压力，还通过赋予和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为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都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途径。这一创新实践，无疑为金融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 （2）委托行业组织调解，邀请人大代表襄助

调解能否达成，极度依赖于调解的沟通机制，但是当纠纷产生的一方为机构时，沟通就相较于个人主体会大幅度增加困难。在金融纠纷调解中，这一问题尤其突出，金融纠纷中存在着大量一方当事人为金融机构的纠纷，金融机构存在办事流程僵化、过于重视规章报表等特征，在调解中需要采取与自然人和其他法人不同的沟通策略。

**案例：**傅某某与别某某夫妇将他们的自有住房抵押给某金融机构，借款32万元用于经营周转。然而，到期后他们未能履行还款义务。2023年，该金融机构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夫妇二人偿还所欠借款本金共计31万余元，并对抵押物执行担保物权。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金融机构的诉讼请求。傅某某不服判决，向成渝金融法院提起上诉，声称受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并表示愿意还款，希望法院能够宽限时间。尽管傅某某表达了调解意愿，但由于未按时缴纳上诉费，案件无法进入实体审理阶段。尽管当事人有调解意愿，但在法律程序上，按撤回上诉处理是唯一的选项。为了实质性解决纠纷，办案法官采取了非传统的解决方式，将案件委

---

<sup>①</sup> 参见余建华、刘丹妮、楼丹：《打造“行业调解+赋强公证”的金融纠纷治理新模式》，载《人民法院报》2023年11月23日，第1版。

托给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指导设立的成渝银行业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进行调解。该中心接受委托后，与金融机构进行了多次沟通协调，最终促成了金融机构同意调解。由于金融机构的工作流程较为固定，双方在几轮协商后仍未能达成一致。为了打破僵局，成渝金融法院邀请了一位具有丰富调解经验的市人大代表参与调解。调解团队在疏解傅某某的心理障碍的同时，向其普及金融知识，并引导金融机构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展现其社会责任。经过反复的沟通和努力，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

对于未按时缴纳上诉费用的案件，根据法律规定，将被视为撤回上诉，无法进行实质性的审理，这通常构成了调解的“盲区”。然而，在本案中，承办案件的法官积极主动地履行职责，成功地阻止了纠纷的持续，为诉源治理的“盲区”带来了调解的希望。在处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时，金融机构的调解意愿往往不高。但本案通过与成渝银行业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以及人大代表的联动合作，充分利用了金融行业协会的专业优势和身份优势，并结合市人大代表的监督与指导，展现了司法的温度与力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庞大，通常涉及房贷、车贷、经营贷等，与广大民众的利益紧密相关。本案的成功调解，为解决此类大量纠纷开辟了新的途径，并将推动成渝金融法院更有效地履行其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

## 2. 金融争议调解典型案例的启示

在金融领域，纠纷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构成诸多挑战。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陆家嘴金融城“金融纠纷治理工作室”以及成渝金融法院的创新实践，为金融调解工作带来了深刻且极具价值的启示。

“诉前调解+赋强公证”模式的推出，展现了一种全新的金融纠纷解决思路。调解本身具有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灵活性强等优势，在金融纠纷处理中应充分发挥这些特质。同时，传统调解制度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弊端得以有效解决，通过赋强公证为调解结果加上法律保障，既避免了债权人在面对债务人可能违约时缺乏有效手段的困境，保护了债权人合法权益，又防止了调解过程中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成为沉没成本。这一模式实现了双方共赢，为金融纠纷的解决开辟了新方向，启示我们在金融调解工作中要积极探索创新方式，将调解的灵活性与法律的强制力相结合，为当事人提供更优的纠纷解决方案。

而委托行业组织调解并邀请人大代表襄助的方式，在处理金融机构参与的纠纷时具有独特优势。当纠纷一方为金融机构时，沟通难度往往较大，此时委托行业组织调解，可充分利用其专业优势和身份优势，与金融机构进行有效沟通协调。邀请人大代表参与调解，能发挥其监督与指导作用，展现司法的温度与力度。人大代表可以在调解中疏解当事人心理障碍，普及金融知识，引导金融机构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展现社会责任。这种联动合作打破了调解的“盲区”，为解决大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开辟了新途径，也提醒我们在金融调解工作中要善于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金融纠纷的有效解决。

此外，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金融调解工作还应注重以下几点。第一加强调解队伍建设，提高调解员的专业素养和沟通能力，确保能够准确把握金融纠纷的核心问题，制定合理的调解方案。第二建立健全金融纠纷调解机制，明确各参与方的职责和权限，规范调解流程，提高调解工作的效率和公信力。第三加大对金融调解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当事人对调解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第四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等的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稳定。

总之，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陆家嘴金融城“金融纠纷治理工作室”和成渝金融法院的创新实践为金融调解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我们应积极借鉴这些经验，不断探索创新，推动金融调解工作迈上新台阶，为金融领域的稳定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 第四章 国际商事调解规则新发展

作为一种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商事调解能够有效解决商事关系中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端，维护商业合作关系，实现争议双方的互利共赢。从全球视野看，国际商事调解规则呈现出体系化、国际化、现代化的特点。在 2023-2024 年度，域外典型国家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的商事调解规则均不断积极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并在增强中立性、与司法衔接等方面有新发展。主要国际组织如国际商会等也在拓展商事调解的适用范围、提升效率等方面取得新进展。这些新成果共同推动了国际商事调解规则的进步。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借鉴域外经验、立足本国国情，对本中心的调解规则进行新修订，在程序灵活性、调解员选任等方面持续优化相关规定，形成了诸多亮点，并作出系列首创性贡献，为解决跨境商事纠纷提供更加高效、灵活且专业的途径，促进我国跨国贸易与投资的稳定发展。

### 一、域外典型国家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的新发展

在域外，商事调解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逐渐成为商事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诉讼程序耗时长、费用高且对抗性强，仲裁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也较高，因此，调解在国际社会已被广泛应用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模式。<sup>①</sup>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的部分商事调解组织于近年来都对本组织的商事调解规则进行了新修改，这些修改可能给我国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的完善与发展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启示。因此，本部分将阐述这些国家商事调解组织近年来在商事调解规则方面的修订情况。

#### （一）美国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的修订

近年来，美国商事调解规则的修订主要集中在调解组织的内部规则上，如美国司法仲裁调解服务股份有限公司（JAMS）制定的《国际调解规则（2011）》（JAMS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Rules）、国际预防和解决冲突研究所（CPR）制定的《国际调解程序（2017）》（CPR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procedure）等。美国仲裁协会国

---

<sup>①</sup> 参见李茁英、肖璟翊、韩婷等：《美国商事调解制度概览》，载《人民调解》2023 年第 3 期。



际争议解决中心（ICDR）已完成对《国际争端解决程序》（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s）中的调解规则和仲裁规则修订的全面审核，并且该规则自2021年3月1日起生效。<sup>①</sup>此外，美国仲裁协会颁布的《商事仲裁规则和调解程序（包括对大型、复杂的商事纠纷的赔偿金）》（Commercial Arbitration Rules and Mediation Procedures Including Procedures for Large, Complex Commercial Disputes）于2022年9月1日修订并生效。

### 1. 美国商事调解组织规则修订的基本内容

美国的商事调解规则主要集中在商事调解员的相关规则、商事调解的适用程序规则、商事调解协议的规则、商事调解的保密性规则、商事调解费用的规定上。

#### （1）商事调解员的相关规则

第一，在调解员的选任上，ICDR的《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第M-4条规定委任调解员的规则，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应协助各方当事人寻找双方均同意的调解员。如当事人不能就调解员的委任达成一致，亦未提供任何其他指定方法，调解员应按下列方式指定：在收到调解请求后，ICDR将向各方发送一份来自ICDR调解员小组的调解员名单。如果各方当事人无法就调解员达成一致，则各方当事人应从名单中剔除不可接受的名单，按优先顺序对其余姓名进行编号，并将名单返回给ICDR。如果一方当事人未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名单，则名单上的所有调解员均应被视为可接受。ICDR应根据当事人指定的偏好，从名单中指定一名双方均可接受的调解员。如因任何原因未能从所提交的名单中作出委任，ICDR有权从调解员小组的其他成员中作出委任，而无需提交额外的名单。

第二，在调解员的公正和披露责任上，ICDR的《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第M-5条规定，国际争议解决中心的调解员必须遵守在指定调解员处理案件时有效的《调解员行为示范标准》。如果《调解员行为示范标准》与本调解规则的任何规定之间

---

<sup>①</sup> 参见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争端预防和解决研究院：《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争议解决中心修改仲裁规则和调解规则》，载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争端预防和解决研究院官网2021年3月25日，<https://iidps.bit.edu.cn/gatsw/dbde8187aba34f74ad7f1791e9c38334.htm#:~:text=%E7%BE%8E%E5%9B%BD%E4%BB%B2%E8%A3%81%E5%8D%8F%E4%BC%9A%E5%9B%BD%E9%99%85%E4%BA%89%E8%AE%AE>。

存在冲突，应以本《调解规则》为准。标准范本对调解员提出如下要求：（i）如果调解员无法以公正的方式进行调解，则拒绝调解；（ii）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披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所有实际和潜在的利益冲突。在接受预约之前，ICDR 的调解员必须进行合理的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任何会认为可能对调解员造成潜在或实际利益冲突的事实。ICDR 的调解员必须披露任何可能造成偏见推定或阻止当事人在当事人希望的时间范围内解决争议的情况。收到此类披露后，ICDR 应立即将披露通知各方，以征求其意见。

### （2）商事调解的适用程序规则

ICDR 的《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第 M-9 条规定，在确定案件程序时，调解员和各方当事人可以通过视频、音频或其他电子方式进行全部或部分调解，以提高程序的效率。鼓励双方交换与所请求的救济相关的所有文件。调解员可以要求就相关问题交换备忘录，包括潜在利益和双方谈判的历史。当事人希望保密的信息，如有需要，可以在与调解人单独通信时发送给调解员。调解员可以在任何预定的调解会议之前、期间和之后与各方当事人和 / 或其代表进行单独或单方面会议和其他沟通。此类通信可以亲自、以书面形式、通过视频、音频或其他电子方式进行。

调解员可以私下向一方当事人提出口头或书面的和解建议，如各方当事人同意，则可向各方共同提出和解建议。当在预定的调解会议中未能完全解决所有或部分争议问题时，调解员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与各方沟通，以持续努力促进商事争议的解决。调解员和各方当事人在诉讼程序的早期或筹备会议中应考虑网络安全、隐私和数据保护，以便为诉讼程序提供适当级别的安全和合规保护。

### （3）商事和解协议的规则

在美国，一旦存在争议的各方当事人通过调解程序签署了书面和解协议，该和解协议对所有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和解协议的效力与一般的合同相同。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和解协议中的条款，其他当事人可以通过仲裁（如果和解协议中包含仲裁条款）或在法庭上提出强制履行和解协议的请求。ICDR 的《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第 M-14 条第 e 款旨在于协助当事人依照《新加坡调解公约》或其他准据法而执行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根据《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4 条第 b 款，各方当事人可以请求调解员在和解协议上签字，请求调解员签署文件表明调解已进行，或要

求 ICDR 签发文件证明在调解过程中达成和解协议，以协助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的执行。

#### （4）商事调解的保密性规则

美国的商事调解非常重视双方当事人的保密性，通常都规定：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对于其通过调解知悉的信息有保密义务，不能向公众披露或与法院共享。CPR 制定的《国际调解程序（2017）》第 9 条即规定，整个调解过程是保密的，除非各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法律要求，否则当事人或者调解员不得向任何人披露有关调解程序、内容、和解协议等结果。

在美国近年的商事调解规范修订过程中，逐渐从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视角来对商事调解的保密性进行规定。譬如，ICDR《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的修订即考虑了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事宜。其中第 9 条规定，对于任何信息而言，若一方当事人希望保持其机密性，则应另行发送给调解员，而调解员可以在任何安排好的调解会议之前、期间和之后与各方当事人和 / 或其代表进行单独或单方面的会议以及其他交流，该等交流可以通过现场亲自、书面或视频进行。调解员可以私下或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共同向所有各方当事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提出和解建议。若在安排好的调解中未能完全解决所有问题，则调解员可以继续与当事人沟通，以促进争议的完全解决。此外，调解员和当事人应针对其案件所需而设定适当的网络安全、隐私和数据保护级别。

并且，ICDR《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第 M-12 条规定，在符合适用法律或当事人协议的前提下，调解员不得泄露当事人或其他参与者在调解过程中向调解员披露的机密信息。调解员应对调解中获得的所有信息保密，调解员在担任调解员期间收到的所有记录、报告或其他文件均应被保密。调解员不得被迫泄露此类记录，或在任何对抗性程序或司法论坛中就调解作证。各方当事人应对调解保密，除非当事人同意或适用法律要求，否则不得在任何仲裁、司法或其他程序中依赖或引入以下内容作为证据：a. 一方或其他参与者就可能的争端解决方案表达的观点或提出的建议；b. 一方当事人或其他参与者在调解程序中作出的承认；c. 调解员提出的建议或表达的观点；d. 一方曾表示愿意或未表示愿意接受调解员提出的和解建议。

#### （5）商事调解费用的规定

ICDR《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第 M-18 条规定，除非各方另有约定，否则调解的所有费用（包括所需的差旅费和其他调解员的费用）均应由各方平均承担。任何一方的参会费用应由请求该参会人出席的一方支付。ICDR 下的商事调解费用按照《国际仲裁收费表》确定，该收费表在 2023 年 6 月 1 日修订，这个表下有两种收费：第一种收费是标准收费表，分两次付款时间，为进入听证会的案件提供较高的初始申请费，但总体管理费较低；第二种收费是灵活的收费表，分三次付款的时间，规定较低的初始申请费，然后在仲裁过程中分摊后续付款。对于进行听证会的案件，总管理费会略高。此外，还有适用于标准费用和灵活费用表的额外费用，包括额外的排队费用（譬如追加当事人费用）、搁置费用（经双方协议搁置一年的案件将每年收取 600 美元的搁置费，由各方平均分摊）等。<sup>①</sup>

#### （6）其他规定

第一，关于责任豁免的规定。ICDR 的《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第 M-15 条规定，ICDR 或任何调解员都不是与调解有关的司法程序的必要一方。国际争议解决中心或任何调解员均不对任何一方因根据本规则进行的任何调解而出现的任何错误、作为或不作为承担责任。美国仲裁协会颁布的《商事仲裁规则和调解程序（包括对大型、复杂的商事纠纷的赔偿金）》第 M-7 条规定，调解人不是任何一方的法律代表，对任何一方均无受托责任。

第二，关于预存制度的规定。ICDR 的《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第 M-17 条规定，除非调解员另有指示，否则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将要求各方当事人在调解会议召开前存入其经与调解员协商后认为必要的款项，以支付调解的费用和开支，而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应在调解结束时向各方当事人提交账目，并退还任何未使用的余额。

## 2. 美国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的新发展

### （1）积极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应用、数据安全保护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这也反映

---

<sup>①</sup>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Fee Schedul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ispute Resolution (Oct. 8th, 2024), <https://go.adr.org/internationalfeeschedule>.

在商事调解中。其一，数字技术运用方面，ICDR 的《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第 1 条和第 9 条承认可以通过视频、音频或其他电子方式进行全部或部分的调解。其二，数据安全保护方面，ICDR 的《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的新规则还强调当事人和调解员需要考虑其案件所需的适当网络安全、隐私和数据保护级别。

### （2）在调解员选任方面强调调解机构和当事人的协作

ICDR 的《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的新规则给出了有关调解程序的详细指南，并强调当事人的参与以及 ICDR 对于当事人寻找和任命调解员方面的机构支持。ICDR 的《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第 M-4 条关于调解员选任的规定上体现了调解机构和当事人协作的要求。该条首先要鼓励各方当事人就名单上的调解员达成一致，但是无法达成一致的，则每一方当事人各自对调解员进行删除和排名，最终由 ICDR 依照双方的偏好指定一个双方都可接受的调解员。若无法从名单中进行任命，则 ICDR 保留从调解员名册中任命调解员的权利，无需对当事人提交其他名单。由此，当各方当事人无法就名单上的调解员达成一致时，就需要调解机构和当事人共同参与完成调解员的选任。

### （3）考量《新加坡调解公约》下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

随着《新加坡调解公约》推出和影响力的扩大，ICDR 的《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的新规则作出了相应的适应性调整，规定了根据《新加坡调解公约》项下的和解协议的执行的问题。然而，即使其对《新加坡调解公约》进行考量，但是也并未直接按照该公约的规则直接承认和解协议的效力。

## 3. 美国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新修订的启示

第一，对调解员的披露进行明确规定。以利益冲突来解释调解员的公正性、独立性问题。相较于直接规定调解员应当披露影响调解独立、公正的信息，《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第 M-5 条进一步通过利益冲突来阐释何谓独立性和公正性。即为了保证调解的独立和公正，调解员不能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利益冲突，如果存在，应当披露。并且还进一步规定调解员必须披露任何可能造成偏见推定或阻止当事人在希望的时间范围内解决争议的情况。

第二，制定灵活的收费方式。ICDR 规定了两种收费方式供当事人选择，第一



种收费是标准收费表，分两次付款时间，初始提交的申请费比较高，但总体管理费较低；第二种收费是灵活的收费表，分三次付款的时间，初始申请费比较低，然后在仲裁过程中后续费用比较高。当事人可以按照自身调解可能适用的程序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收费方式。此外，ICDR 还规定了搁置费用，即商事调解程序被搁置，当事人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

## （二）日本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的修订

受中国文化制度的影响，日本十分强调“以和为贵”，喜欢以非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日本商事仲裁协会（简称 JCAA）是日本主要的商事调解机构。JCAA 的新商事调解规则于 2020 年 2 月 1 日生效。新规则提供了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发布的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一致的严格保密协议，同时还纳入了《新加坡调解公约》中规定的可执行性要求。<sup>①</sup>2024 年 JCAA 修订了其《商事调解规则》（Commercial Mediation Rules），新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共分为五章，分别为总则、调解的开端、调解人、调解程序、调解费用。新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

### 1. 日本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新修订的主要内容

#### （1）调解员的相关规则

第一，调解员的独立性及公正性规则。2024 年 JCAA 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第 15 条也对商事调解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进行规定，即要求调解员应当是公正和独立的，并且在调解程序中始终保持公正和独立。当某人被任命为调解人时，其应当迅速以书面形式向 JCAA 提交他或她的承诺，承诺披露任何可能引起对其公正性或独立性合理怀疑的情况，或声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公正性和独立性声明”）。公正性和独立性声明可以通过任命他或她的当事人提交，或者直接提交给 JCAA。在调解程序进行过程中，调解人有持续的义务对任何可能在当事人眼中引起对其公正性或独立性合理怀疑的情况进行合理调查。如果调解人发现这样的情况，调解人应当迅速以书面形式向当事人和 JCAA 披露这些情况，除非调解人已经披露了这些情况。关于未来可能出现的这类情况的预先声明，并不免除调解人持续的披露义务。

---

<sup>①</sup> 深圳市蓝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日本商事调解制度概览》，载《人民调解》2023 年第 11 期。

第二，调解员的选任规则。2024 年 JCAA 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第 16 条规定了调解员的任免：调解员应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约定进行指定。如果双方未就调解员的选任进行约定，则由调解中心指定；如果一方或双方指定调解员，该调解员的任命只有在 JCAA 确认后才生效。在确认或指定调解员时，JCAA 应考虑未来调解员的背景、国籍、居住地、语言技能、技能、作为调解员的经验、可用性等因素。如果 JCAA 不同意调解员的任命，JCAA 应立即通知已指定调解员的一方、双方或任何一方指定的媒介人（the Party-Appointed Mediators）。

第三，调解员人数的规则。2024 年 JCAA 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第 17 条规定，调解员的数量可以是一人、两人或者三人。如果双方未能在调解开始之日起两周内确定调解人的人数，该人数应为一，双方应共同指定单一调解人。如双方同意调解人人数为两人，但未能就两个调解人的任命程序达成一致，则双方应根据最低限额程序指定两个调解人；如双方同意调解人人数为三名，则双方应指定一名调解员，且双方指定的调解员应同意指定第三名调解员，或双方人数在三倍以上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应分别指定一名调解员，双方指定的调解员应同意指定第三名调解员。

第四，调解员报酬的规则，《商事调解规则》第 31 条对调解员的报酬进行了规定，每个调解人的报酬应按 50000 日元（不包括消费税）乘以调解程序期间执行以下任务合理需要的小时数（调解时间）。此外，调解人的报酬可按以下双方一致同意的任何一种方法计算：（1）固定费用；（2）双方在调解过程中达成和解，应增加小时费率或固定费用；（3）任何其他计算方法。对于调解人报酬的支付，双方应承担调解人的报酬，并委托 JCAA 支付必要的报酬。JCAA 应在调解程序终止后立即向调解人支付其法定报酬。

## （2）调解程序规则

第一，调解程序的适用上，如果当事人就进行调解程序的流程达成一致，调解人应根据当事人的协议进行调解程序。

第二，调解的过程上，2024 年 JCAA 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第 21 条规定，一旦被 JCAA 确认或任命，调解人应迅速与当事人讨论进行调解程序的过程，讨论的内容包括：（1）调解的语言；（2）书面陈述和文件交换的时间表和方式；（3）调解会议的日期和地点；（4）调解人是否应向所有当事人提出和解建议；（5）完成调解的时间限制。



第三, 调解中证据的提交。2024 年 JCAA 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第 24 条规定, 通常情况下, 如果任何一方在调解程序中提出案件、提供证词或引入证据, 则不会影响该方的权利和义务。

### (3) 调解的保密性规则

2024 年 JCAA 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第 22 条规定了“单独讨论”: 除非双方另有约定, 调解人可与一方单独讨论。在这种情况下, 调解人应向所有其他当事人披露已经进行了此类单独讨论的事实。然而, 除非披露信息的一方当事人授权披露, 调解人不得向其他当事人披露在与一方当事人单独讨论中获得的任何信息。第 23 条规定, 调解程序应在私下进行, 所有相关记录应对公众封闭。调解人、当事人、他们的律师和助手、JCAA 的官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以及其他参与调解程序的人员不得披露与调解程序相关或通过调解程序了解到的事实。在他们辞职、退休或完成职责后, 同样适用此规定。除非出现法律要求披露、执行和解协议需要披露的情况。

### (4) 调解的时限规则

2024 年 JCAA 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第 25 条规定了调解时限, 即当事人可以就结束调解程序的时间限制达成一致, 或者如果时间限制被延长, 可以就延长后的时间限制达成一致。如果当事人未就时间限制达成一致, 则从所有调解人被 JCAA 任命或确认之日起三个月为时间限制。即使因撤职、辞职或死亡等而任命了替代调解人, 该时间限制也保持不变, 除非当事人同意延长时间限制。

### (5) 和解协议的规则

如果当事人在调解程序中达成了和解, 当事人应通知调解人, 并提交一份由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原件给 JCAA。调解人应在和解协议上签字, 并且应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请求, JCAA 应提供一份证明, 确认和解协议的内容以及该和解协议是在 JCAA 管理的调解下产生的。

### (6) 调解的费用规则

2024 年 JCAA 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第 34-35 条对调解费进行了规定。在调解的管理费用上, 双方应支付给 JCAA 的管理费为根据第 10 条计算的调解人报酬总额的 10%。双方应承担诉讼所开支的行政费用和可计算费用。在调解费用的支

付上，在调解程序开始后，JCAA 应要求双方支付调解人的报酬和费用、行政费用和因调解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如果任何一方未能支付管理费，JCAA 可暂停或终止调解程序。在调解程序终止后，如果双方向 JCAA 支付的保证金总额超过调解费用总额，JCAA 应立即将剩余金额退还给任何一方或双方。如任何一方退出第 28.1(2) 条或第 28.1(5) 条规定的调解，且双方支付的保证金超过已发生的调解费用，JCAA 应视情况可能及时退还该部分额外款项。除非双方另有约定，调解费用应由双方平均分摊。

### （7）责任的免除规则

2024 年 JCAA 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第 11 条规定，调解员和 JCAA（包括其董事、官员、雇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对于与调解程序有关的任何行为或疏忽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除非该行为或疏忽构成故意不当行为或重大过失。相对于美国的 JAMS《国际调解规则》中的责任免除条款，日本的 JCAA 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的免责条款还规定了免责的例外情况，即排除了故意和重大过失而进行的行为。

## 2. 日本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修订的新趋势

2024 年 JCAA 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中的部分条款体现了该国商事调解规则的新趋势，这一趋势主要体现在对独立性、保密性方面。此外，在调解员的选任上，商事调解机构的作用愈发突出。

第一，将调解员的独立性、公正性和调解员的披露义务联结在一起。即要求调解员必须披露对其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影响的信息。这种披露是及时的，并且需通过书面的形式进行。此外，对于未来出现可能影响到调解员的独立性、公正性的事项时，预先的声明并不能免除调解员的披露义务。

第二，非常重视保密性。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等信息，2024 年 JCAA 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第 22 条规定了“单独讨论”，即调解员可以和一方进行单独讨论，但调解员只能向其他当事人披露单独讨论这一事实，而不能披露此次单独讨论的具体内容。并且第 23 条进一步规定，调解程序应当保密，所有记录不对公众公开。

第三，在调解员的选任上，商事调解机构在特定情况下会介入到调解员的选任等调解程序中。譬如，在当事人选任的调解员为三人时，如果 JCAA 认为适当，

JCAA 可以在给予当事人发表意见的机会后，为调解人的任命设立不同的程序。再如，在特定条件下，商事调解机构可以强制解除调解人的职务。JCAA 在 2024 年新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第 19 条对此进行了直接性规定。

### 3. 日本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新修订的启示

日本商事调解组织的调解规则修订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带来影响，我国商事调解组织在制定和修改商事调解规则时可以借鉴其经验，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强调调解员持续公正地披露义务，且将调解员的独立性、公正性与披露义务结合起来。

第一，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 JCAA 于 2024 年新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第 3 条中，除了有关于调解成本的规则之外，调解双方可以基于自愿更改任何的规则。由此可见，日本的商事调解非常重视调解双方的自由意志，只要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更改调解过程中的程序、调解员选任规则等。其实，调解是当事人自由意思表示的体现，只有在双方均自愿的情况下，才能达成调解，因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此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我国也应当充分尊重调解双方的意思自治，在双方达成合意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其自由选择调解员、选择适用的调解程序。

第二，将调解员的独立性、公正性与披露义务结合起来。在我国商事调解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可以先对调解员设定独立性和公正性的义务，在这一义务的基础上附加披露义务，将该披露义务作为辅助认定调解员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手段。

第三，对调解员的公正性披露义务是持续的。对调解员公正性和独立性的披露义务不能仅仅限于选任那个时点，在调解程序进行过程中，调解人有持续的义务对任何可能在当事人眼中引起对其公正性或独立性合理怀疑的情况进行合理调查。

### （三）澳大利亚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的修订

当事人通常可以在中立的第三方（调解员）的帮助下更好地解决商业纠纷。因此，商事仲裁成为澳大利亚应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中一种普遍被采用的争议解决方式。澳大利亚国际商事仲裁中心（Australi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CICA）、澳大利亚商业争议中心（Australian Disputes Centre, ADC）均是澳大利亚重要的商事调解组织。其中，澳大利亚商业争议中心于 2024 年发布《商事调解指南》（Guidelines for Commercial Mediation），为澳大利亚商事调解提供指



引，该指南于 2024 年 4 月 9 日生效。

### 1. 澳大利亚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新修订的主要内容

#### (1) 选择商事调解之前的程序规则

《商事调解指南》第 1 条规定，如果这些指导原则是通过将争议提交给争议解决委员会（ADC）来启动的，受损害的一方必须向另一方（或各方）发出书面通知，说明争议的性质、争议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寻求解决争议的方案（“争议通知”）。如果没有标准化的争议通知形式，则相关的通知文件在形式上必须体现为有关于争议解决的通知。

在收到争议通知后的 7 天内，各方必须采取合理的步骤进行协商，并尝试解决争议。如果争议在 7 天内或在各方同意的期限内未能解决，那么任何一方都可以将争议提交给 ADC 进行调解。同时，每一方将：(i) 支付一半（或各方和 ADC 可能同意的其他比例）的 ADC 注册费，该费用在争议提交给调解之日（或 ADC 在其绝对自由裁量权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时间）支付；(ii) 向 ADC 提供一份简要的声明，说明各方认为将在调解中出现的关键事实和问题以及所有涉及方的联系方式。

#### (2) 调解员的规则

第一，在调解员的选取上，《商事调解指南》第 2 条对调解员的选取进行规定：(a) 在收到各方支付的注册费和声明后，ADC 将挑选两名或更多适当合格的调解员，并提供每位候选人的资质、经验和费用的详细信息给各方。(b) 在收到有关费用的详细信息后的 7 天内，各方应向 ADC 提供一份关于提议的调解员的偏好列表。如果任何一方认为提供详细信息的人不适合担任争议的调解员，该方应相应地通知 ADC。(c) 在收到偏好列表后，ADC 将确定各方是否已确定首席调解员。如果双方已确定，ADC 将任命首席调解员。(d) 如果各方未能确定首席调解员，并且各方达成的协议中提供了任命调解员的替代方法，ADC 将遵循该方法。如果各方没有指定任何替代方法，或者替代方法在合理时间内未能任命调解员，ADC 将根据其绝对自由裁量权任命 1 名调解员。(e) 在任命调解员后，ADC 将向调解员提供各方争议的详细信息，并要求调解员告知 ADC 是否存在任何利益冲突或任何可能导致对该人担任争议调解员存在偏见的看法。如果有此建议，ADC 将通知所有各方。如果各方

仍希望继续使用该调解员，他们必须以书面形式向 ADC 提供一份声明，表明他们了解利益冲突或可能导致偏见感知的事实，但仍希望继续任命该调解员。如果各方不希望继续使用该调解员，ADC 将根据其绝对自由裁量权任命另一名调解员。

第二，调解员的权力（Authority of Mediator），《商事调解指南》第 6 条规定，争议的每一方必须与调解员和 ADC 合作，并遵守他们为有效解决争议而给出的任何合理指示。调解员无权对各方强加解决方案，但将尝试帮助他们达成一个令人满意和公平的争议解决方案。调解员有权根据其认为适当的情况与各方进行联合和单独会面。如有必要，调解员可以寻求各方的同意，以便调解员能够就争议的专业技术方面获得专家意见。如果各方同意任命此类专家，并同意负担获取此类意见的费用，ADC 将与各方和调解员协商，安排任命专家。

### （3）调解参与人的规则

《商事调解指南》第 7 条规定：如果一方是个人，该个人必须出席调解。如果一方是公司，必须由公司授权的代表出席调解。该代表必须有权解决该事项。每一方有权带上其法律代表和任何其他对解决争议有相关信息或知识的人员。除非各方和 ADC 另有约定，否则每一方应至少在调解前 7 天通知 ADC 其法律代表的身份。

### （4）和解协议的规定

第一，和解协议达成的期间。在任命调解员后的 14 天内，各方必须达成一份和解协议。第二，和解协议的执行。《商事调解指南》第 11 条规定了和解协议的执行：如果调解中解决了一个或多个争议问题，任何参与调解的一方都可以通过司法程序执行在调解中达成和解协议的条款。

### （5）保密性的规定

为了保护调解各方的隐私，《商事调解指南》第 8 条对分开会面进行规定：分开的会谈每一方（无论是否有其顾问）都可以与调解员单独会面。在这些单独会谈中讨论的任何信息，调解员不会透露给其他各方，除非该方另有约定。第 9 条进一步规定，调解尽可能保密，并且所有参加调解的人员将签署保密协议。此协议适用于任何和解提议、调解过程中的陈述或为调解准备的信息。然而，保密要求不会阻止一方向其法律顾问、保险公司或其他必要方（如一方的董事会或其雇主或调解一

方组成的团体的其他成员)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

#### (6) 费用的规定

《商事调解指南》第13条对费用进行规定,对于每次调解,ADC会收取一个不可退还的注册费。如各方同意,他们平均分担调解的费用包括调解场地租赁费、ADC的注册费、应支付给ADC的任何额外行政费用以及调解员的费用(其中15%需支付给ADC)和其他支出。各方必须向ADC支付他们一半的保证金或其他比例的保证金及场地租赁费或其他费用。如果保证金不足以支付调解员或ADC预期的费用和支出,则需要按照ADC或调解员的合理要求增加保证金。如果在ADC或调解员请求后7天内(或ADC或调解员合理要求的更短时间内)未收到增加的保证金,调解员和ADC可能会暂停在调解中提供服务,直到收到增加的保证金。

《商事调解指南》附录规定,对于每次调解,ADC收取以下注册费:a.1600.00美元,包括注册和ADC前5小时的行政管理;b.在涉及两个以上的当事人的调解中,ADC可以全权决定向每一方收取800.00美元,包括注册和ADC前5小时的行政管理。在注册费覆盖的前5小时行政管理之后,ADC可以全权决定按每小时300.00美元的费率收取额外的行政管理费。

### 2. 澳大利亚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修订的特点

澳大利亚在商事调解规则方面具有较为鲜明的特点,调解机构在部分情形下处于较强势的地位,并且和解协议达成的时限相对短促。

第一,ADC在挑选调解员的过程中处于较为强势的地位。相较于美国等国家允许争议双方事先自行寻找调解员的规定,ADC在挑选调解员时较为强势。提交ADC进行调解时,并非由双方挑选调解员,而是由ADC直接挑选出符合条件的仲裁员,并将相关信息提供给争议各方,各方向ADC反映其对调解员选择的偏好,ADC可以根据其偏好任命,如果未能提供,ADC直接对调解员进行任命。并且当已经选任的调解员存在利益冲突时,争议各方不希望继续任命该调解员,ADC将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任命任何一名调解员。

第二,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时限进行规定,并且时限较短。日本JCAA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的调解规则,均对调解程序的时限进行规定,而澳大利亚是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时限进行规定。其中规定14天内需要达成和解协议,相对



于日本 JCAA 要求的三个月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要求的 30 个工作日而言，时间相对较短。

### 3. 澳大利亚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新修订的启示

澳大利亚商业争议中心在商事调解方面强调只有经过协商不成才能提交调解，并且注重当事人的亲自参与性，这些方面均能给我国带来一定的影响。

第一，规定事先的争议解决程序。2024 年《商事调解指南》要求在提交 ADC 进行调解之前，需要受害人对另一方发出解决争议的通知，双方必须就这一争议进行事先协商，如果在一定期限内未能协商成功才能提交 ADC 进行商事调解。一方面，当事人自行解决之后即无需经过后续的商事调解程序，这一做法可以节约争议解决成本；另一方面，这对商事调解的顺利进行奠定一定基础，譬如争议通知及相关回复或可作为商事调解程序中的证明。

第二，注重当事人的亲自参与性。由于当事人本身才有完全的决定权，因此为了便于调解的顺利进行，ADC 要求当事人必须亲自参与且没有例外情况。即使当事人有法律代表或者具备调解相关专业知识的知识人员，其自身必须亲自出席调解现场。如果一方是自然人，其必须亲自出席调解。如果一方是公司，公司授权的代表必须出席调解。

## （四）新加坡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的修订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新加坡注重商事调解制度发展，在立法、司法、机构建设等方面形成了其特有的调解制度，实现了东方调解的传统以及西方现代的调解制度的两相结合。作为亚洲国家之一，新加坡在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对其遇到的问题与挑战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方案。其商事调解的制度成果能为中国现阶段的商事调解发展给予一定的启示。

### 1. 新加坡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修订的内容

新加坡商事调解规则的修订，可分为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新加坡调解公约》通过五年以来的制度变迁情况；二是《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调解规则》的修订内容与实践情况。《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内容变迁在本报告中有专门部分论述，因此本部分不详细展开讨论。

《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调解规则》的内容变迁主要体现为：建立一个国际调解服务提供方——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SIMC”），其设立的宗旨是为跨境商事争议提供一流的调解服务。SIMC 提供差异化的调解服务以满足当事人的不同需求，除非当事人另行约定，SIMC 根据《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调解规则》（简称《调解规则》）提供专业的案件管理服务。旧版《调解规则》非常简洁透明，一共仅有 10 条，其提供了调解流程的基本框架并给予了当事人一定的指引。2023 年《调解规则》做了部分改动，在原有基础上加了一条，共 11 条，并对其中数条进行了几处调整，详见下表 4-1 和表 4-2。

表 4-1 2023 年《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调解规则》的条款框架表

2023 年《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调解规则》的条款框架表	
调解的开始、终止、取消、延期	第 2 条、第 7 条、第 10 条
调解协议	第 3 条
调解员指定	第 4 条
调解机构与调解员费用	第 5 条
调解的流程	第 7 条
和解协议	第 8 条
保密原则	第 9 条
总则	第 11 条

表 4-2 新旧《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调解规则》的内容框架表

新旧《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调解规则》的内容框架表		
	旧《调解规则》	新《调解规则》
第 1 条	规则的适用	规则的适用
第 2 条	调解程序的展开	调解程序的展开
第 3 条	调解协议	调解协议（调整）
第 4 条	调解员的委派	调解员的委派（调整）
第 5 条	费用	费用（调整）
第 6 条	调解方式	调解方式（调整）
第 7 条	调解的终结	调解的终结
第 8 条	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
第 9 条	保密	保密（调整）
第 10 条	总则	取消或延期（新增）
第 11 条		总则（调整）



新增规则为《调解规则》第10条，该条共3款，就调解的取消和延期作了规定。包括调解取消或延期的事由、相关调解费用的收取和承担。

表 4-3 新旧《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调解规则》的内容比较表

新旧《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调解规则》的内容比较表		
	新《调解规则》	修改内容
第1条	规则的适用	
第2条	调解程序的展开	
第3条	调解协议（调整）	将原 3.4 并入 3.3，无实质性变化。
第4条	调解员的委派（调整）	对 4.2 进行了补充。补充内容为：如若 SIMC 中没有合适的调解员，SIMC 也可以从其合作组织中提名一名调解员。
第5条	费用（调整）	对 5.5 进行了补充。补充内容为：分担费用包括与提供用于调解的一切线上会议设施相关的成本和费用，无论任何一方要求提供此类设施。
第6条	调解方式（调整）	对 6.3 和 6.4 进行了补充。6.3 的补充内容有二：一是限制了姓名通知的日期：应在设定的调解日期前不迟于 3 个工作日；二是规定了参与者应当遵守安全措施：无论是线下或线上出席调解，各方应确保所有代表人完全遵守调解场地实施的所有健康和安全措施，否则将被拒绝进入调解场地。6.4 对文件提交与交换的期限进行了补充，如若调解员没有任何异议，双方当事人可以书面形式共同同意缩短文件提交与交换的期限。
第7条	调解的终结	
第8条	和解协议	
第9条	保密（调整）	对 9.4 进行了较大的补充。修改前该条为“除非获得各方当事人及调解员的许可，否则任何一方当事人、其代表及顾问和调解员以外的人士皆不可出席调解”。修改后该条在保留旧条文的基础上增加了保密要求的相关规定，强调了保密原则。
第10条	取消或延期（新增）	本条为新增条文，规定了调解取消或延期的相关条件与后果，共 3 款。
第11条	总则（调整）	第 11 条。增加 10.2，无实质性变化。

## 2. 新加坡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修订的特点

新加坡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修订具有某些典型特征，我们可以从调解进程、调解费用等方面进行分析。

### （1）低成本、短周期、高效率的调解进程

《调解规则》就姓名通知的期限做出了不超过3日的规定，就文件交换期限允许双方合意缩短。前者有利于规范当事人选人用人的时间，进而缩短调解周期；后者有利于直接缩短调解周期。实际上，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在调解上一贯坚持低成本、短周期、高效率的模式。根据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公布的数据，其从收到当事人的调解申请到进行调解程序所需的时间最快仅需3个工作日。

我国应当看到商事调解的特殊性：调解与仲裁、诉讼相比周期更短，在总体上呈现高效率的特征。相比诉讼和仲裁整个程序需要动辄数月甚至数年，国际商事调解时间上的优势非常明显，而更短的时间直接意味着更少的法律费用和更低的纠纷解决成本。不同于诉讼、仲裁等强对抗性的争议解决机制，调解的首要目标既不是查清事实真相、也不是分配法律责任，更加不是击败对方当事人，其最核心的目的是帮助当事人达成和解意向。因此，调解程序通常不需要耗时持久的取证、调查环节，比如，文件披露、专家证人出庭等。

### （2）对调解相关费用的详细规定

本次《调解规则》修改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增设和细化了费用的若干规定。在调解的取消和延期上，《调解规则》新增了相关费用的计算和承担方法；在费用分担方面，《调解规则》明确了费用分担包括线上设施相关的成本和费用（cost and fees relating to the provision of any online or video conferencing facilities to be used in the mediation）。明确相关费用，有助于提高调解成本的可预期性。而新加坡国际争端解决学会出具的《2020年新加坡国际争议解决调查最终报告》显示：“就选择国际商事调解而言，超过80%的受访者表示其公正中立性、效率和保密性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此外，“超过81%的受访者表示‘成本’是他们选择调解‘绝对关键’或‘重要’的因素”。因此，在调解规则中细化费用的相关规定，有助于各方当事人就调解成本问题进行权衡，符合各方当事人利益要求。



### 3. 新加坡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新修订的影响

探讨新加坡商事调解规则对中国的影响，自然也要分成两个层面。一是《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的影响，二是《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调解规则》对我国的影响。

2018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简称《公约》）。《公约》旨在针对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跨境执行机制，从而促进国际商事调解活动的发展和应用。《公约》的起草工作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下文简称贸法会）牵头负责，包括中国在内的85个贸法会成员国以及35个非政府组织参与了公约的起草与协商。2019年8月7日，《公约》的签署仪式在新加坡举行，包括中国、美国、印度等46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首批签约方正式签署。在《公约》生效且中国正式加入后，中国法院也将有义务按照《公约》机制及未来可能制定的国内程序执行外国调解程序中达成的和解协议。

《调解规则》的修订一方面给中国提供了新加坡经验，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公民接受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商事调解时需要遵守《调解规则》的新规定。

《调解规则》的修订，填补了一些法律漏洞，对一些空白事项也做出了规定。如新增的第10条较为系统地规定了调解的取消和延期的事由，特别是规定了调解延期或取消时，调解费用如何计算，以及各方当事人如何分担调解费用。又如第9条第4款对出席调解的人做出了详细的保密要求。再如第6条第3款要求出席者遵守健康和安全措施（health and safety measures imposed by the mediation venue）。再如关于调解员的规定，新《调解规则》允许SIMC在本组织不能提供调解员时从其合作组织提名（nominate）一名调解员。

## 二、主要国际组织商事调解规则的新发展

我们吸收借鉴比较法经验时，除了考察域外国家的商事调解规则，还可以考察主要国际组织的商事调解规则，由此能够更加系统地学习各方经验。

### （一）国际商会的商事调解规则

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是世界上重要的民间经贸组织，总部位于巴黎，成立于1919年。国际商会的宗旨是在经济和法律领域里，以有效的行动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国际商会的工作方式为：制订国际经贸

领域的规则、惯例并向全世界商界推广；与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对话，以求创造一个有利于自由契约、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国际环境；促进会员之间的经贸合作，并向全世界商界提供实际的服务等。ICC 的商事调解规则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 1. 国际商会的商事调解规则的内容

#### （1）《国际商会调解规则》概述

国际商会的商事调解规则是其所制定的《国际商会调解规则》。自 1976 年国际商会设立替代性纠纷解决中心以来，调解因其程序的灵活性、非对抗性以及成本效益方面的优势，逐渐发展成为商事纠纷解决的重要方式，在冲突的不同阶段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商事主体的青睐。2014 年 1 月 1 日，ICC 在对《国际商会友好争议解决规则（2001）》进行全面修订的基础上发布《国际商会调解规则》（本部分以下简称“《规则》”），取代了 2001 年《友好争议解决规则》（ADR 规则）。此次变更后的规则为使用者提供了进行调解的明确参照，并保持了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的灵活性。正如之前的 ADR 规则一样，这些规则也可用于执行其他程序或与其他程序相结合，如调解、中立评估。

《规则》中对调解的定义：“调解”是一种兼具灵活性和私密性的争议解决方法，调解人作为中间人帮助当事方进行沟通并达成和解协议。当事方能够掌控调解的结果及和解协议的条款。

《规则》的具体内容为协议参照本规则的相关规定、调解的地点和语言、调解员的选择和确认、调解费用（包括备案费、行政费用、调解员费用等）、调解程序的进行和终止、保密性要求等。

《规则》专门处理调解程序与仲裁程序的关系问题。根据《规则》，调解程序本身并不妨碍平行仲裁或其他调解的开始。《规则》第 10 条第（2）款明确规定，除非双方另有书面约定或适用法律规定，否则不禁止双方进行平行仲裁或其他调解。

#### （2）国际商会的商事调解的流程

调解的开始。向国际商会中心提出调解请求：若已签订国际商会调解协议则参见第 2 条规定；未事先达成协议的，根据第 3 条规定，需由一方向另一方提出调解；



中心在收到完整的请求后确认收到请求；中心请各方就任何未决的程序问题提出进一步意见。例如，调解程序的语言、调解会议的地点、调解的时间、调解员的属性等。调解费用的支付。双方支付临时存款以支付调解费用，直到双方第一次会见调解员或后续会见调解员。

调解员的选择。由双方共同提名或由国际刑事法院指定。联系调解员。国际商会中心将文件转移给调解员，并邀请她/他与双方联系；调解员与双方之间的第一次会议讨论调解的进行；调解员根据《规则》第7条第（2）款的规定将通知告知当事人；由调解员进行的调解，可能涉及调解员和双方的一次或多次会议，涉及交换书面文件和电话会议。

调解程序的终止。调解程序的终止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由合同双方决定，关键原则是自愿。当双方签署和解协议后，调解程序结束。任何一方在与调解员举行初次会议并收到调解员的调解方式说明后，可随时终止调解程序。第二种，由调解员决定。调解员认为调解不能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或者通知当事人已完成调解程序的，可以随时终止调解。第三种，由中心决定。当中心以书面形式通知各方以下情况之一时，调解程序终止：程序规定的任何时限，包括任何延期已届满；一个或多个各方没有支付所需的费用；未能指定调解员或无法指定调解员时，调解程序亦结束。

和解协议的执行。和解协议及可执行性成功的调解会促成对一个对双方具有合同约束力的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不尊重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请求强制执行和解协议。但和解协议不等于仲裁裁决，在执行上不能等量齐观，因此不能像1958年《纽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下的仲裁裁决那样在国际上强制执行。而由于2008年欧盟关于民事和商业事务调解的指令的下达，许多欧盟国家已立法，以确保和解协议可以从成员国处得到承认和执行，并提供“调解和解执行命令”。

## 2. 国际商会的商事调解规则的特点

### （1）调解启动的便捷性

《调解规则》中的启动程序具有充分的便捷性。根据《调解规则》，无论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是否包含国际商会调解条款，当事人均可以基于合意，选择由中



立第三方协助解决纠纷。替代性纠纷解决中心可以在当事人未事先约定适用《调解规则》解决争议的情况下，将一方当事人的调解请求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并要求后者在收到通知 15 日内向国际商会表明其是否同意进行调解。在取得各方当事人的同意后，替代性纠纷解决中心将协助当事人选任调解员，及时启动调解程序，并为当事人做好调解的释明和指引工作。

### （2）程序衔接的灵活性

《调解规则》中的程序设计具有充分的灵活性。调解程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当事人、代理律师和调解员的专业背景以及纠纷的性质进行改变。调解既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纠纷解决程序，也可以与其他程序结合，作为国际商会多层次争议解决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与协商谈判、调停、中立评估、专家评估意见、快速仲裁等其他方式的结合。例如，可以在争议的早期引入不具有约束力的中立评估机制，协助当事人厘清争议焦点，缩小案件认知差异，发现证据欠缺之处，并且将中立评估报告作为调解程序中协商谈判的起点。又如，在调解程序或者纠纷解决的任何阶段，当事人都可以向替代性纠纷解决中心申请专家评估，由他们协助分析和解决纠纷中所涉及的专业技术性问题。当事人可以对专家评估意见是否具有约束力进行约定，具有约束力的专家评估意见可以在后续纠纷解决程序中继续发挥作用。

### （3）纠纷解决成本的合理性

《调解规则》中的纠纷解决成本具有充足的合理性。国际商会调解的费用主要由案件管理费用和调解员的费用两部分组成。为了鼓励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之前或者之中使用调解，国际商会在最新修订的《仲裁规则》和《调解规则》中均规定，当国际商会调解不成功时，当事人可以选择继续由国际商会仲裁，此时当事人在调解案件中支付的案件管理费的一半可以用于折抵仲裁申请费；如若当事人在向国际商会提出仲裁请求后同意将争议提交调解，作为支付仲裁申请费用的 5000 美元将计入调解的案件管理费。

## 3. 国际商会的商事调解规则的可借鉴之处

### （1）注重规则与实践的衔接

2001 年以来，国际商会替代性纠纷解决中心受理的调解案件的数量稳步增长，



其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心受理的争议涉及建筑与工程、金融、能源、电信等诸多领域。在规则与实践的衔接上，国际商会近年来致力于扩大商事调解的适用范围，凸显其在商事纠纷解决领域的竞争力和优势特色。其中值得关注的举措，如积极发布商事调解实务指引。实务指引是对《调解规则》若干问题的实务指导。国际商会近年来发布了若干指引，包括《调解指南说明（2016）》《关于适用调解和仲裁解决“一带一路”纠纷的指引（2019）》《有效冲突管理指南（2023）》《关于促进国际仲裁中争议解决的报告（2023）》等一系列与商事调解相关的实务指引。这些指引的受众范围较广，既帮助各类国际商事主体了解其在国际商会争议解决规则体系下的程序选择权和处分权，同时也引导仲裁员、调解员、律师等法律执业者更好地理解 and 适用国际商事惯例和争议解决规则。这启示我们要做好规则与实务的衔接，通过发布指引文件等指导性文件，采取多种方式促进规则与实践的统一。

## （2）聚焦商事调解的商事本质

国际商会致力于打造以“商业驱动”为核心的商事争议解决体系。商事调解的制度本性离不开商业范畴，调解的程序价值应当服务于商事目标。因此国际商会深刻地洞察商事交易和商事纠纷的本质属性，鼓励各方当事人将包括调解在内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视为商业工具而非法律救济手段；同时精准地把握商事主体对于维护长期合作关系、掌握决策控制权以及对成本效益的追求，引导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前，达成更具自治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的纠纷解决方案。这启示我们在调解制度的建构和实施上应当时刻关注其“商事本性”，构建一套符合商事主体期待、保护商事主体利益的商事调解制度。

## （3）强调调解这一冲突解决机制的特殊价值

国际商会致力于发挥调解在有效冲突管理机制中的价值作用。根据国际商会建立的有效冲突管理机制，商事主体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自身需求，在冲突的不同阶段综合运用不同的方式预防、管控和解决纠纷。调解并不是冲突解决的唯一解，也不是与其他冲突解决机制不兼容的机制。在当事人向国际商会替代性纠纷解决中心提出的调解请求中，其中多数是基于当事人预先订立的争议解决协议。此类协议通常以双方合同中所包含的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形式订立，约定双方应当根据《调解规则》，将因合同引起或者与合同相关的任何争议首先提交国际商会替代性纠纷

解决中心进行调解。此外，当事人还可以在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中嵌入对“调解之窗”的约定。根据约定，各方当事人同意在仲裁进行过程中为调解预留特定的时间窗口，同时中止或者暂停相关的仲裁程序，利用仲裁裁决作出前的缓冲期，共同探讨可行的纠纷解决方案。这启示我们要看到调解这一冲突管理机制的特色并发挥其价值。国际商会看到了调解方式在实践中的灵活、开放的规则特性，进而把调解方式作为不断跟进不同阶段各方当事人诉求的变化的制度性工具，以最大限度地将商事主体聚焦的商业风险和解决纠纷的成本纳入可预测、可管理、可控制的范围内。

## （二）知识产权国际组织的商事调解规则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WIPO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Center，本部分以下简称中心）的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在新加坡也设有办公室。中心旨在通过调解促进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纠纷和解协议，尤其擅长解决技术和娱乐方面的纠纷。当事人不想继续调解或达不成和解协议的，中心还会根据纠纷案件情况建议当事人通过仲裁或专家鉴定等程序解决纠纷。WIPO 的商事调解规则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商事调解规则的内容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商事调解规则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调解规则》（WIPO Mediation Rules，本部分以下简称“《规则》”），中心对《规则》进行的最近一次修订，明确自 2021 年 7 月 1 日生效实施。《规则》共 28 条，具体内容为：规则的适用范围、调解的开始、调解员的指定、当事人的代理人和会议的参加人、调解的进行、调解员的作用、保密、调解的终止、管理费、调解员费、预缴款、免责、放弃诽谤诉讼权和诉讼时效的终止等。调解的基本流程如下：

首先，调解的开始。约定由中心调解的当事人希望启动调解的，应当向中心提交附具当事人信息、争议要点等内容要素的调解申请书，并将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调解自此开始。任命调解员。中心向当事人提供包含至少 3 名候选人姓名和资格说明的候选人名单，由当事人在 7 日内选定；如果当事人均不接受，则由中心指定或者由当事人约定 1 名调解员人选。其次，调解的进行。调解按当事人约定方式进行，无约定的，调解员依据《规则》决定调解方式。首次会晤时，调解员与当事人协商制定时间表，督促按期提交意见书及相关事实资料，组织交换意见；正式调



解会议可以一次或多次，主要商定调解程序的基本准则，进一步收集资料并确定争议问题，研究当事人利益，拟定和解备选方案，评估备选方案及提出解决纠纷的建议。最后，调解的终止。一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二是调解员决定终止或一方当事人书面声明终止。调解员随即向中心发出调解终止书面通知，并抄送各方当事人。

##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商事调解规则的特点

《规则》的特点包括适用区域的广泛性、当事人约定的优先性、程序的严格保密性、配套系统的完备性。

### （1）适用区域的广泛性

《规则》主要适用于处于不同司法区域当事人的知识产权纠纷，如中国当事人和英国当事人之间；但也不排斥处于同一司法区域当事人的知识产权纠纷，如双方均为中国当事人，适用范围具有全覆盖的特点。

### （2）当事人约定的优先性

当事人约定的优先性覆盖了调解程序的多个方面，包括调解员的产生、调解员的选任、调解方式、调解地、调解语言等。从调解员的产生来看，调解员由当事人在中心推荐的候选人中商定，如无合适人选，当事人也可以自行约定。此种产生方式更看重当事人的“约定”而非中心的推荐，最大限度保证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从调解员的选任程序来看，当事人可以自行约定，没有约定的，按照《规则》规定的有关程序进行。此种选任程序将“约定”的位阶置于“规定”之上，将规定程序作为替代方案而非首要方案，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通过《规则》规定提供兜底方案。从调解的方式来看，调解方式按当事人约定方式进行，无约定的，由调解员按《规则》决定采取的方式。此种规定模式与调解员的选任程序相同，均为“约定—规定”的先后适用顺序。从调解的地点和语言来看，调解地和调解语言均可由当事人共同商议确定。这也体现了当事人约定的优先性。

### （3）程序的严格保密性

《规则》的突出特点就是强调程序的严格保密性，而保密程度的不同，也是商事调解与商事仲裁的重要区别之一。程序的保密性表现在多个方面，如会议记录、

保密书、文件副本等。《规则》规定的保密措施包括：当事人与调解员的会议不做任何记录。参加调解的全部人员在参加调解前均需签署保密保证书，除当事人和调解员另有约定外，均不得使用或向外部披露与调解有关的或者在调解过程中取得的任何信息。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参加调解的任何人在调解终止时应当将一方当事人提供的任何文件、资料返还给该当事人，并不得保留任何副本。如有任何笔记，在调解终止时应当销毁。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调解员和当事人不得将在调解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建议、承认、协议等在任何司法程序或仲裁程序中作为证据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提出。《规则》较为全面而细致地规定了保密事项，这有利于营造双方安心的调解环境，进而提高调解效率和减少双方的对抗性，也避免了内部材料流出从而引发道德风险的可能。

#### （4）配套系统的完备性

任何规定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相关配套设施的帮助。《规则》能够正常运行也离不开一个完备的配套系统，包括专家、服务、硬件等多方面。智库系统方面，中心的数据库收录有来自世界各国的 2000 余名中立专家，皆在商事、知识产权和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争议解决方面拥有专长。配套服务方面，中心提供包含多种语言版本的相关文件样本，并帮助当事人安排可能需要的笔译、口译或秘书等辅助性服务。目前 ADR 程序中已经使用的语言包括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韩文、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硬件设施方面，商事调解既可以线上进行又可以线下进行。若调解在线下进行，如程序在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进行的，中心免费提供会议室和当事人休息室；若调解在线上进行，中心会提供在线申请表以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上案件管理平台，供当事人选择使用。费用管理方面，中心负责与当事人和中立人商议确定中立人的费用，并全程管理有关调解程序的财务事项。

###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商事调解规则的可借鉴之处

#### （1）制定明确的收费指引标准

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商事调解规则中不难看到，商事调解是在制度价值上体现平等自愿、在程序安排上灵活可控的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商事调解，争议双方可以在原有商业基础上化解纠纷，也可以在调解中建立新的商业关系促进争议的解



决。此外，调解在价格上较诉讼、仲裁更具优势。但是此种价格优势却常常被忽略。例如，标的额为 1000 万元的涉外知识产权商事争议，诉至法院需缴纳 81800 元诉讼费；而申请贸仲委仲裁，仲裁费用更是高达 230000 元；但参考“云平台”的公开收费标准，在调解成功的情况下，当事人却仅仅需支付 34720 元，而若调解失败“云平台”亦将分文不取。<sup>①</sup>在此情况下，我国涉外知识产权商事调解仍然存在案源不足的问题，这与“权威主义”的纠纷解决意识有关，亦与涉外知识产权商事调解的收费指引标准制定不明确有关。解决此类问题，宜迅速制定明确的收费指引标准，提高公众对商事调解的了解和信赖程度，增进商事主体对商事调解这一制度本身的认同，从而促进解决案源不足的问题。

### （2）推动知识产权商事调解组织的市场化运作

目前，我国商事调解服务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但商事调解主要是通过公权力介入的方式进行推广，独立的商事调解的利用率很低。<sup>②</sup>知识产权纠纷的专业化特点决定了解决知识产权纠纷需要专业知识过硬、解决问题能力突出的调解员，就专业知识而言，需要调解员兼具法律专业知识与相关领域的技术背景相关知识。如果不推向市场或限制按照市场化运作，仍然依靠来自人民法院和相关部门的经费补助，很难激发调解员的工作热情，且不符合知识产权专业性强、技术强的特点，难以支撑知识产权纠纷商事调解工作向前发展。<sup>③</sup>特别是面对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商事调解组织很难抢占国际市场。

### （3）注重商事调解的保密性

调解的保密性向来是调解的一大优势，也是调解规则区别于其他纠纷解决规则的重要特色之一。《规则》较为全面而细致地规定了保密事项。在《规则》的法律框架下，调解程序实现了从会议记录、保密书到文件副本的保密制度安排。而理解《规则》的保密范围和保密义务主体也是我国借鉴学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商事调解规则的应有之义。应当看到的是，保密义务既包括在调解过程中对专家证人、对

---

①《参见邓宇杰、章渝昕：《我国涉外知识产权商事调解的实践检视与优化路径》，载《产业创新研究》2024 年第 15 期。

②参见黄忠顺：《论商事调解的市场化》，载《人大法律评论》2020 年第 1 期。

③参见李婉：《知识产权纠纷商事调解的几点思考》，载《中国军转民》2021 年第 10 期。

对方当事人等的调解信息的保密义务，又包括调解后续过程的保密义务。我国在借鉴学习《规则》的保密制度安排时，应根据国情设立原则与例外的保密制度。

### （三）国际金融组织的商事调解规则

调解在商事纠纷中的高效性，已得到世界银行的充分认可，其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在 2023 年 5 月发布的新 Business Ready（简称 BR）中被正式纳入“解决商业纠纷”指标的重要考核内容。世界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简称 BIS）作为国际金融机构，主要为各国中央银行提供金融服务和合作平台，重点在于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以及国际支付系统的协调，其并不直接参与像投资争端解决或企业商业争议等领域的调解。

世界银行新营商环境评估 BR 体系中“解决商业纠纷”指标由 DB 评价体系的“执行合同”演变而来。相较于在 2021 年 9 月被终止的 DB 评价体系，BR 体系在覆盖范围、数据收集、公共服务、数字化和时间成本上均有显著差异。尽管诉讼仍是评估重心，但仲裁、调解在评估体系中的占比从“执行合同”的约 5% 提升到“解决商业纠纷”的约 20%。总体来看，DB 注重中小企业所处的商业环境，而 BR 则观察到整个私营部门的商业监管、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

#### 1. 国际金融组织的商事调解规则的内容及特点

评估体系分为监管框架、公共服务和效率三个维度。首先，监管框架维度共计 31 项指标，其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评估诉讼程序的效率和质量，二是评估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效力，涉及仲裁和调解。其次，公共服务维度考察有关体制框架、数字化、透明度和 ADR 服务的规定。最后，效率维度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评估纠纷解决的可信度，第二类为评估纠纷解决的时间和费用，第三类为评估承认及执行的效率。

##### （1）监管框架的完备性上关注完善和解协议执行机制

在世界银行新营商环境评估体系的监管框架维度下，商事调解在基于自愿性的基础上，达成合意、解决纠纷。BR 监管框架强调在调解过程中披露的证据在其他诉讼程序中不被接受，以及在和解协议承认和执行的过程中其具有独立性。具体评估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4-4 世界银行新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中监管框架具体评估内容表

评价要点	评价内容
商事调解的自愿性质	是否具备调解相关的法律规定？ 法律是否规定商事纠纷调解是强制性的，即无论是在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前还是在案件已被受理后，双方皆同意采取调解方式？
调解人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法律是否规定调解员有义务披露任何情况下影响任命前或任命后公正性、独立性的行为？
不接受在其他诉讼中为调解目的而披露的证据	法律是否规定，除双方另有约定外，调解人不担任调解纠纷外涉及其他仲裁纠纷关系的角色？ 法律是否不允许调解程序中当事人、调解员和任何参与调解的第三方所提供的证据或证词，用于仲裁程序或法院诉讼？
和解协议的判决和执行	法律是否规定调解和解协议作为一种特殊的强制执行依据应用于商事纠纷案件，与向法院提起诉讼相比，该方式更有效？ 法律是否规定关于承认和执行的具体规则，当没有法院批准或不享有国际调解协议亦拥有判决或仲裁的权力？

## （2）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上关注提供调解服务的组织性

在公共服务维度下，调解是一种常见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评价的重点包括调解的数字化应用和信息公开情况，具体内容如表所示，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第一，评估调解机构和组织建设，重点考察“是否存在商事纠纷调解服务机构”及“是否公开更新合格调解员名册”等。第二，评估调解的数字化应用，考察“是否有激励措施鼓励调解解决商事纠纷”以及“当事人能否通过调解机构网站安全提交在线调解请求”等。第三，评估调解相关信息的透明度，重点考察“国内调解机构是否每年公布商事案件的调解数量”以及“是否按性别统计并公布调解员人数”等。

表 4-5 世界银行新营商环境评估体系中公共服务评价的重点内容表

评价要点	评价内容
提供商事调解服务	辖区内是否有国内机构为商事纠纷提供调解服务？
建立调解员名册	辖区内的调解机构是否更新并公开合格的调解员名册？
使用财政奖励鼓励应用调解	辖区内是否有激励奖励措施鼓励当事人通过调解解决商事纠纷？注：此类激励奖励措施包括与诉讼费相比大幅降低的调解费、诉讼费、所得税减免、免费法律服务等。 对拒绝参与的制裁调解不视为经济激励。

调解的数字化	商事调解中，当事人能否通过辖区内的调解机构或调解组织的网站线上安全地提出调解申请？ 商事调解中，当事人和调解员达成的调解和解协议可以安全地以电子方式签署吗？
调解的透明度	国内调解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是否每年至少公布一次各类商事案件的调解数量？ 国内调解机构或其他相关机构是否按性别分列的调解员人数，并每年至少公布一次？

（3）效率维度中涉及“调解”的重点评价内容

在效率维度中，涉及调解的评价内容仅有两条，包括对市场主体是否认可调解或和解作为法院解决商事纠纷的可靠替代方法的调查。重要评价要点为调解的可靠性问题，其评价内容是关于调解或达成和解是否能成为法院解决商事纠纷可靠的替代性解决纠纷方式。

2. 国际金融组织的商事调解规则的可借鉴之处

事实上，我国司法实务中长期推行的审判质效内向型评估与 BR 体系的外向型评估在原理、方法上相去甚远。<sup>①</sup>“解决商业纠纷法规质量”“司法公共服务可及性”“解决商业纠纷便利性”三项二级指数及其内容采用的是“功能—组织—程序—科技”的营商民事司法逻辑。从 2010 年开始，我国法院对审判质效的评估采用量化的方式进行内部管理改革，尽管其审判质效评估的初衷是促进司法公正，但由于评估主体、方式和结果内部化出现的问题，已经逐渐演化为了—种审判质效竞赛。从历史来看，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已经成为全球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我国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逻辑的基础上，可以合理吸收借鉴全球民事司法制度的先进部分。我国现行的审判质效评估结果未将司法用户体验思维作为有效评估对象，BR 体系中开放多元的评估方法值得被我国采纳、借鉴。<sup>②</sup>BR 体系中“解决商业纠纷”的概念将评估的数据收集对象扩大到企业市场，尤其是针对私营企业增设企业调查方式，结合案头研究和官方数据予以印证，从而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

① 参见高翔：《便利营商视野下的营商民事司法改革——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中的“解决商业纠纷”为视角》，载《法学杂志》2023 年第 5 期。  
② 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审判管理制度转型研究》，载《中国法学》2014 年第 4 期。

商事调解的真实状况。

此外，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不仅局限于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和仲裁、调解的对接，更应将仲裁和调解制度本身的改革纳入建设重点。相较于中国国内现有调解制度的建设情况，BR 体系中“解决商业纠纷”将仲裁、调解制度自身改革作为重要评估对象，比如仲裁、调解程序的便捷与快速，调解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这些量化指标提供了明确的参考框架，为我国的调解制度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方向。同时，这种评估体系还关注改革实施的实际效果，从而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依据。

#### （四）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国际投资争端调解规则

投资争端调解机制的灵活性备受国际社会认可，理论上其应当成为解决商事投资争议的重要途径，然而截至 2024 年 10 月，ICSID 调解程序仅处理 14 起案件，远远低于选择投资仲裁的 1028 起案件。<sup>①②</sup>在 ICSID 受理的调解案件中，近五分之一的案件调解终止，剩余五分之四已由调解委员会出具报告的案件中有近 90% 的案件调解失败，仅有 10% 调解成功。

2017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简称 UNCITRAL）第三工作组（WGIII）被赋予了全面改革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ISDS）的任务，计划在 2026 年前完成。2023 年 9 月 15 日，UNCITRAL 发布了在第五十六届会议上通过的《贸易法委员会的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下称“《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和《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投资争议调解示范条文》，鼓励当事人利用调解解决国际投资争端。《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对国际投资争端应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识到调解在解决此类争端的重要价值，规范调解的具体程序。该准则的意图并非立即推广实践，而是简要列出和描述在进行国际投资争端调解时应考虑的问题。

##### 1. 《贸易法委员会的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的内容及特点

由于调解的灵活性，促使各方达成和解的程序风格、实践和方法可能各不相

---

<sup>①</sup> Se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avigator, UNCTAD,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iaa-mapping>.

<sup>②</sup> See ICSID, <https://icsid.worldbank.org/cases/case-database>.



同,故《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希望各方足够了解国际投资争端调解的各个方面、过程的细微差别及相应的优势。各方当事人及调解员可根据自身需求酌情使用或参考该规则,并不必采用或解释为何不采用规则中的任何特定要素。其具体条文不构成对各方或调解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求,亦不适合作为具体的调解规则使用。

#### (1) 判断调解是否适合解决相应的国际投资争端

在考虑调解是否适合解决因国际投资引发的任何问题或争端时,应根据情况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否期待维持双方关系,尤其是希望保留现有投资和吸引未来投资的情况下;第二,双方是否愿意进行对话或谈判来了解对方的立场;第三,涉及的各方人数;第四,是否有必要以省时省钱的方式解决争端;第五,争端的性质及根源;第六,争端中问题的复杂性及紧迫性;第七,是否属于有利于简化的问题;第八,是否有必要引入第三方参与;第九,各方是否希望对解决过程和结果进行控制;第十,各方是否希望开发量身定制的创新解决方案;第十一,是否愿意遵守和解协议的效力,包括政治、经济、社会 and 财务的影响。

虽然上述清单可以帮助各方当事人判断解决某一问题或争端是否应当适用调解,但判断时并非需要涵盖所有方面。是否适用调解,根据各方当事人的地位和利益能得出不同的答案。一些当事方可能在早期阶段(例如在问题上升为争端之前)需要适用调解,而另一些当事方可能在仲裁或诉讼开始后,甚至在稍后的阶段(例如书面陈述或听证会之后)认为需要适用调解。

#### (2) 规范调解时间和期限

在调解的时间选择上,《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规定,调解的效果会随着阶段的发展而变化。因此,当出现问题或争端时,调解在投资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可被采用。投资条约和合同会规定各方通过调解来友好解决问题的时间期限,在某些情况下,该期限的到期是启动仲裁的前提条件。当双方同意进行调解时,部分情况下会设立调解的期间,该期间不应过短,但要足够有效、简洁地进行调解。<sup>①</sup>

#### (3) 明确调解员资格的审查条件

《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希望解决目前调解员资格混同的问题,在指定调解

<sup>①</sup> UNCITRAL Guidelines on Med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art.8.

员时，如果没有统一、当事人认可的标准，仅轻易从机构所给仲裁员人才库中进行选任，势必会影响调解机制解决纠纷的公正和效率。实践中，国际投资争端主要由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组织以及全球或者区域性国际法庭负责处理，如伦敦国际仲裁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国际投资争端中心等。在国际投资调解案件中，调解员通常由经验丰富的仲裁专家担任。例如，在 Systra 公司与菲律宾政府的调解案件中，国际商会（ICC）在受理争端后，依照《国际律师协会投资者与国家间调解规则》进行调解，调解员 J. Christopher Thomas 曾多次担任投资仲裁案件的仲裁员。<sup>①</sup>但是，仲裁与调解两种争端解决机制的原理截然不同，对仲裁员和调解员资质的要求也有本质的差异。

《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规定，调解员需经验丰富，在调解领域的能力应得到广泛认可，其应当精通各种沟通方式和不同的谈判风格，并能够运用各种工具，基于各方的需求、利益来制定可以被当事人接受的调解方案。<sup>②</sup>《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并不强制要求调解员熟练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如果在调解中需要法律专业知识，可以指定法律专家协助调解员，同时，各方的法律代表可以为客户提供争端的法律评估或任何拟定解决方案的法律评估。调解员通常由各方当事人指定，各方当事人可以就调解员或就指定程序达成一致意见。在部分情况下，各方当事人在一定时限内未指定调解员或未能就调解员达成一致意见的，可以请求机构作出指定。

对调解员资格的要求，具体而言，首先，在选择调解员时，各方应当考虑调解员是否具备以下经验和能力：第一，担任调解员的经验；第二，以有效方式进行调解的能力；第三，接受过调解培训，包括任何资质的认证；第四，与政府或国家实体合作的经验；第五，参与争议解决的经验；第六，投资法领域或相关行业的专业知识；第七，对投资争端背景的理解，包括经济、法律、社会和文化层面；第八，掌握一种或多种语言，以便进行有效沟通。其次，在调解员独立性和公正性方面。<sup>③</sup>

《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综合考察《投资者与国家间调解规则》等，要求调解员独立于各方当事人，调解员需提供签名声明，附上其对独立性、公正性以及

---

① 刘一行：《ISDS 改革背景下国际投资调解的困境成因及纾解》，载《商事仲裁与调解》2023 年第 6 期。

② UNCITRAL Guidelines on Med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art.14.

③ UNCITRAL Guidelines on Med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art.17.

过程、结果进行保密的承诺。同时，自其被指定之时起，调解员需及时披露足以使当事人质疑调解员独立性或公正性的情况。最后，调解员的国籍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比如，各方当事人会偏向于考虑任命一位与当事方国籍均不同的调解员，以免带有任何主观偏见。然而，各方当事人也会倾向于选择与其相同国籍的调解员，因为该调解员可能更熟悉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且对和解协议的接受度更高。

#### （4）确定各方及其他参与者在调解中的角色

《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规定，各方当事人、调解员之间需要进行合作，在探讨争议问题后得到有效的解决方式，也可以由调解员与其中一方当事人单独会面。

第一，各方在确定其团队的规模和组成时，应优先考虑加入一名有权对争端作出和解决定的成员，并确保该成员全程参与调解过程。调解的初期，各方应与调解员和其他当事方明确共享调解参与者的权限范围。尽管在团队中纳入一位能够全权处理争端的成员至关重要，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实现。例如，国家一方可能需要某个部委、多个部委或内阁的批准或签字，投资者一方则可能需要董事会或公司监督机构的批准。无论如何，团队中应确保有一名与拥有决策权的人员或实体保持直接沟通的成员。关于调解参与者权限的信息应尽早与调解员及其他当事方共享，以确保流程顺畅。<sup>①</sup>

第二，法律代表在调解中的角色与在对抗性程序中的角色显著不同。在仲裁中，法律代表通常集中于提出法律和事实依据，目的是说服仲裁庭作出有利于其客户的裁决。而在调解中，法律代表则更侧重于协助各方合作，探讨并制定符合客户利益的前瞻性解决方案。在这一过程中，法律代表不仅引导各方顺利推进调解程序，还可以提供法律建议，例如说明调解的可行性及相关调解规则。此外，法律代表还可以帮助各方客观评估案件的优劣势，协助撰写书面陈述，准备调解过程中需要使用的相关文件，甚至参与开场陈述的准备及和解协议条款的起草。<sup>②</sup>

第三，调解的灵活性允许相关第三方参与其中。各方应考虑是否让第三方参与调解过程，尤其是当此类参与能够兼顾多方利益并促进友好解决方案时。各方应与

<sup>①</sup> UNCITRAL Guidelines on Med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art.26.

<sup>②</sup> UNCITRAL Guidelines on Med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art.27.

调解员共同协商确定这些第三方的参与范围及其程序框架，以确保各方利益得到平衡和妥善考虑。<sup>①</sup>

#### （5）平衡保密性和透明度

鉴于调解机制透明度要求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可普遍适用于各个国家所有类型不同阶段案件的标准，部分国内立法或国际协议等要求进行确认性披露。《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的观念不同于原有规则，各国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对自身在争端调解机制中所需承担的透明度责任进行约定，从而向公众更新进展情况。这给当事方留下较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根据争端的性质对透明度进行调整，在保留程序灵活性的同时也对保密的内容、披露的程度与方式予以补充。为了确保调解的顺利进行，各方必须能够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自由参与谈判，从而不必担心在调解过程中所交换的信息或所作出的声明会在其他法律程序中被对方利用。因此，各方通常会达成一致，不在其他程序中使用调解期间共享的信息，这一约定适用于所有参与调解的人员。各方还会审慎评估调解过程中共享的信息和文件是否有助于促进有效沟通。如果可以，那么保密义务自调解开始之日生效。<sup>②</sup>

网络技术的发展在调解保密性与透明度的平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线上调解案件激增，给保密性带来了新的挑战。《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已允许通过远程线上方式举行调解会议，这不仅省去了当事方和调解员前往特定地点的各类成本，还减少了日程冲突，大大提升了效率和成本效益。然而，线上调解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在数据保护和网络安全方面，可能对调解过程的完整性和私密性造成影响。因此，《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建议各方应关注隐私政策和线上平台的数据处理机制，确保参与者安全并维护程序的私密性。为此，措施包括数据最小化、加密、数字认证等，避免调解中的机密信息在后续程序中被公开或滥用。此外，使用密码保护的会议并禁止录音录像也是保密的重要方式。<sup>③</sup>

## 2.《贸易法委员会的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的适用

《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明晰了调解的具体程序，并简要分析了不同程序选

---

① UNCITRAL Guidelines on Med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art.30.

② UNCITRAL Guidelines on Med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art.36–39.

③ UNCITRAL Guidelines on Med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art.33.

择可能带来的益处，包括调解员的指定、调解第三方的作用。其次，《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指出在调解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对其所交换的信息处理时的义务。最后，《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表示调解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方面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并对各国促进调解的使用提出了建议和期待。

由当事方任命的仲裁员往往被认为缺乏公正性和独立性，在 ISDS 背景下，这一问题因合格仲裁员的数量相对有限而尤为突出。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作为主要改革机构，致力于制定改革方案，并对各国提交的方案进行梳理和归纳。尽管各类方案数量众多，且涵盖领域广泛，但由于在规则对接、理论适用以及各国接受程度等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与冲突，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被普遍认可且有效的改革方案。此外，各方案或侧重于程序问题，或侧重于实体内容，难以形成统一的共识。<sup>①</sup>

为应对这些问题，《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在现有规则的基础上进行补充，与其他行为守则相辅相成，作为评估利益冲突的关键参考。《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的意图并非完全取代现有规则，而是作为独特且普遍的标准，与其他行为守则相辅相成。虽然对于仲裁员行为的基本标准似乎已经形成普遍共识，但在实践中，依据不同的适用文本，合规性评估的方式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鉴于《ICSID 调解规则》及其附加规则等现有国际投资调解规范未明确规定启动调解的时间，《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明确指出，尽管调解的效果可能随情况变化，但调解可随时启动。因此，在投资生命周期的任何阶段，双方均可将调解作为工具，避免东道国因错失时机而放弃调解的情况。调解的启动时间具有灵活性：一方面，调解可在双方采取对抗立场之前进行，防止争议升级，或在争议范围内找到创新性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即便在仲裁或诉讼期间，甚至在这些程序结束后，也可随时适用更为高效的调解机制。各国可以在投资条约、投资合同、国内法律或其他形式中表达对调解的同意，明确调解可在任何阶段使用，包括诉讼前、诉讼期间或之后的强制执行阶段。这将鼓励当事人在争端发生时优先考虑使用高效且低成本的调解方式，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带来新的推动力。

---

<sup>①</sup> 参见于占洋：《ISDS 改革视野下国际多边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构建方案及实施路径》，载《法学前沿》2023 年第 4 卷。



此外，为了解决东道国在调解国际投资争端时意愿不足的问题，《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建议将投资调解的制度纳入本国国内法律体系，从而作为解决相关纠纷的正式法律渊源，增强调解规则的实用性。完善的国内立法可以为国家和相关机构创造良好的调解环境，消除政府官员因担心个人责任或被指控腐败而不愿选择调解的顾虑，避免因官员的个人顾虑而牺牲国家利益。此外，清晰的国内立法可以进一步界定调解参与者的权利、国家在争端解决过程中的代表权及其他相关事项，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得以落实，有效解决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争端。<sup>①</sup>

### 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规则的新发展

在域外典型国家主要的商事调解组织及主要国际组织不断更新自身的商事调解规则的背景下，为了紧跟全球商事调解发展的步伐，满足日益复杂的商事争议解决需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融合现代信息技术，吸纳多元化参与主体，秉持更加人性化的服务理念，对本中心商事调解规则进行全面修订。此次修订充分考虑了国际商事活动的新特点、新趋势，以及当事人对于争议解决的多元化需求，旨在进一步提升商事调解的专业性、权威性和公信力，为推动国际商事活动的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 （一）商事调解规则新修订的背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对商事调解规则作出全面的梳理和修订，并于2024年7月1日正式施行，对我国商事调解事业起到非常积极的正面影响。本次商事调解规则的修订主要是基于以下两大背景。

##### 1. 商事调解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商事争端解决方式

近年来，商事调解作为一项重要的商事争端解决方式，以其高效实用、兼顾多方利益的特点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当事人的青睐，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商事争端解决方式。2019年8月7日，包括中国、美国、印度、韩国等在内的多达46个国家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标志着国际商事调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后

---

<sup>①</sup> 参见陶立峰、周舟：《国际投资争端调解机制的困境与改进——兼评 UNCITRAL〈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载《海峡法学》2024年第3期。

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并认可公约，为商事调解的执行提供充足保证。

事实上，传统的诉讼、仲裁等方式天然会凸显出当事双方强烈的对抗性，一定程度上需要借助法官或仲裁员的权威解决商事争端，很容易造成获得不利结果的一方心生不满，影响商事领域后续合作。此外，国际诉讼涉及大量国际公约以及不同国家的法律适用问题，程序繁琐复杂，平行诉讼的存在使得诉讼成本进一步增加，与商事领域所期待的高效率有着巨大矛盾。而国际仲裁尽管能较好地提高商事争端解决效率，却又存在程序简单、缺乏监督等问题。<sup>①</sup>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事调解可以很好地弥补诉讼、仲裁等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不足，在国际社会上的兴起自然也就不难理解。

在文明联系紧密、多元文化冲突层出不穷的当今世界，坚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以调解的方式统筹好各方利益，以合作共赢为根本出发点，更能符合国际商事争端当事人的心声。国际商事争议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诉讼、仲裁、调解等争议解决机制的融合多元发展，符合法律和法治的发展规律，是大势所趋。<sup>②</sup>

## 2. 中国商事调解的现阶段需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商事领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纠纷和摩擦，需要商事调解及时介入支持，化解矛盾。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成立以来，中国在商事调解领域的探索还不到五十年，尽管已经取得非常喜人的成绩，但仍有较大的进一步发展需求。

第一，需要把握时代脉搏，紧跟商事调解政策与立法趋势，强化行业管理。目前，国家层面尚未推出统一的商事调解法律法规，有关商事调解的规定大多包含在地方性法规及指导性文件当中。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已于2023年9月印发《关于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作用推进诉源治理的意见》，指出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抓前端、治未病，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基础性作用，深入推进诉源治理，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sup>③</sup>今年以来，已有多名

① 参见祁壮：《国际商事调解发展的新趋势与我国的应对》，载《江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43卷第2期。

② 参见黄进：《当前我国国际商事争端治理体系建设的几个问题》，载《澳门法学》2022年第3期。

③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作用推进诉源治理的意见》的通知，载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0/content\\_6908700.htm](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310/content_6908700.htm)。



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商事调解法的议案，强调要加强商事调解顶层设计，推进商事调解统一立法。<sup>①</sup>社会各界需要形成合力，通过行业协会和行政主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保障调解行业健康发展。

第二，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做好与国际接轨的工作。中国于2019年8月作为首批46个签约方之一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与许多国家一道深度参与国际调解事务，为国际商事调解奠定重要基础。<sup>②</sup>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框架下，加强国际商事调解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商事调解的国际影响力，是应然之举。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由于不同法律体系和文化传统的挑战，需要提供适应性更强的调解服务。

第三，需要进一步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商事调解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解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水平，建立健全人才队伍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的重要工作。一名优秀的调解员应当能够有效地识别冲突各方核心利益，综合运用法学、商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积极沟通联络，通过专门调解手段找到争端解决路径，从而达到多方满意的结果。调解过程存在大量不确定性因素，因此也对调解员的能力有着较高的标准要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建立了一整套调解员选任和培训体系，全面覆盖内陆地区、港澳台以及海外各界人士，为调解员队伍建设提供有力保证，但总的来说，调解员整体素质水平还有待提升。

第四，需要推广商事调解理念，增强社会认可程度。尽管商事调解这一争端解决方式越来越受到当事人的关注和青睐，诉讼等传统争端解决方式仍然占据主流地位。许多当事人对商事调解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顾虑，对商事调解的认识程度还有待深化，有必要在商业领域培育优秀调解文化，鼓励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商事争端。

第五，需要促进商事调解服务升级。商事活动类型繁多，千差万别，涉及贸易、投资、知识产权、房地产、物流、金融证券、保险等多个行业领域知识，这就要求商事调解服务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作出相应调整，以更好地满足当事人需求。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如何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探索在线调解、电子化办案等方式，降低费用、简化程序，提高商事调解的便捷性，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sup>①</sup> 参见朱宁宁：《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商事调解统一立法》，载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404/t20240416\\_436458.html](http://www.npc.gov.cn/c2/c30834/202404/t20240416_436458.html)。

<sup>②</sup> 参见杜军：《我国国际商事调解法治化的思考》，载《法律适用》2021年第1期。

第六，需要优化商事调解服务与仲裁、诉讼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衔接。从系统的角度对争端解决方式进行思考，可以发现商事调解虽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存在固有局限，无法解决所有商事纠纷。在某些特定情况中，当事人可能始终争执不下，以至于调解案件不得不通过仲裁或诉讼程序解决，由于不同程序参与人员众多、文件繁琐，衔接优化显得格外重要。

## （二）新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及其内容

鉴于上述背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规则》（简称《调解规则》）、《调解员守则》《授予调解员资格规定》《调解员行为考察规定》以及《调解员培训规定》进行修订，覆盖内容广泛，修订力度巨大。

### 1. 《调解规则》

新修订的《调解规则》于2024年7月1日正式发布并施行，《调解规则》共三章，分别为总则、调解程序以及调解与其他程序的衔接，为调解提供一套全面、详细且操作性强的指导原则，有助于确保调解过程的公正、高效和专业。同时，该规则也考虑到与现有法律体系的匹配问题，以及调解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充分体现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在争议解决领域的专业性和前瞻性。

《调解规则》第一章总则共有七条，确立了调解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为具体工作的进行提供整体框架指导，也为具体调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指引方向。

首先，在明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相关信息方面，涵盖其设立年限、规范名称以及机构属性等关键内容。着重强调该调解中心作为非营利性的常设争议解决机构，其独立公正的特性是保障调解公平性的基石，同时详细阐释了制定本规则的目的，为调解工作的开展赋予清晰的目标导向。此外对调解中心可受理的案件类型，进行了广泛且细致的界定。其中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等各类不同主体之间产生的民商事、海事争议等多样化范畴，尤其指出可受理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议这一在国际商事纠纷中具有代表性且常见的类型，这种广泛的受理范围充分彰显了调解中心在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的重要地位和国际化特质，使其能够应对复杂多元的国际经济纠纷。



其次，在规则适用情形方面，明确了通常情况下为默认适用这一重要原则。即除非当事人之间另行达成特殊约定，一旦将争议提交至调解中心进行调解，便确凿无疑地视为同意遵循这些规则开展调解。同时，对向调解中心提交争议这一行为作出了详尽阐释，通过明确具体的操作含义和流程，此举不仅有助于简化调解程序，消除不必要的程序繁琐性，而且能够有效避免因理解不一致而产生的歧义，保障调解工作在清晰的规则框架内顺利推进。

再次，关于调解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这是整个调解规则的核心价值所在。调解工作以充分遵循当事人自愿为首要且不可动摇的前提，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意愿是调解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源泉。在这一基础上，紧密结合国家法律法规、国际通行惯例以及行业特定规范开展调解工作，确保调解过程有法可依、有理可循。调解工作着重于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这一目标不仅仅是解决当前争议，更是为了修复双方关系，实现双方利益的平衡与共赢。在整个调解过程中，积极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将调解工作视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调解不仅仅是解决个别纠纷，更是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商业环境的健康发展，通过化解矛盾、减少冲突，为社会创造积极向上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最后，该规则表明调解中心可接受其他机构的邀请、委托或者与之联合开展调解工作，这种积极开放的合作模式体现出调解中心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包容的发展心态。通过与国际社会众多机构携手合作，充分整合各方资源、优势互补，为调解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共同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商事纠纷，展现出其致力于为调解事业积极贡献力量的坚定决心和社会责任担当。

《调解规则》第二章为调解程序，详细地说明调解程序是如何启动、进行和结束的，条理清晰，逻辑清楚。

在调解的申请与受理方面，围绕着调解案件的申请与受理提出明确要求。在申请与受理环节，当事人申请调解需提交《调解申请书》、证据材料、身份证明文件等，委托代理人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申请手续完备时调解中心予以受理，受理后根据情况向当事人发送通知书并附随《调解规则》等文件。被申请人需在规定时间内回复调解意愿，可申请延期，也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意思表示。材料原则上一式三份，可提交电子化材料。此外，当事人需缴纳调解费用，未预缴经催告仍未预缴的，调解中心可继续、中止或终止调解程序。



在调解员的确定方面,对调解员的基本产生方式和其他特殊情形作出细致规定。调解员的确定方面,除非另有约定,调解通常由一名调解员进行,当事人应在规定时间内选定或委托指定调解员,逾期未选则由调解中心代为指定。当事人可在调解名册之外选定调解员,但需经确认。至于调解员的产生方式则充分考虑各种提名情况,综合多种因素,调解员也需及时披露可能影响公正性的情形,当事人可提出异议要求更换调解员,调解员无法履行职责时可能会重新选定或指定。

在调解的进行方面,详细展现了调解程序是如何有条不紊向前推动的。在调解进行阶段,调解会议日期经各方协商确定,原则上在一定期限内完成,特殊情况可延期。调解方式多样,调解员无权强加解决办法。调解地点通常在调解中心所在地,特殊情况可在其他地点。调解以中文为默认调解语言,也可根据情况确定其他语言。规定还特别要求调解的保密性,以保证各方当事人信息不被泄露。

《调解规则》第三章围绕调解与其他程序的衔接展开。在调解与其他程序的衔接方面,和解协议可申请司法确认或依据其提起仲裁、申请公证。调解与其他程序相对独立,当事人和调解员在其他程序中有相应义务。调解中心和调解员有一定豁免权,调解中的陈述意见不得用于侵权之诉,调解程序与其他法律程序相对独立,同时对电子传输、规则解释和施行等也作出了规定。此外,《调解规则》第38条规定了规则的解释问题,一方面强调条文标题不用于解释条文含义,避免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另一方面强调规则由调解中心负责解释,体现权威性。

## 2. 《调解员守则》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守则》(简称《调解员守则》)共计十三条,是调解员的行为指导方针,从调解员角度为调解的公正性、专业性和保密性保驾护航。

《调解员守则》明确了适用人员范围为取得该调解中心调解员资格的人员。在具体规定上,首先强调调解员应秉持公正中立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依据事实进行客观判断。其次,要求严格按照程序规则如《调解规则》等办理案件。在调解态度方面,要求调解员需审慎对待案件,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并积极高效推进调解程序。此外,保密性是重要要求,调解员接触到当事人隐私信息,必须做好保密工作,这既是规定也是职业道德体现。对于可能出现的调解员在调解前就实体问题向当事人提供咨询的情况,有特别的回避规定,需立即披露,除非各方当事人同意否则一



律回避，以解决私下接触问题。对于调解员在其他程序中的义务作出说明，与《调解规则》相关条款一致。最后，规定解释权和生效日期，与《调解规则》相同。

### 3.《授予调解员资格规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授予调解员资格规定》（简称《授予调解员资格规定》）共有十六条，为调解员资格授予提供清晰明确的指南，意义重大。

该规定对调解员资格有原则性要求，调解员需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基础上，拥有较高道德水平和专业能力。对于中国籍调解员，规定了六种具体情形，对职称和工作年限要求严格，体现出调解中心对其专业素养的高度重视。外籍和港澳台人士申请成为调解员，在满足中国籍调解员条件的基础上需增加推荐要求。

同时，对调解员申请年龄和个人品行也有规范。为确保调解员熟悉规则，特别规定了培训要求。申请时需提交特定材料，且有明确的授予资格基本流程。此外，为保障调解员权益，向调解员提供了资格被取消或未续期时的知情权。并且，为维护当事人利益和提高调解效率，即便调解员资格未延续或已取消，在特定情况下仍可能继续组织调解，保证调解的连贯性。

### 4.《调解员行为考察规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行为考察规定》（简称《调解员行为考察规定》）共计十五条，是在《调解员守则》基础上对调解员行为的进一步具体规范。

《调解员行为考察规定》有着明确的制定目的和依据。该规定强调调解员需严格遵守《调解员守则》和本规定。调解员应不断学习以提升专业和法律知识，与《调解员培训规定》相衔接。对于披露方面，要求调解员主动进行书面披露，与《调解规则》相关条款一致。调解员需填写《调解员声明》，其中列举了六种不宜接受选定或指定的情形，为其自我评估提供指导。在调解程序开始前，调解员要确保各方当事人知晓并同意特定内容，以保证调解程序完整及结果被认可。同时，强调意思自治原则且调解内容应合法。调解结束后，调解员需及时提交书面结案报告以便统一管理。对调解员被投诉的情况给予申辩机会，避免不公正对待。规定了对调解员的处罚措施，包括批评、警告乃至取消资格。还列举了调解中心有权取消调解员资格的八种情形，要求调解员需勤勉尽责。

### 5. 《调解员培训规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培训规定》（简称《调解员培训规定》）对调解员培训工作提出要求，共有十三条。

《调解员培训规定》有着明确的制定依据和目的。该规定提出调解员培训的原则为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能力且应训尽训。培训分为资格培训与调解能力培训两类，初次申请调解员资格一般应参加资格培训。培训方式灵活多样，线上线下结合且可与其他机构合作，充分考虑调解员实务需求。调解员培训实行学时制并有相应的学时计算方法，调解中心会记录培训情况供查询。同时，规定强调了满足培训学时的重要性，如不满足可能影响调解员资格续期。

### （三）新修订的商事调解规则的亮点

在本次商事调解规则的修订中，中国贸促会商事调解中心结合实务需求，紧跟时代潮流，对各类规定逐字逐句进行研讨，在许多方面有精彩亮点，极大地促进了调解事业的发展。

#### 1. 框架结构优化

新修订的规则重塑调解规则架构，强化调解机制协同性，“调解与其他程序的衔接”独立成章，凭借清晰章节布局与精准标题设置，清晰勾勒调解在多元纠纷解决生态中的角色，为当事人提供系统指引，促进调解与诉讼、仲裁等程序无缝对接，提升整体解纷效率与协同性，使调解在纠纷解决前期介入、分流与后期执行保障等环节的功能得以强化，完善商事纠纷解决路径网络。

#### 2. 大幅度降低调解费用彰显调解低成本优势

根据修订后的规则，案件调解费的收取比例大幅降低，例如，对于 100001 元至 200000 元的标的，此前需要收取 8000 元加上争议金额 10 万元以上部分的 4%，而现在仅需收取争议金额的 2%，即至多不超过 4000 元，大大降低了当事人参与调解的门槛。此外，为了满足不同当事人的需求，规则还提供了按时间计算报酬的案件调解费收取方式供当事人选择。这种灵活性收费标准的引入，使得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调解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调解费用支付方式。这样的设计体现了调解服务的人性化和个性化，有助于提升当事人的调解体验。

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重构收费架构，设固定低额案件登记费，降低调解准入门槛，减轻当事人初期负担，提升调解启动意愿，改变以往依标的额高额收费模式，消除当事人成本顾虑，增强调解在纠纷解决方式选择中的竞争力，吸引更多商事主体选择调解。

另一方面，精准校准调解收费标准，多档递减收费比例，确保调解成本随标的额增长合理控制，整体低于诉讼、仲裁费用，突出调解经济实惠性。创新双轨计费模式，兼顾标的金额与调解时长因素，适配不同案件类型与当事人需求，提升收费合理性与灵活性，优化调解成本效益结构。

### 3. 扩大调解受案范围

随着商事活动日益频繁，商事争端类型多样化的趋势越发明显，为满足当事人需求，尽可能将商事争端案件纳入调解受案范围，《调解规则》第2条新增规定，可受理投资者与东道国或地区因投资产生的争议，符合近年来投资争议多发的现实情况，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公正、高效的解决争议平台，有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促进了东道国或地区的投资环境的改善和优化。此外，《调解规则》第7条明确列举了部分其他争议解决机构如使领馆、商协会等，有助于加强国际的合作与交流，更好地解决国际商事争端。

新修订的规则拓展受案范围，契合商事纠纷新态势，积极回应国际投资与经贸合作需求，率先将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议纳入受案范围，填补国内调解空白，为跨境投资纠纷提供非对抗性解决途径，助力稳定国际投资环境。深度融入诉调对接、调仲结合进程，接纳外部机构委派委托案件，整合解纷资源，凸显调解在多元纠纷化解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增强纠纷解决的综合性与灵活性，适应复杂商事争议解决需求。

### 4. 简化调解启动程序

为了进一步提升调解的效率和便捷性，本次对调解规则的修订特别关注了调解启动程序的简化。具体来说，《调解规则》第10条新增的规定，如果被申请人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愿意参与调解程序，那么这种行为将被视为对调解的同意。这样的规定有效地减少了调解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繁文缛节，特别是书面告知程序的复杂性。

在以往的调解程序中，往往需要通过一系列书面文件来正式通知被申请人参与调解，不仅增加了调解的时间成本，也可能因为程序的繁琐而导致一些当事人对调解失去耐心或兴趣。新规则的实施，使得只要被申请人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了其参与调解的意愿，比如主动与调解员联系、参与调解会议等，可以直接进入调解程序，无需再进行额外的书面告知。简化的启动程序不仅提高了调解的效率，也使得调解过程更加人性化，更易于被当事人接受。它减少了当事人在调解开始阶段的负担，使得他们能够更快地进入调解的核心环节，即解决争议本身。此外，这也有助于提升调解的成功率，因为当事人能够更加迅速地参与到调解过程中，减少了因程序复杂而产生的抵触情绪。

#### 5. 明确国际调解相关概念构建与《新加坡调解公约》衔接机制

为进一步和国际商事调解前沿发展接轨，满足我国签署《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后的需要，新规则明确了国际调解相关概念构建，并设计出有效的与《新加坡调解公约》衔接机制。例如，《调解规则》第30条强调了当事人可根据《新加坡调解公约》成员国相关法律规定申请强制执行或救济，有利于形成调解保障。此外，新规则还突出了该公约对于调解“友好”属性的强调，引入了该公约中商事调解的概念，以及“调解员无权将解决争议的办法强加于当事人”等类似的表述。<sup>①</sup>

#### 6. 提高调解员授予资格条件覆盖更多调解员从业领域

为了进一步提升调解工作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确保调解员队伍的素质和能力能够满足日益复杂多变的调解需求，本次新规则将原来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聘任管理办法》修改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授予调解员资格规定》，在多个方面进行了调整和优化。规定明确要求申请人必须具备至少十年的相关工作经验，确保调解员具备足够的实践积累和专业背景，能够在处理复杂案件时展现出更高的专业水准。除了传统的贸易、法律等领域，新规则还将科技、金融、建设工程等新兴关键行业纳入调解员资格授予范围。这一举措旨在吸引

---

<sup>①</sup> 参见张维：《让商事调解更具吸引力》，载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https://www.moj.gov.cn/pub/sfbgw/fzgz/fzgzzgflfwx/fzgzmcyjcz/202407/t20240705\\_501880.html](https://www.moj.gov.cn/pub/sfbgw/fzgz/fzgzzgflfwx/fzgzmcyjcz/202407/t20240705_501880.html)。





更多领域的优秀专业人才加入调解员队伍，以满足不同行业调解需求的多样性。新规则还加强了对调解员的监督管理，确保调解员在履行职责时能够遵守职业道德，公正无私地进行调解工作。

对调解员产生规则的细化，依不同调解人数情境确定提名、指定流程，多维度考量确定因素，引入严格利益披露机制，全方位保障调解中立公正。赋予当事人充分自主权利，简化异议处理程序实现调解员快速更换，强化当事人在调解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增强调解公信力与当事人信任度。

### 7. 加强对调解员的中立性要求

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的中立性是确保调解结果公正性的关键因素。中立性意味着调解员在处理纠纷时不偏袒任何一方，能够客观地听取双方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公正的调解方案。本次新规则修订明确提出对调解员的中立性的要求。

《调解规则》的第18条和第19条明确规定了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应遵守的中立性原则，要求调解员必须避免任何可能影响其中立性的行为。同时，《调解员行为考察规定》的第4条和第5条进一步明确了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必须披露的潜在利益冲突，以及未披露这些信息可能带来的后果。此外，《授予调解员资格规定》的第13条还特别强调了违反中立性原则的严重性。如果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违反了中立性原则，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们可能会面临调解员资格被取消的处罚。这一规定是对调解员行为的有力约束，确保他们能够严格遵守中立性原则，维护调解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 （四）借鉴国际经验与接轨实践

新修订的规则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切实做到与国际商事调解实践接轨：

### 1. 融合国际调解价值理念

在调解的核心价值层面，新修订规则深度汲取《新加坡调解公约》精髓，将“友好”属性全方位、深层次地融入规则的每一处细节。从规则制定的宗旨出发，摒弃传统的单一效率导向，转而将和谐、自愿、非强制等理念贯穿于整个调解流程。这不仅重塑了我国商事调解的文化内涵，使其与国际调解的主流价值取向实现深度契合，更在国际舞台上大幅提升了我国调解的形象与认可度，有力地推动了商事调

解文化的国际化交流与融合，为我国在全球商事调解领域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与尊重。

## 2. 校准国际调解交流术语

术语规范方面，新修订规则积极引入国际通行的专业术语，其中将“和解协议”作为调解成果的标准表述具有关键意义。以往我国调解规则中使用的“调解协议”在国际语境下易引发混淆，因为国际上通常将经调解达成的协议称为“和解协议（Settlement Agreement）”，而“调解协议”一般指双方同意开展调解的协议（Agreement to Mediate）。此次修订纠正了这一术语偏差，消除了国际交流中的语义障碍。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外调解规则术语的互通互认，显著提升了我国调解规则在国际上的理解度与通用性。国际商事主体在参与我国调解程序时，能够更加清晰地理解规则要求，从而切实增强了我国调解在国际规则网络中的嵌入深度与广度。

## 3. 强化调解协议公约执行机制

执行与救济机制是调解规则的关键环节，新修订规则紧密贴合《新加坡调解公约》在此方面的要求，精心构建国内配套规则通道。明确将公约作为和解协议执行的重要法律依据，彻底填补了国内与国际调解协议执行过程中的衔接缝隙。在以往的实践中，由于国内规则与国际公约缺乏有效对接，导致部分调解协议在国际执行层面面临困境。此次修订后，我国调解协议的国际执行力与保障力得到显著提升，国际商事调解成果能够更加高效地落地实施。这不仅为国际商事主体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纠纷解决保障，也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在国际调解合作中的履约能力与信誉，彰显了我国在国际法治建设中的积极担当与作为。

## 4. 提升调解程序国际水准

在程序细节优化方面，新修订规则广泛参照联合国贸法会、国际商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权威机构的成熟规则。在当事人意愿尊重方面，进一步细化当事人在调解全过程中的自主权利，从调解的启动、调解员的选择到调解方案的协商等环节，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表达与决策参与权。在维护调解人的中立性上，新增严格的披露义务条款，要求调解员不仅要披露可能影响调解独立性、公正

性、中立性的因素，还要参照国际先进规则，披露可能影响争议结果的个人利益、职业利益、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等情形，确保调解过程的公正无私。

### （五）首创性贡献

新修订的规则注重进行制度创新，在以下方面作出一定的首创性贡献：

#### 1. 案件受理范围的拓展

在受案范围上实现重大突破，开创性地将投资者与东道国或地区的投资争议纳入调解中心受理范畴。此创新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商事调解的空白，为投资者与东道国提供了非对抗性、高效灵活的争议解决新途径，有助于维护国际投资秩序稳定，促进国际投资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 2. 联合调解体系的开创性架构

在联合调解领域独辟蹊径，突破传统合作边界，将使领馆、商协会等多元主体纳入联合调解体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调解合作网络。借助使领馆外交资源与商协会行业影响力，精准挖掘纠纷解决需求，高效整合调解力量，拓展调解服务触角，创新国际国内商事调解合作模式，为全球联合调解实践提供中国样本。

#### 3. 调解计费模式的创新性变革

立足国情与商事调解实践，创新案件调解费计费模式，兼顾争议标的经济价值与调解服务时间成本，提供定制化计费方案，填补国际调解收费模式空白。此模式精准适配我国商事主体多样性需求，平衡调解机构运营成本与当事人负担，提升调解服务性价比，为全球调解收费制度创新贡献中国智慧，引领调解经济可行性探索方向。

## 第五章 新加坡调解公约五年观察（2019–2024）

《新加坡调解公约》自 2019 年开放签署以来，作为国际商事争端解决领域的一项重要法律创新，迅速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并获得广泛响应。公约的诞生不仅填补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跨境执行的法律空白，还为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深化法律合作、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在全球商事环境日益复杂的当下，《公约》凭借其独特的制度设计与显著的实践效果，已然成为国际法律框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对《新加坡调解公约》五年发展历程的深入观察，本文通过梳理其在签署、批准与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成就与面临挑战，从全球视角到中国视角、由宏观到微观，全面剖析《公约》的实践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本章节静态分析《公约》的核心条款与国际影响力，同时动态评估其全球推广与区域适用的实践成效。在此基础上，本报告进一步探讨《新加坡调解公约》对全球争端解决机制的深远影响，并从我国视角提出参与和推动该公约发展的战略建议。

### 一、《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静态观察

#### （一）《新加坡调解公约》概述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下文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是联合国推动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通过，2019 年 8 月 7 日在新加坡开放签署，适用于当事人为解决商事争议而订立的，通过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International Mediated Settlement Agreements—IMSA）。《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国际和解协议提供了一个统一、高效的框架，这类似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下文简称《纽约公约》）为仲裁裁决提供的框架。《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了关于援用和解协议的权利以及执行和解协议的统一法律框架，是一部便利国际贸易的文书，有利于调解成为解决贸易争端的有效

替代方法。<sup>①</sup>《新加坡调解公约》作为一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预计将增加国际调解框架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sup>②</sup>

## 1.《公约》签署背景介绍

### （1）国际贸易与跨境争议的增加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际贸易活动和跨境商业交往日益频繁。全球商品进出口贸易额从 2000 年的约 6.5 万亿美元增长到了 2020 年的近 18 万亿美元，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更复杂的跨境商业关系与潜在争议风险。

首先，跨境商业活动和投资量均有增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 2020》，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额等指数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增长，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增长尤为明显。随着企业在不同国家进行更多的投资和商业扩展，发生争议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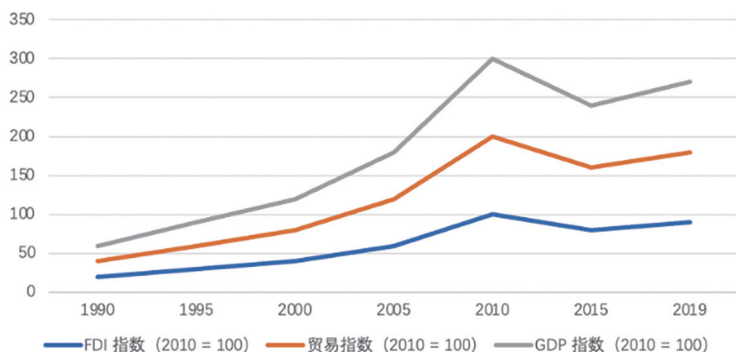


图 5-1 1990-2019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额、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额发展趋势<sup>③</sup>

<sup>①</sup>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2018).

<sup>②</sup>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2018).

<sup>③</sup> 参见《世界投资报告 2020》，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官网，<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investment-report-2020>。



其次，全球供应链性质越发复杂。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几十年来，随着国际分工的精细化，价值链与供应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为许多新兴国家提供了早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机会，为人类带来巨大经济福利。然而，供应链环节越多，涉及的地理规模越大，风险越大。<sup>①</sup>全球供应链的扩张使得跨国公司在多个国家之间进行生产和分销，也增加了潜在的商业纠纷。

再次，法律体系与文化差异引发的争议增加。在国际贸易争议不断增加的同时，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加剧了跨境争议的复杂性。合同法、知识产权法、金融法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不同，可能导致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对合同的解释、执行等方面产生分歧；同样，在跨境交易中，文化、商业习惯的差异也是导致争议产生的重要因素。

最后，跨境贸易争议案件有所增长。如上所述，在法律体系与文化差异的背景下，贸易量的增加和贸易关系的改变使得跨境争议纠纷的数量不断增长，难度逐渐增大，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的需求也随之增加。纠纷解决机构的增加与机制的创新迫在眉睫。以仲裁为例，多个国际仲裁机构的统计数据表明，国际商事仲裁案件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ICC）报告称其仲裁案件的数量持续上升。2020年，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受理了946起新仲裁案件，这是自201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sup>②</sup>此外，根据世界银行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的报告，跨境投资争议也在逐步增加。自1972年到新冠疫情来临的2019年，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处理的案件数量总体大幅增长，<sup>③</sup>尤其是与政府有关的争议，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纠纷的解决方式却略显单一。

---

① 参见李瑜敏、刘云啸、刘民权：《全球供应链外部风险及其对策研究综述》，载《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6期。

② See ICC Announces Record 2020 Caseloads in Arbitration and ADR,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https://iccwbo.org/news-publications/news/icc-announces-record-2020-caseloads-in-arbitration-and-adr/>.

③ See The ICSID Caseload — Statistics: Issue 2022–1,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https://icsid.worldbank.org/resources/publications/icsid-caseload-stat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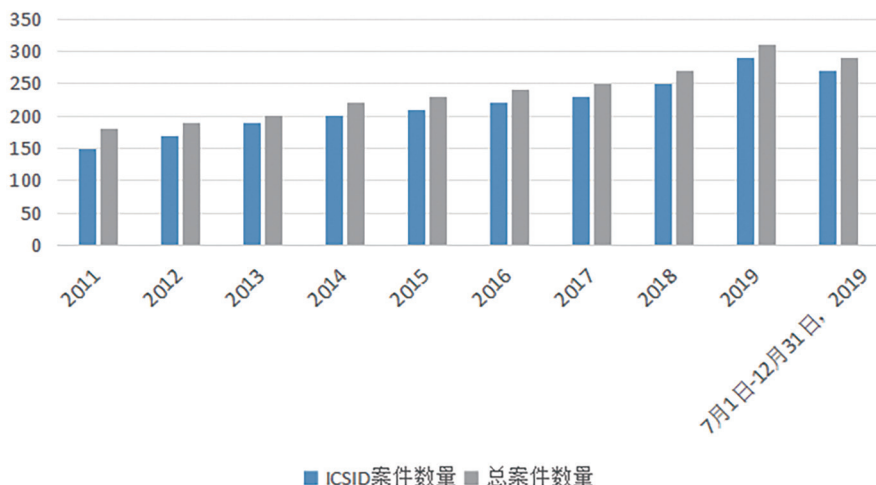


图 5-2 世界银行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秘书处管理的在 ICSID 规则下的案件数量与总案件数量（包括在非 ICSID 规则下的案件）

全球化带来的跨境商业活动增加、全球供应体系复杂化，以及国家地域间法律和文化的差异都是国际贸易争端增加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各国对调解、仲裁等国际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创新、完善的需求，构成了《新加坡调解公约》产生的背景之一。

## （2）调解的优势明显

调解的优势在于：其一，灵活性，节省时间和成本；其二，保密性，此过程中披露的任何信息都将保密且都不能作为证据；其三，自主性，不同于第三方裁判，当事人对调解的过程和结果拥有完全的控制权，调解结果及解决方案有机会使双方都能满意；其四，非对抗性，当事人在纠纷解决后继续保持商业关系的概率更高；其五，效率性，调解过程高效，且当事人双方自愿遵守调解结果的概率较高。根据《国际争议解决调查：2020 年最终报告》（“SIDRA 调查”），与仲裁和诉讼用户相比，更多的调解用户对调解程序的速度和费用感到更加满意，在选择国际商事调解时，超过 80% 的用户表示公正和中立、速度和保密性是影响他们选择国际商事调解的绝对关键或重要的因素。但是，国际商事调解用户对可执行性的评价不高，这反映出当时国际认可的快速执行机制的缺乏。而《新加坡调解公约》为和解协议提供了快速的执行机制，这可能会吸引因重视可执行性而选择诉讼或仲裁的当

事人。<sup>①</sup>如前文所述，调解作为一种解决跨境争议的方法，相较于诉讼和仲裁，具有成本低、效率高和灵活性强的优势，因此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青睐。然而，由于跨境和解协议在各国的法律地位存在差异，它们在执行过程中常常遭遇难题。

### （3）国际调解统一框架的缺乏

在《新加坡调解公约》签署以前，调解虽被作为解决国际间商业纠纷的重要手段，但囿于不同国家对于和解协议的承认和执行法律框架各不相同，一些国家可能需要将和解协议重新转换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这个过程产生的不确定性使得当事人往往最终转入仲裁或诉讼以求争议的完全解决。国际调解中产生的和解协议的既判力和执行力问题成为了阻碍调解发挥作用的绊脚石。相比之下，在《纽约公约》的引领下，仲裁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执行机制。在《纽约公约》批准后，在 172 个缔约国中，大多数国家都通过了《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并于 2006 年通过了修正案，作为支持《纽约公约》实施的仲裁监管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国际仲裁的影响力显著提升。如同境外仲裁裁决享有《纽约公约》的执行框架、境外法院判决享有《选择法院协议公约》（Hagu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的执行框架一样，《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起草实为必要。

### （4）各国对国际调解潜力的普遍共识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在推动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意识到调解的重要性，负责起草并推动了《新加坡调解公约》，其成员国积极参与了这一公约的讨论和起草。谈判各方对调解在解决商事纠纷中的巨大潜力具有普遍共识，这是让《新加坡调解公约》谈判进程在短短 4 年内达成的重要原因。<sup>②</sup>此外，新加坡作为全球重要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也在积极推动这一公约的签署与实施。新加坡政府与联合国合作，举办了公约的签署仪式，在国内配套立

---

<sup>①</sup> See SIDRA Survey 2020,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Academy, <https://sidra.smu.edu.sg/research-program/appropriate-dispute-resolution-empirical-research/sidra-survey-2020>.

<sup>②</sup> 参见江保国：《〈新加坡调解公约〉下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载《国际法研究》2024 年第 3 期。

法与制度上也作出了诸多努力，表明了其对国际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视。<sup>①</sup>

## 2.《公约》核心条款解析

《新加坡调解公约》由序言和 16 个条文组成。根据内容、性质与功能的不同，可将公约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背景和动因。序言介绍了国际商事调解发展的背景、现状和本公约的目的，强调了国际和解协议框架的价值。第二，公约的适用范围。公约第 1 条从国际性、商事性、调解性三个层面对和解协议范围进行了界定。而第 2 条则是对第 1 条有关概念的界定，其实质仍然是对公约适用范围的补充。第三，和解协议的执行。公约第 3 条规定了当事人的执行义务，各缔约国须执行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确保协议在各国司法体系中的有效性；公约第 4 条、第 5 条、第 6 条分别规定了执行和解协议有关的程序及要求（包括执行的申请、抗辩、拒绝与平行请求）。第四，公约与其他法律、条约的关系。公约第 7 条明确了《新加坡调解公约》与其他国际法律文书及国内法律的关系，赋予了当事人选择更有利法律或条约的权利。第五，保留条款及其他程序性条款。公约第 8 至 16 条主要规定了缔约国参与本制度的有关事项，以及公约本身的生效、修订程序。

### （1）第 1 条：适用范围

公约主要从三个层面对适用《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和解协议范围进行了界定，即国际性、商事性和独立性（或调解性）。

第一，国际性。《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1 条第 1 款对“国际性”的判断标准为：当和解协议的当事方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或和解协议的履行地点或标的物涉及不同国家，或和解协议中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跨国性时，此争议涉及的主体、客体、法律事实中的一个或多个要素中就包含了外国因素，此协议便成为公约所称的具有“国际性”的和解协议。<sup>②</sup>《新加坡调解公约》未沿袭《纽约公约》的规定，将“调解地”或“申请执行地”作为和解协议具有国际性的判断因素。这是因为与

---

<sup>①</sup> See Alexander Nadja & Chong Shouyu, *Leading the Way for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ated Settlement Agreements: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Act*, 34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Journal 1 (2022).

<sup>②</sup> 参见刘敬东：《新加坡调解公约批准与实施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国际仲裁相比，国际调解的进行更为灵活，常常涉及到多个法域，其地点通常不受调解机构所在地的限制，因此在实践中常出现难以确定调解地的情况。例如，在调解进行时，争议双方当事人位于两个不同法域，调解员来自第三国，调解适用第四国法律等复杂情况。尤其在网络调解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确定“调解地”将十分困难。<sup>①</sup>

第二，商事性。公约第1条第2款明确排除了消费者保护、婚姻家庭、继承和劳动法等领域的协议。公约并未采取正面方式对“商事性”进行界定，而是用反面列举排除的方式界定了此概念。其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在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基于商业关系产生的法律纠纷大多均可被认定为商事纠纷，对“商事”一词的解释多采用广义解释，公约沿用了这一扩大解释的路径；其次，国家间对“商事性”的认定标准各不相同，为了避免对国际调解广泛适用产生阻力，公约没有进一步地限定商事性这一概念，而是以负面清单的形式对“商事性”进行限定，这借鉴了一些国际公约、国家或区域的立法手段<sup>②</sup>；最后，涉及消费者保护、婚姻家庭、继承和劳动法领域的争议一般受地域文化、习俗影响较大，难以达成共识，不宜纳入统一的管理、执行框架，而应尊重各国各地方文化差异，因地制宜。此外，《新加坡调解公约》并未将政府主体排除在外，而是以第8条关于保留的规定赋予缔约国政府选择的权利，以期尽可能的将各种国际商业关系纳入调解的框架。

第三，独立性或调解性。公约第1条第3款将法院判决和仲裁程序中产生的和解协议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避免了与《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纽约公约》等国际公约发生竞合或冲突的问题。具体而言，该款有以下几点需要进行解释。首先，公约排除的是法院、仲裁机构所作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和解协议。在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的时间范围内，可能产生两种类型的和解协议：一种是能够作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执行的，即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和解协议；另一种则是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和解协议，可以适用本公约。例如，法官与仲裁员可能与担任调解人的第三人

<sup>①</sup> 参见陆一戈：《〈新加坡调解公约〉框架下的国际和解协议执行及我国回应》，载《经贸法律评论》2022年第4期。

<sup>②</sup> 参见许军珂：《〈新加坡调解公约〉框架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效力问题研究》，载《商事仲裁与调解》2022年第3期。



一道参与调解过程，也有可能单独协助当事人友好解决纠纷，这两种情况都应该属于公约的调整范围，不应仅仅因为法官或仲裁员的参与而将产生的和解协议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换言之，在司法程序或调解程序中达成的和解协议，要根据其能否作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得到执行而区别对待。若能够，则不适用《新加坡调解公约》；若双方在诉讼程序中，在法官或仲裁员的协助下达成庭外和解，一方撤诉或撤回仲裁申请，便可以适用《新加坡调解公约》。<sup>①</sup>其次，“可在该法院所在国作为判决执行的协议；已记录在案并可作为仲裁裁决执行的协议”指的是执行的可能性而非结果。<sup>②</sup>若指的是和解协议确定能够被执行的这一结果，那么将导致程序间广泛的冲突。

## （2）第2条：定义

本条对第1条第1款出现的三个概念进行了定义，与第1条的解释与适用密不可分，二者实为一体。

公约第2条第1款分别讨论了一方当事人有多个营业地或没有营业地时其营业地的确定办法，即与争议关系最密切地标准和惯常居住地标准。在公约的制定过程中，部分国家（如法国）代表认为“营业地”已经是一个在商法实践过程中被广泛接受并分别定义的概念，其应当由一国的主管机关来确定，对“营业地”加以定义将超过公约的调整范围。但是工作组最终认为，公约应当对“营业地”加以规定以便更好地为各方当事人提供指导和依据。<sup>③</sup>

公约第2条第2款规定了对书面形式的要求和电子通信“功能等同原则”。首先，公约对书面形式有所要求。在公约的制定过程中，工作组参考了《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31条的规定：裁决应以书面形式做出，并由一名或数名仲裁员签字；裁决应当说明其依据的理由；裁决应明确其日期和地点。<sup>④</sup>但是与示范法相比，本条款更为简洁，其并未规定书面形式的具体要求，而是将此部分交给公约其他条款

① 参见佟尧、王国华：《〈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调解制度》，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34页。

② 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第六十七届会议秘书处的说明》，第14段

③ 参见刘敬东：《新加坡调解公约批准与实施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3页。

④ Se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Secretariat Note for the Sixty-Third Session of Working Group II, [https://uncitral.un.org/en/working\\_groups/2](https://uncitral.un.org/en/working_groups/2).

规定，如公约第4条（详见下述对于第4条的分析）。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本条的书面形式要求更具灵活性，进而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其次，电子通信功能等同原则（也称为“功能对等原则”）是指在法律和政策框架中，电子通信所实现的功能，应当与传统通信手段所实现的功能具有相同的法律效果和地位。这一原则的核心在于，无论信息是通过何种方式传递（电子或纸质），只要此方式在功能上相同，就应当受到相同的法律保护和认可。同样的，该条仅仅是原则上的规定，并未详细具体规定电子通信的形式要求，而将此部分交给了本公约第4条第2款进行详细规定（详见下述对于第4条的分析）。

公约第2条第3款规定，调解指“由一名或者几名第三人（调解员）协助，在其无权对争议当事人强加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当事人设法友好解决其争议的过程”。公约强调了调解的第三人协作特征，排除了当事人私自协商达成的和解协议的适用。具体而言，“调解”应当满足以下特征：调解需在调解员的协助下进行；调解员无权强制解决争议（区别于判决和仲裁）；调解的具体称呼和具体过程并无硬性要求；调解是当事人友好解决其争议的过程。关于公约所指的调解，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不论是机构调解亦或是个人调解，都属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范围，公约对调解的认定更具灵活性。但是公约并未对调解机构和调解个人的资质做出严格限制。一方面，国际商事纠纷的调解可能性因此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某些缺乏专业资质和专业能力的调解员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其次，调解应当秉持自愿、合法、公正等调解基本原则。从调解的效力角度来看，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之所以具备直接申请执行的条件，主要在于调解的自愿性、合法性、客观性和公正性。<sup>①</sup>

### （3）第3条：一般原则

本条规定了和解协议执行的一般原则与在非执行程序中中对和解协议进行援引的一般原则。

第一，“直接执行机制”。公约的执行仅需对和解协议进行形式审查，只有在当事人提出请求时才根据其请求范围对协议进行有限的实质性审查。与此相对应的

---

<sup>①</sup> 参见孙长龙：《论〈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完善及其在中国的适用》，载《国际商务研究》2020年第5期。

是“审查机制”，指公约的执行需要先行经过和解协议相关法院或仲裁机构对协议进行审查，以确保其符合法律规定、公共政策及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进而才能够另一国寻求执行。直接执行机制强调执行协议的效率与当事人的自主性，审查机制则注重保障法律的实质公平公正，防止潜在的权益侵害。在公约的起草过程中，各国围绕各种和解协议执行机制展开了讨论，并最终因其便捷高效选择了直接执行机制。直接执行机制优点在于执行程序简化和审查目标明确，和解协议在他国得到执行仍须满足如和解协议中的义务是否可以在申请执行国执行、调解过程是否程序正当等一系列要求；如采用审查机制，则和解协议执行须经执行地主管机关的认证，这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确定负责审查的主管机关及获得认证的程序，进而可能导致协议执行程序繁琐、效率降低等后果，难以实现公约的目的。<sup>①</sup>

第二，在其他程序中援引和解协议。公约第3条第2款明确了当事人可在非执行程序中援用和解协议。例如，一方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就某事项提出主张，另一方可依据此条款主张该事项已经由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得到解决。此外，应当注意，本款仅仅对在不主张和解协议执行的各种其他程序中援引和解协议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而并未具体规定援用和解协议的条件和法律效果。

#### （4）第4条：对援引和解协议的要求

本条规定了当事人援用和解协议的几项要求。公约第4条第1款规定了当事人欲援用和解协议应当出具的材料。根据该条规定，一份可以被援用并执行的和解协议首先需要当事人各方的署名，表明该和解协议是基于自愿原则签订的。其次，则是要证明该和解协议产生于调解程序。公约列举了三项优先的证据：调解员在和解协议上的签名；或调解员签署的表明进行了调解的文件；或调解过程管理机构的证明。当没有此三项证据时，当事人可以提交能够证明的其他证据。与《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sup>②</sup>第31条相比，公约对于和解协议的要求更具有灵活性：其一，和解协议并不一定要求调解员的签名，但仲裁裁决则必须要求仲裁员的签名赋予其可执行性；其二，证明该和解协议产生于调解程序的证据是多样的，而仲裁裁决的证明

<sup>①</sup> 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第六十二届会议秘书处的说明》，第50、52段。

<sup>②</sup> See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https://uncitral.un.org/zh/texts/arbitration/modellaw/commercial\\_arbitration](https://uncitral.un.org/zh/texts/arbitration/modellaw/commercial_arbitration).

标准具有唯一性，即裁决本身；其三，可执行的和解协议书面形式包括电子通信记录；其四，和解协议的产生并不需要先决条件，即当事人不需要签订一份进入调解程序的同意书才能进行调解，仅仅通过调解后的签字便可以赋予和解协议合法性基础。但是在仲裁程序中，当事人必须以书面的仲裁协议为先决条件，没有事先的书面协议形成的仲裁裁决并不具有合法性基础。<sup>①</sup>公约第4条第2款再次明确了当事人可以使用电子以及其他通信手段满足和解协议的书面形式要求。

#### （5）第5条：拒绝准予救济的理由

公约第5条第1款、第2款规定了主管机关依当事人申请拒绝进行救济和主管机关依职权审查拒绝进行救济的理由。

依据公约规定，当事人的抗辩事由有如下几种。

第一，因当事人缺乏行为能力而拒绝。此规定基本上与《纽约公约》一致，二者的不同在于是否指明了判断行为能力的准据法。《纽约公约》明确指出当事人行为能力的判断依据是对当事人适用的法律或仲裁地法律<sup>②</sup>，而《新加坡调解公约》并未指明相关的准据法。

第二，因和解协议存在问题。当存在以下三种情形时，申请人可据此请求主管机关拒绝执行和解协议。其一，国际和解协议无效、失效或者无法履行。公约特别阐明了判断国际和解协议无效、失效或者无法履行的准据法。在判断和解协议是否属于此种情形时，首先应当根据当事人有效约定的和解协议管辖法律来确定，采用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原则。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公约要求该选择为“有效”的选择，这说明被申请执行和解协议的主管机关可以根据应适用的强制法律和公共政策对当事人各方在有关和解协议中作出的法律选择的有效性作出评价，但联合国工作组并未明确“失效”的具体含义。<sup>③</sup>其次，当没有约定管辖法律时，该主管机关仍可认定应予适用的法律无效、失效、无法履行。其二，国际和解协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在程序法上也并非处于终局地位。需要注意的是，国际协议当下不具有约束

<sup>①</sup> 参见佟尧、王国华：《〈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调解制度》，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46页。

<sup>②</sup> Se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Article 5, 1(a).

<sup>③</sup> 参见张文亮、李雨芳：《〈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执行和审查机制研究》，载《经贸法律评论》2021年第5期。

力或终局性，并不意味着调解被排除出纠纷的最后解决途径。工作组最终保留此情形是为了确保只有最终的和解协议能够被执行。其三，国际和解协议随后被修改。这种情形包括和解协议被当事人的修改和在没有当事人参与的情况下被修改。

第三，因和解协议中的义务已经履行或者不清楚或者无法理解。对于国际和解协议中义务已被履行的情形，虽然此条略显多余，但公约为了增加确定性，仍在此申明缔约国此时可以拒绝该协议的执行；和解协议中的义务“不清楚或者无法理解”这一标准过于模糊，可能会赋予主管机关过大的裁量权，这需要裁量者在实践过程中的审慎司法。值得注意的是，公约将此标准限制在和解协议中的义务而非和解协议全部。

第四，因准予救济将有悖和解协议条款。当出现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违背和解协议宗旨这一特殊情况，如双方当事人调解后无意执行协议中的义务，主管机关得以依当事人申请拒绝救济。

第五，因调解员违反调解员或调解准则，或调解员未履行披露义务。公约第5条第1款第(e)(f)项规定了与调解员行为相关的抗辩理由。首先，根据(e)项，若被申请执行人能够证明调解员严重违反对其应适用的调解准则，且若无此种违反则当事人不会达成和解协议，则可拒绝执行相关和解协议。关于调解员应当遵守什么准则，《新加坡调解公约》本身没有提供标准，因为国际公约是难以对调解员制定资质标准的。<sup>①</sup>其次，根据(f)项，若调解员未进行应有披露，即“未向各方当事人披露可能对调解员公正性或者独立性产生正当怀疑的情形，并且此种未予披露对一方当事人有实质性影响或者不当影响，且若非此种未予披露，该当事人本不会订立和解协议”时，主管机关可以依申请拒绝救济。本条文规定了一个独立的判断标准，此标准强调，该披露义务的违反可能会导致对调解员公正、独立性产生正当怀疑，并会对一方当事人造成实质性影响这一“严重后果”，排除了轻微义务的违反。但是，因为调解的秘密性，该抗辩事由可能在实践中难以证明。

公约第5条第2款规定，公约当事方主管机关如果认定“准予救济将违反公约该当事方的公共政策；或者根据公约该当事方的法律，争议事项无法以调解方式解

---

<sup>①</sup> 参见温先涛：《〈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商事调解——与〈纽约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相比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



决”，也可拒绝准予救济。考虑到国际调解可能涉及公共利益，为促成各国加入，该条规定的拒绝事由均由和解协议执行国主管机关主动审查，包含以下两项。其一，关于违反公共政策的问题。公共政策所维护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是一个涉及时间和地域的概念，在现代多元化的开放社会，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更有极大的不确定性。<sup>①</sup>由于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差异，不同国家可能对公共政策的内涵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其公共政策的内涵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基于此，工作组将对“公共政策”的定义权交给了公约当事方自行认定。其二，关于争议无法以调解方式解决的问题。该条文主要参照了《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a）项，赋予了执行国依广义上的公共政策对调解范围进行限制的权力。

#### （6）第8条：保留

公约第8条对保留相关事项做出了规定。第1款规定了公约允许的两种保留方式；第2款否定了第一款外的其他保留方式，使公约有一个较为稳定的适用框架；第3款规定了缔约国可以随时做出保留；第4款规定了保留书及其确认书的交付对象；第5款规定了保留的撤回。

关于保留的方式，公约第8条第1款规定了两种保留，分别可简称为“政府机构保留”和“明示保留”。第一，政府机构保留，即缔约国可以声明涉及本国或本国政府机关的国际调解协议不适用本公约。在公约起草过程中，工作组认为，给缔约方一定空间，使其可以根据需要在某些特别情况下做出保留，这是必要的。为缔约方提供更加灵活的法律适用空间将吸引更多国家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但是，有观点认为，作出“政府机构保留”可能意义不大。从道义而言，即便是政府机构作为一方的商事纠纷，经过调解达成协议，各方当然应该履行，政府因具有公信力，比一般商事主体更应信守承诺。第二，明示保留，即缔约国可以声明当事人能否对公约的适用与否做出选择。工作组在确定此机制时，考虑到调解的灵活性和非正式性，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让他们明确要适用哪些条款并明确和解协议达成的后果。此外，做出明示保留还可能达到以下合理目的：控制案件数量，未作出明确表

---

<sup>①</sup> 参见温先涛：《〈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商事调解——与〈纽约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相比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



示的和解协议不能适用公约；提升公约地位，适用《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和解协议必须将此公约的适用作为必备条款；减少当事人信息的不对称，即明确了和解协议达成的后果。<sup>①</sup>

## （二）《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影响力

### 1. 《公约》对国际商事调解地位提升的推动作用

在《新加坡调解公约》之前，国际上虽然已有一些调解相关的法律框架，如《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和《国际投资争端调解准则》，但缺乏一个统一的、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国际法律文书。《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填补了这一部分的立法空白，成为国际商事调解领域的重要里程碑。公约为国际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提供了一个统一、高效的国际规则框架，以确保国际和解协议能够根据精简的程序获得直接执行力。<sup>②</sup>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生效显著地提高了国际商事调解的地位。首先，该公约跨时代地建立了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机制，它的产生在机制上填补了调解能够成为一项有效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方式的缺失环节——和解协议的既判力与执行力问题，使得国际调解机制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新加坡调解公约》规定，各国法院应承认和执行依据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除非出现公约规定的有限的拒绝执行的情形，例如协议无效、当事人未能达成真实和解、与公共政策相悖等。在此之前，和解协议在部分国家仅具备合同效力，并不具备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因此在跨国范围内的执行不得不依赖于各国的国内法，而各国法律体系不同，对于和解协议定位的不同，给国际商事主体造成了极大的不便。通过该公约，和解协议在各缔约国之间可以如国际仲裁裁决一样得到承认和执行，极大增强了调解的可行性和和解协议的执行力。其次，基于上述机制的建立，调解因其与仲裁、诉讼的互补性，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吸引力大大提高。尽管仲裁和诉讼仍然是

<sup>①</sup> 参见杨秉勋：《再论〈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载《北京仲裁》2020年第1期。

<sup>②</sup> 参见王涵：《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范围探析，载《国际商务研究》2023年第4期。[procedurallaw.cn/info/1013/5331.htm](http://procedurallaw.cn/info/1013/5331.htm)，2023年11月21日访问。

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主要方式，但调解可以作为这些机制的有力补充，<sup>①</sup>《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生效也极大增强了国际商事调解的吸引力，其灵活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以避免复杂的法律程序和跨国诉讼费用。若在仲裁或诉讼前适用调解，双方可以通过协商解决部分甚至全部争议，从而大幅缩短程序并降低成本。此外，在调解的过程中，其非对抗性的协商状态往往给当事人双方留有余地，进而可能在争议解决或未决的同时恢复或保持商业合作关系；而在诉讼或仲裁中，双方当事人往往处于对抗状态，判决结果往往导致一方失去商业合作的机会。

## 2. 《公约》与其他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制度的协调

《新加坡调解公约》作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重要工具，与《选择法院协议公约》<sup>②</sup>和《纽约公约》等其他国际商事纠纷解决制度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法律框架，服务于日益复杂的跨境商事活动。这些公约各自侧重于调解、法院裁决和仲裁裁决的不同争议解决方式，但在核心法理上始终坚持当事人自治原则，同时通过制度设计体现了对程序公正性与执行公平性的高度重视。它们不仅独立发展，在具体实践中更展现出高度的协调与互补，提供了一套兼具灵活性与强制力的综合争议解决方案。《新加坡调解公约》填补了国际商事调解和解协议跨境承认与执行的法律空白，通过简化执行程序 and 提供法律保障，极大地推动了调解这一柔性解决方式的普及。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则通过明确选择法院协议的管辖权和执行机制，为国际商事争议提供了司法层面的强制性支持。《纽约公约》自1958年生效以来，作为国际仲裁裁决执行的基石，其规范化的执行机制确保了仲裁作为终局性争议解决手段的全球适用性。三者的协调发展，为当事人在国际商事活动中提供了从协商调解到司法解决的全流程法律保障。

### （1）《新加坡调解公约》与《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良性互动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作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框架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侧重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但在很多方面展现出了相互协

<sup>①</sup> See SIDRA Survey 2020,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Academy, <https://sidra.smu.edu.sg/research-program/appropriate-dispute-resolution-empirical-research/sidra-survey-2020>.

<sup>②</sup> See Hagu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June 30, 2005, 44 I.L.M. 1294 (2005).

作与互补的特点。《新加坡调解公约》旨在为国际商事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提供跨境承认与执行的法律保障，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则致力于规范跨境选择法院协议的承认与执行。在全球化和跨境交易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在商事争议日益复杂的今天，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协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适用范围的对比中，虽然两者的适用对象存在差异，但它们同样关注解决跨境商事争议。根据《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3条，选择法院协议指的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某一法院为解决争议的法院，该协议必须得到承认与执行。<sup>①</sup>这为国际商事争议提供了稳定的法律框架，确保法院能够按照当事人选择的法院管辖权进行裁决，从而保证了国际商事交易中的可预测性与安全性。而《新加坡调解公约》第1条则规定其适用范围仅限于“由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明确排除了家庭、继承等非商事领域的和解协议。因此，《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应用对象明确锁定在国际商事领域，强调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可以跨境执行。尽管两者的适用对象有所不同，但它们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功能却是相辅相成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通过确保法院管辖权的确定性与执行力来为当事人提供法律保障，而《新加坡调解公约》则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更加灵活、低成本的争议解决途径，通过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则为国际争议的解决提供了平滑的过渡路径。

在执行程序上，两部公约均体现了对跨境执行的高度重视，但方法有所不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9条规定，选择法院协议达成后，法院必须承认并执行根据该协议作出的裁决，且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情形也仅限于公约第9条规定的几种情形，包括协议本身无效、协议不符合公约要求、裁决违反公共政策等。该条款的设定使得各国法院在执行选择法院协议时具有较为明确的法律依据。<sup>②</sup>相比之下，《新加坡调解公约》第3条则强调，调解和解协议的执行应当依照公约及缔约国国内程序进行，并简化了和解协议的执行流程，减少了可能产生的司法障碍。这使得和解协议相比于法院裁决来说，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便捷性。两者的执行程序虽然有所不同，但都为跨境争议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保障。《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在第9条列出了几种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情形。这些拒绝执行的理由包括：选择法院协议无

<sup>①</sup> See Hagu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 3, June 30, 2005, 44 I.L.M. 1294 (2005).

<sup>②</sup> See Hague Convention on Choice of Court Agreements art. 9, June 30, 2005, 44 I.L.M. 1294 (2005).

效、协议不符合公约规定、裁决违反公共政策等。这些拒绝执行的条款体现了对各国法律主权的尊重，也确保了国际商事裁决的合法性与公正性。与此相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第5条同样列出了拒绝执行的理由，包括和解协议无效、调解程序不符合法定要求、和解协议违反公共政策等。尽管两部公约的拒绝执行理由有所不同，但共同的原则在于，它们均不允许任何超出国际公约界限的当事人或裁决行为影响跨境执行的合法性。特别是公共政策的条款，二者的共同规定有助于确保执行的公平性与正当性。由于调解和解协议通常具有较强的当事人自愿性，拒绝执行的情形在调解公约中设置的更为精细，尤其对调解员的行为和程序公正性做出了明确要求，这使得调解公约在执行上更加注重程序的合规性。

法理分析上，尽管《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所处理的争议解决方式不同，但它们在核心法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当事人自治的原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保障了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争议解决方式的自由选择，确保当事人自主决定将争议提交给某一法院管辖。而《新加坡调解公约》则通过对和解协议的认可，强调了当事人通过调解达成协议的自主权。当事人自治的原则是现代国际商事法的重要基石，推动了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方式的多元化和灵活化。此外，二者也都强调公共政策的适用，以避免不正当的协议或裁决强制执行，这一设定体现了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基本法理，即确保跨境执行不会损害任何一国的法律秩序和基本法治。

两者的互动关系不仅表现在它们各自独立存在的基础上，还体现在它们相互补充、协同发展方面。实际案例中，许多国际商事争议在经历了法院管辖问题的确认后，可能会进入调解阶段，若通过调解达成了和解协议，则《新加坡调解公约》便提供了执行这些协议的法律框架。在这一过程中，《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框架提供了争议的司法管辖和裁决执行基础，而《新加坡调解公约》则为和解协议的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多样化的争议解决途径，使得《新加坡调解公约》与《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两者的互补性使得跨境争议解决方式更加高效、灵活。

## （2）《新加坡调解公约》与《纽约公约》的协调发展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纽约公约》作为国际争议解决机制的重要部分，分别确立了调解与仲裁在国际商事领域的执行框架。虽然两者的适用范围和法律逻辑不



同，但在执行程序、拒绝执行的理由、公共政策的限制以及当事人自治的保护上，具有明显的联系和互补性。

从适用范围来看，《纽约公约》第1条规定，其适用对象为“根据仲裁协议作出的外国仲裁裁决”，包括仲裁庭所作出的最终裁决以及某些仲裁机构的裁定。<sup>①</sup>而《新加坡调解公约》第1条明确指出，其适用范围是“由调解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且明确排除了涉及个人、家庭、继承或就业等非商事领域的和解协议。这一条款体现了两者在争议解决机制中的不同侧重。《纽约公约》服务于以强制力保障终局性的仲裁结果，而《新加坡调解公约》则试图通过柔性的和解协议降低当事人对争议解决过程中对抗性的依赖。两者共同作用于国际争议的不同阶段和层次，为当事人提供更灵活的选择。

执行程序的差异体现了两部公约在法律功能上的不同。《纽约公约》第3条规定，“各缔约国应按照其国内法对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并使之可执行”，即仲裁裁决的执行主要依赖法院的强制力。而《新加坡调解公约》第3条则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按照本公约和本国程序，直接执行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并赋予和解协议法律上的执行力。这一差异体现了两种争议解决机制的核心特点：仲裁裁决以强制性为核心，其结果须具有约束力；而调解以当事人之间的协商为基础，其执行的合法性主要依赖双方对协议的自愿履行意愿。《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这一设计使其能够减少国际争议的司法化倾向，进一步推动柔性争议解决机制的普及。

拒绝执行的理由在两部公约中均占据重要地位，《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拒绝承认与执行的理由包括仲裁协议无效、程序不当、裁决超出权限、违反公平正义或公共政策等六种情形。这些理由旨在确保仲裁过程的合法性与结果的正当性。而《新加坡调解公约》第5条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更具针对性的条款，包括和解协议无效、调解员行为不当、协议未履行法定程序等七种情形。例如，《新加坡调解公约》第5条第2款（b）规定，如果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有不当行为并对协议产生重大影响，则该和解协议可被拒绝执行。该条款不仅注重调解员的中立性和程序正义，也表明调解机制虽然柔性，但在关键程序问题上不容妥协。

---

<sup>①</sup> Se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art 1, June 10, 1958, 330 U.N.T.S. 3.

公共政策原则是两部公约中共同涉及的重要限制性规定。《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b）规定，如果仲裁裁决的执行违反执行地的公共政策，法院有权拒绝承认与执行。而《新加坡调解公约》第5条第2款（a）也规定了类似条款，指出如果和解协议的执行明显与公共政策不符，执行申请可以被驳回。两者对公共政策的定义均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体现了对各国主权的尊重。从实践来看，仲裁裁决中涉及公共政策的适用频率相对较低，而调解协议由于当事人自治的高度参与性，其与公共政策的冲突风险可能性更低。对于公共政策原则规定的差异使得两部公约在公共政策条款的适用范围上形成互补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国际争议解决途径的多样化。

法理上，两部公约共同遵循了当事人自治的原则，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纽约公约》强调仲裁裁决的不可撤销性，体现了对仲裁结果的最终性和强制执行力的支持；而《新加坡调解公约》则更注重和解协议在双方协商基础上的自愿性。法理上的差异不仅彰显了调解与仲裁在争议解决文化上的多样性，也为当事人在国际商事活动中提供了更多选择。两部公约在实施效果上的互动也显示了国际法治发展的动态性。《纽约公约》以仲裁裁决的全球流动性为基础，为当事人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而《新加坡调解公约》则通过简化和解协议的执行程序进一步降低了跨境争议解决的成本。随着《新加坡调解公约》覆盖面逐渐扩大，其与《纽约公约》的协同效应将更加显著，和解协议和仲裁裁决的双重保护机制将为国际商事活动提供更高的法律确定性和执行力。

### 3. 《公约》对国际商事调解实践的影响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实施为国际商事调解实践提供了突破性的法律保障，通过赋予和解协议直接执行力，解决了其跨境执行长期缺乏有效机制的问题。公约确立了无需逐案核准的执行机制，并通过明确的形式要求和程序规则，确保协议执行的正当性和灵活性。《新加坡调解公约》不仅降低了国际商事主体的争议解决成本，还提升了调解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体系中的地位，与《纽约公约》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共同构建了完整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框架，为国际经贸活动创造了更高效和友好的法律环境。

#### （1）赋予了和解协议无需逐案核准的强制执行力

《纽约公约》的生效使得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成员国被承认和执行，与其相

比，国际商事调解实践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直接执行力。综观各国，经调解所达成协议的执行不外乎三种，其一为新缔结的合同，这也是多数国家普遍的做法，依据合同进行索赔。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默认进入自动执行阶段，若一方不履行，另一方只能提起新的诉讼或申请仲裁违约，依据诉讼或仲裁达成的生效法律文件寻求执行。这使得和解协议的履行更多的依靠当事双方的信任，一旦一方违约，则信任破裂，极大提高了维权成本；其二为可转换的民事判决；其三为可转换的仲裁裁决，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订带来了突破性的变革。如前文所述，《新加坡调解公约》参照《纽约公约》第3条制定了公约的适用范围及程序性规则，开创性地确定了适用本公约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执行采用直接执行机制，赋予缔约国依据国内法执行协议的自主权。对和解协议约束力和执行力的高度认可，有望使其与《纽约公约》和《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共同成为解决国际商业争端的“三驾马车”，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国际商贸关系，为推动国际经贸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营商环境和更加有利的法治氛围，推动国际商事主体运用调解这一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处理相应的国际商事纠纷，发挥调解节约纠纷解决成本及维护商事主体友好关系的优势。<sup>①</sup>

## （2）确认了调解协议直接执行的形式

由于《新加坡调解公约》采取直接执行机制，所以对协议的执行未设置实质要求，但是为了保证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直接执行的正当性，《新加坡调解公约》对具有执行力的协议提出了相应的形式要求。首先当事人必须是民事行为能力，体现在《新加坡调解公约》第5条第1款中将一方当事人无行为能力作为当事人的可抗辩理由。其次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且一致，这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也是调解制度的核心所在。再次是调解协议要满足完备性和有效性的要件，即指调解协议对当事人有合同约束力，且执行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应当是不能再更改、修改，也不应就一项尚未满足的要件或某一未达到的日期而决定是否执行。最后是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应当满足的国际性、商事性、调解性、书面的要求。

---

<sup>①</sup> 参见文金玲：《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研究，载《商事仲裁与调解》2022年第5期。

除此之外还有调解协议产生于调解的证明要求。<sup>①</sup>双方当事人向主管机关寻求救济时，主管机关应从速审议救济请求，审议的内容就包括该协议产生于调解的证据。参与调解的证据可以有多种呈现形式，第一种证据呈现形式是协议上有调解员的签字，但部分国家的法律认为该方式会增加法律风险而不予提倡；第二种证据呈现形式是调解员另行签署文件证明；第三种证据呈现形式是开具调解机构的证明文件。如果没有以上一种或多种形式的证据，当事人也可通过提交其他可被主管机关接受的证据以供执行之需，此处也充分考虑了商事调解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二、《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全球实践

（一）《新加坡调解公约》加入情况概述

1. 《公约》签署与批准情况概览

自2019年8月7日到2024年10月19日约五年来，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国家共有57个，批准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国家共有14个。斯里兰卡是最近批准该公约的国家。<sup>②</sup>详见表5-1。

表 5-1 公约接受状况概览

国家	注	签署日期	批准、加入、核准、 接受或继承	生效日期
阿富汗		2019 年 08 月 07 日		
亚美尼亚		2019 年 09 月 26 日		
澳大利亚		2021 年 09 月 10 日		
白俄罗斯	(b)	2019 年 08 月 07 日	2020 年 07 月 15 日 (批准)	2021 年 01 月 15 日
贝宁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巴西		2021 年 06 月 04 日		

① 参见江保国：《新加坡调解公约》下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载《国际法研究》2024 年第 3 期。

②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website, <https://www.singaporeconvention.org>.



国家	注	签署日期	批准、加入、核准、 接受或继承	生效日期
文莱 达鲁萨兰国		2019 年 08 月 07 日		
乍得		2019 年 09 月 26 日		
智利		2019 年 08 月 07 日		
中国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哥伦比亚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刚果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刚果 民主共和国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厄瓜多尔		2019 年 09 月 25 日	2020 年 09 月 09 日 (批准)	2021 年 03 月 09 日
斯威士兰		2019 年 08 月 07 日		
斐济		2019 年 08 月 07 日	2020 年 02 月 25 日 (批准)	2020 年 03 月 12 日
加蓬		2019 年 09 月 25 日		
格鲁吉亚	(b), (c)	2019 年 08 月 07 日	2021 年 12 月 29 日 (批准)	2022 年 06 月 29 日
加纳		2020 年 07 月 22 日		
格林纳达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几内亚比绍		2019 年 09 月 26 日		
海地		2019 年 08 月 07 日		
洪都拉斯		2019 年 08 月 07 日	2021 年 09 月 02 日 (批准)	2022 年 03 月 02 日
印度		2019 年 08 月 07 日		
伊朗 (伊斯 兰共和国)	(a)	2019 年 08 月 07 日		
伊拉克		2024 年 04 月 17 日		
以色列		2019 年 08 月 07 日		
牙买加		2019 年 08 月 07 日		
日本	(c)		2023 年 10 月 01 日 (加入)	2024 年 04 月 01 日



国家	注	签署日期	批准、加入、核准、 接受或继承	生效日期
约旦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哈萨克斯坦	(b), (c)	2019 年 08 月 07 日	2022 年 05 月 23 日 (批准)	2022 年 11 月 23 日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2019 年 08 月 07 日		
马来西亚		2019 年 08 月 07 日		
马尔代夫		2019 年 08 月 07 日		
毛里求斯		2019 年 08 月 07 日		
黑山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尼日利亚		2019 年 08 月 07 日	2023 年 11 月 27 日 (批准)	2024 年 05 月 27 日
北马其顿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帕劳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巴拉圭		2019 年 08 月 07 日		
菲律宾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卡塔尔		2019 年 08 月 07 日	2020 年 03 月 12 日 (批准)	2020 年 09 月 12 日
大韩民国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卢旺达		2020 年 01 月 28 日		
萨摩亚		2019 年 08 月 07 日		
沙特阿拉伯	(b)	2019 年 08 月 07 日	2020 年 05 月 05 日 (批准)	2020 年 11 月 05 日
塞尔维亚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塞拉利昂		2019 年 08 月 07 日		
新加坡		2019 年 08 月 07 日	25/02/2020 (批准)	2020 年 09 月 12 日
斯里兰卡		2019 年 08 月 07 日	2024 年 02 月 28 日 (批准)	2024 年 08 月 28 日
东帝汶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土耳其		2019 年 08 月 07 日	2021 年 10 月 11 日 (批准)	2022 年 04 月 11 日
乌干达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国家	注	签署日期	批准、加入、核准、接受或继承	生效日期
乌克兰		2019 年 08 月 07 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023 年 05 月 03 日 (批准)	
美利坚合众国		2019 年 08 月 07 日		
乌拉圭		2019 年 08 月 07 日	2023 年 03 月 28 日 (批准)	2023 年 09 月 28 日
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共和国)		2019 年 08 月 07 日		

注：

(a) 在签署时作出的声明：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谨借此刻签署《联合国关于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的机会，为其对本《公约》条款的“理解”备案，铭记提交本声明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将来可能以不符合本意和原先立场或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内法律法规不一致的方式对下列条款作出解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理解和保留是：

①以本声明的规定为限，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无义务对于其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或者对于凡政府机构或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适用本公约；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适用本公约的前提将是仅以和解协议当事人已商定适用本公约为限；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批准时可选择作出保留；④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根据《公约》的有关规定，保留通过法律法规与各国合作的权利。

(b) 对于其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或者对于任何政府机构或者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在声明规定的限度内，本公约不适用。

(c) 本公约适用，唯需和解协议当事人已同意适用本公约。<sup>①</sup>

①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载 [https://uncitral.un.org/zh/texts/mediation/conventions/international\\_settlement\\_agreements/status](https://uncitral.un.org/zh/texts/mediation/conventions/international_settlement_agreements/status)。

鉴于各国文化背景、社会结构、法律制度和方法的不同，有必要站在不同法域的角度对公约的接受情况进行审视。不同法域的国家可能基于不同的制度架构对国际调解或《新加坡调解公约》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进而导致对公约的不同接受程度。即使不同法域的国家都签署了公约，也会因为法律制度不同而对公约的衔接采取不同形式。因划分标准不一、种类不同，笔者将不同法域的公约签署国按照大陆法系、普通法系进行分类，并在下文对其中的重点国家进行介绍。

### （1）大陆法系国家

截至 2024 年 10 月前的数据显示<sup>①</sup>，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对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态度相对谨慎。<sup>②</sup>而批准生效的大陆法系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或转型国家，如白俄罗斯、格鲁吉亚等。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重视法院诉讼程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可能担心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会妨碍法院立案，从而阻止它们在分析该公约规定的抗辩可用性时考虑调解过程之外的其他证据。例如，在《新加坡调解公约》制定过程中有代表提出，公约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两种类型的“盾牌”：一种是将文件视为帮助法院裁决案件的证据，另一种是阻止法院完全受理诉讼。<sup>③</sup>已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大陆法系国家：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已批准：2021.1.15）、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已批准：2021.3.9）、格鲁吉亚（已批准：2022.6.29）、洪都拉斯（已批准：2022.3.2）、哈萨克斯坦（已批准：2022.11.23）、老挝、黑山、北马其顿、巴拉圭、塞尔维亚、土耳其（已批准：2022.4.11）、乌克兰、乌拉圭（已批准：2023.9.28）、委内瑞拉、日本（已批准：2024.4.1）、韩国。

### （2）普通法系国家

相较于大陆法系国家，在主要的普通法系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

<sup>①</sup>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website, <https://www.singaporeconvention.org>.

<sup>②</sup> University of Ottawa, Alphabetical Index of the Political Entities and Corresponding Legal Systems, <https://www.juriglobe.ca/eng/sys-juri/index-alpha.php>.

<sup>③</sup> See Timothy Schnabel,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A Framework for the Cross Borde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Mediated Settlements*, 1 Pepperdine Dispute Resolution Law Journal 36 (2019).



亚和新西兰等国，调解已经成为了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主要手段。<sup>①</sup>普通法系国家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程度较高，但是批准概率不高。已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普通法系国家一共有八个：澳大利亚、格林纳达、牙买加、帕劳、萨摩亚、斐济、美国、英国。

## 2. 亚太地区加入《公约》情况

从 2019 年至今，《新加坡调解公约》在亚太地区的推广不仅推动了区域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也增强了区域经济的法治保障能力。这一发展为国际调解实践提供了重要经验，同时为未来更多国家的参与创造了良好基础。自 2019 年《新加坡调解公约》开放签署以来，亚太地区在国际商事调解机制中的参与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与差异化。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枢纽和国际商事活动的核心场域，对公约的接受程度与实施进展不仅具有区域特色，更反映出各国在法律制度、经济需求及国际争端解决优先事项上的多重考量。

新加坡作为该公约的发起国之一和积极推动者，率先完成批准程序，并通过立法保障、政策支持和国际调解服务体系的建立，展示了该公约在促进跨境商事调解中的巨大潜力。新加坡凭借新修订的《2020 新加坡调解公约法案》<sup>②</sup>等国内法规，为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奠定了法律基础，巩固了其在亚太地区国际争端解决中的引领地位。而日本于 2024 年正式批准公约，为公约的区域推广注入了新的动力，其对调解机制的认可展现了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寻求平衡的法律智慧。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虽尚未签署公约，但其国内商事争议解决实践已逐步与国际规则接轨，为未来参与公约的可能性提供了前瞻性支持。亚太地区各国在接受和推广《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方面，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通过实际的法律改革与政策调整，为跨境和解协议的执行创造了法律保障条件；另一方面，部分国家仍处于观望或探索阶段，其接受程度受限于本国的法律体系完善程度及调解机制的成熟度。然而，多样化的参与模式并未削弱调解机制的整体发展趋

---

<sup>①</sup> See Stipanowich, Thomas J, The International Evolution of Mediation: A Call for Dialogue and Deliberation, 4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Law Review 1192 (2015).

<sup>②</sup> 参见申琛：《新加坡商事调解制度化及国际化路径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的实施为背景》，载《国际商务研究》2024 年第 2 期。

势，反而在区域内形成了国与国相互学习与交流的契机。总体来看，《新加坡调解公约》在亚太地区的推广与应用，既体现了调解作为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也凸显了区域内各国对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视。未来，随着区域内更多国家的加入与国内立法的完善，该公约有望成为亚太地区促进商事调解普及的重要制度支柱，并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体系的完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 （1）新加坡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衔接

新加坡不仅是《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发起国，还在国际调解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全球贸易和投资向亚太市场倾斜的背景下，新加坡试图将本国打造为亚洲争议解决中心，通过争议解决服务行业带动国内发展。新加坡致力于建立一整套国际可信度高的争议解决服务体系，发展国际商事调解服务和能力以补充国际商事仲裁和诉讼制度的空缺，确保新加坡争议解决服务的商事主体能够选择从调解到仲裁等全方位的程序。如报告第四章所述，为满足跨境国际商事争议各方的需求，促进调解作为争端解决手段的应用，2014年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SIMC）和新加坡国际调解协会（SIMI）相继成立。同时，新加坡政府通过立法和政策支持，为跨境调解营造了有利的法律和实践环境。其中，《2017年调解法案》（Singapore Mediation Act 2017）的颁布，为新加坡商事调解制度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法律框架，使其商事调解实践迈向国际化发展，并为后续牵头制定《新加坡调解公约》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新加坡调解公约》生效后，为配合《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诞生，新加坡于2020年又颁布了一部关于国际调解和解协议的重要立法，即《2020年新加坡调解公约法案》（下文简称《2020年调解法案》），规定了根据该公约执行和解协议的标准，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同时在新加坡生效。<sup>①</sup>该法案为新加坡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提供了国内法基础，不仅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缔约方的国际义务进行了落实，而且对新加坡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进行了衔接。<sup>②</sup>

新加坡通过双轨制路径对《新加坡调解公约》进行了高效衔接，在保留《2017年调解法案》项下救济措施的同时，通过《2020年调解法案》为符合《新加坡调

<sup>①</sup> 参见申琛：《新加坡商事调解制度化及国际化路径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的实施为背景》，载《国际商务研究》2024年第2期。

<sup>②</sup> 参见申琛：《新加坡商事调解制度化及国际化路径研究——以〈新加坡公约〉的实施为背景》，载《国际商务研究》2024年第2期。



解公约》的国际和解协议提供了新的直接救济路径。《2020 年调解法案》第 7 条承认了法案之外和解协议的救济路径，而第 12 条对《2017 年调解法案》进行了修订，使得符合《2017 年调解法案》救济条件的国际和解协议，即便未依据《2020 年调解法案》记录为法院指令，仍可适用《2017 年调解法案》获得救济。双轨制设计并未取代《2017 年调解法案》既有的救济机制或合同救济路径，而是在此基础上，为国际和解协议提供了基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独立救济途径。通过这一路径选择，新加坡为和解协议的当事人构建了一套灵活且全面的救济选择体系，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适用性和效率。

新加坡不仅是《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核心奠基者，其在商事调解实践层面同样可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2019 年，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SIMC）处理了一起涉及多国企业的技术转让争端。双方在调解过程中通过专业的调解员，迅速厘清了各自的立场与需求，最终在两周内达成协议，避免了可能长达数月的诉讼。这一案例展示了调解在跨国商业纠纷中的高效性，<sup>①</sup>也体现了专业机构的作用。新加坡设立的 SIMC 不仅为企业提供调解服务，还举办调解员培训课程，以提高调解员的专业素养，确保调解过程的公正与高效。新加坡政府通过立法支持、政策倡导等措施，推动了调解在国内外的广泛应用。新加坡还积极举办各种国际会议和研讨会，促进调解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 （2）日本商事调解制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融合

日本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大国，拥有悠久的调解历史，其司法实践中长期强调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商事争议。然而，尽管《新加坡调解公约》自 2019 年开放签署以来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关注，日本国内关于是否加入公约的讨论却持续数年。反对加入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对国际和解协议执行方式与国内法律体系协调性的质疑上。因此，日本直到 2024 年 4 月才正式通过《联合国关于调解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实施法》<sup>②</sup>（下文简称《批准法案》）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并于 2024

---

① 深圳市蓝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组织：《新加坡商事调解制度概览》，载《人民调解》2024 年第 1 期。

② Act for Implementation of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Act No. 16 of 2023 (Japan).

年4月1日生效。经过近五年的审慎评估和立法准备，日本正式加入了这一国际框架，为其调解实践的现代化注入了新动力。

为了确保和解协议执行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一致性和高效性，日本在批准公约的同时设立了专门的管辖机制。根据《批准法案》第5条第6款第(iv)项，任何希望执行和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向东京或大阪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该管辖规则适用于以下情形：相关资产或财产位于日本，争议标的在日本，或被申请人的一般住所地位于日本。此外，东京地方法院在2022年10月设立的“商务法庭”（Business Court）专门处理和解协议执行申请，进一步提升了司法效率。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款并非为专属管辖条款，申请人仍可向具有一般管辖权的其他地方法院提起执行请求。

为进一步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和《批准法案》保持一致，日本修订了《替代性争议解决促进法》<sup>①</sup>（Act on Promotion of Use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下文简称“ADR法”），为日本官方调解机构（如日本商事仲裁协会，JCAA）主持的国内调解案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和解协议执行机制。自2024年4月15日起，JCAA对其《商事调解规则》（JCAA Commercial Mediation Rules）<sup>②</sup>进行了部分修订，新增了关于第26条程序的条款，明确当事人、JCAA及调解员在执行和解协议时需要遵循的程序。同时，新版规则新增第12.2条第4款(e)项，允许调解申请中包括申请人关于基于和解协议执行可能性的提议或观点，从而在调解开始时即促进当事人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进行讨论。此外，该规则第27条还规定，当事人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可指定调解员担任仲裁员，并请求将和解协议记录为仲裁裁决形式，使和解协议作为“同意裁决”（consent awards），有可能依据《纽约公约》作为仲裁裁决得到执行。

在司法文化方面，通过调解解决国内商事争议在日本的诉讼实践中十分普遍。日本法官时常积极参与调解过程，与双方当事人探讨和解方案，甚至可能单独与一方进行讨论，以促成和解。日本外务省也指出，《新加坡调解公约》在日本的生效

---

<sup>①</sup> Act on Promotion of Use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 No. 151 of 2024 (Japan Ministry of Justice).

<sup>②</sup> Jap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Commercial Mediation Rules as Effective on April 15, 2024 (2024).

预计将进一步促进调解的应用，而越来越多的大型国际商事争议已经通过日本商事仲裁协会的国际商事调解规则得到解决，这进一步证明了调解机制在日本愈发重要。<sup>①</sup>

从2019年《新加坡调解公约》开放签署到2024年日本正式批准公约的五年间，日本在加入该公约的过程中展现出其特有的审慎态度与制度探索。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日本对国际商事调解规则的深刻思考，也反映了其国内法律与国际公约衔接的复杂性。通过这一时期的广泛讨论与立法准备，日本在承接国际规则的同时，注重维持其调解传统与国内法律的协调性。在批准公约后，通过修订《替代性争议解决促进法》与优化日本商事仲裁协会的调解规则，日本构建了涵盖调解与仲裁多层次的争议解决体系，强化了和解协议的国际执行力。

### （3）印度尼西亚的观望状态

自2019年《新加坡调解公约》开放签署以来，印度尼西亚作为东盟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至今尚未签署或批准该公约。印尼国家仲裁委员会主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表示，印度尼西亚目前没有必要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理由是其内容与《纽约公约》在承认跨境仲裁裁决的功能上具有相似性，只是适用背景从仲裁延展到了调解。<sup>②</sup>他进一步强调，相较于批准公约，更重要的任务是对现有的《1999年第30号法案》(Arbitration and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Law)<sup>③</sup>进行修订，以更好地适应国内外争议解决的实际需求。

早在1981年，印尼便通过第34号总统令(Presidential Decree Number 34 of 1981)加入了《纽约公约》，被视为为国际商业交易营造更友好环境的重要举措。然而，加入时印尼提出了两项保留条款：（1）仅适用于在其他缔约国境内作出的外国仲裁裁决（互惠保留）；（2）仅适用于印尼法律认定为商事法律关系的争议（商事保留）。尽管这一举措为国际仲裁裁决的执行奠定了法律基础，但印尼法院直到

---

① 参见深圳市蓝海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日本商事调解制度概览》，载《人民调解》2023年11期。

② "Konvensi Mediasi Singapura Dinilai Tak Perlu Buru-Buru Diratifikasi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Does Not Need Hastily to Be Ratified]," Hukum Online, <https://www.hukumonline.com/>.

③ See Arbitration and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Law, Law No. 30 of 1999 (Indon).

1999年《1999年第30号法案》颁布后，才逐步将《纽约公约》中的规定付诸实践。<sup>①</sup>

《1999年第30号法案》成为印尼仲裁和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的核心立法，其内容不仅规范了国内与国际仲裁，还规定中央雅加达地方法院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事项享有专属管辖权。然而，对于调解，尽管《1999年第30号法案》要求当事人在达成一致意见后，将协议提交当地地方法院进行登记，但该法案并未明确界定可登记协议的类型是仅限于国内协议还是也包括国际协议。此外，尽管该法案承认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exequatur*），但对登记和解协议的具体程序与意义仍缺乏明确的法律指引。

在这一背景下，印度尼西亚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观望状态可以理解为其对国内现有法律框架与国际新规则之间协调性的深思熟虑。印度尼西亚较早通过《纽约公约》确立了仲裁裁决的跨境执行机制，但对于和解协议的处理仍处于模糊阶段。《新加坡调解公约》的主要贡献在于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提供直接的跨境执行机制，这一点与《纽约公约》的仲裁裁决功能有相似之处。然而，印尼是否需要通过批准公约进一步完善其争议解决体系，尚需结合国内调解实践的发展和对《1999年第30号法案》的修订进行权衡。展望未来，印度尼西亚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观望态度并非完全排斥，而是更多反映了其在国内法律框架与国际规则衔接上的慎重考量。从现行法律看，《1999年第30号法案》虽确立了和解协议登记与执行的基本要求，但在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路径和法律保障方面尚存在诸多模糊之处。若印尼未来能够通过修订该法案或制定补充性立法，进一步明确和解协议的登记程序、执行条件以及跨境适用性，将有助于提升调解作为争议解决方式的法律地位。此外，印尼若能通过区域合作或借鉴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完善其调解制度，也将为其参与《新加坡调解公约》提供更多可能性。<sup>②</sup>

---

① See Ahmad Rifa'i & Dimas Ramadhansyah, Singapore Convention: Should Indonesia Ratify It?, 21 Indone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 (2024).

② See Ahmad Rifa'i & Dimas Ramadhansyah, Singapore Convention: Should Indonesia Ratify It?, 21 Indone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 (2024).

### 3. 欧洲地区加入《公约》情况

#### (1) 白俄罗斯与格鲁吉亚

白俄罗斯于2019年8月7日,即《新加坡调解公约》开放签署之日便签署了该公约,并于2020年7月15日核准公约,显示出了对接受公约的极大热情。为确保国内立法与公约的衔接,白俄罗斯2021年1月6日修订了《调解法》(全称为《白俄罗斯共和国调解法》)<sup>①</sup>。其中第15条集中体现了承认和执行国际和解协议的相关事项,主要是第15条第1款规定的适用公约的和解协议范围,这基本与公约内容形成了一致。为在更加具体的制度层面与公约进行有效衔接,白俄罗斯在2023年7月17日修订的《经济程序法典》<sup>②</sup>中综合了自身相关利益与公约实施要求,规定了一系列配套程序。这主要体现在《经济程序法典》第262条,该条规定了和解协议执行的具体法律程序类型与申请时限,即申请签发和解协议执行令条款;申请执行和解协议的要求与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事由,此两项均体现了公约与国内法律体系的衔接:第一,申请执行和解协议要求申请人不仅提交公约要求的和解协议原件、显示和解协议产生于调解的证据,还需要满足提交“证明对方未在和解协议规定的期限内履行和解协议的证据;确认代理权的授权书;确认缴纳州税的文件”等本国法律的特别要求;第二,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事由不仅包括公约罗列的当事人行为能力缺乏、和解协议存在问题等理由,还包括“执行和解协议将违反白俄罗斯公共秩序”等结合本国法律规定的特殊事由,体现了对公约一般条款的具体化。

格鲁吉亚于2019年8月7日签署,并于2021年12月29日核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并做出了公约第8条款规定的两项保留声明。格鲁吉亚与公约的制度衔接主要体现在其《民事诉讼法》<sup>③</sup>第44章——“根据2019年8月7日联合国《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达成的国际调解和解协议的承认与执行”。该章系统性地对国际和解协议承认和执行的管辖、法律程序、申请和拒绝事

<sup>①</sup> Law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on Mediation, [https://web.boe.legislationline.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0/BEL\\_Law%20on%20Mediation.pdf](https://web.boe.legislationline.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0/BEL_Law%20on%20Mediation.pdf).

<sup>②</sup> Economic Procedural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https://cis-legislation.com/document.fwx?rgn=1817>.

<sup>③</sup> Civil Procedure Code of Georgia, <https://www.matsne.gov.ge/en/document/view/29962?publication=165>.



由进行了规定与归纳。例如，管辖法院为格鲁吉亚最高法院（第 363 条第 1 款）；申请执行和解协议的文件要求（第 363 条第 3 款）；承认和执行国际调解和解协议的判决程序（第 363 条）；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的事由（第 363 条）。同样地，前述立法衔接也是公约实施所必要的框架建构。

## （2）欧盟与公约全球整合困境

在主要经济体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参与程度参差不齐的大背景下，欧盟的缺席尤为引人注目。缺席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不仅与欧盟一贯积极支持国际调解发展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也为公约的全球推广增添了复杂性。作为一个法律整合度高且经济影响力巨大的区域性组织，欧盟的态度不仅直接影响到公约的全球覆盖范围，还对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整合和统一性产生深远影响。欧盟未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形式性”与“实质性”两类障碍。“形式性”障碍主要涉及法律复杂性。从法律层面看，首先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欧盟应以整体身份签署公约，还是允许其成员国单独签署。根据《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规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可以作为整体缔约方签署公约，然而，公约与欧盟现有法律框架，即《2008/52/EC 号指令》（Directive 2008/52/EC）（下文简称“调解指令”）之间可能存在制度冲突。<sup>①</sup>

根据调解指令，跨境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需依当事人的主动请求，经由法院或其他主管机构批准，或转化为正式文书（authentic instrument）后方可生效。而《新加坡调解公约》则默认赋予和解协议在缔约国范围内自动具有法律效力，机制上的差异不仅增加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削弱欧盟法律体系的一致性。此外，欧盟传统上在调解领域倾向于采取软法（soft law）方式，给予成员国较大的灵活性和自由裁量权，《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硬法（hard law）属性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欧盟现有的法律干预模式产生矛盾，法律逻辑上的分歧，使得欧盟在是否签署公约的问题上需要更加谨慎地权衡利弊。尽管如此，形式性障碍并非不可克服。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双轨制路径：对于欧盟内部的跨境调解争议，继续优先适用

---

<sup>①</sup> Directive 2008/5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1 May 2008 on Certain Aspects of Mediation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2008 O.J. (L 136) 3.

“调解指令”的规定；而对于涉及非欧盟国家的争议，或需在欧盟内执行的非欧盟主体和解协议，则适用《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条款。

相比之下，“实质性”障碍更深刻地反映了调解哲学与实践的内在张力。不同欧盟成员国在调解标准、程序和实践上的显著差异，与公约旨在推动的国际调解统一性目标可能存在冲突。调解本质上是一种灵活、高效且低对抗性的争端解决方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减少程序上的复杂性，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协作。然而，《新加坡调解公约》可能引发调解进一步欧盟公众对于商事调解法律化（juridification）的担忧，即和解协议的执行过度依赖正式的法律程序和强制性条款，法律化趋势可能削弱调解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反而让部分成员国对公约持更加审慎甚至排斥的态度。

综上所述，欧盟在是否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问题上，不仅面临法律复杂性与协调成本的形式性障碍，还受到调解法律化与实践分歧等实质性问题的掣肘。这些挑战既是欧盟作为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法律独立性的体现，也是国际条约推广中需要面对的普遍性难题。

## （二）《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实施情况

### 1. 《公约》国际学术研究进展

#### （1）《新加坡调解公约》国际学术研究情况

在研究成果数量方面，根据“Westlaw 数据库”“Heinonline 数据库”“Oxford academic 数据库”等数据库的检索结果，2019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10日期间，以“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为主题，据不完全统计共发表117篇学术作品，其中包括文章（article）96篇，注解（notes）11篇，评论（reviews）7篇，杂项（misc）3篇。<sup>①</sup>

---

<sup>①</sup> 笔者以“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为主题，以“学术期刊”为检索范围，时间范围设定为2019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10日，在“Westlaw”、“Heinonline”、“Oxford academic”等数据库中检索，检索日期为2024年12月15日。由于内容涉及《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学术研究过多，此处只不完全统计了主题是《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学术研究。

## （2）《公约》意义研究

《公约》的意义研究主要聚焦于《公约》对国际调解秩序的作用和国际调解程序的影响。Corinne Montineri 认为《新加坡调解公约》填补了国际和解协议缺乏统一执行机制的空白。公约通过建立明确的法律框架，减少了各国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简化了国际和解协议的执行程序。他指出类似于《纽约公约》在仲裁领域的作用，公约旨在让和解协议享有同样的国际执行效力。公约通过提供直接的执行机制，降低了因跨境执行复杂性引发的法律和商业风险。<sup>①</sup> Mary Walker 和 Lim Tat 认为公约简化了和解协议的执行过程，减少了当事方在执行协议时的程序性障碍。企业不再需要针对每个司法管辖区寻求单独的确认或执行程序，从而节省了时间和成本。而且调解作为一种快速、低成本的争端解决方式，使公约的实施变得更加具备竞争力。他还指出公约通过提供法律保障，使更多企业愿意选择调解作为解决跨境争端的首选方式。<sup>②</sup> Natalie Y. Morris-Sharma 认为公约促进了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公约的制定是多边主义的胜利，体现了各国在国际争端解决领域的合作精神。并且公约为多边规则体系注入了活力，强化了国际社会对基于规则的争端解决方式的信心。公约通过标准化的和解协议执行机制，为其他领域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模板。同时，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会，加入公约的国家可能需要调整其国内法律体系以适应公约要求，从而推动其法律框架的现代化。这为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改革提供了动力，也增强了其法律制度的国际竞争力。<sup>③</sup>

## （3）《公约》适用研究

《公约》的适用研究主要涉及形式要求、适用范围、执行机制、拒绝执行的理由等的研究。第一，形式要求研究。Rajesh Sharma 认为和解协议必须附有以下证

---

<sup>①</sup> See Corinne Montineri,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UNCITRAL)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20 *Cardozo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034 (2019).

<sup>②</sup> See Mary Walker & Lim T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The Third Piece in 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of Dispute Resolution*, 15 *Dispute Resolution International* 157 (2021).

<sup>③</sup> See Natalie Y. Morris-Sharma,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Is Live, and Multilateralism, Alive*, 20 *Cardozo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009 (2019).

明之一：调解员或调解机构的签名；调解过程的记录或调解程序文件；任何其他能够证明协议源自调解程序的材料。同时，和解协议必须以书面形式存在，包括纸质文件和电子形式，而电子形式符合要求的前提是信息可以被存储和后续检索。<sup>①</sup>

Christina G. Hioureas 认为签名是协议生效的重要条件，可以是当事人的签名，也可以是法律代表或调解员的签名。但是签名形式既可以是传统的纸质签名，也可以是通过可靠电子手段确认的电子签名。他还说明提交法院时，和解协议应使用法院的官方语言。如果协议为其他语言，则需要翻译成官方语言。<sup>②</sup>第二，适用范围研究。Clemens Treichl 认为公约适用于通过调解达成的书面和解协议，调解必须是由第三方中立人士（调解员）协助各方争端解决的过程。同时，公约仅限于商业争议，“商业”的具体定义未在公约中明确，但根据惯例解释，商业性通常包括贸易、金融和合同关系等领域。并且和解协议必须具有国际性质，例如当事方的主要营业地在不同国家，或协议履行地与当事方营业地在不同国家。<sup>③</sup>Robert Butlien 认为公约规定了一些特殊类型的和解协议明确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包括家庭事务（如离婚、子女抚养、配偶赡养）、遗产纠纷（如遗嘱执行、遗产分配）、劳动法相关争议（如雇佣关系中的纠纷），这些领域通常涉及较强的国家政策和社会价值观，因此被排除在外。同时还有已经由法院批准或转化为法院判决的和解协议和已经作为仲裁裁决确认的和解协议。这一排除条款是为了避免与其他国际法律工具发生重叠。<sup>④</sup>

第三，执行机制研究。Ionela-Diana Patrasc-Balan 认为公约提供了简化的执行机制，无需通过合同诉讼即可直接请求强制执行，当事方可以在公约缔约国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直接申请执行。而法院或主管机关负责审查协议是否符合公约规定，重点是审查协议的形式要求和证明文件，而非重新审查争端的实体内容。

---

① See Rajesh Sharma,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 A Drone's View*, 12 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269 (2019).

② See Christina G. Hioureas,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A New Way Forward*, 37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19 (2019).

③ See Clemens Treichl,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Towards a Universal Standard for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1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419 (2022).

④ See Robert Butlien,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A Brave New World f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46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87 (2020).

并且明确了电子形式的协议在执行程序中与传统书面形式享有同等地位。<sup>①</sup> Nadja Alexander 指出公约执行需要提供以下任意一种证据：调解员签署的和解协议；调解员单独出具的调解声明；调解机构的认证声明；其他法院接受的证明文件。同时，他认为加入公约意味着自动承认，缔约国必须承认符合条件的国际和解协议，并确保其在本国可以被执行。公约要求缔约国的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直接执行和解协议，而不需要重新审查案件实体。<sup>②</sup>

第四，拒绝执行的理由研究。Cristian Jura 认为有下列理由：当事人无行为能力；协议无效、不可执行、不具有约束力或不明确；调解员违反中立性或未披露可能导致公正性质疑的事实；执行与公共政策或协议条款相违背；争议标的不符合该国法律规定的调解范围。<sup>③</sup> Shouyu Chong 和 Felix Steffek 认为还需要提供书面的和解协议和证明其通过调解达成的证据（如调解员签名或调解机构的声明），以此来证明符合公约的格式和程序要求。同时，已转化为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的和解协议不适用。<sup>④</sup> Chien-Yu Lung 认为调解员的行为也可能导致拒绝执行。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未披露重大利益冲突，涉及调解员未能披露可能引发对其公正性或独立性合理怀疑的情况。此类未披露行为必须对当事方产生“实质性影响”或“不正当影响”，并导致其达成协议。同时，他强调调解员职责的违反并不会自动成为拒绝执行的依据，必须符合上述严格标准。<sup>⑤</sup>

---

① See Ionela-Diana Patrasc-Balan, *Enforcement of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Concluded by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s under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67 *Analele Stiintifice Ale Universitatii Alexandru Ioan Cuza Din Iasi Stiinte Juridice* 171 (2021).

② See Nadja Alexander & Shouyu Chong, *Leading the Way for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ediated Settlement Agreements: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Act 2020*, 34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Journal* 14 (2022).

③ See Cristian Jura,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 Singapore Convention*, 14 *Romanian Arbitration Journal* 19 (2020).

④ See Shouyu Chong & Felix Steffek,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under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ssues in Perspective*, 31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Journal* 459 (2019).

⑤ See Chien-Yu Lung, *Violation of Mediators' Duties as a Ground of Non-Enforcement under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13 *Contemporary Asia Arbitration Journal* 440 (2020).



#### （4）《公约》创新与挑战研究

《公约》的创新与挑战研究主要包括公约的创新、公约的不足等研究。第一，公约的创新。Khory McCormick 和 Sharon S. M. Ong 指出公约采用了功能等效规则，明确电子形式的和解协议与传统书面文件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这一规则借鉴了《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的相关条款。他认为这一设计使得公约更适应现代商业环境，确保电子和解协议在各国具有同等可执行性。<sup>①</sup> Ahdieh Alipour Herisi 和 Wendy Trachte-Huber 认为公约实现了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打破了和解协议执行必须依赖特定国家法律或司法辖区的传统限制。和解协议无须绑定特定“调解所在地”（Seat of Mediation），而是直接基于公约的国际框架。对于跨境或在线调解，公约减少了因选择特定法律体系而产生的潜在争议。因此公约特别适合在线调解、电子和解协议等现代争端解决方式。<sup>②</sup> Suraj Sajnani 指出公约避免与现有法律框架冲突，通过在公约中插入“其他法律或条约条款”的相关条款，明确规定当事方可以选择适用对其最有利的法律框架。并且公约具有灵活的法律适应性。公约通过“选择加入”（opt-in）和“选择退出”（opt-out）机制，使各国在批准公约时有更大的自由度。国家可以声明仅在当事方明确同意时适用公约（opt-in），可以选择默认适用公约，但允许当事方自行排除适用（opt-out）。公约制度的灵活性提高了公约对不同法律体系的吸引力，降低了国际和解协议的实施障碍。<sup>③</sup>

第二，公约的挑战。Ayushi Saumya 指出公约的法律术语具有模糊性。《公约》第5第1款(e)条允许因“调解员严重违反适用标准”而拒绝执行和解协议。然而，公约并未明确规定适用的标准或调解员行为准则。不同国家的法律对调解员的行为要求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导致不一致的解释。同时，第5(1)(f)条提到，如果调

---

① See Khory McCormick & Sharon S. M. Ong,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An Insider's Perspective into the Making of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31 Singapore Academy of Law Journal 540 (2019).

② See Ahdieh Alipour Herisi & Wendy Trachte-Huber, *Aftermath of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and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12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ation 164 (2019).

③ See Suraj Sajnani,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Is This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for Mediation?*, 50 Hong Kong Law Journal 869 (2020).

解员未能披露可能影响其独立性或公正性的情况，且这一疏忽对协议的达成产生实质影响，执行可以被拒绝。这一条款中“正当怀疑”和“实质影响”等用词过于主观，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导致争议。<sup>①</sup> Prerita Bhardwaj 认为公约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缔约国的国内法律，这可能导致在不常用调解的司法管辖区中执行和解协议的难度增加。并且公约不涵盖谈判、不包括混合争端解决机制，公约明确排除了已转化为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的和解协议。这与《纽约公约》涵盖仲裁裁决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公约仅适用于商业争议，不涵盖家庭、遗产、劳动等领域的和解协议。这一限制减少了公约的普遍适用性，可能影响其在实践中的价值。<sup>②</sup>

表 5-2 2019-2024 年度国际商事调解学术活动汇总表

举办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主题	主办方
2024 年 8 月 28 日	2024 新加坡会议周	《新加坡公约》后“一带一路”及 RCEP 区域间的调解实践	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简称“融商中心”）、新加坡调解人专业协会（SMP）
2023 年 8 月 30 日	2023 新加坡会议周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撤销调解和解协议申请的现场制定	新加坡律师协会、新加坡仲裁员协会、新加坡调解人专业协会（SMP）
2022 年 9 月 2 日	2022 新加坡会议周	《新加坡调解公约》讲座	新加坡调解中心（SMC）、新加坡调解人专业协会（SMP）
2021 年 9 月 9 日	2021 新加坡会议周	《新加坡调解公约》效应：ICDR 调解程序的创新及其在亚洲的作用	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争议解决中心（AAA-ICDR）、亚洲个案管理中心（Asia CMC）
2021 年 9 月 8 日	2021 新加坡会议周	《新加坡调解公约》：政府、法院和调解界合作的机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新加坡调解人专业协会（SMP）

<sup>①</sup> See Ayushi Saumya,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A Historic Evolution of the Mediation Landscape*, 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Management & Humanities 943 (2020).

<sup>②</sup> See Prerita Bhardwaj,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3 Jus Corpus Law Journal 971 (2022).

举办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主题	主办方
2021 年 9 月 3 日	第 28 届 UIA 世界调解中心论坛	《新加坡调解公约》 对国际争端的影响	UIA 世界调解中心论坛
2021 年 6 月 10 日	“新加坡公约 作为国际贸易 和商业调解发 展的一个因素” 国际在线论坛	讨论《新加坡公约》 作为执行国际调解 协议的法律机制、其 对商事调解发展的影 响，以及将其落实到 国家立法中的实际问 题	白俄罗斯明斯克调解和谈 判中心、白俄罗斯明斯克 商业调解员协会“商业伙 伴”
2020 年 9 月 17 日	“一带一路： 建设连通性， 实现一带一路 可持续发展” 研讨会	《新加坡调解公约》 与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可持续发展和 投资项目	亚 太 法 律 协 会 (LAWASIA)
2020 年 5 月 27 日	“使用调解作 为争议管理工 具”在线研讨 会	介绍新加坡调解公约 及和讨论有关使用调 解作为商业争议管理 工具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亚太区域中心 (RCAP)、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 员会印度国家协调委 员会 (UNCCI)、Manav Rachna University Centre of Excellence on ADR (CADR)

2019-2024 《新加坡调解公约》国际学术研究研究成果数量分布图

■ 文章 (article) ■ 注解 (notes) ■ 评论 (reviews) ■ 杂项 (mis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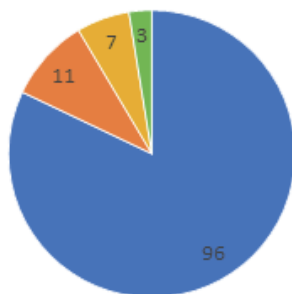


图 5-3 2019-2024 《新加坡调解公约》国际学术研究研究成果数量分布图

### （5）《新加坡调解公约》国际学术会议情况

2019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10日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共举行学术研讨活动9场，列于表2。从活动类型来看，包括讲座、论坛、交流会等多种类型，讲座1场，占比11.11%；论坛6场，占比66.67%；交流会2场，占比22.22%。<sup>①</sup>

2019-2024《新加坡调解公约》国际学术会议活动类型分布图

■ 论坛 ■ 讲座 ■ 交流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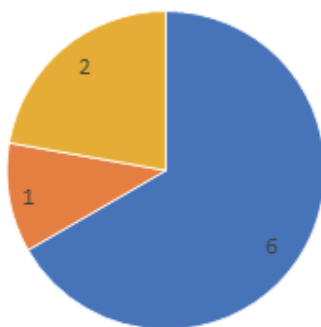


图 5-4 2019-2024《新加坡调解公约》国际学术会议活动类型分布图

## 2. 国际商事调解实践中《公约》适用情况

当前，关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研究，虽然在理论层面已取得较多成果，但在实证研究方面仍显不足。这主要是因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保密性特征，导致可供公开讨论和分析的案例数量较为有限。然而，随着《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开放签署及全球化推广，各国司法实践也逐渐围绕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展开，力图实现该公约的落地与适用。在这一背景下，新加坡与澳大利亚两国的实践为国际商事调解提供了丰富的实务经验：新加坡通过 *Law Chau Loon v Alphire*

<sup>①</sup> 笔者以“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lecture”“forum”为关键词，在“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进行检索，筛选出日期为2019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10日的搜索结果，检索日期为2024年12月15日。由于内容涉及《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学术研究过多，此处只不完全统计了主题是《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学术研究。

*Group Pte Ltd* [2019] SGHC 275<sup>①</sup>案，重点解析了和解协议的有效性与授权问题；澳大利亚则通过 *Bank of China Ltd v Chen* [2022] NSWSC 749<sup>②</sup>案，确认了中国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在普通法体系下的可执行性。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从理论和实践视角，分别展现了《新加坡调解公约》在跨境和解协议执行中的优势和指导作用。

（1）新加坡案例：*Law Chau Loon v Alphire Group Pte Ltd* [2019] SGHC 275

在 *Law Chau Loon v Alphire Group Pte Ltd* 案中，原告 Law 与被告 Alphire Group Pte Ltd（下文简称“Alphire”）因债务纠纷而产生争议。根据此前法院判决，Law 需履行债务偿还义务。然而，Law 与 Alphire 部分投资者经过谈判，于 2019 年 2 月 2 日在新加坡当地达成了一份和解协议，试图替代此前的法院判决内容。协议条款主要包括：Law 现场支付 100 万新元现金，并在后续四期内支付 40 万新元，此外还需无偿转让其所持有的 Alphire 公司股份，并提供公司债务相关信息作为对价。作为交换，投资者一方同意撤销针对 Law 的破产申请。这份协议的核心条款通过 WhatsApp 短信进行了记录，并由投资者将短信发送给 Law 予以确认。然而，协议达成后，Alphire 公司否认该协议的法律效力，提出两点抗辩理由：一是部分投资者无权代表公司签署和解协议，二是协议条款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对此，Law 向新加坡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该和解协议。

新加坡高等法院在审理中重点关注了两个核心法律问题：一是投资者是否具备代表 Alphire 签署和解协议的代理权，二是和解协议本身是否具备法律效力。首先，在代理权问题上，法院认定投资者虽非 Alphire 的正式董事，但其在公司治理与运营中的深度参与构成了隐含的实际权力。法院指出，投资者对公司财务管理、运营决策及盈利状况拥有实质性控制力，董事会在具体事务中对其高度依赖，因此，法律上可推定投资者具备代表公司进行谈判并签署协议的代理权。这一认定不仅回应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5 条第 1 款关于授权问题的拒绝执行条款，同时也为解决国际商事调解中常见的代表权争议提供了明确的法理依据。其次，法院对和解协议的完整性、明确性及法律约束力进行了详细审查，并援引了 *Gay Choon*

---

① *Law Chau Loon v. Alphire Group Pte Ltd*, [2019] SGHC 275 (Sing.).

② *Bank of China Ltd v. Chen*, [2022] NSWSC 749 (Austl.).



*Ing v Loh Sze Ti Terence Peter* [2009] 2 SLR(R) 332<sup>①</sup>案的原则，强调有效和解协议必须具有清晰的对价、具体的履约条款以及建立法律关系的意图。法院进一步指出，WhatsApp 短信的内容与双方谈判中达成的条件高度一致，条款明确且具有可执行性。此外，双方律师在后续通信中确认协议的存在及终局性，成为法院认定和解协议有效的重要佐证。法院最终裁定该和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并准予强制执行。

本案的裁决在国际调解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强调了代理权问题在和解协议执行中的关键作用，明确了隐含实际权力作为授权认定的法理基础；另一方面，法院对电子通信技术的认可，顺应了线上争议解决（ODR）机制的国际趋势，也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第4条关于“书面形式”及电子确认的规定高度契合。此外，该案对和解协议条款的严格审查标准，提供了确保协议可执行性的实务指引，有助于减少履行过程中的法律争议。尽管《新加坡调解公约》未直接适用于本案，但该案的审理过程和裁决结果，充分体现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中的核心问题和解决路径。

#### （2）澳大利亚案例：Bank of China Ltd v Chen [2022] NSWSC 749

在 *Bank of China Ltd v Chen* 案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首次确认了中国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可在澳大利亚根据普通法原则予以执行。这一裁决在跨境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上提供了重要的法理支撑，展示了普通法体系下对外国调解结果的认可机制，也为《新加坡调解公约》后续适用奠定了坚实的国内法基础。

本案的背景涉及中国银行（原告）向一家服装贸易公司发放的两笔商业贷款，被告 Ying Chen 为该贷款提供担保。然而，借款公司未能按时履约偿还贷款本息，中国银行遂向中国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院主持的司法调解程序中，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确认公司需偿还债务本息，而包括 Ying Chen 在内的担保人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对该协议进行了审查，确认其符合中国法律要求，并加盖法院公章，形成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民事调解书。

尽管在中国进行了部分执行程序，但大部分债务未能清偿。中国银行随后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申请承认并执行这两份民事调解书，寻求对被告在澳大利亚的资产进行强制执行。被告提出抗辩，认为中国的民事调解书不符合“判决”

---

<sup>①</sup> Gay Choon Ing v. Loh Sze Ti Terence Peter, [2009] 2 SLR(R) 332 (Sing.).

的定义，不应在澳大利亚执行。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是否构成“判决”应依据澳大利亚法律标准，而非中国法律定义。根据普通法原则，判决需具备终局性、确定性，产生既判力（res judicata）并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法院认定，中国民事调解书经过法院盖章认证，已具备与正式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此外，法院审查了普通法关于外国判决执行的四大要件，即管辖权、终局性、当事人一致性及固定金钱债务。法院确认中国的民事调解书满足上述要件，且被告未能提供公共政策等抗辩理由，因此裁定准予执行。本案虽未直接适用《新加坡调解公约》，但其裁决逻辑与《公约》核心条款高度契合。《公约》第4条和第5条明确了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及拒绝执行的例外标准，而澳大利亚法院通过普通法原则对中国民事调解书进行认定，充分体现了跨境调解结果的可执行性标准。此外，本案也凸显出《公约》框架下和解协议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重要地位，在加强跨境司法合作与保障调解结果方面的现实意义。

### 3.《公约》实施中的现实挑战

#### （1）公约签署国范围的局限性

《新加坡调解公约》自2019年开放签署以来，为推动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框架。然而，截至目前，仅有14个国家完成批准程序，并将其条款纳入国内法律体系当中，美国、英国和印度等主要经济体尚未批准，欧盟及其成员国甚至未签署公约，主要经济体的缺席无疑对公约的国际推广和执行效力产生了消极影响，使《新加坡调解公约》在全球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尚未稳固。

各主要经济体的谨慎态度，并非单纯的技术性拖延，而是源于对公约可能对本国法律体系、经济利益和国际承诺的潜在影响的深度评估。国际条约的批准历来不是单一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博弈过程，特别是在当前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下，国际条约的实施往往需要在多方利益间取得平衡。对于大国而言，是否批准公约更多地与其国际战略和经济政策的考量密切相关。

尽管如此，日本近期的批准无疑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推广注入了新的动力。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加入不仅强化了公约的合法性和国际影响力，还为其他经济大国提供了可能的参考路径。大量日本跨国公司活跃于全球市场，其对调解机制的正式支持可能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产生连锁效应，促使其他国家重新审

视公约的实际价值和战略意义。

批准数量有限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国内法律体系与国际条约之间的衔接问题。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条款纳入国内法的过程，因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而复杂化。普通法国家往往需要围绕现有法院规则制定新的立法，而大陆法系国家通常需要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来实现条约的转化。此外，批准公约还涉及政府的优先事项和资源分配问题，在过去三年，新冠疫情（COVID-19）的长期影响使得许多国家在短期内难以将批准公约列为优先事项。

英国的批准国际公约的进程可以被视为该现象的缩影。英国的法院规则需要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等不同司法辖区内进行协调，而即使地方立法完成，相关法院程序的修订也需提交英国议会审议并通过。此外，即便完成所有程序，英国政府仍需向联合国总部提交批准文书，公约才会在六个月后正式对英国生效。综合来看，《新加坡调解公约》当前在签署与批准范围上的局限性，反映了国际条约在推进全球化适用过程中所需面对的多重考验。这既有各国法律制度协调不力的技术性原因，也有因国际格局多变而产生的政治经济考量。尽管日本的批准为公约提供了正向示范，但未来能否真正推动更多国家加入，仍取决于国际社会在法律协调和利益平衡方面的长期努力。

## （2）签署国经济与法律影响力差异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推广和适用过程展现了全球经济和法律体系的不均衡特征。主要经济体的支持不仅直接影响公约的实际覆盖范围，还间接塑造了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整体格局。大国的参与，尤其是发起国或早期签署国，往往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然而，目前主要经济体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支持力度参差不齐，其背后既有战略利益的考量，也反映了不同国家对调解机制的接受程度及其与本国法律体系的契合性。

以英国为例，其政府明确表态希望成为公约的缔约方，主要目的是巩固其作为国际争端解决中心的地位。英国政府在公众咨询中指出：“现在是英国成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缔约方的适当时机，这将向国际合作伙伴发出明确信号，表明英国致力于维护并加强其作为争端解决中心的地位，同时推动英国繁荣的法律和调解行业的发展。”英国的表态背后的逻辑并非简单的法律义务，而是对国际法领域领导地位的维护，以及对本国法律行业竞争力的提升。英国认为，加入公约不仅能够强化

其作为全球争端解决司法辖区的吸引力，还能维护其在联合国和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等国际法制定场合的传统领导地位。可见，英国的考量更多是基于提升自身国际声誉和经济利益，而非单纯推动公约的普适性。<sup>①</sup>

类似的利益驱动也体现在日本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批准上。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加入不仅增加了公约的分量，还显示出其明确的战略目的。有学者指出，日本之所以批准公约，是因为其认为促进国际商业争端使用调解能够吸引外资，并鼓励日本企业在海外扩展业务。这些目标的实现，不仅可以帮助日本巩固其在国际商业争端解决领域的地位，还可能通过调解机制刺激日本的经济增长。因此，日本的加入不仅是对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一次支持，更是其自身经济发展战略的一部分。<sup>②</sup>

尽管主要经济体的参与可能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推广产生重要推动作用，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实际适用仍面临文化和法律层面的多重障碍。一方面，“现状偏好”（status quo bias）可能限制公约的推广效应，例如，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化仍然偏好传统的争端解决方式，如仲裁。在许多法律文化中，仲裁被视为更可靠、更具强制力的争端解决方式，而调解则往往被误解为一种软弱的、缺乏约束力的选择。

另一方面，国际商事调解领域本身也面临内部挑战。例如，调解员尚未形成全球统一的专业标准，和解协议的执行效果仍因地而异。此外，在一些特定地区，文化障碍、对调解员质量的担忧以及对和解协议保密性的疑虑，进一步削弱了公约的吸引力和实际效用。这些因素不仅限制了调解作为一种争端解决方式的普及，也影响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国际适用性。

综上所述，《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全球推广不仅受到法律框架和实施机制的影响，还深刻反映了经济体间利益博弈和法律文化的差异。主要经济体的参与对公约的全球适用性具有关键作用，但这些经济体的战略考量与文化偏好同时也制约了公

---

① See U.K. Gov' t,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2018), <https://www.gov.uk>.

② See Olga Belosludova & Adam J. Weiss, With Japan's Ratification, the Singapore Mediation Convention Gains International Momentum, Paul Hastings (Mar. 20, 2024), [https://www.paulhastings.com/insights/client-alerts/with-japans-ratification-the-singapore-mediation-convention-gains#\\_edn9](https://www.paulhastings.com/insights/client-alerts/with-japans-ratification-the-singapore-mediation-convention-gains#_edn9).

约的扩散与实施。要真正实现公约的全球适用，需要进一步协调各国间的法律体系，推动调解机制的普及，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公约的适用规则。

### （3）法律保留条款的制约性

《新加坡调解公约》作为推动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里程碑性国际条约，其广泛适用性面临着法律保留条款的挑战。第8条的保留机制为缔约国提供了灵活性，允许其针对特定主体或特定情况限制公约的适用。然而，这一灵活性在提升国家接受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公约的全球一致性和实际效力带来了新的制约。

根据第8条的规定，一些缔约国选择在批准公约时作出保留。例如，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均排除了公约对公共机构的适用，而格鲁吉亚和日本更进一步，仅在和解协议中明确同意适用公约的情况下，才将其纳入法律框架。法律保留条款的设置虽然符合公约通过时的灵活性初衷，但实际上也削弱了其对跨国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普适性。具体而言，当要求和解协议当事人明确同意时，这一原则虽然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理念，却可能导致公约在不同国家和司法辖区内的适用效果不均衡。

与《纽约公约》相比，《新加坡调解公约》在保留条款上的差异性值得深思。作为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核心条约，《纽约公约》并未设置类似的保留选项，其执行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高度一致性。相比之下，《新加坡调解公约》的保留机制为国家提供了更大的政策空间，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跨境执行的统一性。此外，这些保留条款还可能引发当事人间的权力失衡。例如，在强势一方的主导下，谈判中可能强制性要求另一方接受不利于其的公约适用安排。在这种情形下，调解不仅违背调解机制本身的平等性原则，也可能损害公约推动商事调解的初衷。相较于直接认可和和解协议效力的机制，保留条款的设置可能为强势当事方提供了规避执行义务的便利条件，进一步削弱公约作为争端解决统一框架的功能。

另一方面，将公共机构排除在公约适用范围之外的保留条款，尤其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机制构成了实质性限制。作为跨国投资争端解决的核心机制之一，ISDS近年来因传统仲裁的高成本和透明度问题而饱受批评。《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引入为调解在该领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契机，旨在通过更灵活、更高效的方式解决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争端。然而，公共机构的广泛参与被视为ISDS机制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排除适用的保留可能直接削弱公约在



该领域的效力，使投资者难以在与国家实体的争端中依赖和解协议实现法律救济。

综上所述，《新加坡调解公约》第8条的保留条款虽然为缔约国提供了灵活性，但其对公约适用的统一性和实际效力造成了多重限制。未来，如何在保持灵活性的同时，优化保留条款的设计与实施，将是公约在国际争端解决体系中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 （4）国内实施机制的多样性对公约统一效力的法律挑战

在全球范围内，《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批准和实施虽然标志着国际商事调解机制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各国在国内实施过程中展现出的多样性也为公约的统一效力带来了严峻挑战。除了部分国家对公约适用范围作出的保留外，已批准公约的国家在执行机制和立法转化上的显著差异，可能会削弱公约的全球适用性，并加剧跨国争端解决过程中的法律不确定性。

首先，以白俄罗斯为例，其国内立法对公约的实施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缩窄。《白俄罗斯调解法》第15条规定，国际和解协议是“通过一项程序达成的协议，该程序允许各方在不具备提出具体解决方案权力的第三方参与下解决争议”。这一规定源自白俄罗斯部长会议2013年12月28日第1150号决议批准的《调解程序规则》，明确禁止调解员主动提出具体解决建议。这一做法不仅与公约更为宽泛的调解定义形成对比，也将调解的实践限制在更为狭窄的范围内，从而排除了许多司法辖区中普遍采用的评估性和指导性调解方法。

其次，在厄瓜多尔，《新加坡调解公约》通过《普通程序通则》（General Organic Code of Processes）被纳入国内法体系，但其执行和解协议的条件则强调协议需符合原产国的正式性要求。《新加坡调解公约》并未对“调解所在地”（mediation seat）作出明确定义，这在跨境调解中可能导致原产国界定的复杂性，加剧国际执行中的法律冲突。同样，尼日利亚通过其授权立法，将公约的适用范围限定为来自同为公约签署国的司法辖区的和解协议，这一做法重新引入了互惠原则，并要求明确调解所在地。厄瓜多尔的规定虽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但也限制了公约作为普遍适用工具的潜力。<sup>①</sup>

---

<sup>①</sup> Código Orgánico General de Procesos [General Organic Code of Processes], <https://www.funcionjudicial.gob.ec/pdf/CODIGO%20ORGANICO%20GENERAL%20DE%20PROCESOS.pdf>.

再看卡塔尔，根据《卡塔尔调解法》第 24 条，和解协议须以书面形式存在，并由各当事人和调解员签署，才能具备执行力。该要求虽增加了协议的正式性，但也可能使部分调解员对签署协议保持谨慎，影响和解协议的执行意愿和效率。<sup>①</sup>

此外，日本在救济条件上与公约存在显著差异。根据《批准法案》第 3 条第 5 项，如果调解员违反适用法律或规则，且该违约情节严重并影响了和解协议的达成，可对协议授予救济。这一规定相比于公约的对应条款，未将违约行为直接影响当事人意图作为必备条件，从而可能扩大了救济适用范围。同样，哈萨克斯坦在救济理由的规定上也与公约不同，进一步反映出各国在实施公约时的多样性。

综上所述，已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国家在国内立法转化和执行机制上的显著差异，可能对公约的全球统一性带来严峻挑战。商事调解制度的多样性既反映了各国对国际公约适用的自主性，也揭示了国际条约在国内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为实现公约的核心目标，国际社会需在以下方面持续努力：一是推动各国在立法转化中的协调与标准化，减少因法律差异导致的适用冲突；二是建立跨国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各国间的经验交流与实践借鉴；三是通过国际组织的倡导与监督，推动对公约实施效果的持续监测和适时调整。这不仅有助于公约核心功能的实现，也能进一步促进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整体协调与完善。

#### （5）《新加坡调解公约》保密性规定缺失风险

在探讨《新加坡调解公约》全球适用性的挑战时，保密性问题无疑是一个关键领域。保密性作为调解机制的核心特质，不仅是当事人选择调解的重要原因，也直接关系到调解的成效。然而，已批准公约的不同国家在保密性规则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样的差异可能导致国际和解协议在跨境执行中的法律不确定性。

《新加坡调解公约》并未对保密性规则作出具体规定，而是将此问题留给各个缔约国国内法进行规制。这一选择虽然尊重了各国法律制度的自主性，但也不可避免地为和解协议的全球执行增添了复杂性。例如，在英国，现行的保密性和特权规则与《国际调解示范法》（Model Law on Mediation）中的相关规定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进一步推广，如何平衡保密性与透明性、尊重当事人隐

---

<sup>①</sup> Qatar Law No. 20/2021 on the Issuance of the Law on Mediation in the Settlement of Civil and Commercial Disputes (Nov. 4, 2021).



私与保障执行程序的公正性,将成为国际社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通过在国际层面加强协商,推动制定指导性原则,以及在区域范围内探索规则的协调路径,有可能为保密性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和解协议的法律确定性,也能为《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普及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 三、中国视角下的《新加坡调解公约》

#### (一) 中国与《公约》的关系

##### 1. 中国签署《公约》的过程

中国的调解历史源远流长。历代统治者大多以儒家思想中的“无讼”为目标,积极发挥调解的作用,减少诉讼数量。受到自然经济和重农抑商思想的限制,中国古代的商事调解没有太大的发展。民国初年,中外之间的贸易逐渐增加,商事纠纷解决的诉求也随之增加。1902年,中国第一个民间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其章程中关于商事调解的规定为商事调解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sup>①</sup>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调解商事纠纷的需求愈发强烈。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提出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其他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可以进行司法确认。2016年最高院公布《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商会、商事仲裁组织等设立商事调解组织。2019年,我国共有10.8万名调解员分布在2.8万家调解组织中。<sup>②</sup>

然而,我国商事调解领域仍存在一系列问题。第一,和解协议本身不具备强制执行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经调解组织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法庭申请执行。这说明商事和解协

<sup>①</sup> 参见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sup>②</sup> 参见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载司法部官网2024年3月17日, [https://www.moj.gov.cn/pub/sfbgw/zwgkztzl/2023zt/2023qglh20230223/bgqjd20230223/zgrmfyzfggbg20230227/202303/t20230317\\_474612.html](https://www.moj.gov.cn/pub/sfbgw/zwgkztzl/2023zt/2023qglh20230223/bgqjd20230223/zgrmfyzfggbg20230227/202303/t20230317_474612.html)。

议仅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需要司法确认才能使其成为直接执行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2019 年的《关于发挥商会调解优势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也坚持了这一态度。第二，缺少专门的商事调解规则和调解员行为规范。我国的调解领域法律法规主要为《人民调解法》等规范，人民调解的行政和权威色彩较浓，其规则难以在商事调解中适用。现有的调解员行为规范多为各调解组织发布，缺少统一的调解员选任培训、权利义务和调解过程的规定。第三，调解组织缺乏统一的管理，运营较为混乱。主管部门对商事调解组织没有建立相应的统计、识别机制，对商事调解组织的准入、审批、登记注册、管理、退出没有统一规定。某些调解组织本身也存在缺乏明确定位、没有建立合理运营模式、收费管理混乱等问题。<sup>①</sup>另外，还存在涉外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没有法律保障、调解员的理论和技能培训不足等问题。

2014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接受了美国政府的提议，决定起草一部旨在鼓励通过调解解决商事纠纷的公约，也就是未来的《新加坡调解公约》。为了优化法治营商环境，促进调解领域的国内立法，我国积极参与并支持了该公约的谈判、起草，最终于 2019 年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公约的核心在于直接赋予和解协议执行的效力，以缔约国的公权力保障和解协议执行。有学者将《纽约公约》与《新加坡调解公约》相对比，《纽约公约》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国际仲裁事业的发展，而《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目标在于推动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发挥当事人的自主性，更加高效、温和地解决纠纷。<sup>②</sup>签署和批准该公约有助于完善我国商事调解领域的法律法规，对推动本土商事调解机构发展、培养壮大专业调解员队伍、优化国内营商环境有着重大的意义。

## 2. 中国商事调解实践国际化与《公约》的适应性

调解作为诉讼、仲裁之外的重要纠纷解决方式，具有便捷、专业、灵活等诸多优势。调解可以减少因争议而中止商业合作关系的情况，<sup>③</sup>对已经走出去或将要走

<sup>①</sup> 参见范愉：《商事调解组织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商事调解与仲裁》2020 年第 1 期。

<sup>②</sup> 参见温先涛：《〈新加坡公约〉与中国商事调解——与〈纽约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相比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 年第 1 期。

<sup>③</sup> 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序言部分。



出去的中国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的《202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1772.9 亿元，境外企业覆盖全球超过 80% 的国家和地区。截至到 2022 年的 6 月底，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约 12 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 1400 亿美元。<sup>①</sup>频繁的商业往来必然引发纠纷，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环境复杂，增加了纠纷的解决难度。2018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鼓励国内调解机构开展涉“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机构为解决“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当事人之间的跨境商事纠纷出具的调解书，可以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经过司法确认获得强制执行力。迄今为止，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中心现已调解案件三万七千余起，拥有 760 名专业调解员，并制定了相对成熟的调解规则。<sup>②</sup>可以说，商事调解已经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公约》的加入将增强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力，以法治建设为“一带一路”发展保驾护航。

## （二）《公约》对中国的影响

### 1. 《公约》签署对我国商事调解制度构建的积极作用

#### （1）促进我国商事调解规则构建

司法部在《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21-2025 年）》中明确提出要“研究推动调解立法，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商事调解相关法律制度”。从 2019 年到 2024 年，为了与公约衔接，我国一直在不断探索商事调解立法。2021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将调解的司法确认细化为“人民法院邀请调解组织开展先行调解”和“调解组织自行开展调解”两种，明确中级人民法院可以进行司法确认。最高人民法院 2019 年 12 月印发了《关于人民法院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随后上海市高

<sup>①</sup> 参见《共建一带一路九周年成绩单》，载中国一带一路网 2022 年 10 月 1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281310.html>。

<sup>②</sup> 参见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中心官网，<http://www.bnrmediation.com/CN/Index>。



级人民法院印发了有关自贸区内调解工作的《上海法院涉外商事纠纷诉讼、调解、仲裁多元化解一站式工作机制的指引（试行）》，提出法院在法律适用等方面要为调解组织和仲裁机构提供裁判指引，支持调解组织引入外籍调解员，建立外籍调解员名册。2020年1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广东省司法厅联合发布了《广东自贸区跨境商事纠纷调解规则》，提出跨境商事纠纷的当事人可以自愿选择国际条约、惯例或域外法律调解商事争议，可以自愿选择调解的期限、地点和方式，这意味着调解员可以在境外为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地方商事调解立法中较为完善的是2022年5月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下文简称《深圳ADR条例》）。该条例首次对商事调解作了专门规定，明确了商事调解的适用范围、商事调解组织的设立、服务费的收取、商事调解的保密性等问题。该条例借鉴了公约关于商事调解适用范围的规定，<sup>①</sup>将婚姻家庭、劳动关系、相邻关系、物业管理、道路交通事故、医疗等民间纠纷归入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商事调解的适用范围则包括贸易、投资、金融、运输、房地产、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工程建设等商事领域发生的矛盾纠纷。该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或者调解组织主持调解期间，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在此之前，我国法律仅允许法院进行诉讼保全或仲裁保全，《深圳ADR条例》开创性地规定了调解期间的保全，<sup>②</sup>能够更好的防范部分当事人的不诚信行为，促进更多当事人选择商事调解。该条例的出台是我国商事调解的重大进步，体现了我国调解立法向公约靠拢的努力。

## （2）促进我国商事调解机构发展

调解制度的发展需要高水平的商事调解机构和完善的调解员准则。自《新加坡调解公约》签署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专业化的商事调解队伍。2023年，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召开的调解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

① 参见《探索人民调解与商事调解的协同发展与创新——以南山区民商事纠纷多元化解为视角》，载深圳市司法局官方网站2022年8月19日，[http://sf.sz.gov.cn/ztzl/fzszjs/fzsdyl/content/post\\_10035036.html](http://sf.sz.gov.cn/ztzl/fzszjs/fzsdyl/content/post_10035036.html)。

② 参见郭子平：《我国国际商事调解特区立法：问题争议、解决机制及制度贡献》，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商事调解组织，培育一支国际化专业化高素质的商事调解队伍。《深圳 ADR 条例》第 38 条规定允许商事调解组织收取服务费，收费实行市场调节原则，这一规定推动商事调解组织向市场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2024 年 10 月，《商事调解工作规范》在深圳发布，有效填补了商事调解组织统一标准方面的空白。该工作规范确定了商事、商事调解组织等关键概念，明确了商事调解的基本要求是自愿、合法、公平、中立、高效便捷、诚实信用、保密，详细阐述了调解员的申请条件、权利义务、职业伦理规范等。根据该工作规范，商事调解组织是经市、区司法行政部门同意，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商事纠纷调解的非营利性法人组织。截至 2024 年 10 月，深圳市共成立民办非企业型商事调解组织 35 家，成立事业单位型商事调解组织 1 家；商事调解员 2374 名，共受理案件 7.7 万余件。<sup>①</sup>

## 2. 我国批准公约的具体问题

### （1）公约概念的认知差异

第一，对国际性的认知差异。公约第 1 条规定，和解协议双方当事人营业地分属不同国家，或者双方营业地在同一国家，但协议中规定的相当一部分义务履行地所在国或与争议事项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位于当事人设有营业地的国家之外的，属于公约调整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也就是说，公约判断国际性的标准是当事人的营业地、主要义务履行地或最密切联系地。即使双方当事人营业地在同一国家，若和解协议所涉财产在另一国，和解协议也具有国际性。与《纽约公约》考虑仲裁地的做法不同，公约没有定义“调解地”，因为在互联网调解发达的当下，很难确定商事和解协议的来源地。公约对国际性的判断来源于和解协议实质的内容，而不是调解的程序。<sup>②</sup>公约第 2 条规定，若当事人存在不止一个营业地，则以与和解协议所解决的争议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为准；若不存在营业地，则以当事人的惯常居住地为准。但公约没有进一步定义惯常居住地的概念。

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国际性一般会转化为我国的“涉外因素”。根据《最高

<sup>①</sup> 参见《深圳发布全国首个〈商事调解工作规范〉团体标准》，载深圳新闻网 2024 年 10 月 30 日，[https://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24-10/30/content\\_31306234.htm](https://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24-10/30/content_31306234.htm)。

<sup>②</sup> 参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第六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第 31 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的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判断标准包括当事人的国籍，经常居所地，标的物的位置，产生、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的发生地等。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发布的《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也从主体、客体、法律事实的角度出发确定调解协议的涉外性。然而，公约中所称的“相当一部分义务履行地”不一定等于我国规定的“标的物所在地”；我国当事人就发生在国内的争议经外国调解机构调解，也会被我国法院认定为具有涉外性，而这不符合公约的国际性标准。<sup>①</sup>不同的国际性标准会导致许多争议，当事人可能利用这一差异进行法律规避，以取得对自身更有利的结果。

第二，对商事认知差异。公约没有直接写明商事范围，仅在第2条中列举消费者保护、雇佣劳务、抚养、婚姻、继承等领域不适用公约。这些领域往往涉及当事人的重大利益，又存在双方地位不对等的情况，因此各国国内法对其进行了特别规定，公约难以在这些领域达成共识。<sup>②</sup>我国国内法对商事没有明确的定义，参考我国在《纽约公约》中作的商事保留声明，即商事包括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囊括了国际贸易纠纷和新型商事纠纷，消费者权益纠纷属于新型商事纠纷的一种。这与公约认为消费者保护纠纷不属于商事纠纷存在矛盾。

第三，对和解协议的认知差异。公约所称和解协议实为国际商事调解产生的协议，是在一名或几名调解员的协助下友好达成的协议。国内“调解协议”和“和解协议”的定义尚不明确。《人民调解法》将调解产生的协议称为调解协议，中国国际商会的调解规则使用了“经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但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中心的调解规则则使用“经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调解过程中用词的不一致也会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困难。

公约强调在调解员不得通过对当事人强加解决办法而达成和解协议，意在商事调解员应当起到促进的作用，而不是指导双方当事人。<sup>③</sup>在我国人民调解的传统下，

① 参见王国华、施长艳：《〈新加坡公约〉与中国调解机制的冲突与破解之道》，载《中国海商法研究》第34期。

② 参见温先涛：《〈新加坡公约〉与中国商事调解——与〈纽约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相比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

③ 参见李浩：《民事调解书的检查监督》，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

调解员常以说服、劝导甚至教育、规劝的方式促使当事人达成协议，<sup>①</sup>这与商事调解自由灵活的理念有所不同。

公约第2条仅写明“一名或几名调解员”，没有要求调解员来自调解机构；第四条要求出示和解协议产生于调解的证据，当事人可以出具调解过程管理机构的证明，也可以出具调解员签署的文件，公约也没有提及调解员必须隶属于调解机构。这说明机构调解和个人调解产生的协议都可以得到公约保护。然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1条，只有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产生的协议才能进行司法确认，个人调解产生的协议难以通过这一途径执行。

## （2）和解协议执行问题

第一，协议的效力与范围。公约第3条规定，公约当事方应当按照本国程序规则和公约约定的条件执行和解协议。若和解协议的执行发生争议，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形式审查后，可以直接强制执行该和解协议。这说明公约规定和解协议具有更强的约束力，而我国规定和解协议仅具有民事协议的效力，和解协议的执行依赖当事人的自动履行，执行产生争议则需要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通过后才能强制执行。我国的司法确认模式与公约的直接执行模式明显存在冲突。另外，公约第1条第3款规定，可作为判决或裁决执行的和解协议不适用公约。也就是说，我国经司法确认后具有判决效力的和解协议和在诉讼、仲裁过程中产生的，效力等同于判决书、裁决书的和解协议不适用公约。若和解协议在诉讼或仲裁过程中形成，但却仅具有合同效力，则可以适用公约。<sup>②</sup>

第二，协议的形式审查与司法确认。公约第5条规定了拒绝准予救济的理由，即法院对和解协议进行形式审查的要件，若审查不通过，则和解协议无法强制执行。这些要件包括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和解协议的义务约定的是否清楚、调解员是否违反调解准则、公共政策等，不包括和解协议的实质内容。我国《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中列举了六种法院不予确认和解协议效力的情形，

<sup>①</sup> 参见《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载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18-04/27/content\\_5286469.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8-04/27/content_5286469.htm)。

<sup>②</sup> 参见王涵：《〈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可直接执行和解协议范围探析》，载《国际商务研究》2024年第4期。

包括协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损害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不明确，无法确认的，其他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由此可见，我国法院会对和解协议进行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sup>①</sup>实质审查包括确定其内容是否违法、是否侵害案外人的利益等，这与公约仅进行形式审查的立场不同。

另外，公约有关调解员是否违反调解准则，是否客观公正的审查在我国很难实施，因为我国的调解员制度尚不成熟。公约拒绝准予救济的理由包括在调解员严重违反调解准则，或未披露特定事项，若非存在此种严重违反或隐瞒，当事人本不会订立该和解协议。我国缺乏统一的调解员行为准则，尤其是商事调解员行为准则。目前的行为准则多为各调解组织自主起草的，内容不统一，且某些准则规定过于宽泛，难以作为公约“严重违反调解准则”的标准。

第三，案外人救济。公约的批准可能使我国面临着虚假调解的问题。虚假调解是指当事双方共谋通过虚构的实体争议，意图借助民事程序达到损害第三人权利或权益的调解活动。<sup>②</sup>调解与诉讼相比更为灵活自由，具有保密性，调解员仅起到协助的作用，难以发现当事人的共谋。且根据公约对和解协议进行形式审查的精神，不审查和解协议的实质内容，更难以揭发虚假调解。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规定了案外人撤销制度，若经司法确认的协议对案外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案外人可以申请撤销确认决定。但公约中没有类似保护第三者利益的制度。

### （3）公约条款保留问题

公约有两项保留，第一项是缔约方政府机构或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可以在声明规定的范围内不适用公约，第二项是当事人选择适用保留，即经当事人同意后才能适用公约。同时，公约没有设置《纽约公约》规定的互惠保留，即仲裁裁决必须在缔约国的领土上作出。这表明在非缔约国达成和解协议后也能在缔约国进行

<sup>①</sup> 参见房昕：《〈新加坡调解公约〉背景下我国商事调解协议执行力问题研究》，载《商事调解与仲裁》2021年第5期。

<sup>②</sup> 参见张卫平：《中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构成与适用》，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



执行。未设置互惠保留可能会给我国法院带来审查国外和解协议的压力，增加其执行的负担。

### 3. 我国批准公约的未来展望

长远来看，批准公约对我国营商环境法治化、商事调解制度走向成熟具有积极的影响。但短期来看，我国批准公约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我国商事调解领域的立法尚不完善、调解机构较少、港澳等地法律适用情况复杂。另外，截至 2024 年 10 月，仅有 14 个国家批准公约，其中不包括美国、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有利于减少批准公约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最大限度发挥公约的积极作用。

#### （1）完善商事调解立法

随着国际贸易增加，调解日益成为一种主流的纠纷解决方式，各国的专门立法也在增加，如美国的《调解示范法》、欧盟的《欧盟调解指令》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通过法律规定。作为仲裁之后新兴且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也可以以法律的形式进行规定。有学者认为，在大调解格局已经形成的背景下，<sup>①</sup>应当将商事调解、家事调解、消费争议调解等均纳入《人民调解法》的框架下，以总分的形式构建统一的调解法体系。<sup>②</sup>也有学者认为，商事调解与人民调解差距很大，只有制定独立的商事调解法才能全面、系统地规定有关内容。<sup>③</sup>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更为合理。因为人民调解与商事调解的当事人、程序、理念等都存在很大差异，人民调解属于权力导向型调解，商事调解属于利益导向型调解；<sup>④</sup>人民调解员可以劝导、教育当事人，商事调解员应当协助当事人。二者差异较大，恐怕难以规定在同一部法律中。

---

① 参见《司法部：到 2022 年基本形成大调解工作格局》，载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19-05/09/content\\_5390085.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9-05/09/content_5390085.htm)。

② 参见王国华、施长艳：《〈新加坡公约〉与中国调解机制的冲突与破解之道》，载《中国海商法研究》第 34 期。

③ 参见尹力：《国际商事调解法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88 页。

④ 参见段明：《〈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商事调解的立法选择》，载《商事调解与仲裁》2021 年第 2 期。

法律的制定不能一蹴而就，因为我国商事调解的基础较为薄弱，在制定商事调解法之前，可以先进行立法路径的探索或试点，如先制定商事调解条例或在自贸区展开商事和解协议直接执行的试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定，国家鼓励海南自贸区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支持海南自贸区探索相关的司法体制改革；对落脚海南自贸区的国际商事调解机构达成的协议，由海南涉外民商事审判机构审查执行。<sup>①</sup>因此，可以考虑在海南试点直接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总结经验后再进行正式立法，推广至全国。

### （2）完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机制

根据公约，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应当能够在国内直接执行，因为调解员的介入作为合同的和解协议增加了约束力。目前我国和解协议的执行仍然依靠司法确认制度，其实质审查与公约的形式审查存在矛盾。若批准公约，应当建立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直接执行制度，按照公约的要求规定协议审查要件等。仅建立国际协议直接执行制度，可能会导致当事人为了更高的执行力而规避国内和解协议，将其转变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从长远看，调解作为未来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国内和解协议也应当拥有相同的执行力，但我国调解机制尚不成熟，且我国一直在努力推进和解协议的执行，不应当因批准公约而打乱国内立法的步调。我们认为短期内可以保持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直接执行，国内和解协议通过司法确认执行的“双轨制”，在我国调解制度取得更大发展之后再将二者的执行程序统一为直接执行。

为防范虚假调解，可以设置案外人的救济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改意见稿规定，案外人有证据证明裁决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诉讼；提起诉讼的案外人若提供担保，则可以中止裁决的执行。和解协议可以设置类似的案外人救济措施，要求案外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和解协议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提供担保后，法院可以中止执行。

### （3）制定调解员行为规范准则

鉴于公约已经将调解员的行为严重违反准则纳入了审查商事和解协议的事项，

---

<sup>①</sup>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2021 年 1 月 15 日，<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84531.html>。

我国应当制定统一的调解员准则，让法院审查调解员行为时“有法可依”。现行的调解员准则除了《人民调解法》的部分规定外，都是由各调解组织制定的，内容各不相同。如各机构对离退休法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的工作年限要求不同，对调解员应当接受的培训时长要求不同等。<sup>①</sup>许多国家对调解员有着统一的准入标准和行为守则，为满足公约要求，未来我国也应当制定统一的调解员准则。该准则可以参照《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专业操守最佳准则》，第一部分明确调解员的独立性、公正性、保密性等原则，第二部分规定调解员应有的能力，第三部分规定调解员的角色和责任。调解员作出违背其角色定位的行为，就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和解协议的效力也随之受到影响。另外，我国法律也在探索个人调解员制度的发展，可以在调解员准则中明确个人调解员的地位，结合商事仲裁法或商事仲裁条例，承认临时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效力。至于国内临时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的效力，可以等我国调解行业取得进步后再进行完善。

---

<sup>①</sup> 参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员培训规定》第6条：调解员培训实行学时制。调解员每年接受培训不得少于八个学时。全天培训按八个学时计算，半天培训按四个学时计算；《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培训管理办法》第7条：调解员每年应完成累计不少于16个学时的培训……每半天培训一般按4个学时计算。

## 结 语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时期，国际商业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商事调解凭借其非对抗性、高效率性、低成本性成为解决商业争端的重要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逐渐与诉讼、仲裁构成商事争议解决的“三驾马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更是进一步强调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在此背景下，加强对我国年度商事调解规则修订及商事调解实践现状的研究对建立健全新时代中国特色商事调解体制机制意义重大。有鉴于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基本沿袭上一年度商事调解报告的编制经验，针对 2023–2024 年度我国商事调解在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案件处理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的进展情况，考察域外典型国家商事调解组织规则修订及《新加坡调解公约》生效五年来的实践状况等，编写了《中国商事调解年度报告（2023–2024）》，以求精准呈现本年度中国商事调解的发展全貌，阐释近年来国际商事调解规则修订及实践的大致状况。

第一，系统阐述我国商事调解年度进展。在制度建设方面，列出我国出台的系列商事调解规范，凸显我国进一步推进商事调解制度化、体系化；在组织建设层面，展现我国商事调解组织迅速发展、调解人员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商事调解在线调解平台建设持续优化；在案件处理方面，通过大量数据和案例，展示我国商事调解在案件数量、案件类型等方面的年度变化，反映我国商事调解的发展趋势；在学术研究方面，汇总我国商事调解文献研究情况、学术会议情况、学术比赛情况以及学术研究年度进展评价，表明我国商事调解的学术研究逐步深化、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

第二，全面介绍我国商事调解模式的新发展。本年度我国的商事调解模式正朝着更加专业化、高效率的阶段稳步迈进，形成“调解 + 仲裁 + 诉讼”“诉前调解 + N”“法律 + 科技 + 调解”“法院 + 商会”“专业调解资源 + 便捷纠纷解决机制 + 多元服务供给”“公益性调解 + 市场化解纷”等商事纠纷调解新模式。这些新模式的探索和实践，提高了商事调解的效率和效果。本报告从模式内涵、实际应用、特点优势及效果评价等方面详细介绍这六大商事调解模式，希望为我国商事调解的



未来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

第三，深入分析我国典型商事领域争议调解的发展。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及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的大环境下，知识产权争议及金融行业争议数量持续增长，争议形式愈发多元化。因此，本报告聚焦于知识产权争议调解及金融争议调解两个领域，分析了这两个领域的商事调解现状、创新措施以及典型案例，展示中国在知识产权和金融领域商事调解的成果，为国际商事调解提供有益的经验 and 启示。

第四，对标探索国际商事调解规则的新发展。国际商事调解规则呈现出体系化、国际化、现代化的特点。为了整体客观地探索世界范围内商事调解规则的进展情况，本报告详细阐释本年度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规则的修订、近年来域外典型国家商事调解组织调解规则的修订以及主要国际组织商事调解规则的新发展。这些规则的新发展体现了国际商事调解规则正在逐步完善的趋势，为解决跨境商事纠纷提供了更加高效、灵活、专业的途径。

第五，深度观察《新加坡调解公约》最近五年的实践状况。《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和实施，为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提供了统一的法律框架，对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报告采取“动静结合”的方式对《新加坡调解公约》最近五年的实践状况进行深度观察：静态探赜其制定背景、核心条款和影响力；动态审视其加入情况和实施情况。此外，在研究中国商事调解国际化与《公约》的适应性的基础上，对我国批准公约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对我国批准公约之后的境况进行展望。

本报告是体系化阐释我国商事调解发展全貌的“年度型报告”，是学理化阐释我国商事调解研究状况的“研究型报告”，是数据化梳理我国商事调解案件脉络的“实践型报告”，集中展现了我国在商事调解领域的探索实践和理论创新，反映我国商事调解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贡献度。在报告中，我们对 2023-2024 年度我国商事调解进行全面回顾与深入分析，见证中国商事调解在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取得的显著成就，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设性意见。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商事调解经验，谱写好商事调解的权威性、可靠性、专业性“三部曲”，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干在实处，让商事调解调出温度、调出速度，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在此，我们对所



有支持和参与我国商事调解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期待与各方携手合作，共同开启我国商事调解事业的新篇章。

《中国商事调解年度报告（2023—2024）》编写组

2024 年 12 月 30 日



## 附录 1：2023—2024 年中国商事调解发展大事记汇总

### 2023 年

#### 2 月 河北省雄安法院召开推动构建“总对总”在线多元解纷新格局工作会议

2 月 15 日，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推动构建“总对总”在线多元解纷新格局工作会议。“总对总”在线多元解纷，旨在发挥中央国家机关、全国性行业协会对下指导管理职能，将各单位分散在省、市、县、乡各个层级的调解资源进行最大限度集约，并集成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上，实现“一次对接、全国覆盖”，做到“一平台调解、全流程在线、菜单式服务、一体化解纷”。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作为合作单位派员参会，中心王芳副秘书长介绍了调解中心开展调解工作相关经验，她指出，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充分发挥系统优势，指导各分中心同当地法院建立诉调对接机制，开展商事调解市场化探索，减轻法院案件压力；开展立法、行业理论研究，积极完善中心规章制度，制定行业团体标准，推动理论完善；组建知识产权调解专业委员会，举办国际调解高峰论坛，开展国际商事调解员培训，打造贸促会调解品牌。

#### 5 月 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建设暨“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发展研讨会举行

2023 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也是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五周年。5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建设暨“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发展研讨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会议主题为“新时代、新机遇、新发展”。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作为首批“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构之一，受邀作交流发言。蔡晨风主任以“探索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之路，助力“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为主题，分享了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在参与一

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建设中的相关工作，同时表示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将继续积极发挥作用，不断优化商事调解服务，为国际商事案件当事人提供便利、快捷、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服务，助力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新格局。

## 5 月 贸促调解工作培训在杭州成功举办

5 月 8 日至 9 日，贸促系统调解工作培训在杭州成功举办。培训由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主办，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杭州市贸促会共同承办。培训旨在为贸促系统调解机构提供交流平台，培训调解技能，提升贸促系统商事调解服务能力和水平。来自 62 个贸促分支会的负责人、业务骨干和调解员约 130 人参加培训。

## 7 月 2023 年中国贸促会商事调解员培训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

7 月 19 日至 20 日，2023 年中国贸促会商事调解员培训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培训由山东省贸促会主办，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和山东省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共同承办，由中国贸促会商法中心指导。培训意在使各位参训人员对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全貌有更为系统的了解，不断培养商事调解员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提高调解技巧等，有力扩充我国商事调解的人才队伍。授课讲师围绕国际商事调解办案程序、商事调解技巧、合格商事调解员需具备的能力素质、《联合国贸法会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联合国贸法会调解规则》、知识产权争议调解实践与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知识产权争议调解规则解读、中国贸促会调解规则及调解员守则解读等议题进行了授课。培训班还设置了专门的商事调解案例模拟演练环节。

## 9 月 《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调解规则》颁布

2023 年，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正式颁布了《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调解规则》。这一规则的发布，标志着资本市场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提供了新的法律保障。该规则详尽地包括了总则、受理范围、当事人权利与义务、普通调解程序、其他调解程序及方式、效力保障以及附则等多个方面。它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坚持公益服务的定位，遵循依法、中立、专业、便捷的原则。

## 9 月 第二届内地 – 香港 – 澳门联合调解机制研讨会举办



9月14日，第二届内地－香港－澳门联合调解机制研讨会在澳门举办。会议由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主办，来自内地、香港、澳门的11位调解专家就三地调解合作进行了交流分享，80余位专业人士参会研讨。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表示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营造和谐健康的国际经贸环境、推动各方互利共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灵活高效的调解背后，是对于零和思维和对抗意识的纠正，是对立足长远、合作共赢理念的坚持。中国贸促会将依托驻外代表处和国际合作机制，深化商事调解国际合作，做精做优做强商事调解业务，完善商事调解服务体系，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更大贡献。

## 9月 新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强化虚假调解规制

9月1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决定修改《民事诉讼法》，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将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115条对于虚假诉讼、调解行为的规制范围从“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扩大至“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

## 11月 第二届新时代调解论坛召开

11月16日，“第二届新时代调解论坛”在珠海召开。论坛由司法部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局、中华全国人民调解员协会、广东省司法厅作为指导单位，由湘潭大学、人民调解杂志社、司法部调解理论研究与人才培训基地主办。论坛以“打造调解发展新格局，促进‘枫桥经验’新发展”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司法行政系统、法院系统、调解机构、高校院校的1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通过开展理论研讨和实践交流，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挥好调解的基础性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 12月 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同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签署诉调对接合作协议

12月20日，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与北京四中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诉调对接座谈会在京举办。北京市四中院努力打造集国际商事纠纷诉讼、调解、仲裁于一体的一站式多元解纷中心“北京样板”。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愿充分发挥自身在涉外领域的资源优势，与北京市四中院携手探索法院涉外案件多元化解决新路径，

为北京市营商环境改善贡献力量。会议期间，双方签署诉调对接合作协议，强化诉前诉中委派调解、调解人才培养、调解业务推广等领域合作。

## 12 月 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调解员实务培训成功举办

12 月 23 日，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成功举办调解员实务培训。培训共邀请了 118 名在商事争议解决、知识产权等领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杰出能力的专家，主要为来自中央和地方大型企业的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知识产权领域领军人才，以及资深退休法官、知名学者等。四位重量级专家作为培训讲师，与参训学员分享对商事调解理论与实务的经验和感悟。

## 12 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通报持续深化商会商事调解机制建设情况

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通报看，2023 年以来，江苏省各级商事商会调解组织累计化解纠纷 13960 件，标的总额 11.3 亿元，有效减少了广大民营企业的解纷时间和金钱成本，赢得了广泛认同和信赖。江苏省各级法院积极践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重要指示精神，把诉调对接的“调”向前延伸，引导市场主体选择调解方式化解纠纷，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省法院与省工商联共同推动将“商会商事调解工作情况”纳入全省营商环境评价指标评价体系，引导各地做大做强商会商事调解；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动商会商事调解，坚持依法、自愿调解原则，对于调解不成的纠纷，及时立案登记，坚决杜绝久调不立；全省各级法院、工商联指导商会调解组织在调解中坚持法理、事理、情理融合，努力让当事人“事心双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 12 月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工作指引（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工作指引（试行）》。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进一步完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成果。未来，对于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管辖的案件，当事人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在其官方网站设立的全流程在线服务平台，便利地运用和启动调解程序。该文件第 6 条至第 18 条详细列明了通过该“一站式”





平台申请和参与调解的流程。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建设该平台的过程中重点关注了用户隐私保护以及调解保密性安排的事项。“一站式”平台严格执行隐私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对收集、存储、利用当事人信息进行严格的保密。

## 12月 深圳施行《关于规范商事调解收费的实施办法（试行）》

12月10日，由深圳市司法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制定的《关于规范商事调解收费的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正式施行，这是深圳市深化诉源治理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优化调解资源配置，激发商事调解市场活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和防范经营风险，建立健全具有深圳特色的商事调解配套制度的最新举措。其中，对商事调解市场化收费制度进行了细化，明确了商事调解组织在调解贸易、投资、金融、运输、房地产、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工程建设等商事领域发生的矛盾纠纷时，可依法依规收取调解服务费。调解服务费包括给付调解员的调解报酬及因调解活动所产生的住宿费、交通费、场地费、翻译费、机构运作费用及其他合理费用，调解服务费由商事调解组织按照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制定收费标准并向社会公开。调解服务费的收取方式可以按时间或者按争议标的比例等方式确定，或者由当事人与商事调解组织之间进行协商收取。

## 2024 年

### 1 月 《DB3308/T141-2023 金融纠纷调解工作规范》出台

浙江省出台《DB3308/T141-2023 金融纠纷调解工作规范》，该规范强调金融纠纷调解应以公正合法为根本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制定合法合理的调解方案。这不仅要求调解员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和专业素养，更要确保每一个调解结果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同时，规范明确了调解自愿的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强迫、不诱导当事人接受调解方案。这一原则保障了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确保他们能够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调解，从而提高调解的成功率和当事人的满意度。此外，保密原则也是金融纠纷调解工作的重要要求。

2024 年 2 月，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与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续签谅解备忘录

2 月 1 日，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执行副主席蔡晨风与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主席林长仁代表双方在新加坡续签《关于共同建立“一带一路”倡议调解员名册的谅解备忘录》。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和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是中新两国具有代表性的商事调解机构，长期共同致力于推动国际商事调解发展。通过签署该备忘录，双方将进一步密切合作，商讨建立中新联合调解机制，联合培养国际商事调解员，共同为中新两国企业提供高质量商事调解服务。

### 2 月 仲裁全流程智能辅助系统成功调解一起案例

广州仲裁委员会联合华南理工大学研发的仲裁全流程智能辅助系统成功调解一起案例，这系我国首例由人工智能主导的纠纷解决成功案例。在调解过程中，仲裁全流程智能辅助系统 L.Code 根据双方当事人提出的法律咨询、意见进行实时地灵敏互动协调、释法说理、促进双方达成共识，现场归纳案件事实并出具法律分析，最终使双方达成一致的调解。该系统的智能调解功能可以为当事人提供“立案后，组庭前”的智能调解服务，为当事人提供多种调解方案。如果各自方案不能完全满足当事人需求，系统则会结合已有方案进行优化分析，最终得出个性化的最优调解方案，实现从争议源头高效化解纠纷。该案成为由全流程智能辅助系统主导的庭前调解首案，为我国探索打造智能调解服务贡献了广州智慧。

### 3 月 “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启动仪式暨天府贸促大讲堂一商



## 事纠纷解决培训”活动成功举办

四川省贸促会在南充市举办“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启动仪式及商事纠纷解决培训”活动。活动上，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王芳副秘书长、四川省贸易促进委员会王志敏书记分别为南充调解办事处和南充市涉外商事纠纷调解室授牌，并为新聘任调解员代表颁发聘书。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调解中心、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南充市贸易促进委员会签署《建立涉外商事纠纷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合作备忘录》，启动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工作。

## 3月 《律师协会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业务操作指引》表决通过

上海市律师协会业务研究指导委员会表决通过了《律师协会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业务操作指引》，该指引的制定具有重要的背景和依据。为贯彻落实中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等文件精神，上海市律师协会调解业务研究委员会依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结合律师办理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业务的操作流程和经验，制定了本指引。其适用范围明确为律师以调解员身份办理的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业务，并对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进行了定义。同时，也规定了不适用的八种情形，如所涉法律关系非金融（消费）类、涉及刑事犯罪等。

## 4月 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标准必要专利实务与热点问题”讲座成功举办

4月2日，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举办了主题为“标准必要专利（SEP）实务与热点问题”的线下讲座。讲座聚焦在标准必要专利纠纷领域，调解中心希望能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与作用，为企业妥善化解SEP纠纷提供新路径。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中石油集团、中国钢研科技集团、中国移动专利中心、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华为公司、京东方、理想汽车、快手公司、美国InterDigital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等机构30余位专业代表参会。

## 4月 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主任、调解中心执行副主席蔡晨风参加第32届世界调解中心论坛

4月5日，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主任、调解中心执行副主席蔡晨风率团访问英国伦敦，应国际律师联盟邀请，参加第32届世界调解中心论坛，与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开展商事调解对话交流。商事法律服务中心调解一处处长、调解中心副秘书长王芳发表主旨演讲，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商事调解发展的最新进展，探讨与国际上有关调解组织共商共建中外联合调解机制，共同推动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

#### 4 月 “合作开展商事纠纷解决一体化平台建设工作推进会” 举办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联合上海仲裁委员会举行“合作开展商事纠纷解决一体化平台建设工作推进会”。在会上，双方签署了《关于发挥仲裁优势、共建一体化商事纠纷解决新平台合力推进商事纠纷多元化解的战略合作协议》，打造一体化商事纠纷解决新平台。在商事调解方面，该合作协议作出了多项尝试，包括建立仲裁员与调解员的双向交流机制，形成调解在前、仲裁及诉讼托底的分级化解模式，确立“有偿+低成本”的调解工作模式，建立特定类型案件“优先推送”机制。这些创新性举措旨在推动构建仲裁联动调解机制，进一步释放了商事调解的服务潜能，并同时构建与诉讼相衔接的商事争议多元解决模式。

#### 5 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 2024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预备制定《商事调解条例》

5 月 6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 2024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国办发〔2024〕23 号）。此计划围绕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拟预备制定《商事调解条例》，并将在新制定的《海关法（修订草案）》等多项法律中引入商事调解制度。

#### 5 月 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展台首次亮相国际商标协会年会，宣传贸促调解品牌

5 月 18 日至 22 日，国际商标协会（International Trademark Association，以下简称 INTA）2024 年年会在美国亚特兰大举办，吸引了来自 136 个国家和地区的 9560 多名品牌专业人士、商界领袖、品牌所有者、政府管理者参加，在业内具有广泛影响力。中国贸促会商法中心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单位联合设立了“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展台，积极宣传中国贸促会积淀深厚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包括商事调解、商事仲裁、知识产权代理、知识产权公共法律服务咨询等。这



是中国贸促会首次在 INTA 年会上设展，展台在会场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内外知识产权专业人士、参展商纷纷前来交流，探讨商事法律服务合作，以期共同为中外企业国际知识产权布局和保护提供优质服务。

## 5 月 证监会发布了泽达易盛特别代表人诉讼案等典型案例

在“当事人主动提起 R 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纠纷调解案”中，双方当事人为避免管辖法院变更导致的裁判结果不确定性，降低诉讼成本，基于与中证法律服务中心过往合作经验，共同选择向中证法律服务中心申请调解。经调解，双方达成调解方案，同意参照示范判决。本案是首起由纠纷当事人主动提起申请启动调解的证券虚假陈述纠纷，是传统意义上的“示范判决 + 专业调解”机制的延伸，体现了调解这一纠纷多元化解方式越来越被投资者与市场主体各方所接受，调解组织在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化解领域的公信力、权威性在不断提升。

## 5 月 商事纠纷预防与解决合作交流大会召开

5 月 23 日下午，商事纠纷预防与解决合作交流大会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主题是“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实践与创新”。大会以“国际商事调解动态研究”和“商事调解如何助力湖南营商环境改善的路径探讨”为议题，来自英国、马来西亚、香港特区的境外专家以及湖南当地著名院校、重要企业、省高院、律师协会、知名律所的实务专家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和经验，发表了真知灼见，现场参会代表超 300 人，30 万余名观众线上参会。交流大会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经验交流和业务合作的大平台。

## 7 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国际商事调解制度

7 月 15 日至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该决定为我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指引，其中特别强调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旨在进一步提升仲裁与调解制度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

## 7 月 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发布新版《调解规则》《调解员守则》等五项制度规定



为进一步提升商事调解服务质量，推动商事调解规范化、制度化、国际化发展，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新修订了《调解规则》《调解员守则》《授予调解员资格规定》《调解员行为考察规定》《调解员培训规定》五项重要制度性规范。本次修订创新力强，亮点突出，综合考虑了联合国贸法会大力推动调解示范法及调解规则对各国商事调解发展的新指引，以及全国贸促调解系统统一适用现代化调解规则的新要求，结合了以贸促调解系统为代表的中国商事调解最新实践，汲取了多家国际知名调解机构商事调解规则的先进经验，重点改革商事调解程序、调解收费办法、和解协议的签署与执行以及调解员队伍的规范建设等方面的制度，力求为国际商事调解提供“中国方案”，打造商事调解的“中国品牌”。

## 7 月 “和合之美”北京国际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对话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7 月 13 日，“和合之美”北京国际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对话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中国贸促会商法中心主任、调解中心执行副主席蔡晨风出席会议并致辞。商法中心调解一处处长、调解中心副秘书长王芳参与对话会，围绕跨境商事争议解决中商事调解的重要性及未来展望等主题对话交流。对话会由北京市贸促会、北京国际商会主办，聚合商事调解有关主体，共话商事调解在国际争端解决中的重要价值，共谋北京国际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之道。北京市相关委办局、商事调解机构、法院、高校、企业、涉外律所等单位代表约 100 人参会。

## 7 月 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举办知识产权调解实务交流会

7 月 10 日，由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主办的中法连线活动——IP 大咖谈系列之“知识产权调解实务交流会”成功举办，三位中外嘉宾受邀进行线上交流。会议旨在增进中法双方对各自知识产权调解发展情况的相互了解，近 200 人报名在线参加会议，包括科技企业知识产权部门负责人、知识产权领域律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代表以及高校师生。

## 7 月 《专利开放许可实施纠纷调解工作办法（试行）》发布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专利开放许可实施纠纷调解工作办法（试行）》。该办法旨在促进专利技术的实施与运用，及时化解专利开放许可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纠



纷，强调了自愿、合法、公平和保密原则，明确了案件受理、调解、结案等具体流程规定，并规定了调解申请的受理条件、调解员的指定程序、调解过程中的行为要求以及调解协议的签订等具体操作步骤。

## 7月 深圳市商事调解协会与前海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在深圳举办主题宣传活动

深圳市商事调解协会和深圳市前海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在深圳成功举办“湾区调解员”主题宣传活动第五期。此次活动于深圳市内开展，主题聚焦《商事调解发展——香港商业纠纷调解案例分享》。活动邀请到国际专家学会会长梁海明以及香港调解联盟会长陆庭华作为演讲嘉宾，他们凭借丰富的经验与专业知识，为在场听众深入剖析香港商业纠纷调解案例，分享相关经验与见解。活动吸引了40余位业内律师、专家等积极参与，共同探讨商事调解发展趋势与实践经验。同时，深圳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处副处长曾旺瑜、中山市司法局四级调研员侯坤依出席活动，并共同为中山市律师协会和中山市律正商事调解中心颁发了“湾区调解员”宣传活动支持单位纪念牌，进一步推动了大湾区商事调解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 8月 《中国商事争议解决年度观察（2024）》正式发布

《中国商事争议解决年度观察（2024）》由相关专业机构或团队编撰完成，其对中国商事争议解决领域的整体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与深度剖析。报告指出，在商事调解发展方面，中国调解事业虽发展迅速，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大调解工作格局”的深化改革急需顶层设计助力，全国层面调解统一立法进程有望加速推进，包括明确商事调解定义、推动调解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发展以及解决调解与确权审查衔接等关键问题，为中国商事调解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与方向指引。

## 8月 中国贸促会 / 中国国际商会瑞安调解中心获得批复成立

全国首家县级涉外商事调解中心——中国贸促会 / 中国国际商会瑞安调解中心获得批复成立。该中心的成立是全国贸促系统的创新之举，也是瑞安统筹推进涉外商事纠纷化解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年来，瑞安率全省贸促之先积极探索涉外商法服务集成改革，持续加强涉外商法服务队伍建设，扩大专业领域范围，高效地打通本

地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遇到的痛点、堵点，全力打造涉外商事服务县域样板，让涉外企业“遇事不愁、出海无忧”。该调解中心的成立，进一步完善了商事调解的组织体系，为基层商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平台。

## 8 月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调解中心商事调解系列讲座” 举办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调解中心商事调解系列讲座”在上海市锦天城（长沙）律师事务所拉开帷幕，湖南警察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廖永安教授主讲“中国商事调解的新理念与新思维”，强调了商事调解的时代意义，并提出了调解的三个转变及现代化调解体系构建。温先涛老师分析了商事调解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并探讨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等议题。中南大学教授陈文曲、湘潭大学教授邓春梅和湖南大学助理教授王聪在与谈环节分享了对商事调解的见解，讨论了其核心理念和未来方向。

## 8 月 第八届国际调解高峰论坛举办

第八届国际调解高峰论坛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论坛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主办，主题为“深化解纷机制改革，推进经贸投资发展”，旨在探讨纠纷预防与解决的最新发展及其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作用。来自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的法官、律师、仲裁员、调解员、学者等专业人士参与了对国际多元化争议解决前沿议题的讨论。研讨环节中，中外专家学者深入讨论了国内外纠纷预防与解决机制的最新进展、多国多地高效化解纠纷的经验分享，以及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最新发展。同日，中国贸促会中亚调解中心落户新疆。

## 8 月 新加坡公约周开幕

新加坡公约周（SC Week）一直是新加坡律政部（MinLaw）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等其他合作伙伴组织共同举办的标志性活动，聚焦于争议解决、仲裁、调解和诉讼，给法律界、商界以及政府部门的领导、专家、从业人员以及决策人士提供讨论、交流、互鉴的平台。2024 年 SC Week 于 8 月 26 日至 8 月 30 日举行。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副秘书长姚俊逸应邀出席在新加坡举办的“未来调解的发展：国际调解能力标准的承诺与挑战”主题研讨会，详细阐述了建立国际调解能力标准的重要性、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应对策略，并介绍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



积极探索和取得的进展。

## 9月 2024年中国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年会在京召开

9月12日，2024年中国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LES China）年会在北京召开，华为、小米、中兴、TCL、高通、飞利浦，诺基亚、InterDigital等全球知名企业知识产权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知产运营驱动可持续创新”这一主题开展交流研讨。年会专门设置了主题为“调解之道－解决争议，达成许可的新趋势”的研讨环节。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连续两年受邀参加LES China年会，积极利用这一宝贵的国际交流平台，与全球知识产权领袖交流知识产权调解发展情况，分享中国知识产权调解实践，在凝聚国际调解共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 9月 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2024年第一期全国调解员培训班在贵阳举办

本次培训邀请了中国证监会法治司、上海金融法院的代表和优秀公益调解员等分别就资本市场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证券群体性纠纷审判实践、纠纷调解技巧等三个方面进行重点讲解，并设置了纠纷调解案例实务讲解。会议期间，法律服务中心组织了调解员工作交流座谈会。会上，各位调解员畅所欲言，围绕调解规范性、投资咨询类纠纷化解以及如何更好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分享经验，提出建议。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名调解员参加培训。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夏建亭，贵州证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国飞出席开班仪式。

## 9月 深圳市发布全国首个商事调解领域的团体标准

《商事调解工作规范》是深圳市发布的全国首个商事调解领域的团体标准，于2024年9月24日起实施。该规范涵盖了商事调解的基本要求、调解组织、调解员、调解当事人、调解协会、调解程序、制度保障和工作指导等方面，旨在规范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商事调解组织工作，有效填补了商事调解工作统一标准方面的空白，推动商事调解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发展，为深圳市乃至全国的商事调解立法和实践提供重要参考，助力营造公平有序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 10月 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主任、调解中心执行副主席蔡晨风率团参加“第六届亚洲调解协会大会”

“第六届亚洲调解协会大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本次会议由菲律宾最高法院主办，来自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主任、调解中心执行副主席蔡晨风率团访问菲律宾马尼拉参加本次会议。本届大会主题为“调解与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中的和解与战略创新”（Harmony and Strategic Innovations in Mediation and ADR），涵盖了家庭调解、跨文化司法救济、环境纠纷调解等八个议题。

### 10 月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无锡调解中心揭牌

10 月 10 日，无锡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交流会在无锡成功举行。交流会以“加强国际商事法律服务合作，共建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推动无锡涉外商事法律服务的国际化发展，助力无锡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无锡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法律保障。中国贸促会商法中心主任、调解中心执行副主席蔡晨风致辞并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无锡调解中心揭牌。贸促系统、江苏省的外经贸企业代表、涉外法律工作者，相关法官、调解员、仲裁员、律师等 150 余人现场参会。

### 10 月 2024 年企业出海国际知识产权服务对接会成功举办，设置“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在国际知识产权运用促进中的最新发展趋势”研讨环节

为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开放、助力企业出海，10 月 23 日，2024 年企业出海国际知识产权服务对接会在杭成功举办，来自中外知识产权领域政府机构代表、企业代表以及法律服务机构代表近 200 人参会，共商、共享海外知识产权合作成果。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副秘书长姚俊逸主持会议的研讨环节。来自南非、巴西、印度、德国及中国的资深知识产权律师，围绕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在国际知识产权运用促进中的最新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交流。

### 10 月 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调解中心成立大会暨首期调解员培训班成功举办

10 月 27 日，由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和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联合主办的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调解中心成立大会暨首期调解员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威海举行。针对近年来国内外建筑市场发展中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明显增多，所引





发诉讼和仲裁案件在民商事纠纷案件中比例逐年递增的现象，中国贸促会建设行业分会会同有关单位共同发起设立建设行业调解中心。80 多位来自各地建设行业相关专业单位的学员参加了为期两天的首期调解员培训班，培训围绕中国贸促会调解规则解读及商事调解国内外最新发展动态、调解员应具备的专业素质与能力要求、国际建设工程调解实务、案例分析和调解演练等内容展开，旨在培养能正确适用中国贸促会调解规则、满足建设行业各方主体息诉止讼、化解纠纷需求的合格调解员。

### 10 月 “2024 华语律师大会（专题活动）——跨境商事调解合作发展路径探索” 举行

“2024 华语律师大会（专题活动）——跨境商事调解合作发展路径探索” 在前海基金小镇路演中心举行。中国商事调解发展合作机制管委会主席蒋惠岭、粤港澳大湾区律师丘志强、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朱珠等多位专家就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现代化、香港商事调解经验、无讼思想与 ADR 机制、中国商事调解的机遇与挑战、市场化调解机制等议题发表演讲。会议聚集了来自香港、澳门、深圳等地的商事调解机构代表，分享了工作经验，探讨了商事调解的发展困境、机遇和未来展望，并讨论了如何加强合作，推动商事调解专业化和国际化。

### 11 月 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应邀出席香港法律周“法治湾区、协同聚变”活动

11 月 7 日，中国贸促会副会长、贸促会调解中心主席于健龙率团参加香港法律周 2024 “法治湾区、协同聚变” 专题活动，就内地、香港、澳门三地的调解体系差异及其在处理跨境争议中的特点发表讲话。会上，内地、香港、澳门的代表团分别模拟了针对同一跨境贸易案例的调解过程，这一环节不仅生动展现了三地调解文化和实践的差异，也为参会嘉宾提供了深入了解三地调解特色的宝贵机会。

### 11 月 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商事调解实务培训于湖北武汉成功举办

11 月 9 日至 10 日，以“商事调解思维养成课：让商业纠纷解决回归商业本质” 为主题的商事调解实务培训在湖北武汉成功举办。培训由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主办，受到了湖北省贸促会、中国贸促会湖北调解中心以及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

的大力支持，近 70 名资深律师、企业法务或业务人员、法律从业者报名参训。中国贸促会商法中心主任、调解中心执行副主席蔡晨风，中国贸促会湖北省委员会副主任石明辉出席培训。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设置培训课程，创新性地以商事调解思维的培养作为培训目标，为商事调解理念传播与人才培养做出了有益探索。

### 11 月 《上海市促进浦东新区商事调解规定》表决通过

上海市十六届人大第十七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促进浦东新区商事调解规定》，该规定共有 33 条，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这标志着首部省级人大常委会专门商事调解地方性法规通过。该规定的通过将有利于浦东新区商事调解发展，健全商事调解体系，提高商事调解质量、效率和影响力，及时有效化解商事纠纷并优化营商环境。

### 11 月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调解条例》通过

11 月 21 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商事调解条例》经珠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规范商事调解活动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共七章三十九条，主要规定了有关商事调解组织、商事调解员、商事调解程序、商事调解协议、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这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运用珠海经济特区立法权深化调解制度改革的生动实践，为合作区商事调解的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构建诉讼、仲裁、调解协同发展的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支持合作区打造国际商事争端解决的优选地，为进一步优化合作区营商环境，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 12 月 中国贸促会商法中心与佛山市人民政府、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在香港签署三方合作框架协议

12 月 11 日，由中国贸促会、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工商大会在香港开幕。大会签约环节，中国贸促会商法中心与佛山市人民政府、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签署了三方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三方将以促进合作、优势互补、共谋发展、提升共赢为目的，共同支持在佛山建设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大湾区中心，并在搭建实体平台、聚集市



场化商事法律服务供给、项目资源挖掘及信息共享、探索多领域商事纠纷争议多元解决路径、理论研究、法律人才培养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 12月 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湖南调解中心株洲办事处挂牌成立

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湖南调解中心株洲办事处挂牌成立，同时与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株洲市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关于推进涉外商事纠纷协调对接工作的合作备忘录》，加强涉外商事纠纷的诉调对接工作。中国贸促会湖南调解中心是以调解为主要方式，独立、公正帮助中外当事人解决商事、海事等争议的常设调解机构，此次在株洲市贸易促进委员会设立办事处，是积极应对当前复杂国际经贸形势、服务对外开放大局的创新之举。株洲办事处的设立，既是该市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行动，又是该市在推动贸易促进和纠纷解决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

## 12月 中国贸促会 / 中国国际商会江西调解中心揭牌仪式暨涉外商事调解培训交流活动成功举办

12月17日，中国贸促会 / 中国国际商会江西调解中心揭牌仪式暨涉外商事调解培训交流活动在江西南昌举行。江西省作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商事纠纷“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的通知》中的十个试点地区之一，是商事调解创新机制的先行者和实践者。此次活动的举办标志着江西省在商事法律服务领域迈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尤其是为推动商事纠纷“总对总”在线诉调对接机制方面培训了专业人才。贸促系统江西省国际商事一站式解纷工作室有关负责人，江西省国际商事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相关调解行业协会、高等院校、司法机构、律师事务所、企业代表等，总规模120人左右参加活动。

## 12月 深圳证监局赴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深圳国际仲裁院及其下属证券仲裁中心开展调研

深圳证监局与深国仲就优化辖区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加强调仲对接等事项开展深入交流，并就下一步做好调解中心工作达成共识。一是继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探索通过调解方式化解辖区资本市场纠纷，从源头防范化解矛

盾风险。二是加强并购争议解决中心建设，发挥其在辖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的纠纷调解和定分止争作用。三是加大非诉解纷文化的宣传引导力度，加强与法院、仲裁院沟通协作，形成辖区非诉解纷合力。四是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强化对调解员业务知识培训，组织开展行业经验交流，不断提升辖区调解工作能力。

## 附录 2：2023—2024 年度地方商事调解规范性文件

类型	名称	发布时间
省级 地方性法规	1. 安徽省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 (2023 修正)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14 届第 18 号)	2023.12.28
	2. 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 (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0 号)	2024.01.04
	3. 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条例 (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2 号)	2024.01.19
	4. 内蒙古自治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7 号)	2024.03.26
	5. 河北省多元化解纠纷条例 (2024 修正) (河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8 号)	2024.03.28
	6. 重庆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促进条例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6 届〕第 31 号)	2024.03.28
	7. 中国 (黑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 (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6 号)	2024.04.24
	8. 北京市外商投资条例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16 届〕第 20 号)	2024.05.31
	9. 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 (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1 号)	2024.07.31
	10.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服务工作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决定 (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5 号)	2024.09.26
设区的市 地方性法规	1. 潍坊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潍坊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41 号)	2023.12.01
	2. 长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长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5 号)	2023.12.19
	3. 长沙市知识产权保护若干规定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23 年第 10 号)	2023.12.21
	4. 东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2024.01.12
	5. 长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2024 修正) (长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8 号)	2024.04.02
	6. 佛山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 (佛山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3 号)	2024.04.07



类型	名称	发布时间
设区的市 地方性法规	7. 广元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广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0 号）	2024.04.11
	8. 崇左市优化营商环境规定（崇左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5 届第 15 号）	2024.06.07
	9. 阳江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阳江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2 号）	2024.08.01
	10. 海东市平安建设条例（海东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68 号）	2024.08.16
	11. 杭州市矛盾纠纷预防和多元化解条例（杭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1 号）	2024.10.09
	12. 南京市律师社会责任与执业保障条例（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22 号）	2024.10.11
经济特区 法规	深圳经济特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条例（2024 修正）（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144 号）	2024.05.10
地方 政府规章	1. 济南市促进多元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济南市人民政府令第 290 号）	2023.12.25
	2. 珠海经济特区行政争议调解办法（珠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153 号）	2024.01.19
地方 规范性文件	1.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服务浦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打造上海国际法律服务中心核心承载区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府办规〔2023〕24 号）	2023.12.11
	2.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圳市罗湖区行政调解实施办法》的通知（罗府办规〔2023〕6 号）	2023.12.13
	3. 南京市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	2024
	4.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领域专项资金操作规程》的通知（2024）（深市监规〔2024〕5 号）	2024.01.26
	5. 上海市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联席会议印发《关于推进上海社会组织协商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沪社建联〔2024〕1 号）	2024.04.18
	6.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持续打造“三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24〕7 号）	2024.05.10



类型	名称	发布时间
地方 规范性文件	7.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关于支持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高端法律服务业集聚的实施办法(修订)》的通知(2024)(深前海规〔2024〕8号)	2024.05.19
	8.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印发《关于促进本市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沪司发〔2024〕44号)	2024.05.22
	9.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司法局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诉调对接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司发〔2024〕48号)	2024.06.03
	10. 舟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创新发展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的决定(舟人大常〔2024〕21号)	2024.06.26
	11.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商外资〔2024〕157号)	2024.07.11
	12.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行政调解规定》的通知(深府规〔2024〕7号)	2024.08.03
	13. 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奋力争当新时代改革开放示范的实施意见	2024.08.31
	14. 深圳市律师协会律师参与会展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操作指引	2024.10.08
	15. 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浦东新区著作权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浦府管规〔2024〕6号)	2024.10.11
地方 司法文件	16.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高地若干政策的通知(豫政办〔2024〕65号)	2024.11.07
	1.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十条措施” 2.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2023 年度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八大典型事例	2024.01.12 2024.01



类型	名称	发布时间
地方 工作文件	1.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 10 个人民法庭推进乡村振兴方面的典型案例	2023.12.01
	2. 三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亚市创建一流营商环境 2023 年实施方案》的通知（三府办〔2023〕181 号）	2023.12.07
	3. 浙江省司法厅关于建立调解组织名册管理制度的通知（浙司〔2023〕120 号）	2023.12.14
	4. 南宁市司法局关于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32 号代表建议的补充答复（南司函〔2023〕504 号）	2023.12.19
	5. 南宁市司法局关于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303 号代表建议的补充答复（南司函〔2023〕505 号）	2023.12.19
	6.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五批自治区级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工作的通知（桂政函〔2023〕151 号）	2023.12.22
	7.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发挥城市功能优势 做强律师事务所品牌 加快推动上海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建设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沪府办规〔2023〕32 号）	2023.12.29
	8. 广州市司法局关于 2023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2024
	9. 加快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	2024
	10. 南宁市司法局 2023 年工作总结和 2024 年工作计划	2024
	11. 长春市司法局关于 2023 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	2024
	12.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行动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24〕9 号）	2024.01.12
	13.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十四五”营商环境和社会信用体系发展规划的通知（2024 修订）（豫政〔2024〕5 号）	2024.01.12
	14.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坚持对标改革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通知（沪府办发〔2024〕1 号）	2024.01.13



类型	名称	发布时间
地方 工作文件	15. 四川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关于 2023 年度完成换届备案程序的全省性社会组织名单的公告	2024.01.15
	16. 成都市民政局关于同意成都锦观民商事调解中心成立登记的批复（成民审〔2024〕10 号）	2024.01.18
	17. 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公布 2024 年 1 月 26 日发行政府债券信息披露文件的通知	2024.01.19
	18. 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钦州市贯彻落实《广西提质增效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钦政办〔2024〕2 号）	2024.01.22
	19. 宁波市政府购买服务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公布 2024 年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的通知	2024.01.25
	20. 十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十堰联动创新发展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十政办发〔2024〕9 号）	2024.01.25
	21. 南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核准 2024 年第三批重新申请南宁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符合保障条件人员保障资格的通告	2024.01.26
	22. 无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无锡市推进民营企业科技自立自强行动方案等文件的通知（锡政办发〔2024〕2 号）	2024.01.29
	23. 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24 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部署工作责任分工的通知（穗府〔2024〕1 号）	2024.02.06
	24. 福州市司法局关于印发《2024 年全市司法行政工作思路》的通知（榕司〔2024〕17 号）	2024.02.07
	25.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明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2024 年重点工作责任单位的通知（豫政〔2024〕9 号）	2024.02.07
	26.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嘉定区坚持对标改革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通知（嘉府办发〔2024〕2 号）	2024.02.09
	27. 邯郸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落实方案的通知（邯政字〔2024〕2 号）	2024.02.19
	28. 厦门市司法局关于印发 2024 年全市司法行政工作要点的通知（厦司〔2024〕23 号）	2024.02.22

类型	名称	发布时间
地方 工作文件	29. 双鸭山市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双鸭山市 2024 年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2024.02.26
	30. 商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2024 年重点工作责任单位的通知（商政办〔2024〕6 号）	2024.02.29
	31. 大庆市司法局关于印发《关于建立“大庆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法律服务中心”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4.03.01
	32.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 年普法工作计划》的通知（鲁发改法规〔2024〕148 号）	2024.03.03
	33.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聚焦“创新四力”升级“四大服务”杨浦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暖城区实施方案》的通知（杨府发〔2024〕3 号）	2024.03.04
	34.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4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沪府办发〔2024〕6 号）	2024.03.11
	35. 南京市民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南京市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通知（宁社管〔2024〕31 号）	2024.03.12
	36. 乳山市司法局关于印发《乳山市司法局 2024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乳司发〔2024〕3 号）	2024.03.13
	37.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1 + 7”法务区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郑政办〔2024〕14 号）	2024.03.14
	38.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方案(2024—2027 年)》的通知（渝府办发〔2024〕27 号）	2024.03.22
	39. 厦门市司法局关于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第 20244007 号提案办理情况答复的函（厦司函〔2024〕25 号）	2024.03.26
	40.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禅城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4 年版)的通知	2024.03.27
	41. 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构建佛山“益晒你”企业服务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2024 年度版)的通知（佛府〔2024〕1 号）	2024.03.28





类型	名称	发布时间
地方 工作文件	42.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4 年威海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的通知（威政办字〔2024〕9 号）	2024.03.28
	43.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 2024 年经营主体深化年行动方案的通知（晋政办发〔2024〕13 号）	2024.03.28
	44. 河北省司法厅关于印发《公证减证便民提速十条措施》的通知	2024.04.08
	45. 成都市民政局关于同意成都民为商事调解中心成立登记的批复（成民审〔2024〕39 号）	2024.04.08
	46. 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管委会关于修订印发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支持海丝中央法务区自贸先行区建设的若干措施（2024—2027）的通知（2024）	2024.04.12
	47. 青岛市司法局等九部门关于印发《“服务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法律服务行动方案》的通知（青司发〔2024〕10 号）	2024.04.12
	48. 厦门市司法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0206 号建议办理情况答复的函（厦司函〔2024〕35 号）	2024.04.22
	49.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十大创新”“十强产业”“十大扩需求”行动计划（2024—2025 年）的通知（鲁政发〔2024〕5 号）	2024.04.22
	50. 威海市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4 年乳山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的通知（乳政办发〔2024〕2 号）	2024.04.23
	51.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推进数字贸易强市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的通知（杭政办函〔2024〕25 号）	2024.04.23
	52. 天津市司法局对市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0061 号建议的办理答复	2024.04.23
	53.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哈尔滨市 2024 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哈政发〔2024〕20 号）	2024.04.24
	54. 苏州市第三届十大特邀调解典型案例	2024.05
	55.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自治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通知（内政发〔2024〕16 号）	2024.05.08
	56. 成都市民政局关于同意成都雅署商事调解中心成立登记的批复（成民审〔2024〕50 号）	2024.05.08



类型	名称	发布时间
地方 工作文件	57.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高明区构建全周期企业服务关爱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2024 年度版）》的通知（明府办〔2024〕3 号）	2024.05.11
	58. 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梅州市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服务“百千万工程”行动方案的通知（梅市府办〔2024〕2 号）	2024.05.13
	59. 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关于青岛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会字第 245 号代表建议关于设立市场化商事调解中心的办理意见	2024.05.15
	60. 中共重庆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第 0102 号提案答复的函（渝委金议〔2024〕30 号）	2024.05.20
	61. 北京市东城区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 年度东城区“两区”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东服开办〔2024〕2 号）	2024.05.21
	62. 上海市司法局关于举办第三届“新时代上海司法为民好榜样”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沪司发〔2024〕43 号）	2024.05.21
	63. 宁波市司法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82 号建议的答复	2024.05.22
	64. 广州市南沙区司法局、广州市南沙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广州市南沙区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印发《广州市南沙区深化民营企业“法治体检”暖商护企行动计划（2024—2026 年）》的通知	2024.05.23
	65. 青岛市司法局关于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第 498 号提案的办理答复意见	2024.05.24
	66. 江苏省司法厅、江苏省工商联、江苏省律师协会关于印发《2024 年法律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十项举措》的通知（苏司通〔2024〕12 号）	2024.05.27
	67. 杭州市司法局关于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 293 号提案的答复	2024.05.28



类型	名称	发布时间
地方 工作文件	68. 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包头市持续打造“包你满意”、“包你放心”一流营商环境品牌若干措施的通知（包府发〔2024〕40号）	2024.05.28
	69. 杭州市发改委关于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桐庐13号建议的答复	2024.05.29
	70. 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烟台市人民政府2024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计划的通知（烟政办发〔2024〕8号）	2024.05.30
	71. 石嘴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石嘴山市2024年营商环境提升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石政办发〔2024〕29号）	2024.05.30
	72. 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龙湖区关于支持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专项扶持措施》的通知（汕龙府办〔2024〕10号）	2024.05.31
	73. 广州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穗营商办〔2024〕3号）	2024.06.05
	74. 四川省对外开放暨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标领航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开放领〔2024〕1号）	2024.06.06
	75. 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无锡市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2024的通知（锡政发〔2024〕13号）	2024.06.06
	76. 惠州市司法局对惠州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2024118号提案的答复（惠市司案〔2024〕第8号）	2024.06.07
	77. 宜春市司法局关于市政协五届四次会议第0189号提案答复的函（宜司提字〔2024〕4号）	2024.06.11
	78. 江苏省司法厅对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0355号提案的答复（苏司〔2024〕96号）	2024.06.13
	79. 上海市司法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司法局关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若干举措》的通知（沪司发〔2024〕49号）	2024.06.14
	80. 吕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吕梁市2024年经营主体深化年行动方案的通知（吕政办发〔2024〕18号）	2024.06.20

类型	名称	发布时间
地方 工作文件	81. 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面构建营商大格局打造办事“标准之城”实施方案的通知（银政办发〔2024〕46号）	2024.06.20
	82. 扬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决议	2024.06.28
	83. 台州市司法局关于市政协六届三次会议第 2024041 号提案答复的函	2024.07.02
	84. 中共南京市司法局党组关于市委第五轮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2024.07.05
	85. 南宁市司法局关于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第 147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南司函〔2024〕270号）	2024.07.08
	86.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关于市政协十四届广州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 2109 号提案答复的函	2024.07.10
	87. 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对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269 号建议的答复函（陕知函〔2024〕102号）	2024.07.10
	88. 陕西省司法厅对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718 号提案的答复函（陕司函〔2024〕305号）	2024.07.11
	89. 安徽省商务厅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0175 号提案答复的函	2024.07.15
	90.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中韩自贸区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的通知（威政办字〔2024〕26号）	2024.07.15
	91. 中共北京市司法局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司法局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京司党发〔2024〕38号）	2024.07.17
	92. 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深化推动“有呼必应”品牌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4—2025年）的通知（呼政发〔2024〕29号）	2024.07.17
	93. 陕西省司法厅对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266 号建议的答复函（陕司函〔2024〕326号）	2024.07.21
	94. 河南省司法厅对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 1320118 号提案的答复	2024.07.22
	95. 河南省司法厅对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919 号建议的答复	2024.07.22

类型	名称	发布时间
地方 工作文件	96. 河南省司法厅对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589 号建议的答复	2024.07.22
	97. 宜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宜兴市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 2024 的通知（宜政发〔2024〕95 号）	2024.07.22
	98.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湖南省“信易+”惠民便企场景建设项目（第一批）》的通知（湘发改财信〔2024〕619 号）	2024.07.25
	99. 中共云南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意见	2024.07.29
	100. 湖北省司法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20240139 号建议的答复	2024.07.31
	101. 山东省商务厅、青岛海关、济南海关、山东省口岸办公室、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山东海事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支持海关高级认证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外贸固稳提质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2024.08.05
	102. 郑州市司法局关于人民法院通过律师行业市场化调解多元化解诉源建议的答复	2024.08.07
	103. 坪山区司法局 2024 年度区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总结	2024.08.07
	104.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推进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近期重点工作举措（2024—2025 年）》的通知（沪发改改革〔2024〕13 号）	2024.08.29
	105.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内外贸一体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浙政办发〔2024〕30 号）	2024.09.02
	106. 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发布 2023 年年检合格全省性社会组织名单的公告	2024.09.11





类型	名称	发布时间
地方 工作文件	107.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闭会期间第 1196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意见（杨府〔2024〕26 号）	2024.09.18
	108. 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加力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的通知（杭政办函〔2024〕52 号）	2024.09.23
	109. 上海市商务委、上海市发展改革委、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印发《关于支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沪商规〔2024〕15 号）	2024.09.29

### 附录 3：2023—2024 年度全国登记的商事调解组织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自由贸易 试验区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奉公民事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2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证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直辖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重庆市九龙坡区利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2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市虹口北外滩多元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2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生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2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奉贤区东方美谷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2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闵行区星虹桥金融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1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天津市西青区智调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1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市垫江县百众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2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和顺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2.2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徐汇区言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02.2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天津市武清区智调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0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贸促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0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天津市滨海新区众信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1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市公平云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2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市宝山泛亚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2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直辖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重庆市九龙坡区法渡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2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枫华商事调解事务所	2024.04.0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合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0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江北华澍弘益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中朵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2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浦东新区中道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2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浦东新区中泰金融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2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枫景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1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允衡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2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徐汇律英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3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江北中信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3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智城商事调解事务所	2024.06.0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奉贤区海纳缘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正信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1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徐汇区合盈澄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市江北区协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奉贤区正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直辖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上海奉贤区仲融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公正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市九龙坡区合知信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徐汇区汇邦金融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市綦江区多元解纷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高新区正信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徐汇区商联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天津市河东区 中和法政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1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闵行区至信金融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1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市江北区公信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2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天津市宁河区重光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2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市北碚区致中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2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市九龙坡区法讯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2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天津市河西区万聚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2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市普陀惠锦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1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两江新区福泓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2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重庆市九龙坡区兼善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1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直辖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上海浦东新区上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1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虹口正明金融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1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天津市宝坻区德道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2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上海徐汇区和为贵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0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设区的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郑州航空港区和顺数科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0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滨州黄河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0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汉市武昌区鑫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0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晋中市广厦房地产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鄂尔多斯众和诚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1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青岛市城阳区志伟民商事调解工作室	2023.12.1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证信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1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杭州市滨江区悦城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2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华容县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2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魏县和协金融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2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 协成民商事调解服务中心	2023.12.2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无锡市新吴区博爱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2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苏州市吴中区捷诚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2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设区的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襄阳市襄州区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2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玉林市利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3.12.2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公安县枫桥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0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宝安区星湾信用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0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宝安区君合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0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汉市武昌区楚融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0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广饶县信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1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汉市武昌区锦瑜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1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廊坊市广阳区丰勤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1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临沂市河东区政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1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邯郸市复兴区雷石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1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盐城市亭湖区和融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1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法言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1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中卫市多元解纷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1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杭州市拱墅区建华律威 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1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成都锦观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1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磁县惠民金融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1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设区的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丰宁满族自治县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2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中江县数智法辅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2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淄博市张店区正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3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玉林市强国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3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威县鼎正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3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监利市守正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3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罗湖区百朋商事调解中心	2024.01.3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 众合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2.0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杭州市富阳区春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2.0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苏州市相城区达因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2.0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佛山市高明区正道商事调解中心	2024.02.0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邯郸市邯山区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2.0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临沂市兰山区清正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2.0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罗湖区意鑫商事调解中心	2024.02.0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襄城县信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2.1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西安市陆港商事调解中心	2024.02.2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福田区中孚商事调解中心	2024.02.2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设区的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广西商事调解中心	2024.02.2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防城港市法泰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0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成都市双流区众联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0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杭州市拱墅区法易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0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宝安区国云高新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巴彦淖尔普惠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1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东营市齐鲁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1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郑州经开区法哲经贸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1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昆明市西山区善治商事调解服务中心	2024.03.1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南京市建邺区智解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1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南京市建邺区和泰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1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淮安市和韵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1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无棣县通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1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东营市文卓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2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玉林市福绵区福信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2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湖北理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2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消费保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2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设区的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意众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2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毕节市七星关区壹诺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2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东营市大正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2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东营市华海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3.2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仁和民商事 调解中心	2024.03.2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溆浦县红花园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0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宝安区壹诺金融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0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第五师双河市中正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0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长沙市众和金融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0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安市诚善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0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永城市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0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巴东县奇源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0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广合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0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成都民为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0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杭州市富阳区中正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0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磐石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瑞安市瑞信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设区的市内的商事调解组织	东营市河口区 军园民营企业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罗湖区蓝翊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1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西安市天平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1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柳州市柳江区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1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宁波市镇海区知行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1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寿光市悦成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1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无锡市新吴区丹宁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1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桂林市诉源金融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2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宁波市鄞州区鄞源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2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成都守正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2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南通市通联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2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汕头市荣信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2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西安市蓝田县德润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4.2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张家口市鼎典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0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张家口市崇礼区泓毅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0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 白杨市迎通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0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广州市天河区天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0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设区的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陕西正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0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成都雅署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0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宁波高新区诚信云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0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德州市德城区鸿泰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1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榆林中允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1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杭州市富阳区正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赣州市章贡区赣商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肇东市枫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1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丰宁满族自治县企业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1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宜昌市弘义法律咨询 专家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1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泰安市众鑫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1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文昌市同理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1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同正民事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1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东莞市汇和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2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合作市诉理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2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张家口百川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3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昆明市澜湄国际 法律查明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3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设区的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石家庄市信融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3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阜阳市颍淮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5.3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惠州市惠证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0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成都上工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0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南京市建邺区维信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0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济南市莱芜区鲁誉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梧州市万秀区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宁波市镇海区法润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1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广安市金证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1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衡水市冀州区众信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1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大连高新区国信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1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青冈县青法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1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海宁市宁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1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长沙市邵商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1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肇庆市金桥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1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南宁多元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1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盐城市亭湖区和韵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2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设区的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柳州市柳北区神州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2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淮南市田家庵区谐治一法民 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2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余姚市舜合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2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西安市融合国际商事调解中心	2024.06.2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长沙县中信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长沙县智茂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广州市白云区尚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广州市白云区君胜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张家口市张房住宅与房地产 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双鸭山市宏泰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绥棱县绥新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安市方圆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协和云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青岛市法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0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绥化市北林区联合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胶州市润禹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东营市东营区天平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设区的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武汉市硚口区世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杭州市富阳区协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铜仁市碧江区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赣州市律谐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广安众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银川市普惠金融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胶州市新城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济宁市济州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伊春市多元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济南亲清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汉市武昌区筑武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 观复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汉市武昌区数智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永兴县新华元民商事调解服务中心	2024.07.1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兰州市城关区汇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1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汉市硚口区和立方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2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巨鹿县法诉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2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设区的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深圳市罗湖区邦正金融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2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遵义市红花岗区国仲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2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哈尔滨市普信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2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盐城市盐南高新区 裕民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2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南山区全景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2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济南市历下区泉商商会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3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哈尔滨市惠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3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宝安区 邦律信用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7.3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泰安市泰山区商会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0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安市奉法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0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长沙市华湘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0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银川市久思多元解纷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0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张家口市丰勤易讼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0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哈尔滨市合众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0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汉市武昌区正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0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罗湖区息讼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0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龙华区德正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0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设区的市内的商事调解组织	哈尔滨市信德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0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原阳县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1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广州市天河区中正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1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菏泽市牡丹区证信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1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哈尔滨市银知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1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南京市浦口区聚慧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1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深圳市罗湖区中博信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1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汉市硚口区杰衡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1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枣强县阳光民商事调解	2024.08.1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伊春市和谐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1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铁力市万通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2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滨海县民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2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江山市江律商事调解中心	2024.08.2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日照市东港区厚德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0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望奎县百宏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0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汉市武昌区琥珀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0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广安葵花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0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设区的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利津县合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0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邑金融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0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咸宁市咸安区数智金融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1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广州市白云区鼎翊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1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瑞丽市仁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德州市德城区慧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1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乐东黎族自治县金诺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1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广州市增城区金桥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1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南京市建邺区和邳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2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宁波市东方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2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张家港市正和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2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张家港市邗吉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2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哈尔滨市律通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2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临沂市罗庄区厚润商会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2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邱县中安正扬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09.3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唐山市路南区 文轩民商事调解服务中心	2024.10.0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哈尔滨市嘉程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0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设区的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柳州市柳江区柳安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1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苏州市吴江区律合携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1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善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1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枣阳市启言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1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湖南省商事调解协会	2024.10.14	社会团体
	哈尔滨市君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1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大庆市国信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1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阜宁县正信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1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 公信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1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隆尧县云诉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1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衡水市和泰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2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饶阳县阳光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2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曲靖市沾益区民营企业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2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海原县法仲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23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盘锦市兴盛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2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汉市江夏区乐信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2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 信任度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2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种类	组织名称	成立时间	登记性质
设区的市内的 商事调解组织	北海市海城区和顺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10.30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哈尔滨市奕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01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哈尔滨市和盛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04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哈尔滨市法平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0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淮安市法润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0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湛江市霞山区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0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哈尔滨市新枫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0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九江市中冶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0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辉县市辉证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0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壹号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06	民办 非企业单位
	绍兴市越城区会会通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0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武胜县数律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07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宜昌市猇亭区产业园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08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广州市南沙区同理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12	民办 非企业单位
	故城县政融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1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哈尔滨市仁和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1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鸡西市惠仁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15	民办 非企业单位
	十堰市和信民商事调解中心	2024.11.19	民办 非企业单位



## 附录 4：2023—2024 年度商事调解学术活动汇总表

举办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主题	主办方
2023 年 12 月 8 日	第十六届“WTO 法与中国论坛”分论坛暨第三届三亚国际商事调解论坛	海南特色涉外法治人才体系建设	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海南法学会
2023 年 12 月 14 日	第五届上海商事调解宣传周——外资企业调解实务沙龙	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商事调解跨境合作的探索与实践等	南京西路街道党工委
2023 年 12 月 19 日	国际商事调解公益主题研讨会	国际商事调解拓宽多元化国际争议解决路径、国际调解员公信力是国际商事调解的生命线	“一带一路”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上海市国际服务贸易行业协会等共同主办
2023 年 12 月 20 日	“国际商事调解的谈判技巧及应用”线上专题讲座	国际商事调解的谈判技巧及应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深圳市委员会
2024 年 3 月 8 日	商事调解理论与实务研讨会	商事调解的创新与发展、商事调解的立法模式等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调解学院）
2024 年 3 月 11 日	“商事调解的理论与实务”专题讲座	商事调解的理论与实务	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2024 年 3 月 14 日	商事调解发展趋势与调解技巧讲座	商事调解发展趋势与调解技巧	上海市企业法律顾问协会
2024 年 3 月 18 日	西安市商事调解专题讲座培训会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国际商事调解、商事调解法律实务概述等	西安市司法局
2024 年 3 月 19 日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的新发展专题讲座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的新发展	北京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
2024 年 3 月 21 日	“企业国际化合规经营：商事调解的道与术”线上调解专题讲座	企业国际化合规经营：商事调解的道与术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深圳市委员会

举办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主题	主办方
2024 年 4 月 23 日	“商事纠纷中的 调解实务”培训会议	商事纠纷中的 调解实务	中山市律师协会、 广东省律师协会商 事调解专业委员会
2024 年 4 月 27 日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事 调解专业交流会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调 解风控暨培训质效论 略、商事调解在中国 的司法确认等	广东省律师协会粤 港澳大湾区工作委 员会与跨境争议解 决法律专业委员会
2024 年 5 月 1 日	“企业国际化合规经营： 赋能跨境电商商事调解 先行”线上调解专题讲座	企业国际化合规经营： 赋能跨境电商商事 调解先行	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 深圳市委员会
2024 年 7 月 8 日	金融法论坛系列讲座第 三十期：多元调解解决纠 纷模式在商事领域的应用	多元调解解决纠纷模 式在商事领域的应用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 务所
2024 年 8 月 1 日	2024 年度广东省法学会涉 外法治人才培训班（第三 期）商事调解培训活动	国际商事调解	广东省法学会
2024 年 8 月 2 日	第十二届全国调解理论 与实务研讨会	调解法治化、信息化 与多元共治	上海政法学院
2024 年 8 月 10 日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调解 中心商事调解系列讲座	中国商事调解的 新理念与新思维、 商事调解产业如何 在中国生根发芽等	湖南省法学会诉讼 法学研究会、中国 中小企业协会 调解中心
2024 年 8 月 22 日	第八届国际调解 高峰论坛	深化解纷机制改革， 推进经贸投资发展	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 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2024 年 9 月 1 日	“商事调解机制创新 发展”2024 年第三季度 法治观察会	商事调解机制 创新发展	宝山区委 依法治区办
2024 年 9 月 11 日	“商事调解在律师业务中 的作用”专题讲座	商事调解在律师 业务中的作用	山西省律师协会
2024 年 9 月 11 日	“企业国际化合规经营： 国际贸易中商事调解的 应用”线上讲座	企业国际化合规经营： 国际贸易中商事调解 的应用	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 深圳市委员会

举办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主题	主办方
2024 年 9 月 21 日 至 22 日	全球视野下的国际商事 仲裁和调解高峰论坛 及培训会	全球视野下的 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	亚太国际仲裁院 香港仲裁中心
2024 年 9 月 25 日	民商事调解 热点问题研讨会	浦东新区商事调解立 法前瞻、民商事调解 的大公实践等	广信君达（上海） 律师事务所
2024 年 9 月 25 日	2024 年深圳调解周第 3 场 活动——数字金融和普惠 金融争议调解宣传活动	打造金融争议 多元化解高地	深圳市司法局、 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深圳市 地方金融管理局
2024 年 10 月 10 日	无锡国际商事争端 解决交流会	打造国际商事争端 解决优选地，服务 无锡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贸促会 无锡市委员会
2024 年 10 月 14 日	第二届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仲裁调解周 “商事调解制度的 创新发展圆桌沙龙”	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 商事调解的改革创新 和持续发展	珠海国际仲裁院 （横琴国际仲裁中 心）、横琴国际 商事调解中心
2024 年 10 月 15 日至 16 日	第六届亚洲调解协 会（Asian Mediation Association）大会	调解与替代性纠纷 解决方式中的和与 战略创新	菲律宾 最高法院
2024 年 10 月 17 日	海南自由贸易港 国际商事调解交流会	法治自贸港·与世界 对话	海南省律师协会、 “一带一路”律师 联盟海口代表处
2024 年 10 月 22 日	2024 华语律师大会（专题 活动）——跨境商事调解 合作发展路径探索	跨境商事调解合作 发展路径探索	深圳市前海国际 商事调解中心、深 圳市商事调解协会
2024 年 10 月 24 日	线上讲座：探索调解的 力量：解锁国际商事纠纷 新解法	探索调解的力量： 解锁国际商事纠纷 新解法	中国贸促会 调解中心
2024 年 10 月 24 日	东莞理工学院国际学术周 主题讲座：国际商事争议 解决的香港实践	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 香港实践	东莞 理工学院
2024 年 11 月 1 日	商事调解思维养成课讲 座：让商业纠纷解决 回归商业本质	让商业纠纷解决 回归商业本质	中国贸促会 调解中心



举办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主题	主办方
2024 年 11 月 6 日	中国人民大学第十一届“明法学术月”开幕讲座: 一带一路商事多元化解决机制新进展讲座	一带一路商事多元化解决机制新进展讲座	中国人民大学
2024 年 11 月 8 日	第三届新时代调解论坛	新时代新征程调解制度的创新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湘潭大学、宁波市人民调解协会
2024 年 11 月 9 日	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年度论坛	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打造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4 年 11 月 12 日	东京·2024 中国商事争议解决高峰论坛——第二环节	当事人视角下的商事调解：期待、挑战、前景	北京仲裁委员会 / 北京国际仲裁中心 (BAC/BIAC)、环太平洋律师协会 (IPBA)、日本商事仲裁协会 (JCAA)、日本国际仲裁综合研究所 (JIART)
2024 年 11 月 14 日	首尔·2024 中国商事争议解决高峰论坛——第二环节	用户视角下的商事调解：挑战、期待与前路	北京仲裁委员会 / 北京国际仲裁中心 (BAC/BIAC)、大韩商事仲裁院 (KCAB)
2024 年 11 月 16 日	调解工作体系与商事调解立法研讨会暨上海市法学会多元解纷法治研究会 2024 年年会	上海调解工作体系建设研究、商事调解组织与工作机制研究等	上海市法学会多元解纷法治研究会、同济大学法学院
2024 年 12 月 7 日	继承并发扬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暨国联政信民商事研讨会	继承并发扬新时代的“枫桥经验”	北京国联政信科技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13 日	“第十七届 WTO 法与中国论坛”暨 2024 年 WTO 法学术年会边会暨第四届三亚国际商事调解论坛（广州场）	海南自贸港封关启航的法治保障——深化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建设与实践	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广东省法学会



举办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主题	主办方
2024 年 12 月 18 日	第三届国际调解论坛 ( 2024 )	调仲诉机制结合、 跨文化国际调解等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 法学院、中国政法 大学仲裁研究院
2024 年 12 月 28 日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金融司法前沿论坛第十期	商事金融纠纷多元解 决机制的理论与实践	上海财经大学 法学院

## 附录 5：国际商事调解相关文件和规则名称对照表

序号	中文全称	英文全称	中文简称	英文简称
1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新加坡调解公约》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2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调解规则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ediation Center Mediation Rules	/	/
3	美国司法仲裁调解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国际调解规则（2011）》	Judicial Arbitration and Medi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Rules 2011	《国际调解规则（2011）》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Rules 2011
4	国际预防和解决冲突研究所《国际调解程序（2017）》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 Resolution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Procedure 2017	《国际调解程序（2017）》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Procedure 2017
5	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国际争端解决程序》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ispute Resolution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s	《国际争端解决程序》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s
6	美国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和调解程序（包括对大型、复杂的商事纠纷的赔偿金）》	American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Rules and Mediation Procedures Including Procedures for Large, Complex Commercial Disputes	/	Arbitration Rules and Mediation Procedures Including Procedures for Large, Complex Commercial Disputes
7	日本商事仲裁协会《商事调解规则》	Jap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ssociation Commercial Mediation Rules	/	JCAA Commercial Mediation Rules



序号	中文全称	英文全称	中文简称	英文简称
8	澳大利亚 商业争议中心 《商事调解指南》	Australian Disputes Centre Guidelines for Commercial Mediation	/	Guidelines for Commercial Mediation
9	《新加坡国际调解 中心调解规则》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Centre Mediation Rules	《SIMC 调解 规则》	SIMC Mediation Rules
10	《国际商会 调解规则》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Mediation Rules	《ICC 调解 规则》	ICC Mediation Rules
11	《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调解规则》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Mediation Rules	《WIPO 调解 规则》	WIPO Mediation Rules
12	《国际投资争端解 决中心调解规则》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Mediation Rules	《ICSID 调解 规则》	ICSID Mediation Rules
13	《联合国国际贸易 法委员会国际投资 争端调解准则》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Guidelines on Med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国际投资 争端调解 准则》	UNCITRAL Guidelines on Med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Disputes
14	《联合国国际商事 调解和调解所产生 的国际和解协议示 范法》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Med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	《国际商事 调解示范法》	Model Law on Mediation